

柳州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柳州抗战史录

政协柳州市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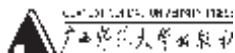
柳州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柳州抗战史录

LIUZHOU
KANGZHAN
SHILU



政协柳州市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 桂林 ·

序

以史为镜,方知兴替。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之际,巍巍中华那段屈辱而难忘的岁月,那段可歌可泣的故事,那段荡气回肠的抗争史再一次叩开我们记忆的闸门。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义无反顾、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同仇敌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

1944年11月,古城柳州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成为八年抗战中中国最后沦陷的城市之一。之后的七个多月,柳州遭遇了建城两千多年来空前的浩劫。作为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柳州既是西南抗战的大后方,又是抗击日军的最前线。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柳州人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宣言和国共统一战线的号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悲壮的诗篇。

抗战中的柳州,涌现了一大批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迹和令人敬仰的爱国志士。面对铁蹄践踏下劫后余生的龙城,面对日军的疯狂空袭,面对抗日救亡的强烈呼声,柳州人民浴血奋战,用生命和血汗抒写着慷慨雄浑的悲歌。我们不会忘记异常惨烈的桂南会战、桂柳会战,不会忘记“断头不做降将军”的抗日师长阚维雍、魂系国家兴亡的廖磊、英年早逝的抗日虎将陈烈……不会忘记在抗日战场上英勇献身的仁人志士和感人事迹!柳州人民将永远铭记这些为抗战胜利做出宝贵贡献的爱国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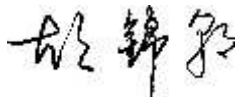
抗战中的柳州,凝聚了以抗战文化为载体的强大精神力量。抗战爆发后,柳州的先进知识分子和旅柳文化名人以文化创作、文艺活动和新闻宣传为载体,组

织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以巴金、茅盾、夏衍、丰子恺、秦牧、徐悲鸿等为代表的旅柳文化名人,以陆田、黄荣灿、余武章、潘文经、邓俊群为主的柳州艺术家,与广大文艺工作者一道,通过书画、诗词、话剧等形式,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正是他们,凝聚了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抗战的思想共识,激励着柳州人民克服艰难险阻、团结奋力抗战的强大精神动力。

抗战中的柳州,传承了广西工业重镇的情怀和实业报国的优良传统。作为民国时期广西“工业的心脏”和广西工业重镇,柳州后方工业在沦陷区工厂内迁、新桂系发展军力等因素的刺激下,工业发展曾极一时之盛。同时,金融商贸、农业、教育和城市建设也在抗战中艰难发展,1940年柳州建成柳江铁桥,奠定了柳州西南地区交通中心的地位。虽然1944年日军攻陷柳州,柳州城区遭受了大规模的破坏和焚毁,工业和城市发展受到了重创,但是柳州人民传承了以工业为荣的“重工主义”情怀和实业兴邦的优良传统,为战后工业柳州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正处在和平时期的我们,正纪念着抗战胜利的我们,缅怀历史,勿忘国耻,更要警钟长鸣。抗战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由危机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永载中华民族史册!革命先烈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不倒旗帜和永恒丰碑!

我们应当铭记那段历史。



(作者系柳州市政协主席)

2015年5月20日

前言：柳州抗战与抗战文化

抗日战争初期,战场主要在中国北方地区和沿海地区,柳州地处西南,属于后方地区;另一方面,柳州交通便利,地处湘桂、湘黔铁路汇合处,航运可直达广州、香港,公路可通桂林、南宁,柳州机场是抗战时期华南最重要的军用机场,从柳州起飞的战机可对台湾、大陆及东南亚日占区进行轰炸,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抗战爆发后,文艺界人士和抗日文化青年在“到大后方去”、“到延安去”的口号影响下,纷纷奔赴内地,桂林因为大批文化人云集及进步报刊集中而被称为文化城,毗邻桂林的柳州与之呼应,又因为是转往大西南昆明、重庆的交通要道,大批文化名人、机关人员、难民途经或滞留柳州,抗战文化也空前繁荣起来。

(一) 华南抗战的军事中心

国民政府认识到柳州的重要军事地位,通过修建军用机场、加强城防建设,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移驻柳州等措施,加强柳州军事建设。柳州成为华南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基地。

1. 建设机场,培养空军人才。1929年桂系主政的广西省政府为与广东省合办航空运输,修建了柳州帽合机场,初建时规模很小,面积只有0.5平方公里,供小型飞机起降。同年3月中旬开始征用柳州市河南帽合标营前一带土地,雇用附近农民修筑帽合机场。4月,帽合机场竣工,并首次降落广东航空处的“中山号”飞机。1932年10月,广西航空管理处从南宁迁到柳州帽合机场,建筑房屋和机库。1934年4月,成立第四集团军航空学校,帽合机场成为广西空军的主要

训练基地。同年11月,帽合机场扩修。1939年冬,帽合机场为苏联空军志愿队使用。1941年3月,国民党第46军第170师第501团进驻柳州帽合机场,担任扩建机场任务,年底扩建完成,成为美国志愿空军陈纳德上校领导的“飞虎队”基地之一。1943年柳州帽合机场进行第三次扩修,机场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为当时广西最大的军民两用机场。柳州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中美空军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最重要的前沿空军基地之一。

2.进行城防工事建设。今存张公岭环山工事碉堡群遗址、小鹅山防御工事群、金鸡岭碉堡、鸡喇碉堡等遗迹。1933年柳州城厢民团后备队配合桂军第7军24师和军工兵营,大规模筑建城防工事。柳江南岸东南地区,均筑有战车防御壕、散兵壕,壕内有掩体坑道、指挥所及炮台。在柳江南岸东南、正南和西南地域,各筑有混凝土碉堡10余个。柳江北岸筑有混凝土碉堡10余个。张公岭作为桂系第七军驻防柳州军事要地,原柳州城厢民团后备队奉令配合国民党第7军20师工兵于1942年10月在岭上环山修建战壕,有掩体、坑道、指挥所及炮台等,可容纳1000人战斗。1944年7月,为抵御侵华日军,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张发奎下令国民党第46军在柳州市郊构筑工事,张公岭在原有工事的基础上加固了一些战壕和碉堡。张公岭有着完整的地下防御工事,特别是掩体坑道有两层,上下成“之”字形设计,错综复杂,环山而建,共有三层防线,一直延伸到旧飞机场。战壕宽3米,深3米,周长2000米,明暗碉堡星罗棋布,有着独特的军事防御功能。这些战壕和碉堡保存至今,成为研究柳州军事史的重要实物。

(二)军事会战的重要目标

1.桂南会战。1939年11月,日本为了达到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的目的,发动南宁战役,意欲占领南宁,截断中国自越南河内至南宁的西南国际补给线,实现一举解决“中国事变”的计划。针对日本的企图,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决定集中兵力,重点守备战略要点,以确保西南国际交通线的安全。这就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日作战之一的桂南会战(1939年11月—1940年2月)。桂南会战国民党投入兵力30万,其中包括中国当时装备最精良的中央军第5军,而日军兵力总共只有约3万人。中国军队除在昆仑关战役中取得全歼日军精锐“钢军”21旅团的胜利外,整体战略失败。日军最后固守南宁外围,在四塘、高峰隘、蒲庙一线与中

国军队形成对峙,实现了既定作战意图,切断了中国西南的国际交通线。桂南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在柳州主持召开桂南会战检讨会。这是抗战史上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会议于1940年2月21日开始,25日结束,会场设在柳州市羊角山柳州高级工业学校校内。26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宣布:“当前已无反攻南宁的必要。”整个桂南战役到此结束。

2.桂柳会战。桂柳会战亦被称为桂柳战役,是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军与国民革命军之间的一场主要战役。1944年8月日军攻陷湖南后,即以驻华中的第11军和驻广东的第23军共15万余人,从湖南、广东两方面向广西进攻。日军进攻广西的具体目的,除要打通“大陆交通线”进入越南及东南亚各国外,还要摧毁桂林、柳州等地的美国空军基地,防止美机起飞轰炸日本本土。9月间,日军第11军从湖南直扑桂林;第23军沿西江上梧州经桂平进攻柳州。八九月间,蒋介石严令第四战区(广西属第四战区作战地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在广西的桂林、柳州等地进行防御抗敌,张发奎在黔桂湘边区总司令部的三个军支援下,以分区防御抗击日军。第四战区将三个方面军编组为左、中、右兵团,集中兵力保卫桂、柳。11月初,10万日军围攻桂林,桂林守军只有桂系部队的2万余人,但官兵抗战意志坚决,孤军奋战,在优势敌人面前拼死抵抗,被称为“最令日军胆寒的战役”。经10天浴血巷战,11月10日桂林陷落。10日凌晨,日军第3师团第34联队与第104师团第161联队第3大队攻占柳州飞机场。美国陆军航空队支援战机30架及桂林机场遭日军击毁;驻守柳州城区的第26军伤亡过半,奉命撤离,柳州失守。随后,日军第3、第13师沿黔桂铁路(都匀—柳州)向西北进攻;第23集团军沿柳邕(柳州—南宁)公路向西南进攻南宁。日军于11月24日攻陷南宁,11月28日攻陷凭祥,12月2日攻陷龙州。至此,大陆交通线全部打通,桂柳会战结束。

(三)国际反法西斯军事力量汇集的城市

1.苏联志愿航空队在柳援华抗战。苏联政府以对中国抗日战争同情和支持的态度,采取了积极的援华方针。1937年8月20日,中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1月,苏联组成志愿航空队援华作战,直至1941年6月22日,由于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大规模援华中断。这期间,苏联先后派遣空军志愿队员2000余人

来华参战,其中200多名官兵为之献出生命。1938—1941年,苏联志愿航空队进驻柳州。1939年年底,桂南会战爆发,日军对广西的昆仑关发动猛攻,中苏方面投入飞机115架,与敌220架飞机浴血厮杀。在桂南会战中,中苏飞行员出动12批次,投弹28吨,炸毁日机15架。在桂林、柳州等地的18次空战中,击落日机11架。

2.美国“飞虎队”在柳援华抗战。1942年至1943年7月,“飞虎队”500余人陆续进驻柳州,战机保持在50余架。1945年7月柳州光复,“飞虎队”重返机场,停驻的各种飞机一度达到200多架。P-40飞机是“飞虎队”的主要装备,由于当时柳州所处的重要位置,柳州机场成了“飞虎队”在华南的重要基地。“飞虎队”在柳州期间,参与武汉、衡阳、桂林空战,远赴日本本土、台湾对日军目标轰炸,击落了不少日军飞机和炸毁了大量军事目标,“飞虎队”在柳州机场经常保持有几十架飞机参加战斗,直到抗战胜利。

3.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柳抗战。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1919年9月,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因日本迫害,韩国临时政府开始流亡历程,辗转杭州、镇江、嘉兴、南京、长沙、广州,1938年10月,到达柳州。迁移柳州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内阁成员有李东宁、李始荣、宋秉祚、赵琬九、车利锡、李青天等,随行的还有临时政府成员的家属,共100多人。临时政府主要领导人金九在广州沦陷前,前往陪都重庆争取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所以没有来到柳州。临时政府在柳州期间主要活动有:颁布《韩国独立宣言20周年纪念宣言》;组建光复阵线青年工作队;组织筹款义演慰问军医院内抗战负伤的将士;和柳州群众一起开展全市性的抗日火炬大游行等各种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间抗战蓬勃发展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柳州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日益高涨。中共柳州地下党组织,积极地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各中学爱国师生纷纷行动起来,组成宣传队、歌咏队、演剧队,到大街小巷、车站、码头、茶馆、酒楼,控诉日军的滔天罪行,诉说沦陷区人民的悲惨遭遇,宣传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感人事迹。柳州中学、龙城中学组织成立了抗日宣传队和抗日巡回工作团。与此同时,

地下党组织还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向学生推荐进步书刊等,广大青年学生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地下党在文艺界同样十分活跃。1938年11月,柳州成立了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主编出版《救亡周刊》。这一时期,在柳州活动的还有国民政府四战区中共特别支部、中共柳州日报支部、中共抗敌演剧四、五队支部。由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抗敌演剧宣传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队伍。中共四战区特别支部,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四战区中共特别支部在柳期间(1940年从广东迁到柳州),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和统战工作。国民政府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秘书和军事参谋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经常巧妙地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利用特殊身份与国民党高中级将领广泛交往,激发其民族正义感和爱国热情,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中共桂北工委领导的抗日武装、柳州日报社警卫队、融县抗日挺进队、融县挺秀队、镇国政工队在融县一带开展对敌战斗,直至抗战胜利。1944年9月,柳江县爱国青年自发组织了“柳江抗日青年挺进队”,前后同日军作战几十次。抗日自卫队的活动,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包围之中。

(五)中国农都科研力量空前强大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柳州处在抗日大后方,许多农业专家、学者、教授为避难云集在广西农事试验场,试验场农业科研力量空前强大。这一时期,广西农事试验场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并相继向各地推广,专家们的优秀论文在全国性报纸杂志上发表,广西农事试验场因此也声名远播。同时,广西农事试验场在大力进行农业科技研究和实践中,也造就了一批高级农业人才,如我国原农业部长何康,农业博士马保之,农业专家孙仲逸、彭绍光等。抗战时期的广西农事试验场,为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六)抗战文化空前繁荣

抗战时期的柳州抗战文化活动十分活跃,抗日文艺演出和美术歌咏活动、新闻出版以及诗词创作都非常踊跃,抗战文化空前繁荣,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柳州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

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起,到1944年9月湘桂大撤退止,沦陷区的大批文

化人云集桂林,坚持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使桂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抗日文化中心。作为毗邻之地的柳州也与其互相呼应,以文化武器进行宣传抗争,广大文化工作者,用诗歌、喜剧、音乐、绘画以及新闻社论等形式,宣传抗战、进步、团结,烽火中的声音铿锵有力,振奋人心。柳州本地文化人创作了大量抗战作品,如抗战木刻、抗战诗词、抗战话剧等。

这一时期柳州的抗战美术创作空前繁荣,木刻创作和木刻理论研究处于鼎盛时期。20世纪40年代,柳州共举办个人或联合画展24次。其中木刻画专展5次,共展出木刻作品2200余幅。1942年3月,抗敌演剧第五宣传队举办战地画展,影响很大。抗战时期在柳州任教的版画家陆田不但参与国内许多重要抗战美术活动,还创作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木刻作品,成为中国抗战木刻的重要版画家。版画家黄荣灿在《柳州日报》出版“黄荣灿战地写生画展”特刊。

期间,柳州籍画家潘文经在桂林参加抗战美术活动,挥笔作画参加抗日联展义卖。柳州籍画家邓俊群参与创办的桂林榕门美术专科学校,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美术活动一个重要阵地。此外,从桂林借道柳州转往大西南昆明、重庆的大批文化人,有的滞留柳州进行文化活动,许多美术界人士来到柳州,他们的木刻、油画、国画、漫画创作活动和画展推动了柳州美术创作的发展。

(作者:林冬 潘晓军)

目录

沦陷前后

文化名人忆战时柳州

在柳州	巴 金/ 2
空袭在我们后面	夏 衍/ 4
混乱的“湘桂大撤退”	秦 牧/ 8
柳州一夜	茅 盾/ 9
“艺术的逃难”	丰子恺/10
紧急疏散的柳州	陈佚生/15
1944 年柳州南站街火灾	陈铁生/19
日寇对柳州的惨烈空袭	韦建章/22
日机轰炸柳州目睹记	张宏德/24
沦陷前柳州的军事布防	梁镇海/25
日寇铁蹄下的柳州	陈佚生/27
劫后余生的柳州	陈佚生/31
战争摧残之后的柳州	刘汉忠/35

抗战风云

柳州战场

从柳州起飞的“长空雄鹰”	刘汉忠/40
--------------------	--------

- 我参加了在柳召开的桂南检讨会议 陆学藩/44
- 首次空袭柳州的日机从哪来 李广西等/47
- 桂柳会战是怎样一场战役? 刘丽虹/51
- 抗战时期的柳州肃奸活动 沈培光/54
- 柳州军民抗击日寇记 陈佚生/58
- 融县军民抗日斗争片段 宋启贤/62
- 柳州军民百子坳伏击日军纪实 韦卓史/66
- 徒手搏杀日本兵 韦化如/70

抗日救亡

- 柳州女同胞为抗战踊跃募捐 陈佚生/73
- 小飞燕为《柳州日报》义演记 刘 雄/77
- 抗战时期柳州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刘汉忠/80
- 柳州热血青年在 1939 年 沈培光/84
- 不做亡国奴的呐喊
——抗战时期柳州文化救亡活动概述 李建平/87
- 韩国临时政府流亡在柳州的日子 巴 方/91

抗战人物

- 阚维雍：断头不做降将军 刘 山/96
- 廖磊：魂系抗战国兴亡 刘丽虹/100
- 陈烈：英年早逝的抗日虎将 陈佚生/104
- 越南领袖胡志明在柳州的日子 巴 方/107
- 柳州融安籍飞行员韦鼎烈、韦鼎峙抗日空战事略 吴爱玲/112

城市后方

- 急剧膨胀和“繁荣”的城市 刘汉忠/116
- 抗战岁月柳州的战时运输 刘汉忠/120
- 抗战时期的柳州后方工业 刘丽虹/124
- 抗战时期的柳州农业 刘丽虹/127
- 抗战时期柳州的金融商贸情况 刘振先/131

柳州抗战时期的教育	刘丽虹/135
桐油灯下的西农学子	沈培光 兰生葵/139
土法上马的专家学者	沈培光 兰生葵/142

抗战遗存

柳州机场旧址	李乐年/146
柳州城防工事群旧址	市文物局、李乐年/149
桂南会战检讨会旧址	李乐年/152
胡志明旧居	李乐年/153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抗战活动旧址	李乐年/154
廖磊公馆	李乐年/155
广西农事试验场旧址	李乐年/156
泗角碉楼	市文物局、李乐年/157
钟宅	市文物局、李乐年/157
水文岩民众避难所	市文物局、李乐年/158
柳州铁桥	李乐年/158

文化抗战

文化名人

夏衍、马思聪抗战时期途经柳州轶闻	陈铁生/160
舒模在柳州的艺术活动	沈培光/162
抗战时期旅柳文化人活动	李建平/164
徐悲鸿画于柳州的《松鹤图》	林 冬/166
抗战美术活动中的柳州籍画家邓俊群、潘文经	林 冬/168
陆田与抗战木刻	林 冬/171

抗战作品

《柳州日报》的“战时木刻”	沈培光/173
话说柳州抗战时期的诗词	林 玉/175

田汉诗十一首	田 汉/177
曾敏之诗二首	曾敏之/180
从烽火中来的声音	
——为《四五队歌选十一曲》所作序	田 汉/182
《四五队歌选十一曲》编者言	/184
《民主抗战进行曲》代序	舒 模/185
75 年前《柳州日报》刊载的抗战联语	沈培光/187
文艺活动	
抗敌剧宣队在柳州	陈佚生/190
抗战时期粤剧在柳州	李理想/195
抗战时期柳州的影戏院	方 敏/197
火热的抗日话剧演出	陈雄子/200
1944 年的柳州抗战文艺活动	陈铁生/202
新闻报刊	
抗战期间柳州新闻检查述略	喻春生/204
抗战时期的《柳州日报》	李理想/208

附录

抗战时期在柳州活动的部分文化团体一览表	林 冬 李理想/211
抗战时期在柳活动的部分文化人士一览表	林 冬 李理想/212
抗战期间在柳州创作或演出的部分文艺作品一览表	林 冬 李理想/216
抗战时期在柳州举办的部分美术展览一览表	/217
抗战时期在《柳州日报》发表的部分绘画作品一览表	/217
柳州抗战文物保护与利用研究	柳州市政协课题组/219

后记

.....	/231
-------	------

沦陷前后

文化名人忆战时柳州

在柳州

巴 金

(1938年11月3日)傍晚我们到了柳州。柳州是一个热闹的城市。一条柳江分割了南北两岸。江上没有桥,连接这两岸的是一些摆渡的小船。汽车停在河南。河南有不少大旅馆。但每家都说已经客满了。我们走遍旅馆找不到一个房间,后来只得在一家“伙铺”里勉强住了一晚,第二天才搬到旅馆去。

在这里我打算休息两天,以后就搭车到桂林去。这一段路的车票是容易买到的。

在柳州住了三天,我们现在买到去桂林的车票。明天早晨不等天亮就要搭汽车出发了。同路的三个朋友去贵阳转重庆,搭西南公路局的车,也是在明天上午动身。在柳州只有这短时期的逗留就很顺利地买到车票,这倒是我们料想不到的。

去四川的朋友昨天下午还到公路局登记,他们被通知要到明年二月十八日才可以买到车票,就是说他们要在柳州还要住三个多月。这长久的等待会使每个人失掉勇气,而且在旅店住三个月,即使自己身边带着充足的川资,也会被警察当作汉奸看待。这里警察的感受是特别锐敏的。他们来“查夜”,看见我的案头放着一份新买来的广西地图,就以为发现了汉奸的阴谋,立刻发出一些奇怪的问话,后来事实证明自己毫无所获时,他才悻悻地去了(我倒喜欢梧州的警察,他甚至替过路人打电话找住处)。从这件事情看来,外省人长久留在这个地方,是不大方便的。既然在这里没有事做,还是早些离开好。去四川的朋友正打算改变计划。忽然意外地在一个新成立的四川旅行社买到了三张去贵阳的车票,每张索价法币二十七元五角,比原来的票价多花五元。那个旅行社转卖三张车票就赚得法币十五元。这种做法也是发国难财百术之一罢。不过朋友们能够买到

第二天的车票,已经万分高兴了。我这里不知道还有若干人在等待机会购买去贵阳或者重庆的车票,而且有好多人已经等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至今还见不到一线的希望。

我们明天要离开柳州了。

这三天我们就住在河南,没有遇见一次警报。午后我们走到江边,搭着渡船跨过柳江,到河北去。河北才是柳州的市区,地方大,热闹的道路多。有卖新书的书铺,也有两家较大的旅馆。我们在其中之一的新柳江饭店二楼饮茶。每张茶桌都被客人占据了,我们停留一刻钟才找到座位。人声嘈杂,外面还有清脆的鸟鸣,偶尔被风吹进一声两声。我喝着红茶,吃着点心,仿佛坐在广州西关的西南酒店里面。我觉得我是在做梦,这半个多月的奔波不过是一场奇怪的梦,不然我四周为何还有如此太平时的景象。

昨天是一个很好的晴天,我们午后到河北去游中山公园,在那里面一个茶棚里喝茶。我和年长的朋友兴奋地谈论抗战的前途,也谈论这半个多月来的见闻。现实的黑暗面投掷了阴影在我们的心上,使我们的不时发痛。但是光明永远在我们的眼前闪耀。我们始终不曾失去对未来的信仰。公园里飘荡着南国的香气,明绿色的茂盛树木给我们遮盖了焦热的日光。我们在茶棚里坐了两个钟点,后来听见外面的号鼓声,才慢慢走出去。我们站在门前,看见中央军校第六分校的学生整队走进对面公共体育场集合,举行纪念典礼。走在最后的是该校的化妆宣传队,所以还有五六个学生穿着女人衣服,他们刚刚在外面演过《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

晚上月色甚好,年长的朋友约我们几个人到河北江边一家广东酒楼吃饭。我们坐在楼头栏杆畔,望着江水载了月光缓缓地流动。渡船带着星子似的灯火流过来,又流过去。对面是山,山似乎贴在淡青色的天幕上,又仿佛是名画家随意的几笔涂抹。山上也有几点灯火,它们却是多么昏暗。

里面人们在饮酒谈笑,那是广西大学农学院教职员的聚餐会,参加的人不少,坐满了两桌。人们笑容满面地彼此劝酒。酒楼上充满了快乐的气氛。

我又回头望江面,月亮进了云堆中,江面罩上朦胧的灰色。依旧是那几点昏暗的灯火。忽然在下面,在码头上,在什么地方一个年轻的女音唱起来了《渔光曲》,于是明月从云层里慢慢地露出它团团的脸庞。

柳州和梧州不同,柳州是一个还没有受到战争损害的城市。然而明天不等天亮,我们就要走了。

(选自《巴金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

巴金(1904—2005),四川成都人,原名李尧棠,字芾甘,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抗战期间创作抗战三部曲《火》(共三部,第二部又名《冯文淑》,第三部又名《田惠世》)。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著有《灭亡》、《新生》、《雾》、《雨》、《电》、《家》、《春》、《秋》以及《巴金文集》等。

空袭在我们后面

夏衍

(1939年1月11日)预定是上午六点从南宁出发的,可是到了八点半才开车。南宁—宾阳—迁江这一段,公路和湘桂铁路汇合在一起,我们一会儿在铁路线之左,一会儿又在铁路线之右,铁路像一颗直的树,那么公路就像缠在这株树上的藤了,我们从左从右的饱看了这桩伟大的工程,这一段,现在也在建筑桥梁,等枕木和铁轨一铺上,就可以通车了。

12时左右到宾阳,一整列的汽车已经开到宾阳市集的路口了,可是突然,前面的几辆以可怕的速度,打回头望乡下去了,为什么?走错了路?正在疑惑的时候,路旁的人也已经很快地躲避了,很明白,是报警。

我们把十辆汽车散开,掩蔽在大树下,公路上避警报的汽车还是很多,防空部队一班班的带着机枪,跑步到郊外的阵地去了,静得使人感到异样,但是没有机声,等了一小时,警报解除,我们到宾阳吃午饭。

从汽车站得到消息,说南宁被轰炸了,南宁很早就有警报,大概在我们离开之后不久,空袭老是在我们后面!

照路程,从南宁到柳州是一天可以到达的,可是下午四时到了大塘,说又要在这儿留宿了。大塘是一个小村子,但是在公路线上它却是到贵阳和到桂林的

分岔的地方,上次我们从桂林到湛江的时候,曾在这地方逗留过两个钟头,这儿找不到住的地方,命运注定了又得在汽车中过夜了。

谁也梦想不到吧,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寒村里面,会看见这许多年青的知识分子。我们看见了“交通大学招待处在××街××号”的招贴,说起交通大学,立刻会引起一个规模伟大、建筑宽敞的联想的,那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和这寒村连接在一起吗?而现在,抗战却使他们发生了关系了,我们低着头,侧了身,走进了一条不像“街”的小弄,“大学”的“招待所”到了,这是一间茅屋,门口散乱地堆着一些家具,进门的地方,就是一张破床,上面张着一个补丁重叠的黑黝黝的破帐。招待所,就是这样了。在徐家汇时代,假使大学门口有这样一家小店,我猜想那时候的大学生是谁也不会去光顾吧,可是现在是走了几千里,他们居然于这样的屋子作为他们的“招待所”了。谁说中国的大学生不能吃苦?谁说我们的节约建国运动不能成功?

我们在南宁曾经遇见过从百色徒步到云南去的同济大学学生,在同登曾经遇见过由广东经龙州到云南去的中山大学的学员,对于他们的辗转迁校的是非,暂时不说。我觉得为着继续学业,忍受一切物资上的苦痛,而到平时想象不到的远方去的一件事情,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事了。

照旧样蜷曲了身体在汽车中坐上一晚,第二天天未亮起来,我们以为今天总可以到达桂林了。可是在小面摊上盥洗的时候,一个司机说:

“今天到柳州,过一夜,明天到桂林。”

“什么,今天到柳州?大塘到柳州不是只有五十九公里吗?”

“谁知道,一天走五十九公里到是新纪录呢!”一个机匠笑了。

陈技术员不见人,天晴了,太阳晒在浸透了雨水的大地上蒸得使人头晕,八点,九点,十点,还没有开车的消息,连司机们也等得抱怨了。

“妈的,等什么?”

“等警报!”另一个带着不怀好意的笑说。

“可不是!天晴了,敌机一定会来的,这十辆新车目标又是这么大。”

“在这毫没有掩蔽的地方等警报就没有活了。”一个一路上最同情我们的司机说。

十二点了,还是不走,我们倒反而不焦躁了,反正要在柳州过夜,五十九公里

是两小时就可以到达的了。我们在濛濛地发出水气的村落间散了一会步，到汽车站去看了一回来往的旅客，花一毛钱泡了一壶热茶，买了十个铜子油煎糯米饼，在露天野餐了一顿。

从桂林，从柳州，从宾阳，一车车地往贵阳、重庆去，旅客多极了。汽车大都在这里停一停车，于是车上的男男女女性急地跑下来，伸伸腰，捶捶背，买水果，囤干粮。女人们拍着灰土，哄着孩子，乱得不可开交。每个人的眼睛都带着睡意，每个人的表情都堆着疲劳，尤其是平时装扮惯了的女人们，穿着臃肿的棉衣，有的穿了逗人发笑的男人衣服，戴着防灰的头绳便帽，显露了被铅粉剥黄了的脸，在这种场合，平时的一切虚饰、一切顾虑都扫净了。

路旁墙上，写着一幅很大的标语：

“到后方去，更要努力工作啊！——居委会政治部孩子剧团鞠躬。”“鞠躬”这两个字用在标语上，有趣极了。

正在悠然的时候，一阵引擎声音，一列汽车蜿蜒地开出来了，我们以为出发往柳州了，赶快上了车！哪知离大塘不多一段路，汽车零落地躲进树荫里面去了，一问，果然又是警报。

我们依旧是悠然地在温暖的树荫下午睡了一个午觉。醒来，警报解除了，依旧回到大塘，下午二时开车，一路无事，四时前一刻到了柳州。

这个广西最清丽的城市依旧是那么的惹人怜爱。柳州，我已经到过三次了，我还是喜欢那清澈澈底的柳江，过去从江之南到江之北要用渡船的，现在已经搭了浮桥，过桥的时候丢三个铜子就可以了。汽车站附近，敌机投了许多弹，把车站办公室对面的一排房屋都炸毁了。

到了旅店，知道敌机到了宾阳，空袭依旧在我们后面。

天很晴朗，时候还早，雷平一兄第一次到柳州，我们约好了去游公园，在柳州的（柳宗元）衣冠冢，意外地遇见了在广州同出来，在佛山空袭中分了手的上海“八一三”歌咏队的朋友们。在空袭中分手，在空袭中再见，大家觉得更亲热了。他们从西江到柳州，在这儿做了一个多月工作，现在正在发动柳州图书的义卖。从他们的谈话里，知道了和我先后从桂林出发到北江去的陆诒、叶厥孙两位也在柳州。到了我们约好的时刻，匆匆地回去，正在一家书店门口徘徊的时候，一只有力的手在我肩上一拍，大声的哄笑起来，这不是陆诒还是哪个！

他们一行四人——陆诒、任重、叶厥孙、高咏，也要回桂林去，但是找不到车，正要到民团指挥部去想办法，我们相遇得巧极了，我们不是有十辆车吗？我们约好了明天一早在旅馆会齐，去和陈技术员交涉，他屡次说，只要不擦坏车垫，坐人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对于他们这四个不带行李的人总该不会拒绝的了。

在旅馆里谈到了深夜，许多当地的朋友们知道我们来了，也赶着旅馆里来，我们从陆诒那里听到广东的情况，他们从我们嘴里知道了香港的情形。熄灯的时候，大家走了，正要就寝，又有一位来客来敲门了，那是不久之前才从桂林来柳州的蓝白剧团的谈星，他问了许多香港的情况，也讲了许多本地工作上的情形，直到临走，他摸到一张报来，笑着递给我：“你看见我吗？你们的报已经复刊了！”

这正是1月10日复刊号的《救亡日报》，我惊喜了，得到朋友们的支援，经过社友们的献身的努力，这小小的报纸终于又在轰炸中出版了，我读遍了每一个字，我从每一个字里看出了一切支持这个刊物的朋友的热议和艰辛。兴奋使我一夜不能入睡，我睁着眼睛直等到天明。

五点，天还未黎明，陆诒、厥孙一行已经来了，我们先把行李搬上车去，司机们还睡着呢，在冷水一般的清晨空气中，一直到七点，汽车才开始作出发的准备，陆诒拿出名片去和陈技术员交涉，很快地沟通了。八点开车，十二点到荔浦，用了午饭。因为昨晚一夜的失眠，一上车就睡着了，醒来，阳朔的奇山，已经大半过去了。渡过相思江，桂林已经在望了，但是在离城十公里的地方，为了修饰撞坏了的叶板子，又停了一个半小时，这对于归心如箭的我，也算是一桩小小受难，四点钟进南门，穿过新炸毁的废墟，一排汽车停在一个大炸坑旁边，“长途”就是这样结束了。

（选自《夏衍杂文随笔集》）

夏衍（1900—1995），浙江杭州人，原名沈乃熙，又名沈端先，中国现代剧作家。抗战爆发后，先后在上海、广州、桂林主编《救亡日报》，又在重庆主编《新华日报》副刊，和于伶等组织中国艺术剧社。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副部长、文联副主席、对外友协副会长等。著有《电影论文集》、《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秋瑾传》、《祝福》、《烈火中永生》、《包身工》等。

混乱的“湘桂大撤退”

秦 牧

在“湘桂大撤退”的后期,桂北和黔南一带,出现了盗贼蜂起、杀人越货的局面。但是在初期,公然抢劫的事情还不太多。不过小偷小摸已经开始活跃了。有人把财物箱子放在车厢里,一家轮流坐在箱子上看守,满以为这样严密,可保无虞了,谁知,盗贼从车厢底下挖一个大洞,再一层层挖通箱底,把里面的东西也尽数偷去了,等到主人发觉的时候,那一个个箱子都像给白蚁蛀过一样,只存一副副空壳而已。

我们在柳州以西等车时,秩序还不算太坏,所以我们在车顶上找到一丁点地方,和一户当乞丐的人家毗邻,他们大概已经几十天没有洗澡了,恶臭阵阵袭来,但这些乞丐毕竟还是善良的人,我们和他们之间,仍然有说有笑,但是跟车一天多时间,火车只走了一站,我想这样下去,必将困死在车上无疑,经过再三商量,我和妻子决定下车步行。因为步行虽慢,每天毕竟可以走三四十里,在那段日子,两条腿走路的速度,仍然要比火车快。当时我们靠亲友接济和出卖行李,身上的钱大概可以支撑一个多月,如果这笔钱在我们抵达后方一座大城市之前用完,那么我们势将沦为饿殍。

从柳州附近经过宜山、怀远、河池、南丹到六寨(桂黔边界上的一个小镇),这么漫长的道路,我们俩完全靠步行越过。这条路大概有八百华里至一千华里之遥吧,我们沿着大体和铁路线平行的公路走,有时经过火车站,有时没有经过,我所看到的每一座火车站的可怕景象,都和我上面描绘的差不多。我听一位朋友讲到一件更令人悲伤的事,有一个人被突然开动的火车轧断了腿,痛苦不堪,竟拱手哀号着:“哪个有枪的,赶快行行好补我一枪,求求你。”一个不知是什么身份的持枪者,果然拔枪朝他的心窝开了一枪,然后扬长走了。

(选自《秦牧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秦牧(1919—1992),广东澄海人(生于香港)。原名林觉夫,幼年随父母侨居新加坡。1932年回国,抗日时期辗转粤桂等地,曾任教师、编辑,在重庆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机关刊物《再生》编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

《羊城晚报》副总编辑、广东省文联副主席、《作品》主编、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作协理事等。著有《贝壳集》、《星下集》、《艺海拾贝》、《黄金海岸》、《秦牧文集》等。

柳州一夜

茅盾

我们决定(1942年)12月3日离开桂林赴重庆。行前一星期,我们忙着向朋友们辞行,也忙着参加他们的欢送宴会和家庭便宴。十一月二十九日,柳亚子、田汉夫妇请我们到月牙山吃豆腐,为我们饯行。月牙山为桂林一名胜,紧傍漓江,山上有寺,殿堂筑于山洞中,山前有素菜馆,煮的豆腐远近闻名,被誉为桂林三宝之一。我们品尝着滑嫩鲜美的豆腐,远眺笔立的群山,耳听漓水之喧哗,不时为这几年来国事之艰难,文网之森严,以及朋友们聚散之无常而慨叹。亚子、田汉即兴赋诗赠我,亚子的诗曰:“远道驰驱入蜀京,月牙山下送君行,离情别绪浑难说,惜少当筵醉巨觥。”田汉对我说,他的长子海男也要去重庆,愿和我们同行,一路上可以保护我们,我们当然感激不尽。海男是正规军人,国民党军校炮科毕业,能随身携带手枪,有他陪伴,我们就像跟了个保镖。

当时从桂林到重庆,需先乘火车经柳州到金城江,然后换乘长途汽车,听说汽车票很难买,于是又托陈少绍先在广西省政府弄了一张买车票的介绍信。

十二月三日我们与海男顺利地来到了柳州,并在柳州过夜,因为从桂林至金城江没有直通客车,必须在柳州换车,我们住进一家旅馆。刚坐定,就有人敲门进来,那时德沚上街去了,屋里只有我一个。来人长得獐头鼠目,自称在桂林拜访过我,和我谈过话。我说记不得了。他又自我介绍说曾经去过苏联,懂俄语。我打断他的话,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也住在这旅馆里,要同我一路去重庆。我见此人来路可疑,就爱答不理。那人却说,我给您看两样东西,一面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我接过一看,上面写着几行字:查沈雁冰(茅盾)、邹韬奋系异党分子,有不轨行为,着各地的分处、分局留心稽查他们的行径。下面盖了中统局的章。他又拿出第二张纸,上面写着同样的内容,只是名字不相同,换成了沈雁冰和陈

培生。我心中思忖,这两份东西看样子是真的,他们大概是在对我进行精神攻势,只是为什么把陈培生和我连在一起?陈培生远在新疆嘛。我笑了一笑,做出无所谓的样子。那人却严肃地说,沈先生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这是真的。我吃的就是这碗饭,因为我向来敬佩先生,所以向您透个风,明天火车上就有一人和您同行,这人是我的上司,我们奉命陪送您到重庆。那人走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德沚和海男,海男道,怪不得我在旅馆的饭厅里看见那个人。我问是谁?他说,一个中统特务,姓陆,公开身份是西南公路局稽查,常在这条路上跑,在桂林和柳州都有它的办事处。德沚则埋怨我在桂林随便接见客人,混进了特务也不知道。

(选自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茅盾(1896—1981),浙江桐乡人,本姓沈,学名德鸿,著名作家、文化活动家。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主编《文艺阵地》、《立报·言林》。1938年底去新疆学院任教。1940年到延安参观学习和讲学。此后,辗转于重庆、桂林、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文化部部长。著作宏富,有《茅盾全集》十卷等。

“艺术的逃难”

丰子恺

那年(1939年)日本军在广西南宁登陆,向北攻陷宾阳,浙江大学正在宾阳附近的宜山(即当时的宜山县,今天的宜州市,抗战期间曾先后属柳州监督区、庆远区、柳州区管辖),学生、教师扶老携幼,仓皇向贵州逃命,道路崎岖,交通阻塞。大家吃尽千辛万苦,才到得安全地带。我正是其中之一人,带了从一岁到七十二岁的眷属十人,和行李十余件,好容易来到遵义。看见比我早到的浙大同事某君,他幽默地说:“听说你这次逃难很是‘艺术的’?”我不禁失笑,因为我这次逃难,的确受艺术的帮忙。

那时我还在浙江大学任教。因为宜山每天两次警报,不胜奔命之苦。我把

老弱者六人送到百余里外的思恩县的学生家里。自己和十六岁以上的儿女四人（三女一男）住在宜山，我是为了教课，儿女是为了读书。日军入侵南宁之后，宜山的人都忧心忡忡，计划逃难。然因学校当局未有决议，大家也不知该怎么办。我每天逃两个警报，吃一顿酒，迁延度日。现在回想，真是糊里糊涂！

不久宾阳沦陷了！宜山空气极度紧张，汽车大敲竹杠。“大难临头各自飞”，不管学校如何，大家各自设法向贵州逃。我家分两处，呼应不灵，如之奈何！幸有一位朋友，代我及其他两家合雇一辆汽车，竹杠被敲得不重，一千二百元送到都匀。言定经过离此九十里的德胜站时停一停，让我的老弱六人上车。一方面打长途电话到思恩，叫他们整理行物，在德胜站等候我们的汽车。岂知到了开车那一天，大家一早来到约定地点，而汽车杳无影踪。等到上午，车还是不来，却挂了一个预报球！行李尽在路旁，逃也不好，不逃也不好，大家捏两把汗。幸而警报不来，但汽车也不来！直到下午，始知被骗。丢了定金一百块钱，站了一天公路。这一天真是狼狈之极！

找旅馆住了一夜。第二日我决定：叫儿女四人分别携带轻便行李，各自去找车子，以都匀为目的地。谁先到目的地，就在车站及邮局门口贴个字条，说明住处，以便相会。这样，化整为零，较为轻便了。我惦记着在德胜站路旁候我汽车的老弱六人，想找短路汽车先到德胜。找了一个早晨，找不到。却来了一个警报，我便向德胜的公路上走。歇下脚来，已经走了数里。我向来车招手，他们都不睬，径自开过，一看表还只八点钟，我想，求人不如求己，我决定徒步四十五里到怀远站，然后再找车子到德胜。拔脚迈进，果然走到了怀远。

怀远我曾到过，是很热闹的一个镇。但这一天我很奇怪：我走上长街，店门都关，不见人影。正在纳闷，猛忆“岂非在警报中？”连忙逃出长街，一口气走了三四里路，看见公路旁树下有人卖团子，方才息足。一问，才知道是紧急警报！看表，是下午一点钟。问问吃团子的两个兵，知道此去德胜，还有四十里，他们是要步行赴德胜的。我打听得汽车滑竿都无希望，便再下一个决心，继续步行。我吃了一碗团子，用毛巾填在一只鞋子底里，又脱下头上的毛线帽子来，填在另一只鞋子底里。一个兵送我一根绳，我用绳将鞋和脚扎住，使不脱落。然后跟了这两个兵，再上长途。我准备在这一天走九十里路，打破我平生走路的记录。路上和两个兵闲谈，知道前面某处常有盗匪路劫。我身上有钞票八百余元，开始担起心

来。我把八百元整数票子从袋里摸出,用破纸裹好,握在手里。倘遇盗匪,可把钞票抛在草里,过后再回来找。幸而不曾遇见盗匪,天黑,居然走到了德胜。到区公所一问,知道我家老弱六人昨天一早就到,住在某伙铺里。我找到伙铺,相见互相惊讶,谈话不尽。此时我两足酸痛,动弹不得。伙铺老板原是熟识的,为我沽酒煮菜。我坐在被窝里,一边饮酒,一边谈话,感到特殊的愉快。颠沛流离的生活,也有其温暖的一面。

次日得宜山友人电话,知道我的儿女四人中,三人已于当日找到车子出发。啊!原来在我步行九十里的途中,他们三人就在我身旁驶过的车子里,早已疾行先长者而去了!我这里有七十二岁的老岳母、我的老姐、老妻,十一岁的男孩,十岁的女孩,以及一岁多的婴孩,外加十余件行李。这么多人,如何运往贵州呢?到车站问问,失望而回。次日又到车站,见一车中有浙大学生。蒙他们帮忙,将我老姐及一男孩带走,但不能带行李。于是留在德胜的,还有老小五人,和行李十余件,这五人不能再行分班,找车愈加困难。而战事日益逼近,警报每天两次。我的头发便是在这种时光不知不觉地变白的!

在德胜空住了数天,决定坐滑竿,雇挑夫,到河池,再觅汽车。这早上来了十二名广西苦力。四乘滑竿,四个脚夫。把人连物,一齐扛走,迤迳而西,晓行夜宿,三天才到河池。这三天的生活竟是古风。旧小说中所写的关山行旅之状,如今更能理解了。

河池地方很繁盛,旅馆也很漂亮。我赁居某旅馆,楼上一室,镜台、痰盂、茶具、蚊帐一切俱全,竟像杭州的二三等旅馆。老板是读书人,知道我的“大名”,招待得很客气,但问起向贵州的汽车,他只有摇头,我起个大早,破晓就到车站去找车子,但见仓皇、拥挤、混乱之状,不可向迳,废然而返。第二天又破晓到车站,我手里拿了一大束钞票而找司机。有的看看我手中的钞票,抱歉地说,人满了,搭不上了!有的问我有几个人,我说人三个,行李八件(其实是五个人,十二件行李),他好像吓了一跳,掉头就走。如是者凡数次,我颓唐地回旅馆,站在窗前怅望,南国的冬日,骄阳艳艳,青天漫漫,而予怀渺渺,后事茫茫,这一群老幼,流落道旁,如何是好呢?传闻敌将先攻河池,包围宜山、柳州。又传闻河池日内将有太空袭。这晴明的日子,天是标准的空袭天气。一有警报,我们这位七十二岁的老太太怎样逃呢?万一突然打到河池来,那更不堪设想了!

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好几天,前途似乎已经绝望。旅馆老板安慰我说:“先生还是暂时不走,在这里休息一下,等时局稍定再说。”我说:“你真是一片好心!但是,万一打到这里来,我人地生疏,如之奈何?”他说:“我家在山中,可请先生同去避乱。”我说:“你真是义士!我多蒙照顾了,但流亡之人,何以为报呢?”他说:“若得先生到乡,趁避乱之暇,写些书画,给我子孙世代宝藏,我便受赐不浅了!”在这样交谈之下,我们便成了朋友。我心中已有七八分跟老板入山,但二三分还想觅车向都匀走。

次日,老板拿出一副大红闪金纸对联来,要我写字。说:“老父今年七十,蛰居山中。做儿女的糊口四方,不能奉觞上寿,欲乞名家写联一副,托人带去,聊表寸草之心,可使蓬荜生辉!”我满口答允。就到楼下客厅中写。墨早磨好,浓淡恰到好处,我提笔就写。墨渾堆积,历久不干。门外马路边太阳光作金黄色。他的管账提议:抬出门外去晒,老板反对,说怕被人踏损了。管账说:“我坐着看管!”就由茶房帮同,把墨迹淋漓的一副大红对联抬了出去,我写字时,暂时忘怀了逃难。这时候又带了一颗沉重的心,上楼去休息,岂知一线生机,就在这里发现。

老板亲自上楼来,说有一位赵先生要见我,我想下楼,一位穿皮上衣的壮年男子已经走上楼来了。他握住我的手,连称“久仰”、“难得”。我听他的口音,是无锡、常州之类。乡音入耳,分外可亲,就请他在楼上客间里坐谈。他是此地汽车加油站的站长,来得不久。适才路过旅馆,看见门口晒着红对子,是我写的,而墨迹未干,料想我一定在旅馆内,便来访问。我向他诉说了来由和苦衷,他慷慨地说:“我有办法。也是先生运气太好,明天正有一辆汽油的车子开都匀,尚有空地,让先生运走。”我说:“那么你自己呢?”他说:“我另有办法。况且战事尚未十分逼近,我是要到最后才走的。”讲完了,他起身就走,说晚上再同司机来看我。

我好比暗中忽见灯光,惊喜之下,几乎雀跃起来。但一刹那间,我又消沉,颓唐,以至于绝望,因为过去种种忧患伤害了我的神经,使它由过敏而变成衰弱。我对人事都怀疑。这江苏人与我萍水相逢,他的话岂可尽信?况在找车难于上青天的今日,我岂敢盼望这种侥幸!他的话多分是不负责的。我没有把这话告诉我的家人,免得他们空欢喜。

岂知这天晚上,赵君果然带了司机来了。问明人数,点明行李,叮嘱司机之后,他拿出一卷纸来,要我作画。我就在灯光之下,替他画了一幅墨画。这件事

我很乐愿,同时又很苦痛。赵君慷慨乐助,救我一家出险,我写一幅画送他留个永念,是很乐愿的。就作画这件事说,我一向欢喜自动,兴到落笔,毫无外力强迫,为作画而作画,这才是艺术品,如果为了敷衍应酬,为了交换条件,为了某种目的或作用而作画,我的手就不自然,觉得画出来的,笔笔没有意味,我这个人也毫无意味。但在那时,也只得勉强破例,在昏昏灯火下用恶劣的纸笔作画。

次日一早,赵君亲来送行,汽车顺利地开走。下午我们老幼五人及行李十二件,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都匀,汽车站壁上贴着我的老姐及儿女们的住址,他们都已到了。全家十一人,在离散十六天之后,在安全地带重行团聚,老幼俱各无恙。我们找到了他们的时候,大家笑得合不拢嘴来。正是“人世难逢开口笑,茅台须饮两千杯”!这晚上十一人在中华饭店聚餐,我饮茅台酒大醉。

一个普通平民,要在战事紧张区域内顺利地运出老幼五人和十余件行李,确是难得的事。我全靠一副对联因缘,居然得到了这权利。当时朋友们传为美谈,这就是某君所谓“艺术的逃难”。

1946年4月29日于重庆

(选自《丰子恺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

丰子恺(1898—1975),浙江崇德(今嘉兴桐乡市崇福镇)人,散文家、画家、文学家、美术与音乐教育家,原名润,又名仁、仍,号子觊,后改为子恺,笔名TK。主要作品有《缘缘堂随笔》、画集《子恺漫画》等。师从弘一法师,以中西融合画法创作漫画以及散文而著名。

紧急疏散的柳州

柳州人把抗日战争时柳州疏散称为“跑日本”，至今老一辈还有句口头禅：“乱过跑日本！”到底跑日本有多乱呢？听我摆摆抗日战争时期柳州沦陷前的事情就知道了。

1944年6月上旬，由于湘北吃紧，有难民往南疏散，柳州出现旅客拥挤现象，这时柳州当局也动员居民疏散。6月18日、8月8日长沙、衡阳先后沦陷，更有大批难民涌向柳州，打算转车向云贵川大后方逃命。作为湘桂、黔桂和粤汉铁路联运站的柳州，把客货运输和行李包裹联运业务交由城站（后改名东站）办理。于是城站内外就挤满了两三万人，月台和车站周围堆满了行李和疏散物资。当年柳州是没有什么公厕的，车站里面虽然有厕所，哪经得几万人轮番进出，所内早已尿满为患，尿水横流，无人再敢涉足。为解决拉撒问题，人们只好向车站附近及铁路两边发展，弄得车站周围臭气弥漫，人们也怨气冲天。



一家人占有货车的下边，当火车开动时，他们将自己捆绑在上面。（资料图片）

在逃难来柳的人还没有疏散完时，柳州当局也下了紧急疏散令。由于战况急变，黔桂路的客、货车大部被军政机关征用，余下的也作为铁路高级员工和家属疏散用车。客运列车开行很不正常，黑市票价几倍甚至十几倍增长，买不到或买不起黑市票的难民，一见有车开动便蜂拥而上，挤不进车厢就爬上煤车或车顶上。有被赶下车的，就用绳索把木棍、木板绑在车底的构件上蹲着、坐着、卧着……因绳索被震断或体力不支跌下铁轨被辗断手脚的人，沿途都可见到。到



不堪重负火车挤满从柳州撤退的难民(资料图片)

了9月铁路交通更加混乱,黔桂路因机车缺煤,三天才能开出一列车。又由于用的是本地合山煤,质地不良,蒸气不足,经常半路抛锚。柳州到独山的特别快车平时只走22小时,这时最快也要四天,慢的要十几天才到。

这时的公路交通也非常紧张,客车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开出,开到独山去的一百多辆汽车不见回头,有人说等公路局的车子比登天还难!有钱的人都做了黄鱼(拿出金条买生路),无金条的每人至少要交5万元才能上车。包一辆车则要80万-100万元不等,柳州到独山的商货运费每吨索价高达22万元!从柳州疏散到宜山去的人,只好身背行李,扶老携幼徒步前往,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想改由水路向柳江下游逃难的人,也只能望江兴叹,以前停泊在柳江上的大小船只,差不多已经走光,连停在东门沙角的航运联社的办公船,也用火船拖到鸡喇去了。偶尔有船,票价也高得惊人,到桂平去的船票卖到5000元一张!其发国难财的黑心肠令人发指。

由于公路不畅,铁路不通,随工厂、机关南迁托运到柳州,准备转运贵州、昆明、重庆的布匹、瓷器、香烟、五金、机器、书籍等货物在城站堆积如山,这一带的旅店、栈房客货爆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大量公私物资只好就地削价抛售,投机者乘机买通车站工作人员,把货物低价买进,然后当作免费免税的行李包裹装上火车,转到大后方销售,从中牟取暴利,城站以及附近变成活跃的旅游市场。湖南祁阳一家新中公司滞留在城站的上千吨机器,就是这样被一些有势力的投机分子压价收购,然后用手中的权力疏通关系运到大后方,大大发了一笔国难财。设在车站的海关也生财有道,利用手中的权力敲诈勒索,物资货运手续稍有



1944年11月9日,湘桂铁路管理局奉命炸毁柳州铁桥。(资料图片)

欠缺或相关手续不完善,就只好用钱铺路。如衡阳的亨达利商行,因为走得匆忙,疏散证没有经过衡阳海关盖章,被城站关卡勒索现款10万元了事;桂林亨达利商行的疏散证上未具花名,被索50万元,因没有这么多现款,几经交涉,以现款7万元、皮鞋4双、手表5块,约值18万元奉上才搞定。

到了10月上旬,湘桂路桂柳段和黔桂路的客货车运行,已经没有一定时间,偶尔开出一列,也全部被机关或军队征用。有不少候车旅客强行攀登货车,有一天就摔下30多人,其中10多人当场死亡。有一节由新闻界占用的车厢(其中多是桂林《扫荡报》职工及眷属)行至柳州站时,忽然被后面开来的列车碰撞,全车厢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扫荡报》报社总编钟期森全家,被这场无妄之灾“扫荡”得无一幸免。

到下甸,柳州、宜山、都匀之间的交通基本断绝,在柳州候车疏散的难民还有一万多人,由于生活无着落,还遭到偷盗和抢劫,不少人身无分文,沦为乞丐,更有被饿死的现象发生。受害人纷纷向当局呼吁:立即调整黔桂路的交通,及时制止非法行为。可当局对此置若罔闻。驻重庆的英国红十字会曾派人来视察,拟设站施救,也无下文。著名新闻学家徐铸成在湘桂大撤退时曾经过柳州,在他的回忆录中发出过“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的慨叹。

早在1944年6月,柳州就成立了疏散委员会,也制定了一些疏散实施办法。但是百姓多持观望态度,加上逃难的“旅费”一时筹备不出,无法成行。9月上旬,城区实施紧急疏散。10月21日实行强迫疏散,限3日内离城。但是没有什么组织来领导或指挥,都是“黄牛过水各顾各”。到11月初,河北这边的县政府已经撤出城区,移到成团办公,各机关团体也走光了。众多的老百姓因为没有什么交通工具,连牛车、马车甚至板车都找不到,绝大多数难民只能靠肩挑手提,徒

步离开家园,家里的东西能带走多少算多少。11月5、6日,县政府撤退到河南这边的几个留守人员,开始到各街巷巡察,催促百姓马上离开。那时河南很多人家养有牲畜,鸡、鸭、猪都没有办法带走,杀来吃已经来不及了,又不愿留下来肥了日本鬼,大多赶走“放生”,就近的就送到鱼峰路消防队。当时有几名消防队员还没有走,他们和留守人员把送来的牲畜杀了,大宴宾朋,见者有份。

直到这时候,城站附近一些仓库还有大批物资未能运走。有名留守人员走到离城站不远的云头岭,见有一家原来叫一善当铺的大房子大门敞开,里面三层楼堆满了军用衣裤、棉被、钢盔、刺刀等军用物资,还有20多个油笕(旧时装油用的容器)装满花生油,但却无人看守。该员怕留下这些物资会资敌,放火烧了又没这个权力,后经报告,决定由县民兵团电话通知各乡自卫队来搬回去,作为各乡自卫队的装备,谁搬谁得,真的是“公鸡叫,母鸡叫,哪个搬得哪个要”。沿公路的里高、三都、思贤等乡出动马车来运,因为东西太多了,马车数量和载量有限,路又远,从7日一直搬到9日还没有搬完。一架三都来的马车装满东西往回赶路时,不知道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飞机场,经过时糊里糊涂地被鬼子抓住了。

(作者:陈佚生)

1944年柳州南站街火灾

1944年8月,日军攻陷衡阳,大批湖南、桂北、粤北等地的难民流落到柳州。顿时,不大的柳州城畸形地热闹起来,旅馆家家客满,房租贵得惊人。一座三间的木板房每月租金为5000元(当时的国币),还至少要预先交三个月的;小洋房每月要15000元,要预先交一年的,连江上篷船都有人不惜高价租住。

市面上物价飞涨,加上日军铁蹄沿湘桂线直犯广西,到柳州的难民深感此地也不可久居,又想着要转到贵州、四川等省。而此时的柳州也正值人口大疏散,于是火车南站便成了最热闹的地方,站门内外的地上睡满了等车的人,售票窗外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头等车已停运,二等车按规定要先登记,再按次序买票,价钱是1129元一张,黑市上卖到1万元以上。买三等车票的人则在头一天就早早排在售票窗前了,每人限购五张,每张560元,黑市上要卖到1000至1500元。由于车次的减少以及火车到站不正点,每当火车一来,人们便蜂拥而上,争先恐后,呈现出一片慌乱而激烈的场景。南站街也因此成了货物、行李的囤积地和交易场,随人或工厂、机关南迁托运到柳,准备转运到贵州、四川的布匹、瓷器、香烟、五金、机器、书籍等货物,使这一带的旅店、栈房爆满。由于铁路的不畅通,大量公、私物资只好就地削价抛出,投机者乘机买通火车站查票员,把货物当作行李装上火车(行李不纳税、免费装运)转到贵州销售,大获其利。而大批难民则叫苦不迭。许多人早把带出来的一点有限现金和货物用光卖光了,只好上街叫化度日。

正是“屋漏偏遭连夜雨”,1944年8月15日凌晨2时10分,南站街(另一说东站)突然发生了一起空前大火,大火一直烧到5时20分方止,共焚毁房屋140余家,灾民达1000多人。大批堆放在旅店、栈房的货物化为灰烬,损失惨重。最为可惜的是由开明、远方、实学、学艺、光明、新光、学术等出版社疏散到柳州的600多箱教科书和实用参考书、10箱文具也在被焚之列。起火地点据说是广贤馆内军政部第三纺织厂转运站,该站的人极力否认,说大火是由邻居大来号商

辅引起的,街长则指控了一些失火嫌疑犯交当局查办。可怜的是那千余名灾民,风餐露宿,事隔半月才每人领到40元救济费。

当年9月7日《新华日报》转载了桂林方面报道的柳州失火消息。消息说:

桂林开明等书店疏散到柳州的书籍共五六百大包准备远销川、黔、滇等地,因交通困难,一时无法起运,堆存在火车站附近的栈房内,8月14日晚(按:应为15日凌晨)该栈房无故起火,存书全部焚毁,损失约1000万元,起火原因还没有查明。

9月13日,该报通过作者先召的文章对火灾情况作了较详细的报道,对于书籍的被焚,作者感慨地说:“这样大批文化粮食被毁,在目前出版业种种困难之时,实是一大损失。”第二天,该报刊载了沈灵题为《书的自焚》的评论文章,沈灵在读了7日报道柳州失火,书籍被焚的情况后说:“我们无法猜出这‘无故起火’四字里的玄虚,但那五六百大包的书籍究竟是自焚还是被焚都是值得玩味的。”对这次火灾的起因提出了疑问。很快,9月21日《新华日报》以“作家出版家心血成灰,柳州焚书案水落石出,原来是旅馆老板串通偷窃寄存物资,纵火灭迹”为内容,对火灾内幕作了揭露:

上次在柳州被焚的各书店书籍据说共值一千数百万万元。其中以开明损失最大,计800万元。但最惨的还是几家资力较弱的小书店,每家损失总在百二三十万元,多年辛苦化为灰烬,伤心之至。据说这次柳州焚书案是由于旅馆店主串同小偷窃取其他客商寄存的五金、布匹、文具等物之后,加以纵火灭迹。书籍虽非此等人偷窃对象,但因与五金、布匹等货物同时存在各旅馆中,也就连带遭殃。据说若将其他商货损失合计起来不下数万万元。

至此,柳州南站街失火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由于解放前柳州出版的报纸,在我市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均无存,而其他城市如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图书馆所存解放前出的柳州报纸又恰恰没有1944年的,因此,当年柳州市民的呼声及反映无从得知。幸而《新华日报》这

几则消息,才使得这一事件不致因岁月的流逝而湮没。南站街的大火距今已有70余年,不知是否还有当年的目击者健在,希望他们能对那场火灾提供比以上介绍更为详细的现场情况和背景材料,使当年的内幕彻底曝光。

(作者:陈铁生,写于1988年4月,选自市政协留存资料)

参考资料:

柳州市图书馆藏影印的1944年8、9月份《新华日报》

日寇对柳州的惨烈空袭

自从抗战之日起,日军扰乱我国,不分前方后方,经常派飞机狂轰滥炸各处军事基地、物资仓库、交通线路及城市乡村民房,我市自不例外。有时数日空袭一次,有时一日空袭数次,防不胜防。柳州便制定了同时发放的两种防空讯号。一是目睹的,即在马鞍山顶挂一个黑布灯笼叫空袭预备警报,表示敌机已向我方飞来;挂两个黑布灯笼,叫紧急警报,表示敌机将至我地,大家赶快躲好;敌机离境远去则将两个黑布灯笼放下叫解除警报,大家方可回家。二是耳闻的,即在市中心区响警报器,空袭预备警报响一分钟稍停又响一分钟,连续三次;紧急警报,急速连响三分钟;解除警报,响长声两分钟。

躲警报的地方分为,住河北片的居民向铜鼓岭、野鬼桥等远处去,或去柳侯公园、河滩及有树木的地方疏散以减少伤亡;河南片因为山岩多,如牛仔岩、鱼峰山、马鞍山、蚂蜗岩、驾鹤山、龙岭岩、火光岩等,所以住河南片的居民多往这些山的岩洞里躲藏。一些住在河北片的老人们,清早就搭船过河南来到各个岩洞附近等候躲警报了,只有学生、职员、生意人、工人们等到发警报时才拔腿跑去躲避,跑不及的就听天由命了。

日机轰炸柳州,其次数之多,破坏损失之惨重难以统计。除小轰炸,物资、房屋、人畜伤亡少的不计外,大轰炸计有两次:一次是1939年7月15日下午,多架敌机轰炸河北区,柳侯公园、映山街大树脚多处,这天共炸死炸伤两三百人;一次是一周后即7月22日中午,敌机多架从河南牛仔岩起飞,炸鱼峰山,马鞍山、驾鹤山、蚂蜗岩等处成一条线,死伤亦两三百人。两次轰炸尤以公园、大树脚、马鞍山西南麓一带死人最惨。敌机走后已是黄昏,到处呼爷唤娘,寻子找女,喊哥叫弟之声,闹成一片,死者有些断头折骨,脚、手、肝、肠、肉、血横飞挂在树枝叶上,有些仰、扑在地上、冲沟里、石头边的血泊中,惨状实不忍睹。大街小巷,颓垣断壁无数,电线、电杆木,横七竖八地堆积满路。晚上城里一片漆黑,提灯执火踏入死尸中寻找亲人、跟踪追问的比比皆是,各人忙乱不堪,还胆战心惊地恐怕又接

有警报来临。即使见到亲人,面目全非也难辨认,重伤轻伤人员,医院容纳不完,呼痛叫疼之声不绝于耳,令人心胆破裂。

另有 1939 年 9 月某日中午,日机 72 架轮流轰炸我飞机场,每三架为一小队,九架为一中队,这八个中队炸得机场像烂泥田,没飞走的飞机、机房、航空司令部完全被炸毁。1940 年 9 月下旬,日机 15 架入侵柳州,住太东街谢宅的飞行教官周某等近十人,接到迎击命令,连中餐都来不及吃,便乘小车赶至飞机场,同驾 9 架飞机前往截击,结果周某被 3 架日机包围击落,其余 8 架往长安方向逃躲,敌机一架被击落在穿山附近地方。空战各有损伤,也不只一次。1941 年 2 月某日,蒋介石在羊角山召开军事会议,被汉奸告知日军,日军派多机轰炸羊角山,仅炸死士兵两名,会议照常开并无妨碍,唯汉奸令国人切齿痛恨。嗣后日机侵犯频繁,市面买卖困难,警报无期常发,人心惶惶。至 1944 年头,日军从外围攻柳,军政下令分期疏散,丢下一座空城。同年 11 月 9 日,柳州全部论陷,军民都逃往附近山区县乡去了。

(作者:韦建章,写于 1987 年,选自市政协留存资料)

日机轰炸柳州目睹记

1944年,我才10岁,在桂林读书。当时日军已从湖南逼近广西,日本飞机轰炸桂林的次数也日益增多,从每天的1到2次增加到3到4次不等。弄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商店停业,学校停课,市民为躲飞机而惶惶不可终日。在形势逼迫之下,我们最终被迫撤离桂林向柳州转移。托运到柳州的東西,全都丢在当时鹅山脚下的一个露天货场,无人看管,更没有领发手续,都是凭良心到那里自行寻找各自的東西。说来也怪,在那时候可能是各自顾着逃命了,没有人起歹心趁乱要别人的東西。这些堆积如山的東西,在露天任其日晒雨淋,等待它的主人来认领,没有听人说東西丢了或是被盗了。

1944年春,我们一家逃难到了柳州,但躲警报的事一点也不比在桂林少,几乎天天都有。那时我们住在湾塘路旧皮鞋厂(即现在的湾塘路小学对面),每次发警报,我们大多数跑到黄村头(即现在油脂厂附近),也有跑到如今木材场一带,那一带有国军修的钢筋水泥碉堡。黄村头即现在的郊区医院柳州铁桥隧段一带,那里有一片坟地,还有一些能容一两人躲进去的小土洞可躲飞机。

河南片的居民就跑到鱼峰山、马鞍山、蚂蚱岩和附近有洞的石山去躲。有一次没有发预备警报,突然间发紧急警报,弄得市民措手不及,住在湾塘路附近的居民,都朝北跑,到了转弯路口,飞机已经到了头顶,再跑就要暴露了,这时人群自然地分成两帮,一帮右转弯向原黄鹤龄公馆(即现在的柳州饭店)的河边跑去,有的就地趴下;我们这一帮则向左转到如今的柳州地委一带,就听见飞机俯冲扫射声了,再跑也就危险了,于是我和柯伯妈(我们的房东)赶快钻进旁边的松树林,树林里有一片乱坟。那飞机好像看见了我们似的,老是在头顶上盘旋,不肯飞走,一刹那就冲下来,接着是一串震耳欲聋的机枪扫射声,我害怕极了,只顾往柯伯妈胯下钻,头都不敢抬。

在那段期间,每天晚上,尤其是飞机来到时和来到前的10分钟左右,马鞍山、鹅山一带都有密集的信号弹射向天空,听说这是汉奸给敌机指示目标的信号,可见当时柳州的汉奸非常猖狂。那以后不久,我家就转到如今的郊区长塘定居。

(作者:张宏德,写于1987年8月,选自市政协留存资料)

沦陷前柳州的军事布防

1944年10月,柳州已经进入沦陷前的紧张阶段,所有柳州的专员公署及其所属的柳庆师管区等机关都向西面罗城一带迁走了,只留下一个寡头的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原是专员尹承纲兼任,后尹承纲调任桂北行营主任,留下副司令马维岳主持工作,驻扎在鱼峰山。当时柳州市区内的培新路斜坡口和河南浮桥大码头口的交通要道处,都建有碉堡,看上去是有准备与敌人进行巷战的架势。

进入10月,由粤军所属的二十六军在市区布防,军长叫黄涛,他曾在军部召开与地方机关联席会议。我当时是柳江县政府的社会科科长,代表县政府出席会议。黄涛在会上说,他的部队是在湖南衡阳西站参加激烈的战斗后转移下来的。并宣布了维护地方的秩序,最主要的是不准擅放冷枪,以免误会。曾有一次因农民携七九步枪来县府,教育科科长李津源拿该枪试鸣几发,被该军士兵缴枪扣留起来,后由我交涉释放的。进入11月,该二十六军调出市区,到柳江县穿山乡一带防守,市区由川军新属六十二军接防,军长是丁式盘。

当时连接柳州南北岸的交通浮桥,原是为了方便群众避免空袭而架设的,桥上设有桥管处,由动员委员会监督,动委会主委尹承纲调走后由县长覃采为处理,县府便派我管理浮桥。10月的一天,十六集团军派来一名中校副官伍汉章到浮桥向我索要几十名民工(因我在县里又临时分管征民工的任务)和10多名水工。询问才知是十六集团军败退下来,用火车装载了很多货物(商品),因路轨阻塞,火车不能前进了,欲改由水运,但货物上面又压满了枪械。他的条件是,送一些枪械给地方作自卫抗战用。我把情况向代县长刘栋平和国民兵团副团长韦文富作了汇报,副团长韦文富派了几十名民兵帮他解决了问题,这个中校副官送了几挺重机枪发给三都等乡。

11月6日,守军六十二军派一工兵排杨排长强行接管浮桥,孰料7日柳江涨大水,该排士兵管理不善,浮桥被大水冲走了。

我们在县府的一批人员及自卫队,没有得到撤退疏散的命令,死守在县府,

个个都很心焦。6日晚10时许,接到穿山守军二十六军的电话,因他们的军用电话已断,便让我们代他接通四战区长官部。我们代他叫来了长官部吴石参谋长(长官张发奎已撤走了)。原来敌人已从象州渡河,二十六军请求增派兵力阻守,否则明晨敌人就有可能攻进柳州。

得知这一消息以后,代县长刘栋平报呈警备司令部,说明市区内老百姓已走光,县府拟转入乡下。于是,除了警佐冯华堂率领几名警兵留守外,我们在8日清晨全体向成团乡转移了。

后来得知六十二军的士兵也退往土博向宜山县方向转移,9日,柳州城内被日军一枪不发地占领了。

我11日到土博乡外的土坳脚见到坳顶有机枪布守,坳下有一军官带着两名士兵,阻止我们前进(因我带有在成团乡李春岭被日军击溃的自卫队30多人)。据他说前面有敌人在柳城一带与我军战斗,我军有一团强渡过河,团长就是我们柳江县人韦善祥,是一八八师的。我问他,师长呢?他说师长海竞强坐小车向宜山县去了。

(作者:梁镇海,写于1987年6月6日,选自市政协留存资料)

日寇铁蹄下的柳州

1944年11月11日,日军的铁蹄踏进了柳州城区,从此以后的7个多月,柳州遭遇了建城2000多年来空前的浩劫,人民被屠杀,物资被掳掠,房屋被烧毁,昔日繁华的桂中商埠,变成了一座死城。

日军一进城,就霸占好房子,日军驻柳最高指挥官叫福兴大佐,就在东大路陈炳琨的琴园设司令部,对面柳庆师范学校(今文化大院)驻军,居民都不敢从那里走过,怕被抓走。河南天主堂成了日军宪兵司令部,凡是被日军怀疑是游击队探子的人,都被抓进去,或灌辣椒水,或用烧红的烙铁烫身,甚至拉到马鞍山脚活埋。

映山街有间国民党大官的洋房(今城中派出所)成了日军宪兵俱乐部,这里面群魔乱舞,还有几十个被抓来的女子在那里惨遭摧残。日军经常在门前宰杀抢来的牲畜,吃喝过后就斗殴闹事;日军在逃离柳州前,还在那里面绑了一批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汉奸,押到映山塘边枪杀,把尸体丢下塘去。水南路旧电厂和多处大的建筑物成了军营。

柳州沦陷时,仍有少数人没有离开,其中有重病在身走不动的,有因持观望态度最后跑不了的,也有心怀不轨想掳掠遗留物资的亡命之徒,更有一心想充当汉奸的民族败类。沦陷10多天后,日军在驾鹤山的半山酒店成立了“柳州地方维持会”,用思贤乡黄岭村的刘植森当维持会长,板桥村的刘炳荣当秘书,下面设有科室,负责人由本地汉奸充当。各乡镇还有分会,柳西镇维持会长叫庞忠,柳东镇有个副会长姓黄。早年从湖南来的两个和尚释春霖、释法依分别做了水上维持分会和滨江镇维持分会会长,还成立了以汉奸石补天为局长的柳州警察局。

汉奸们带人或派人出城到郊区和附近乡村,招诱民众回城,说回到城里会得到种种“优待”。不少原来住在柳州的外地人,因为逃到乡下无亲可投,也无友可靠,生活毫无着落,就试探着先后回城。日军为了解决生活补给的困难,除了由汉奸带领到四乡抢夺食品外,还在雅儒村办了两个农场,哄骗回到城里的人为他

们种菜,每天发四斤杂粮。回城的一些人为了解决生计,迫于无奈,也只好为鬼子种菜了。



1944年11月11日日军占领柳州的消息(资料图片)

沦陷后的柳州十室九空,凡是无人看守的房屋,大门、窗扇、板壁、床板、楼板、楼梯等所有木料,都被日军撬去当柴烧了。屋边甚至街上野草丛生,蓬蒿齐腰,一片荒凉。汉奸们把人骗回城后,就带着鬼子到处抓人,经常半夜三更拍门入室抓夫、找花姑娘,开门稍迟就被搨嘴巴。当时的铁路、公路全都被破坏了,陆路运输全靠人力挑抬,鬼子和汉奸到四乡抢夺得来的物资,或需要运往贵州方面供日本兵用的军需,全由民夫肩挑运去。谁因精疲力竭走不动了,或者落后掉队了,就会遭到日军用枪托拖,用刺刀捅,伤得动弹不得了干脆弄死。死人的担子就分给其余民夫来挑。为了保命逃避拉夫,居民寝食不安,东躲西藏,但少有幸免的。从水路运到柳州的東西也由拉夫来卸货起岸,挑到柳庆师范学校堆放。《柳州晚报》曾连载了一篇纪实文学作品《民夫泪》,记载的就是大桥游山村人覃克诚被拉去当挑夫,从柳州挑到南宁,过越南,经柬埔寨,到马来亚的吉隆坡,直

到日军投降后才得回到柳州的血泪经历。

曾经先后担任过柳江县教育局局长的钟震吾和余炳华两位老人也被抓去当挑夫,余炳华因挑不动重担被日军用刺刀捅死。钟震吾曾留学英国,有个读过大学的日军班长会讲英语,钟老向他表明身世,求他关照,到宜山后侥幸获得释放。在郊区和四乡的情况比城里更惨,日军进村见人就抓,见妇女就强奸,见衣物粮食等有用的东西就抢,见家畜家禽就杀,还挨家挨户地砸烂门窗,打烂水缸,把门板、床铺、桌椅板凳、龙骨车、风柜、犁耙、箩筐等等家具、农具统统堆到晒谷坪放火烧掉。

沦陷后也还有人摆摊做生意,经营者有趁紧急疏散时掠得他人没有搬走的东西拿出来卖的;有日军同汉奸串通,把到外地抢得的东西拿出来摆卖的;也有逃到附近乡下因为生活无着落,被迫返回柳州,但不愿为日军做事,只做点小吃来卖的人。这生意很难做,经常被日军、汉奸强抢白吃,稍有不从就会挨打。那时沦陷区流通的是汪精卫伪政府发行的纸币,大家都不愿要,交易多是以物易物。还有些近郊的农民把自产的农副产品拿来城里交换煤油、火柴、衣物等日用品的。农民带农副产品进城是要冒风险的,因为路上有土匪、汉奸拦路抢劫,进到城区又会被无端指控为游击队的探子,抓去拷打逼供。

疏散前比较旺的小南路、人字街(如今柳江大桥北端保险公司大楼西北侧)、大十字街(今五角星)地段,和河南大码头一带,开有几家赌摊和烟馆,那是些嫖、赌、饮、吹(鸦片)的场所,经常聚集一群流氓、汉奸在胡混。这些亡命之徒总是输打赢要,经常拔枪相向,往往从屋里打到屋外,伤及无辜。

可柳州人也不是好惹的,据当年从广东来做生意、因为生病没有来得及疏散的一个叫肖焜的人讲:有一天晚上他被抓到兴仁东路街口,日军把抓到的人先集中在一处派人看守,等抓得差不多了再押走。在他挨抓来时已经有 10 多个人了。不晓得哪个用柳州话小声讲了句什么,大家一齐冲上去把那个看守他们的日军撞倒,然后分散逃跑。那日军爬起来叽哩呱啦边喊边打枪。因为街上没有电灯,日军连电筒都没有一把,哪里去追?

长塘乡八卦村有个叫余裕清的人讲,他练过武,跑日本那年他也挨拉夫,被逼挑担到流山圩,那个晚上,他和同伴用在墙边得来的石灰粉向看守他们的两个日军的脸上撒去,当日军搓眼睛时,就把日军扳倒把枪抢到手,用刺刀把日军戮

死后逃跑。在现在柳江县的百朋、三都、穿山等地,更有多起只身或数人砍杀日军夺枪的英雄事迹,至今还在民间流传。柳州民众抗日武装打击进村掳掠的日军、设伏拦截日军的运输船只、袭击日军过往队伍的脍炙人口的故事,直到今天还是村上老人摆古时百讲不厌的题材。

在中国军队和民众抗日武装的打击下,日军在柳州待不下去了。在逃跑前三天公开声称要放火烧城,日军和汉奸一齐出动,强迫居民在 10 分钟离开住所,并趁机抢掠财物,然后用汽油、火焰喷射器放火烧房,烧不燃的钢筋水泥建筑物,则投放燃烧弹。居民只好拖儿带女地找空旷的地方避开。一时间整个柳州城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房屋倒塌声、木竹燃烧的爆裂声、小孩的哭喊声和不时响起的枪声,不绝于耳,全城陷入死亡的恐怖中!柳州从 20 世纪 30 年代兴建,经过 10 多年经营的中心区繁华街道,被日军烧成废墟。

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沦陷期间,当时的柳江县(包括现在的柳州市区和郊区)被日军杀害 5095 人、伤 33378 人、因战乱死亡 8672 人、失踪 4350 人、毁屋 26764 间、财产损失价值 98.9 亿元。疏散到外地的物资十有七八受到损失。当年日本侵略者给我们柳州乃至全中国带来的那场灾难,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

(作者:陈佚生)

劫后余生的柳州

1944年11月11日柳州沦陷;经过中国军队和柳州周边民众抗日武装的反击,1945年6月29日柳州光复。日军逃跑前纵火焚烧柳州城,将河北民生路(今小南路)、大东路(今中山东路)、庆云路(今中山中路)、兴仁路(今曙光中路)、天星巷(今红星街)、皇荡巷(今红星街东一巷)、北门大街(今解放北路)、潭中路(今解放南路)、潭中路中段(今公园路)、龙城路、斜阳街、文惠路一段、连塘路(今五一路)、西兴街(今柳荫路)、培新路、柳江路及河南的驾鹤街(今驾鹤路,飞鹅二路东段)、鱼峰路、柳庆路(今柳邕路)口、城站路(今文笔路)、太平街(今太平中、东、西街)、张翀路(今光明路)等街道3000多间房屋变成废墟,为当时柳州房屋总数的75%—80%,全城只有300余间房子幸免于难,但也残破不堪。一名叫格兰姆·贝克的美国记者在《一个美国人看中国》一书中,写到战后他在柳州飞机场附近一小山顶上远眺城区的情景说:柳州像躺在郁郁葱葱的嫩绿的大地上的“一块黑色疮疤”。“市中心一度是有声有色,熙熙攘攘,现在则是一片寂静的废墟,只有十来所房子还有屋顶。”

7月22日,《新华日报》登了一篇美国新闻处7月20日发自柳州的电讯,题为《劫后柳州一片瓦砾》,文中说:

柳州全城已遭焚毁,这是敌人兽性破坏的证明。柳州原来是广西最繁华城市之一,现在寂无人声,中国军队收复柳州已有三周,柳州仍是一片瓦砾与焦木,只剩一付城市的躯壳,墙倒屋塌,无日无亡。本城人口一度达数十万,现在只有数千,难民已经有人回来。

可是呈现在回城人们眼前的是一片恐惧和悲凉,在断壁残垣边、在乱砖瓦堆上,甚至在十字街中的碉堡旁,都见到有发臭的、聚满苍蝇的死尸。

日军逃跑后没几天,惨遭劫难的柳州百姓,陆续回来,可是从他们的脸上并



劫后柳州街区的一处残破景象(资料图片)

没有见到胜利后重返家园的喜悦。面对瓦砾遍地、荆棘丛生的故地,他们感到食住无着落,不禁悲恸欲绝:今后何处安身?又何以为生、何处求生?他们徘徊在废墟上,像进入一个陌生的地方,不知所归!无奈之下,只好在依稀还能辨认的“家”的残垣断壁之下,清理出一处相对安全、可容纳一家数口的地方,盖上烂油布、断板皮暂且栖身。

地方行政机关也从乡下回到城里办理善后,但面对民生问题,也束手无策。守法的人们为了生存,只好到河滩挖野菜、挖石姜和到山边挖草根、剥树皮充饥度日。一些原来就染有恶习的不肖之徒,便乘机偷盗他人劫后余剩的衣物自用

或出卖。当年我家住在天主堂背后的天马路,房子虽然没有被烧,可门板和屋里房间的隔板全被拆掉了。隔壁冯家阿公晚上睡觉时搬几个烂木桶、脚盆,摆在门口处作防盗障碍物用,把全家好一点的衣服都装在一个小皮箱里当枕头。不知什么原因,第二天早晨醒来,枕在头下的皮箱不见了。柳石路还发生过一宗离奇的抢车案,劫匪用两架牛车拦在路中间,当汽车停下时,数名匪徒便涌上车,一枪不响地把车上乘客的财物洗劫而去。



市区被毁严重的一个街区(资料图片)

8月中旬日本投降后,战时的机关缩编了,战时人员也实行遣散,这又造成了胜利后失业人数大增的恐慌。缩编遣散的各种兵员,大多生活无法维持,飞机场的大量裁员,就使得很多外地人生活失去了依靠,一名姓李的工人因找不到工作,求生无望,跳江自杀。为了生存,不少人抱着“打死好过饿死”的想头,铤而走险,给已经够乱的社会治安,带来极大威胁。潭中路就发生过汽车在黄昏时分被失业的遣散军人抢劫的事件。在北站附近,一名广西大学学生在大白天也被人抢去几百万元现款。

因为电厂还没有恢复,一到晚上全城就被恐怖黑暗所笼罩。夜间无人敢出门,一是怕被抢,二是怕摇摇欲坠的危墙崩下压中,三是怕踩着日本鬼子逃跑前埋下、还没有挖出的地雷。《新华日报》7月13日就登了一则美联社记者的电讯《柳州城内到处是地雷》。

随着回城的人不断增多,有人在废墟上建起茅房板屋,一些商铺也开业了,兴仁路东段的菜市和小南路还有夜市,到9月初,各中小学也陆续复课,柳州也就有了一点新生的气息。

时值盛夏,垃圾和粪便还无人清理,8—10月间,一场灾难又降临柳州,先是痢疾,继以霍乱,因药品奇缺,医疗人手不足,卫生机关也无可奈何,患病的人只好听天由命。这次瘟疫虽然只持续10天左右,也死了几十人。一些因病死去又无人过问的死尸,叮满苍蝇,成为散布病菌的新病源,这一惨状又给人们带来巨大恐惧。由于无奈和迷信,东大路有人集资打“平安醮”,通宵达旦请道士念经祈求消灾。

因久旱成灾,这年秋天的晚稻失收,10月,米价涨到5万元一担,给刚回城还没有任何收入的人感到求生绝望。幸好柳江县政府发放了一批急赈款和急赈粮,给绝望的人们有个喘息的机会。但是祸不单行,10月5日,河南接云路(今云头岭到鱼峰山脚谷埠街口一线)发生火灾,把整个河南的天空都烧红了,事后统计,共烧掉民房(都是些刚搭盖的窝棚)上百间,使才得“安居”几天的人们,又成为无处住宿的灾民。

由于回城的人逐渐增多,家底厚实的人家要重建家园,得小兴土木,政府机关也急着修建办公用房,需要大量泥水木工和挑运沙石砖瓦的人工,才让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们有了条继续生存的活路。

此时有上万的湖南、广东等地的难民,从大后方又先后回到柳州,等待车船返回故乡。由于交通工具紧缺,车船又屡屡被买得起高价黑市票的或有特权的“高等难民”“封”了,因此,滞留在柳州的难民有7000多人,这就给食品并不丰富的劫后县城加重了压力。救济机关虽然整天“忙”于办理遣送难民回乡的事,但有名无实。好在善后救济总署有一批物资运到,稍减柳州的压力。

(作者:陈佚生)

战争摧残之后的柳州

抗战结束的柳州,城市残毁不堪,民生极度艰难。大批柳州难民归乡心切,这是一首伤心的流离之歌。这一切,清澈的柳江便是无言的见证者。

抗战结束之际的柳州,在战争摧残之下,加之天灾病疫,人们在极度贫弱的状态下苟延残喘。黄永柱在《劫后柳州》(《中央周刊》1946年8卷7期)真实地记录柳州民众的生存状态:

敌人退了四五月了,劫后的柳州,仍在满城碎瓦断墙之下负伤呻吟着。

柳侯祠前,印下了敌人践踏的木屐的印痕。立鱼峰下,布满了敌人留下的奸污的腥气。累累白骨,暴露于秋天的阳光之下,湘桂黔铁路铁轨的洁白躯体,在敌人污辱之后遍体鳞伤的埋葬于秋草之中,现出战后的凄凉的惨状!

敌人走了,留下一城的瓦砾。流亡了8个多月的柳州人,大家都抱了满腔的热望,而在这战后的废墟上,开始重整家园与重建柳州的新活动了。这战后的瓦砾场上已建立了不少的茅房板屋,表现出柳州新生的气象。

敌人投降了,战时的机关缩编了,战时的人员也实行遣散了,这样,又造成了柳州胜利后失业人数骤增的恐慌,尤其是缩编遣散的兵员,有家归不得的难民,徘徊于十字街头,鹤立于交通要道,为着生活不能维持,为着要打破生活恐慌袭击,便抱着“打死好过饿死”的念头,给柳州的治安,蒙上空前的威胁。潭中路的车辆,在黄昏时节,突然也给失业的遣散军人,乘夜出来拦路抢劫了。河南的金铺,也有凶手持枪公开抢夺了,北站附近,西大学生白日给凶徒抢去几百万的现款。

劫后的柳州,整日在这恐慌的空气下残喘着!

战后柳州,残破不堪,元气大伤。大兵之后遇大灾,1945年粮食严重减产。延及次年,又遇春旱,乡间大部分农户断粮断炊,饿殍载道,饥民靠树叶、芭蕉根

和观音土果腹。而奸商抢购粮食，囤积居奇，刺激粮价暴涨，更使人心惶惶。

与战乱饥荒相伴生的瘟疫，席卷城乡。柳城县政府 1946 年 4 月发布的一篇文告说：“本县自去年被敌侵据历时已八月，敌骑所经之地区几达全县，其人口之伤亡、物资之损失惨重，亘古未有。光复后，所种晚稻，又遭虫灾旱灾，损失过半。”“所见各乡，十室九空，颗粒无存，一般灾民，衣不蔽体，日以草根树皮野菜为生。”大批游资商人纷至沓来，“抢购粮食，囤积居奇，刺激粮价暴涨，人心惶惶，情形颇为严重”。1946 年初的《农历岁末话柳州》报道说：“每当华灯初上，小南路上游人如鲫，商店灯光辉煌，茶楼酒馆，人声喧闹，戏院里鼓乐喧天。……世界尽管升平，尽管笙歌弦管，但却有不少人仍过着惨淡的生活，如果你有机会，到第一难民收容所及街头巷尾的零落的难民群里去走走，你便会看到一幅血泪构成的图画！”这些战争的遗黎，陷入了“胜利后的灾难”。

战后恢复，难民的救济与遣返，是最为艰难的问题。八年抗战，难民问题甚为严重。战后，难民的遣送返籍事务极为繁重。这时集结在柳州的大多是湘鄂、华北籍，以及广东方向的难民。

1945 年 9 月，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黔南主任柳州办事处开始办公，开设收容所。11 月，善后救济总署广西分署在柳州成立，设于乐群社。救济院、难民登记总站等机构也相继设立，进行难民救济和遣返。1945 年 11 月，成立柳州难民登记站和收容所，次年裁撤，累计收容难民 15056 人。

1946 年 1 月，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广西分署成立柳州难民救济院，院址在铜鼓岭（今三中路），次年 1 月移交柳江县政府接管，改称柳江县救济院。

1946 年 5 月 29 日，时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顾问吴景超抵达柳州，视察广西分署工作。吴先生一生重视研究社会现实问题，是中国社会学界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次日上午，广西分署署长黄荣华来拜会，吴先生向他要了广西分署的各种规章及业务旬报，“预备在与各主管人员谈话之前，将分署的工作得一鸟瞰的认识。”5 月 31 日，与赈务组主任黄嵘芳谈话，了解的情况，吴先生做了详细的记录，后来收录入了他的著作《劫后灾黎》中。由此可见当时广西救济难民的大体情况。对于关注抗战结束后难民救济和返乡问题的人来说，这是一段很有价值的历史文字：



集结于乐群社的难民上车回家(资料图片)

遣送难民,是广西分署主要业务之一。柳州由分署直接办理,桂林由分署的办事处办理,梧州由难民转运站办理,其他各地,委托地方政府机关办理。在柳州设难民登记总站,在桂林设分站,随时登记审核,合乎标准的,一面设所收容,一面遣送回籍。凡属湘、鄂及华北籍的,由柳州转送衡阳,属粤籍的,则运送梧州,由转运站托广东分署西江难民输送站接运回粤。被遣送的难民在出发之前,可暂住收容所中,还有无家可归的难民,则长期住在收容所内。柳州的难民收容所,有寝室五间,可容难民 200 余人。柳州还有两个机关,均与收容难民有关,一为救济院,收容了儿童及鳏寡 173 人,一为难民寄宿舍,可容 65 人。难民中可以自立谋生,但晚间无处容身的,寄宿于此。

同时施行紧急救济,主要为现款急赈及粮食急赈。配发的对象为分署及所属机关收容的难民,已经立案的慈善机关,公私举办的社会事业如医院、儿童教养院、托儿所等,以及受灾惨重贫苦无靠的灾民。柳州方面,分署于三月间,每日拨面粉 366 斤,托华侨饼家代制免费面包,及平价面包,以救济柳州市贫民。四月起,协助柳州社会服务处办理柳州平民食堂,分署拨给开办费 156 万元,并每日拨给面粉 400 斤,制售平价面食。此外还有衣服救济等项。同时修理毁坏房屋救济,首先重在卫生机关、各县市小学校、慈善福利机关的修复,并在市中建筑平民住宅。农业救济方面,主要是协助农民增加生产。广西分署将种子肥料赈

款及业务费发给对象为确属受灾最贫苦农民。农业救济的第二种工作,是发放耕牛贷款。第三件是水利工赈。

分署难民管理科的黄嘉谟,给吴景超先生提供了一些关于难民遣送的统计。由柳州起运的难民,至5月底止,共9307人。由桂林起运的共4913人,由南宁起运的424人。《难民回籍证》上面印着“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广西分署难民登记总站”一行字。为遣送工作的展开,广西分署制定了遣送难民回籍实施细则。分为总则,遣送难民标准,调查登记及审查、遣送、护送人员之责任,护送人员出发前应准备事项,报销手续,附则等项详细的规定。其中记载了由柳州转送的范围及运达地点:“柳州为转运之中心,由黔桂路东下之难民集中柳州后,由登记总站登记,其属湘鄂及华北籍者由柳转送衡阳,其属粤籍者,则运到梧州本分署转运站转托广东分署西江难民输送站接运回粤。”在1946年的一年内,共遣送了3万余难民返籍,耗资18亿元(法币)。

(作者:刘汉忠)

抗战风云

柳州战场

从柳州起飞的“长空雄鹰”

在柳州市柳南区柳邕路一带,有许多以“航”字命名的道路,如航银路、航岭路、航鹰大道……老柳州人习惯将这一带称为“旧机场”片区。抗战期间,这里曾经是中国空军、苏联航空志愿队、美国飞虎队与日寇对空作战的重要基地。70多年前的这里,伴随着发动机的巨大轰鸣声,中、苏、美飞行员驾机从柳州机场呼啸起飞,与日寇激战长空,浴血奋战,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1929年国民党桂系主政的广西省政府修建了柳州帽合机场。1932年10月,开始专供国民党第四集团军航空管理处训练飞行员,1934年4月,成立第四集团军航空学校(不久改名为广西航空学校)后,柳州机场成为广西空军的主要训练基地,先后培训各类飞行专业人员219人。1937年9月,广西航校与迁柳的中央笕桥航校合并。广西空军编入中央空军第三大队第七、第八中队和第三十二独立中队的战斗序列。在滕县、归德、南昌、南雄、襄樊、武汉、南宁、昆仑关等地的空战中,与敌人展开血与火的拼杀,先后有黄莺、韦一青、莫更、何信等15名师生牺牲。

广西航校曾请过日本的飞行教官。最初的时候,这些“老师”根本不把昔日学生放在眼里。然而航校学员们却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与日军飞机多次展开了血与火的拼杀。这些被戏称为“广西蛮子”的飞行员,是八桂父老值得骄傲的长空雄鹰。

吕明和韦善谋是广西航校飞行班的柳州籍学员。1938年1月8日,14架敌机空袭南宁,吕明和4位战友驾机迎战。这是广西空军在战场上第一次和日本空军交火,在敌机几乎三倍于我的不利情况下,击落敌机1架、击伤敌机1架。

1938年8月30日,在广东南雄空战中,我方8架战机迎战敌机11架。吕明担任三分队僚机,当一、二分队俯冲攻击的时候,三分队在上方掩护。韦善谋则利用所驾驶的英制战机高空性能好的特点,多次俯冲扫射,击中敌机。交火中双方都中弹,韦善谋跳伞后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回到航空站。吕明的战机飞到湖

南柳州机场降落,飞机竟然中了99发枪弹、2发炮弹,机翼被机关枪打伤,弹箱上夹有敌弹。此役广西空军与敌机作战,击落敌机6架,我方付出了2人牺牲、5人受伤、损失7架飞机的代价。

容县籍的飞行员韦一青,在驻防柳州期间与太平西街一位姓陆的柳州姑娘相恋,两人相约在抗战胜利后结婚。昆仑关战役中,韦一青和战友从柳州起飞增援地面友军,座机中弹起火,坠于敌我两军阵地中央,韦一青牺牲。1940年1月8日下午,柳州军民在羊角山空军坟场公祭壮烈殉国的空军勇士韦一青。柳州空军总站站长题写挽联:“如今马革裹尸还,且与名关同不朽;未驱残敌领空外,犹留遗憾在人间。”

1938年7月18日,大队长陆光球率领黄莺等驾驶的4架僚机,在樟树机场起飞,与苏联志愿空军会合。黄莺为营救被日机攻击的苏联空军飞机(被救者为苏联志愿队领队巴比洛夫上校),被尾追的日机击中,壮烈牺牲。

1938年7月16日,在保卫大武汉空战中,莫更壮烈殉国。人们在他的机舱里看到贴有柳州妇女后援会的一封慰问信。上面有莫更的一句话:“姐妹们,我莫更绝不辜负你们的期望。等着看我的行动吧!”

这些飞行英雄用鲜血和生命兑现了誓言。

在柳州与中国空军一同抗击日寇的还有苏联空军志愿队。

抗战开始,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于1937年8月21日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并于11月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1939年10月,苏联空军志愿队开始进驻柳州机场,他们与驻扎于柳的中国空军密切配合,并很快投入了对日的空战。

1939年10月18日,上午7时许,柳州突然响起空袭警报,9架日本



民国报刊对庆祝空军凯旋的报道(资料图片)

轰炸机侵入柳州上空,驻守在柳州机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迅速驾机升空,分两路夹击,经过近三个小时空战,击毁日机2架,这是苏联空军在柳州上空第一次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胜利空战。12月22日,驻柳的中苏空军又击落入侵柳州9架日机中的1架。

桂南会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的一次重要战役。在这次会战的核心战役——昆仑关大战中,苏联志愿援华空军与中国空军一起,从柳州机场出动飞机12批次,向昆仑关日方战场实施轰炸、扫射,击落日机多架,对日军地面部队形成较大的杀伤,有力支援了中国军队对敌的反攻。

12月27日,苏联志愿航空队与日机在昆仑关上空激战,中国空军三大队副大队长陈瑞钿率32驱逐中队队长韦一青等,驾驶6架战机出动配合。12月30日,日军96式驱逐机18架空袭柳州,苏联空军与中国空军协同作战,一举击落日机8架。这是抗战中空战的一次大胜利。次日,重庆各界召开慰劳会,向参战空军将士致敬。郭沫若在会上代表各界向参战空军将士献旗,《新华日报》1940年1月1日报道了空军屡建奇功的消息。

1941年6月,德国突然对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苏联航空志愿队奉命陆续撤离中国,驻扎在柳州机场的苏联飞行员不得不离开柳州。到1941年年底,苏联支援航空队员基本撤退完毕,飞机和装备则留给了中国空军。

1943年7月,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即飞虎队)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所属的七十六中队进驻柳州基地,驻军人员达5000余人(包括中国雇员,其中多数为地勤人员),柳州机场真正成为盟军最重要的基地之一。桂柳会战时,七十四中队也于1944年9月从桂林撤退至柳州。

这些空中飞虎与日机展开多次空中搏杀,还远飞日军占领下的香港、广州、台湾及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桂柳沦陷后,美军飞机仍然多次出动战斗机协助中国部队作战。

曾在柳州机场从事地勤工作的柳州人李梦秋耳闻目睹了飞虎队的英勇事迹:

一次,飞虎队袭击日军基地,在北部湾展开激烈的空战。由于日机有军舰高炮配合,美军飞机进攻受损。返航后,一名飞行员愤愤不平,强令地勤人员快给飞机加足油,不挂副油箱,却挂上一个500公斤的重磅大炸弹,摇摇晃晃地就要起飞。当指挥塔发现情况异常而发出制止信号时,飞机已像离弦之箭,将这个大

炸弹驮上了天空。原来,他要再去海边,报刚才那一箭之仇。日本人没料到美机马上又来,而且来的只是孤零零的一架。这架飞机由于装载的炸弹沉重,几乎是贴着地面飞来,不易察觉。等日本人发现时,不及应战。这架复仇之机便朝着日本军舰的要害部位,扔下这颗重磅炸弹,一身轻松掉头返航。敌舰被炸沉了,而这位“违抗”命令的“飞虎”受到军纪处分,被禁闭了两天。

这位飞虎队队员“任性”复仇的行为虽然有些个人英雄主义,但他表现出的一身是胆、舍生忘死的精神却让我们对他更加感到钦佩。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飞虎队队员还经常面临无法正常降落、失事坠机的危险。1944年10月16日18时37分,机组11个人驾乘一架B-24轰炸机飞离柳州基地,前往南中国海侦察日本船舶。他们穿越晚霞,在黄昏抵达大海上空,用雷达展开搜索。突然,4个引擎中的一个失去油压。此时,飞行高度只有海拔7000英尺,他们开足马力,迅速爬升到12000英尺高空。很快,这个引擎完全失灵了。他们靠着剩下的3个引擎,保持安全的飞行高度,掉头飞往柳州。日本人通过播放音乐和嘈杂的人声进行电波干扰,已经阻断了美机与基地自动导航信号之间的无线电联系。黑暗中,机组人员不知道准确的航向,只能依靠指南针,摸索着往柳州方向飞。基地的人也知道这架轰炸机遇到了麻烦,他们不顾危险,打开探照灯照亮夜空,希望灯光可以引领那架正在挣扎的飞机回到柳州。然而,当他们刚看见探照灯光,飞机另一个引擎也随之失去油压,着火了。机舱里黑烟滚滚,飞行员奋力保持飞机平稳,其余的10个人逃出烈焰熊熊的飞机,跳入漆黑的夜空。失去控制的飞机像受伤的野兽一样翻转。飞行员跌跌撞撞地从打开的炸弹舱门跳了出去。第二天一早,鹿寨县木龙村在山里躲壮丁的一位村民首先到达坠机地点,将飞行员带回村子。当6名机组人员聚集到木龙村时,这个此前从未去过外国人的小山村像开了锅的水一样沸腾起来。另外的5个人,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险境和困难之后,分别从山里走了出来。他们最后都安全地返回了柳州。

1945年8月,随着抗战的胜利,飞虎队陆续撤离柳州。飞虎队走了,但他们虎胆雄心、英勇战斗的精神却永远留在这块大地上和人们心中。

(作者:刘汉忠)

参考资料:

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图说柳州抗战》(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

我参加了在柳召开的桂南检讨会议

1939年冬,抗战已进入第三年,日军为封锁大陆,截断越桂铁路交通,从广东沿海登陆,奔袭并占领南宁。同时,日军为保持对南宁的占领,分兵扼守宾阳的昆仑关及武鸣的高峰坳。蒋介石为光复南宁调兵遣将,对南宁方面进攻,因而发起昆仑关战役。这个战役由桂林行营指挥作战。桂林行营主任、一级上将白崇禧调集蒋介石中央嫡系部队及其他地方部队参加作战,兵力近40万,但日军兵力总计不过五六万人。战役之结局是以蒋、白惨败而告终,损兵折将,伤亡惨重,乃民国军事史上的奇耻大辱之一。昆仑关没有打下,南宁依然在日军手中,越桂交通仍被日军截断。由于国民党在昆仑关战役之惨败,西南震动,过去以办民团、军训著称之广西,成了有名无实的东西,小诸葛白崇禧的威名一落千丈。(编者注:关于昆仑关战役的全过程,请参阅作者所著《昆仑关战役亲历记》,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蒋介石对此大为震怒,于是,遂有柳州作战会议之召开。我在1939年昆仑关战役期间,是国民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的作战科上校科长,亲身参与了昆仑关战役及蒋介石在柳州召开的桂南检讨会议。

桂南检讨会议之目的,主要是检讨昆仑关战役失败之原因,追查战败之责任,执行奖惩,整肃军纪,重振军心。我记得,1940年2月中旬左右,即刚过了春节不久,会议在柳州召开,地点在市郊羊角山一个高级农业学校(今结核病防治院内),会场为该校课堂。蒋介石由重庆乘飞机到柳州参加会议,说明会议之重要性。会议由桂林行营参谋长林蔚主持。出席人员有白崇禧、陈诚、李济深,行营参谋长林蔚、副参谋长俞星槎,秘书长梁寒操,总参议王泽民、兵站总监陈劲节及各处处长和业务有关人员(笔者也在内);其余为部队主官: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各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徐庭瑤、蔡廷锴、叶肇等;军长有杜聿明、郑洞国、何宣、韦云淞、陈骥、邓龙光、黄涛等,以及各师师长。另外由重庆随同蒋介石飞柳的宋美龄、蒋经国、张治中等也列席参加。蒋介石于会议的前一天飞到柳州,住羊角山农校校部。白崇禧及桂林行营人员全部住羊角山农校课堂。陈诚、李

济深、张发奎及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负责人全部住在鱼峰山脚的乐群社。会议期间,羊角山和鱼峰山一带,军警密布,警卫戒备森严。会议准备就绪后,即在蒋介石到达柳州之第二天举行。

行营参谋长林蔚宣布开会,行礼仪后即请蒋介石讲话。蒋介石窝着一肚子怒火(因为在昆仑关战役中他的嫡系部队损失最大),铁青着脸,怒气冲冲、声色俱厉地用宁波口音“这个……这个”地训斥众将领。他讲话的大意是:

抗战以来,我们连战皆败,丧师失地,大部国土沦陷,国力一蹶不振,士气消沉,民心涣散。我总想找寻机会,给日军一次打击,以励士气,振奋人心。这次日军孤军深入南宁,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同时广西民团训练有素,民族性格强悍,更是战胜之有利条件。针对这个情况,我调用不少部队投入这个战役,满以为胜利在握,谁知出我意料之外,得个惨败,真使我痛心已极。这个失败,主要是指挥失当,其次是部队主官不肯用命,畏缩不前,临阵退缩的结果。为了严肃军纪,决定认真分清功罪,予以奖惩,不然的话,何以谈抗战云云。

蒋介石讲话时,全场肃然,鸦雀无声,战败的将军们更是额渗冷汗,胆战心惊。接着行营参谋处长吴石作了关于昆仑关战役作战经过的总结报告。各集团军,各军、师长相继作了作战的检讨。

会议进入奖惩阶段时,负战役监军之责的陈诚首先起立请罪,自谓督战不力请求处分,降为二级上将。白崇禧接着发言以指挥失当(实为保全桂系实力不肯用命)归罪于己,自请处分,降为二级上将。此时会场更加肃然紧张,人心惶惶。接着参谋长宣布:在该战役中杜聿明的第五军(蒋介石嫡系的机械化部队)作战勇敢,应予记功;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叶肇,未奉命令,擅自撤退,造成全线溃败,着扣留查办;135师师长苏祖馨作战不力,着撤职留任,该师团长伍宗骏临阵退缩,依军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蒋介石还决定,撤销桂林



会后,蒋介石检查军备和视察战车演习。(资料图片)

行营,改为桂林办公厅,取消作战指挥之权,李济深任办公厅主任、林蔚任副主任,调白崇禧回重庆军委会任原职——军训部长兼副总参谋长;取消叶肇、徐庭瑶、蔡廷锴三个集团军番号;第四战区张发奎的指挥部移驻柳州,专管广西。会议到此,宣布结束。

会议期间防空司令部发出空袭紧急警报,会议暂停,与会人员跑进岩洞躲避。不久敌机八九架进入柳州市上空并在羊角山上空盘旋,俯冲投弹 20 多枚,震动很大。但炸弹都落在荒地,房屋未中炸弹,人身安全幸告无恙。当炸弹在附近荒地爆炸时,岩洞震动厉害,气浪扑人。蒋介石表现很镇定,宋美龄则吓得面如土色,浑身颤抖。空袭 40 分钟左右敌机才离去。会场无任何损失,会议继续进行,以迄结束。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宋美龄、张治中、蒋经国等,于第二天清早飞回重庆。陈诚、李济深亦同机回渝。白崇禧及桂林行营人员回桂林。各集团军总司令,各军、师长分别先后回防。

(作者:陆学藩,写于 1980 年 3 月 4 日)

首次空袭柳州的日机从哪来

2015年3月18日,我们驱车前往北部湾。

为何寻访的首站选择北部湾?理由很简单,日军第一次入侵广西就是在北部湾登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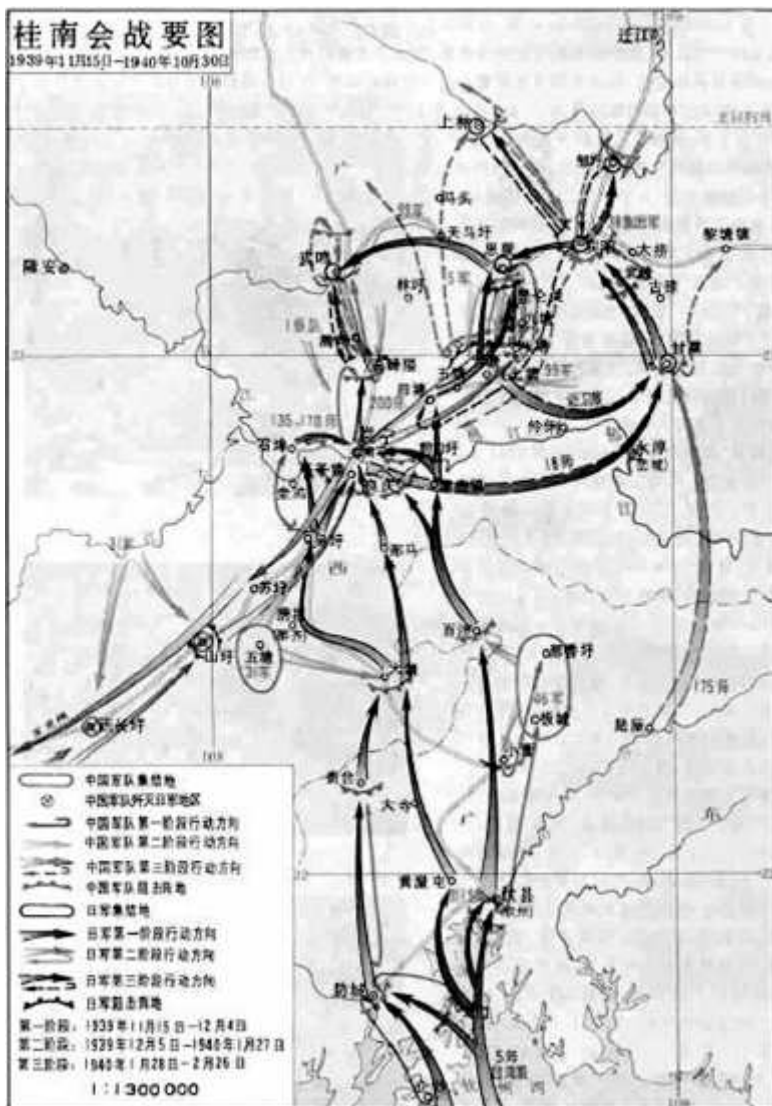
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广西成为全国遭受侵略者践踏和蹂躏的重灾区之一。1939年11月—1940年11月和1944年9月—1945年8月,日军先后两次入侵广西。第一次入侵,日军于1939年11月15日在钦州龙门港和防城企沙一带(两地当时隶属广东省)强行登陆,没经历什么大的抵抗就长驱直入,一路北上攻占南宁、昆仑关等战略要地。

这让我们深感疑惑,作为中国南大门的广西在抗日战争时期,战略位置难道无足轻重?不然,防线为何如此轻易就被日军突破?假如广西真的不重要,为何中国军队后来又发动桂南会战,动用了蒋介石的嫡系,也是中国当时唯一一支机械化部队,血战昆仑关呢?资料显示,到1938年10月,日军虽占领武汉和广州,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失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1939年4月,日本海军部认定,陆军已很难进行大规模作战,海陆协同占领华南主要沿海港口以切断中国对外最后交通线,才是解决“中国事变”的最佳途径。

其时,中国经法属印度支那方面的海外补给交通线是中国最大的补给来源,仅1939年9月运进中国总吨位14700吨中八成以上的战略物资即经此路线。该补给交通线开始于抗战爆发后不久,战略补给物资从越南经滇越铁路、桂越公路,进入云南和广西。南宁是运输线上重要枢纽之一。南宁外围素有“雄关独峙镇南天”之誉的昆仑关则崖高谷深,中通隘道,更是控扼桂越国际交通线的雄关险隘。

日军为了侵吞中国,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开始对中国进行长期的研究,并派出大量特务详细测绘中国山川地貌。对于占领广西的重要性,他们了然于胸。在其出版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1979

年出版,田琪之翻译)中提到,日本发动桂南战役,是经过深谋远虑的,意图非常明显:占领南宁后,直接切断桂越国际交通线,威胁中国抗战大后方,使中国丧失抵抗能力,从而可以立即结束在华战争,完成它对中国的侵略任务。还有很关键的一点是,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已迁至重庆,“一旦进入南宁,以该地为基地,则



交通四通八达,远可通往广东、湖南、贵州、云南。所以南宁—谅山的道路,形成了蒋政权联络西南的大动脉。为了直接切断它,首先必须夺取南宁。南宁一旦占领,无须置重兵于东京湾附近即可以完成作战目的”。

也就是说,南宁沦陷后无异于丧失重要的“护都”屏障,直接威胁重庆。此役,日军派出了第五师团、台湾混成旅团、其他配合部队、第五舰队(后改称第二派遣支舰队)、海军第三联合航空队,兵力总共约3万人,以及军舰70余艘,航母2艘,飞机约100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主力部队的第五师团,是日本陆军一流精锐机械化部队,号称“钢军”,参加过南口、忻口、平型关、太原、上海、台儿庄、广州等战役,屡次担任主攻任务。可见日本方面何等重视入侵广西的作战,大本营陆军部作战部长富永恭次更宣布:“这是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既然广西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何在日军登陆初期,我们能找到的关于中国军队阻击日军登陆的战事史料如此之少?难道当时的中国政府一早就放弃广西,自断后路了吗?车行在泉南高速公路上,带着我们的许多疑问奔向目的地。

我们期待着在北部湾,以上所有的谜团都能水落石出。

我们最初的计划是首先前往钦州龙门港和防城港企沙一带寻访,了解日军当年登陆时的情形。行前,我们进行了资料查寻,但所获得关于日军在广西登陆的史料十分有限。因此,一行四人一直在车上使用手机上网,继续查阅相关材料。结果,一个意外的发现改变了我们的行程,决定先去北海。

我们在网上找到了一篇题为《涠洲岛首次沦陷前后》(署名为谭承裕,原刊于《北海文史》第六辑)的文章。

文中提到:从1937年开始,日军便开始轰炸广西。1938年9月12日,日本“加贺号”航空母舰由万山群岛驶往北海与涠洲岛之间的海面,并有巡洋舰及炮舰3艘随行护卫。13日,日机从舰上起飞12架战机,飞往柳州轰炸,飞往桂林上空盘旋。当天日军在涠洲岛登陆,全岛首次沦于敌手。

这一发现,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关注。资料显示,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柳州首次受到的空袭。

日军的空袭,来自空中的噩梦,曾给广西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根据《广西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报告》统计,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不

断出动飞机轰炸广西。1937年至1944年初的七年间,先后有7620架日机侵袭广西1666次,其中投弹轰炸的有564次,广西重要城市都变成了一片焦土。

这些日机从何而来?长期以来,鲜为人知。而此次发现,让我们有了意外的收获:在抗日战争时期,首次空袭柳州的日机原来是从日军罪恶累累的航母“加贺号”上起飞的!紧接着,我们又从找到的资料《抗日期间日军对北海的侵占及封锁》(作者李志俭)一文中得知,日军在正式登陆广西之前,就在北海的涠洲岛上建有野战机场,盘踞涠洲岛长达七年之久,停留飞机最多时达四百余架,轰炸北海、合浦、钦州、南宁、梧州、云南、昆明等地的战机,多从此起飞。

新的发现,让我们追溯日军入侵广西的时间又往前推进了两年。

然而,这些纸上得来的资料是否可靠,涠洲岛上还有什么遗迹可追溯,是否还有亲历者可以验证?此时,涠洲岛就像一把关键的钥匙,等待着我们去开启尘封已久的历史真相。我们都期待着此次前去能有更大的发现。

(作者:李广西 赵伟翔 陈跃文 李俊)

桂柳会战是怎样一场战役？

第四战区最高长官、桂柳会战的指挥官张发奎在自己的抗战回忆录中说：“这一次会战，是我军人生活中最难忘的一战，我为它而兴奋、忧虑、悲痛和愤恨。”

桂柳会战是怎么样的一场战斗？而当时这场战斗的主要指挥官为何如此悲愤交加？

1943年秋季起，同盟国在二战转入战略反攻，在中国本土的中美空军基地已严重危及日本本土至南洋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影响日本本土战略物资由海路运输到各战场。如果打通亚洲大陆的陆上交通线，使关东军、中国派遣军和南方军结成一体，便可充分利用亚洲大陆战略空间作持久战，打击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识。为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拟定了一个由北而南、全面进攻的计划。

第一期作战由华北方面军发动攻击，打通平汉铁路，同时歼灭国军在河南的主力汤恩伯部。第二期作战由驻武汉的日军第11军攻击衡阳，摧毁国军第九战区主力。第三期作战由第6方面军与华南第23军配合，由广州北上，以打通粤汉铁路为目标，并与第11军会师。第四期作战于打通平汉、粤汉线之后，再出兵攻占广西和越南的通路。若日军达成其战略目的，中国将被分为两半，重庆基地有可能被其占领，这也是抗战伊始，中方最为担心的日军战略方针。

日军为打通由平汉路经湘、桂两省至越南的陆路交通线，于1944年8月攻陷湖南衡阳后，由湖南、广东分兵向广西进犯。1944年八九月间，蒋介石严令第四战区（广西属第四战区作战地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广东人）在广西的桂林、柳州等地进行防御抗敌。这次对日军的防御作战，史称“桂柳会战”。1944年9月11日，日军攻陷了桂北全县（今全州县）的黄河，桂柳会战由此揭幕。

1944年8月，日军侵占湖南衡阳后，为准备进占广西桂林、柳州，成立第六方面军，以冈村宁次为司令官。11月9日，日军向桂林城发起总攻。

同日，日军突破国军中央兵团的防御阵地，攻向柳州。11月11日，防守桂林

城区的中国军队撤退,部分军人在撤退途中被俘,桂林陷落,31军131师少将师长阚维雍拒绝撤退,于阵地拔枪自尽忠烈殉国。

国军第27集团军接到战区11月7日改为中央兵团、固守柳州的命令后,以急行军于当夜到达指定位置,当即进行防御部署。8日,日军进至柳州南约18公里的四方塘,



小南路被毁的一段(资料图片)

而抵御该日军的国军第22师团仍在贵县北龙山地区,柳州可以说门户洞开。9日,日军由柳州以北、以东和东南发动总攻。当日中午,日军由三门江附近强渡柳江,进至西岸和攻入柳州北部、柳州机场南侧。10日凌晨,日军攻占柳州飞机场。美国陆军航空队支援战机30架及桂林机场遭日军击毁;坚守柳州城区的第26军伤亡过半,奉命撤离,柳州失守。随后,日军分别向西北和向西南进攻,11月24日攻占南宁。

参加桂柳会战的国军部队,计有11个军的番号,大致10万人。这次参加作战的10多万人的部队分属四个系统,即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新桂系部队、粤系部队、杂牌部队。这四系部队,名义上统归张发奎指挥调遣,实则不然,张发奎对蒋介石嫡系部队是指挥不动的。

1944年5月,第93军军长陈牧农率部从四川赴广西全州县驻防,1944年8月率军不战而退,致使日军迅速占领军事重镇全州。陈牧农不但兵力部署不按张奎发的命令执行,就是张发奎严令陈牧农退撤时机必须候命才能行动时,陈牧农仍我行我素,撤出全县时根本不告诉张发奎,从而打乱了张发奎原来的作战部署。陈牧农后被国民党逮捕,1944年9月20日被蒋介石电令执行枪决。

1944年7月,陈素农任陆军第97军中将军长,负责陪都重庆卫戍之责。9月,陈素农奉命率军赴黔桂边区作战。11月,陈素农率军至广西南丹布防,阻止日军由贵州进攻重庆,苦守七昼夜,拖延日军前进时间,让国民党各路援军赶

到,重庆转危为安。但终因南丹失守,所部被日军击溃,陈素农被免去军长一职。就在蒋介石派第97军入桂到南丹时,张发奎派参谋人员到该军与军长陈素农联络,陈素农立即于11月23日电话请示蒋介石说:“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派有参谋到我部联络,此后我军之行动,是否受张指挥?”蒋介石答:“你直接向我负责好了。”这样,张发奎派去的联络参谋只有扫兴而归了。

更使张发奎下不了台的是,第97军原被指定坚守南丹县的芒场,掩护其他部队后撤,但陈素农却擅自放弃芒场后撤,1944年12月1日,陈素农率残部撤至六寨时,被张发奎发现。张发奎责骂陈素农不坚守芒场之过,并命陈素农立即返回芒场阻击敌人。陈素农却抗命说:“我奉蒋委员长命令,直接向蒋负责,不接受你指挥。”张在无奈之下,只好听之任之了。

参加会战各部队不服从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的处处可闻,形成战区内兵力分散,单打独斗,被敌各个击破而败北。

蒋介石嫡系部队指挥官不服从非蒋嫡系将领指挥在国民党军队中那是家常便饭,但对新桂系部队,张发奎也指挥不了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如奉命“死守”桂林城的韦云淞,城危时请求张发奎准予“突围”。张发奎始终不允,但韦云淞却以电报报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夏威及蒋介石以副参谋总长名义派往第四战区指挥桂柳会战的白崇禧而“突围”逃跑了,对此张发奎也无计可施;张发奎原按蒋介石严令部署以新桂系的两个军“死守”桂林,最后却被白崇禧改变了。

此次会战失败,是蒋介石趁机借日军消灭异己,新桂系防蒋暗算保存实力,参战部队同床异梦,未能团结对敌,单打独斗,被动挨打,结果被敌各个击破而告失败。

“桂柳会战”持续近8个月,国民党军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人,丢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省的大部或一部,使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敌手,6000余万同胞处于日军铁蹄蹂躏之下。

国民党中央战后在柳州召开的桂南会战检讨会,撤销桂林行营,成立桂林办公厅,不负作战指挥。第四战区移驻柳州,专管广西。

(作者:刘丽虹)

参考资料:

张发奎:《抗日战争回忆录》(《广东文史》第五十五辑)

抗战时期的柳州肃奸活动

1940年初,桂南会战打响不久,柳州城厢不时发现有冒充为难民的汉奸在活动。他们以金钱收买孤苦无依的难童及乞丐,三人编为一组,以年长者指挥之,出没于重要机关、工厂、车站、码头、机场、油库、军火库及避难场所。每当日机临空,这些民族败类便指挥收买之难童故意嬉戏、玩耍或打架、对骂……以吸引人们视线,然后趁机点燃烟火,或以镜子对着太阳照,或以大幅红(白)布铺地……给敌机指示目标。

防护团针对汉奸的活动规律和作案手段,请军委会政治部抗敌演剧第一和第九队编了几首严防汉奸活动的快板,在群众中教唱。

人民群众擦亮眼睛提高警觉以后,一个肃奸高潮便在柳州城内掀起。经柳州区防空指挥部与军警督察处和警察局联合行动,当年8月18日,破获以佟昌贵为首有4名成员的汉奸团伙;26日,又破获以高柏成为首有6名成员的汉奸团伙,他们专门为日军收集情报、指示轰炸目标,干出卖民族利益的勾当。

1944年11月柳州沦陷后,日军便在驾鹤山上西面的半山酒店处成立“柳州地方维持会”,由刘植株任会长、刘炳荣任秘书。1945年春,大汉奸石补天从桂林跟随日军来柳做特务工作,接任柳州警察局局长职务。他原名石方剑,会讲日语,深得日军赏识。在日军的纵容下,他任意残害同胞,指使敌特在河南街搜捕我自卫队派入城里活动的战士钟显廷、丘麻子,把他们关进驾鹤路集中监狱内(今天主教堂),捆绑吊打,用辣椒水从口鼻灌入腹内,待腹部膨胀隆起后,又用大木棍在其腹部上拼命踩压,惨不忍睹,还将二人押出来当街示众。有的无辜百姓也遭审讯,被红铁烙身,甚至挖坑活埋……同年6月下旬,日军撤退前夕,石补天奉其主子之命,亲率日特、汉奸等,对居民进行大肆掳掠,并在城内施放大火焚烧居民房屋。较坚固的建筑物,汉奸们则利用日军配给的化学药物焚烧炸毁,弄得到处硝烟弥漫、烈火腾空,全城一片火海。驾鹤路从驾鹤山脚以西,包括河边巷,

一直烧到车渡码头;对面街从天主教堂以西一直烧到鱼峰路口;今红十字会第二门诊部以东的民房(包括柳州机器工会)门窗被拆除当引火物,受到严重破坏。驾鹤路的房屋被毁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全城被烧最严重的一条街道。柳州光复后,石补天被抓住关在文笔路看守所,法院以汉奸罪判处他无期徒刑。

1944年11月11日,柳州全城陷于敌手。日本鬼子才来几天,鱼峰山鱼峰寺住持释春霖和铜鼓岭士林寺住持释法依这两个和尚即奴颜婢膝地去叩见日军,趁机充当敌人向导,下乡抢夺粮食和禽畜,奸淫妇女。两个汉奸频繁出入日军司令部和宪兵队队长的家,认贼作父,竭力取悦日军。日军在驾鹤山西麓的半山酒店成立“柳州地方维持会”,释春霖被任命为水上维持分会会长,释法依则任滨江镇维持分会会长。自此,这两个内鬼变本加厉地危害百姓,主动巴结特务组织的大小头目,经常向特务组织提供各种情报,常在河南河北的主要渡口码头坐守,监视过渡的群众,遇上生面人和认为可疑的人,即示意让日特抓送设在天主教堂的日军司令部监狱。一些无辜群众为此惨遭严刑酷讯,折磨至死,尸体则抛入顺家巷程显宏家对面菜园的一个大坑内,有的甚至被活埋在坑边,其状惨不忍睹。警备司令部司令长官奇赤艳亲自签发通行证,让他俩将抢掠得来的群众财物,顺利地运回融县老家据为己有。释春霖、释法依除在柳州水上和河滨区域作恶外,还常到白沙、北站、黄村等地肆虐。有一次,释法依路过更新亭时,见两个妇女从牛皮厂码头(今柳州饭店南侧)挑水过来,便将她们抓住,送到日寇宪兵俱乐部供鬼子奸污。他们不但在柳州和近郊一带残害百姓,还丧心病狂地窜往洛埠和东泉一带活动。他们装扮成小贩,为日伪敌特组织搜集情报,侦察抗日组织及郊县粮食储存情况,把侦知的情报交给日伪特务小头目黄少章,再由他俩带领日军去破坏抗日组织,抢夺粮食,杀人放火。日军即将撤出柳州前夕,释法依则在鹧鸪江一带,继续为非作歹,几次带领日伪军的箩筐队,去洗劫梳妆岭、西流一带村屯。柳州光复后,释法依被抓起来,在鹧鸪江就地枪决。

1944年冬,日军在百朋街建立乡维持会和特务便衣队,网罗一批流氓、地痞、赌徒,充当汉奸和走狗。维持会长韦美廷,就是个“有奶便是娘”的头号汉奸。他是百朋乡伪乡长,布村人。百朋乡陷落后,他对日军孝敬如祖宗,活像一条摇尾舔足的哈巴狗;对本乡同胞,他又是凶神恶煞,动辄捆绑踢打,经常借日军之刀杀

人,成为地方上臭名昭彰的败类。他为日军侦查民众抗日组织情况和各村粮食存放地点,亲率日军搜捕、攻打抗日自卫队,残杀无辜,掳掠群众的粮食和猪牛鸡鸭,拆毁民房门窗板壁给日军当燃料,弄得十室九空,鸡犬不宁。他还在要道路口设卡,若是妇女经过,就以搜身检查为名,肆意摸弄侮辱;凡没有疏通其关节的小商贩路过,就要勒索敲诈,甚至将货物全部没收。柳州弯塘路有个姓刘的,挑些盐、火柴和粮油之类的东西去赶百朋圩,被拦下后将其在柳以高价买来的通行条撕毁,无端地诬指刘是自卫队探子,要送交鬼子处理。刘吓得跪地求饶,愿将全部物品奉送才作罢。韦美廷投其所好,夜间带鬼子到街上或村上,破门入室强抢民女,不论老少,拉回据点均遭轮奸。为筹集日伪粮饷和生活物资,韦美廷以维持会名义,强制各街、村按数额派粮、派柴、派夫。被派或拉的民夫按年龄分挑重担:50岁挑50斤,60岁挑60斤,从百朋挑物品到柳州,又从柳州挑日用品回百朋。如果走不动了,或者落后掉队,押运的鬼子就用刺刀刺,直至血淋淋倒在路边。剩下的担子,再由其他民夫分担。韦美廷作恶多端,百姓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地方抗日自卫队决心铲除他。1945年农历二月初二是百朋圩日,来赶圩的人很多。自卫队员扮成赶圩的村民,把手枪藏在合拢的雨伞里,径直来到维持会的大门口,说是送礼物来慰劳皇军的,要见维持会长。自卫队员一路放鞭炮,很像是送礼的队伍。守门口的伪兵以为真是送礼的,不加防备,便让自卫队员进去了。两个自卫队员快速冲上楼,用枪顶住韦美廷的背后,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枪已响了,韦美廷当场倒地丧命。自卫队员在鞭炮声中迅速撤离。杀了韦美廷,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大煞鬼子的嚣张气焰,尤其是维持会的喽啰们被震慑得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自卫队会再来收拾他们,就四处张贴告示,明令“今后一律不准放鞭炮,违者严惩不贷”。群众私下议论说,现在当然不放,等到抗战胜利那天,我们再来大放特放!

融县(今融安、融水县)陷敌后,汉奸覃家谋充当敌伪维持会会长,卖国求荣,积极征粮、抽丁、拉夫、抢劫、开赌、贩毒、杀人、献媚,为敌效劳,无恶不作。人民群众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日军慌忙撤退时,这条该死的走狗被抛弃了。覃家谋后来被自卫队捕获,解返融县公审。开庭之日,法院内外旁听群众成千上万,水泄不通。法官宣读起诉书,义正词严。覃犯自知罪证如山,无法抵赖,只好低

头认罪。他知道死期将近,发出哀鸣:“我挨关那时,就料到要挨打背(枪毙)的了。”经审判合议后,即席判决汉奸覃家谋犯叛国罪,处以死刑,立即执行!这个罪恶累累的坏家伙马上被押出去,就地正法,得到一个走狗应得的下场。

民族败类卖国求荣,罪恶昭彰天地难容。抗战胜利后,柳州军民又揪出严福全、杨澄江、罗麻子等10名汉奸,并于1945年冬,在城内第一次公审汉奸,公审完后押到一路塘(今连塘路)的塘边枪毙,汉奸们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作者:沈培光)

参考资料:

鱼峰区政协:《鱼峰文史》第十三辑张兆金、彭德等文章

柳州军民抗击日寇记

在日军侵华期间,柳州军民为了捍卫祖国、保护家园,对入侵强盗的打击是义无反顾、毫不手软的,为抗日战争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驻柳的八桂子弟兵第七军中有不少柳州健儿,“七七事变”后不久,他们奉命开赴前线,开拔前,以军长廖磊和副军长周祖晃名义,于9月1日发表《第七军奉命出发抗日救国告别柳州各界书》。《书》中开宗明义地说明:

抗日救国是我们目前唯一图存的出路……国难严重到危急存亡、千钧一发的局面,我们要维持中华民族的生存,维持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的确,我们除了发动对日实行民族自卫,独立解放的抗争;迅速抗战、全面抗战、持久抗战,用铁血去抢救危亡外,没有第二条出路!

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不少柳州籍子弟战死沙场,在徐州会战中,廖磊的21集团军下属48军173师副师长周元率一个团坚守蒙城,全团官兵2000多人与城共存亡,其中有名可查的柳州籍士兵就有36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西即组织学生军到各战区进行各种服务。1937年秋组建的第一批学生军中,柳州籍的就有50多人,他们绝大多数是省立柳州中学(今柳州高中)学生。他们到桂林集训一个多月后,便奔赴湖北、河南、安徽等地慰问在前线的广西子弟兵。

1938年11月底,广州、武汉已相继失守,广西面临倭寇直接入侵的威胁,而原驻广西的部队大部分已调到前线作战,留守兵力不足以御敌。广西当局再组建第二批学生军,原计划在柳州只招收30名,可两天内报名的竟达300人之多,第三天只好终止报名,可仍有学生不断涌来。经请示,柳州录取名额扩大为80名。第二批学生军编为三个团,柳州同学编入一团六中队。临行前,六中队全体同志在《柳州日报》上发表《告柳州各界人士书》,表明献身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桂南空战中被中国空军击落的日本九七式战斗机,民众群集参观。(资料图片)



“抗战已向我们招手,祖国已向我们呼唤,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和新生,让我们暂时告别吧!祖国的明天,就将在我们的血泊里到来,在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里,我们再欢乐的相见吧!”第二批学生军在桂林经过几个月的军事、政治训练后,即开赴敌后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清除汉奸走狗、建立地方游击队,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广西学生军的组建,在当时全国各省是唯一的,他们是一支英勇的队伍,离开广西后,奔赴中原大地,转战大江南北。在对敌战斗中,柳州籍学生军有多人光荣献身。

广西航空学校培养的飞行员,在抗日战争时为捍卫祖国的领空和领土,抗击日本飞贼的入侵,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其中柳州籍飞行员韦善谋和吕明多次并肩作战,表现最为出色。韦善谋在保卫广东南雄机场的空战中,以少胜多,击落敌机两架,因自驾飞机受伤被迫跳伞,得到当地农民救助幸免于难。吕明在这次空战中驾驶的飞机机身中了99发枪弹、2发炮弹,机翼也被打伤,他竟然把受伤的飞机滑行到湖南郴州机场着陆。

据统计,抗战期间,柳州城乡每年约有600名壮丁入伍,八年入伍人数约5000人之多。据民国年间编纂的《柳江县志》“民国二十二年柳州户口调查新旧比较表”载,这年(1933年)人口数为211668人。“七七事变”后柳州人口大幅度增长,但绝大多数是外来人,不入柳州户籍,不入征兵名册。也就是说,八年抗战中,柳州100人中就有两个以上应征入伍!

1947年12月,由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抚恤处编制的《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姓名录》中,广西省柳江县(当时柳州名称)籍官兵有刘观海(中校营长)、萧英(一等兵)等319人。这统计是不完全的,像日军进犯桂林时,与城共存亡的131师师长阚维雍将军及属下柳州籍官兵就不在名录中。据《柳州军事志》“地方武装对日作战人数及伤亡统计表”统计,参加游击作战阵亡官兵共163名、伤221名。

柳州沦陷前,部分爱国青年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冬发起组织“柳江青年抗日挺进队”。这支挺进队,活跃在周边各处打击进犯之敌,先后作战20多次,击毙敌军60多人,有6名队员为国捐躯。县政府也组织武装维护社会治安和准备对敌进行游击战争,柳江各乡或联村普遍自发成立抗日自卫大队、村屯抗日自卫中队或小队等群众性的抗日武装。各队人数虽少,武器也落后,但在日军铁蹄踏入他们家园时,却敢于正面迎击强敌或进行游击战。

《柳州军事志》记载:

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6月,柳江县城乡各地各种武装共计有42个中队,4837人,共对日游击作战200余次。其中,一次歼敌20人以上的战斗有:1944年11月25日,三都自卫队在雅田村与敌军100多人遭遇,激战1小时,毙伤日军53人;同一天,三都乡里贡村自卫队在三都至六道的公路边伏击一队百余人的日军,毙伤敌军53人;11月28日,柳州民军第一支队在前一天袭击驻三都木康的日军、毙敌7人后,又袭击由六道开往三都的12辆日军汽车,毙敌200余人;12月21日,柳江县挺进大队在上吉村坳的伏击战中,毙敌20余人,缴获战马17匹;12月27日上午,成团大荣自卫队在大山脚截击由三都开往柳州的200多名日军,战斗两小时,共毙伤敌48人;当天下午又有50多个日军经三都到大山脚,又遭到自卫队伏击,日军伤亡10人;1945年5月1日下午,里贡自卫队又在六道坳伏击日军,战斗到第二天上午,击毙敌30多人、俘敌9人……

日军侵入柳州时,国民党守军不战而退。从1945年5月开始,侵入广西的日军逐步向北逃窜,此时,退守在各处的部分“国军”也活跃起来。6月,经柳州向北退走的日军遭到“国军”和地方自卫队联合反击。其中致使日军伤亡40人以

上的战斗有:17日在三都百子坳截击向柳州方向撤退的日军,毙伤敌军200人;18日,百朋大武山阻击战,毙伤敌军100余人;20日,在洛满反击战中,毙伤敌军60余人;21日,在火车南站攻击战中,毙伤敌军40多人;23—27日,在飞机场攻击战中,毙敌约100人……

据《柳州军事志》“毙伤俘日军人员统计表”载,日军侵略柳州期间,我抗日武装共毙敌900人、伤敌257人、俘敌39人。

除抗日武装外,也有民众自发地以种种方法打击敌人。1944年10月,土博乡六累屯农民梁小诸和韦现港、韦瑞讲、韦仲圈等七人,连夜摸到三岔街日本兵马房偷了鬼子7匹战马。20天后,这7人得知30多里外的宜山县洛东乡坡揽屯,也有个日本鬼子的马房,他们决定再次去偷马。可这次没有上次顺利,因军马不愿意离开马房,折腾到半夜被鬼子发现,他们打倒了一个鬼子后冲出马房,消失在夜色茫茫的田垌中。这年初冬,三都村民韦作爱、韦作送、韦作代等三人被鬼子拉去做伙夫,趁鬼子吃饭时无备,就用斧头柴刀砍杀了三个日本兵,抛尸深潭,还获得了三支“三八”式步枪和一副望远镜、三把大刀等物。几乎同时,里高福基屯农民韦世吉在摸清驻在九丹屯的鬼子行动规律后,竟然在晚上一人潜入鬼子住地,偷走了一支“盖板六五”长枪。谷埠街有位修板车的曾师父,练过几年功夫。柳州沦陷后,他逃难到成团时被鬼子拉夫,在行进路上,他乘鬼子防备松懈,抽出扁担一人搞死了三个鬼子,还缴得一支“盖板六五”长枪拿去卖。后来他回到沦陷的柳州,又在鱼峰山下搞死三个日本鬼子。此外,还有破坏敌人军用设施、夜间惊扰敌人和在小股敌人行动时打伏击的无组织的抗日百姓。

(作者:陈佚生)

参考资料:

- 1.民国文献资料丛书:《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姓名录》(国家图书出版社,2011年)
- 2.柳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柳州军事志》,1993年
- 3.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民国《柳江县志》(点校本)(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融县军民抗日斗争片段

1944年11月10日柳州沦陷后,1945年春融县涌现出三方面的抗日武装力量,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挺进队、挺秀队、镇国政工队、《柳州日报》社警卫队、桂师战时服务团;二是国民党领导的融县民团,辖三个中队(融县县长兼民团司令吴一峰,副司令廖振鹏),和睦抗日联队(队长由县民团副司令黄君忍兼任);三是群众组织的抗日武装队伍有鲤鱼岩村自卫队、白马村自卫队、小荣村自卫队、稽村自卫队、古鼎村自卫队、寺门村抗日别动队和何平、刘子标等部队。广大群众积极要求抗日,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的主张深得人心,“打垮东洋鬼子”是广大人民的共同口号。所以,在柳州沦陷的8个月里,日军在融县一带到处受到抗日联军力量的打击。

融水、古鼎村的一些人,开始愿意领取“皇军”发的“良民证”和承担“皇军”派取的粮食,后来“皇军”步步逼紧,要古鼎村献出几个“花姑娘”,于是,群情激愤,走上“梁山”,不要“良民证”,不缴粮食,组织自卫队决心坚决抗日,并三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距县城八华里有一个叫鲤鱼岩的村庄,三面靠石山,沿村有茂密的茨竹,高达数丈,内筑有丈多高的片石墙,墙上每间隔约一丈远留有枪眼,外面子弹不易打入,从外看去只见茨竹林,不见住房。村内住着曹姓七八十户,六百多人。县城沦陷前夕,从外地逃难住在村内的就有五六百人,我随家中大人从县城躲在村内亲戚家。日军侵略后,村上及时组织抗日自卫队,有百余人,用简单的土造武器,五次狙击号称东亚无敌的“日本皇军”,成为全县赫赫有名的抗日模范村。村民推举曹德全等五人为领导成员,曹德全任村抗日自卫队主任。全村有12公厘口径猪崽炮1门、长短粉枪20多支、“过山彪”单响钢枪4支、毛瑟单响3支、单筒降底步枪4支、驳壳手枪1支,麻尾手榴弹4箱,都是一些老式陈旧、年久失修的武器。1944年12月底,日伪军掳掠古选等几个村后,一天上午鬼子从古选村通往鲤鱼岩的山隘过来,村自卫队发现后,队员们迅速进入阵地,各守岗位。敌

人下山后把重机枪放在距村约半华里左侧的大榕树下,日军背着日造六五步枪,上着刺刀,大摇大摆地往鲤鱼岩村走来。鬼子快走到村口,守在大门炮楼上的曹德全大声喝问:“你们是什么军队?”回答:“我们是国军。”“请你们先退后,派代表进村接洽。”鬼子不听,继续前进,已靠近茨竹。曹德全一声令下:“打!”鬼子兵蒙头转向,只听得惨叫声,纷纷后退。敌人利用距村二百多米左侧的石板桥架起两挺机枪,朝村里射击,打得竹叶纷纷落地,围墙石头火花乱飞,变成了“麻脸”。守卫在左右山头的曹德清、曹文波等队员用“过山彪”对准敌人的轻机枪射去,三寸多长的子弹打得石桥火星直冒,崩石横飞,敌人的机枪被打哑了。鬼子兵退到田垌,组织第三次进攻,榕树下的重机枪和轻机枪响了,鬼子慢慢摸来,村内的“猪崽炮”早已装上半斤土硝,放进碎锅头片、粗铁沙、小秤锤,“轰”的一声,震动整个山谷。带着啸声的小秤锤和“过山彪”子弹,把榕树杈打断,把重机枪、轻机枪压哑了。暴雨般的铁沙一齐打向敌人,铁沙打在敌人身上变成蜜蜂窝。鬼子被迫溃退回县城。这次战斗敌死伤18人。缴获轻机枪预备枪杆1条、饭盒4个、钢盔数顶、军呢大衣和军衣数件。另外捡得被铁沙击中屁股粘有血肉的黄呢子长短裤各三条。村自卫队队员曹七英用的粉枪,因枪管爆炸而阵亡。这次战斗的胜利大振人心,村上群众的抗日组织更加严密、团结,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不甘心失败的敌人,从1945年元月至3月,又组织攻村4次,鬼子采取汉奸带路、夜间偷袭、从后山来、走小路来的办法,兵力增多,三面围攻,武器增加利用小钢炮。企图铲掉他们的眼中钉——鲤鱼岩村。但是,全村群众越战越强,士气更高,依托着坚固的工事,鬼子的每次围攻,都被自卫队顽强反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摸不着头脑,鬼子不能进村一步。敌人丢下的是数十摊血迹和大堆炮弹筒及大堆子弹壳。所以,全县群众称之为铁壁鲤鱼岩村。

距县城30多华里有个村庄,一边靠山,前面有宽十多米的小溪围村,沟渠内是茂密的茨竹林,再有片石围墙,群众称之——铜墙白马寨。是镇守易攻进难的险地。该村有自卫队60多人,并住着融县民团陈英中队和融县西区办事处工作员等百多人。1945年农历正月初四,县维持会主任覃兆谋带着鬼子兵和维持会的汉奸100多人,攻打白马村。上午10时许,战斗打响,鬼子火力猛烈,企图迫使白马村内的军民就范。村内军民英勇抗击,沉着应战,从山头上打下,从围墙内的枪眼打出,日伪军不能接近沟边。汉奸覃兆谋躲在小坡上一株大树下喊话:

“你们被包围啦！快放下武器吧！皇军宽大你们。”村内军民用密集的火力来回答，山上的队员看见敌人被打倒，敌人无奈，到下午1时许退回县城。这次战斗打死敌人6人，打伤10人，他们全部用担架抬走。事后清理战场，见血迹多处，缴获敌钢盔10多顶，血衣9件。村内军民无伤亡。有一个伪军腿部负伤，逃窜到大岩村，被一个农民发现，见伪军背驳壳枪1支，骗他说把他治好送回县城，然后带到家中打死，缴获驳壳枪1支，金戒指6只。

1945年3月某日，县城的鬼子兵百多人第一次进山区掳掠，走至小荣村附近，与守卫在朴船岭的融县民团第二中队第一分队龙祖光分队前哨接火。二中队队长胡汉强下令，在南团的第三分队官兵迅速进入苗岭头阵地。当第三分队赶到苗岭头时，见第一分队顶不住，已撤退至汾水与第二分队会合于汾水后山竹林阵地。鬼子兵追到黑饭寨，用小钢炮、轻、重机枪及所有的长、短枪一齐向自卫队射击，火力很猛。第三分队冒着敌人的封锁，勇敢地进入阵地支援。敌人曾三次组织进攻，在二中队官兵密集的火力阻击下，敌人的每次进攻都被击退。

激战中，县长兼民团司令吴一峰、副司令廖振鹏，带一个加强排的兵力，亲临阵地。双方各在原地射击，都不敢前进。到下午4时40分左右，不见敌人进攻，枪声也停止了，指挥者误认敌人退走，命第二中队100多人追歼敌人。二中队前进至小榕岭脚时，突然被埋伏在那里的敌人居高临下疯狂地射击，二中队官兵抬不起头来，幸得当时阴雨雾大，加之地形弯曲凹凸，敌人的火力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二中队被迫撤回苗岭头阵地，敌人也撤回县城。这次战斗敌死伤12人，民团第一分队被俘2人。

1945年春节前一天，融县抗日挺进队接到情报，县城的日伪军到古鼎油榨村偷运大批食盐上县城。经挺进队领导研究后，决定派队员莫文，打入古鼎村侦察，及时准确地报告敌情。莫文接到任务后，当天上午9时许赶到目的地，莫采取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办法，经过反复的摸底，证实敌人有40多人，用



融县抗日挺进队缴获的日军战利品(融水县党史办提供)

13 只木船装二万多斤食盐,于次日上午 5 点多钟开船上县城。估计敌船一小时左右可到挺进队伏击点,在寒风刺骨的深夜,莫文赶回队部报告,圆满完成了侦察任务。

4 日午夜,挺进队队长杨繁带领 30 多名武装战士,精神焕发,士气饱满,恨不得马上投入战斗,4 点多钟就赶到扁洲头。决定由第二分队队长陶树才作截盐船的总指挥。同时通知友邻武装力量参战,大扁洲两岸很快就有武装埋伏。东方刚露出红霞,只听不停地哼嗨哟……嗨……嗨……嗨……哟的声音,敌人的盐船像乌龟爬沙似的缓缓地一只、两只……上滩,机枪手李清友用肩顶住轻机枪,队员们紧紧握住手中枪,眼盯着盐船,待敌船进入埋伏有效射程,陶树才一声令下:“打!”机枪、步枪、鸟枪一齐开火,敌船急靠对岸,又遭到寺门别动队等群众武装的打击,枪声使寂寞沉静的融江沸腾起来,打得日伪军措手不及,无法还击,成为瓮中之鳖,有的跳下河中,有的被打死,融江水一时血染尸流。人死船翻,盐船无人掌舵,倒退、横流、相互撞碰,阻塞江中。剩下 9 只被打穿孔漏水的盐船,漂流到对岸高街时,被群众全部截获。二万多斤食盐,挺进队留一部分作经费,其余分给寺门别动队和其他参战的群众。逃跑到古鼎村的几个日伪军,又被自卫队围歼。

这次战斗击毙日伪军 30 多名,大大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增强了抗战必胜、日军必败的信心。挺进队在主动出击,联合群众力量,歼灭日军的战斗中树立了光辉榜样。事实证明,抗日战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军民团结一致才能得到胜利。

(作者:宋启贤,选自《融水文史资料》第五辑)

柳州军民百子坳伏击日军纪实

1944年11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入侵柳江后,一夜之间三都里高也沦为敌占区。从此,日本兵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面对野蛮的敌人,群众无比愤恨,纷纷组织抗日自卫队奋起杀敌。在家乡沦陷7个多月中,抗日自卫队灵活机动,寻找战机,先后袭击日军数十次,其中在里高镇百子坳军民伏击撤退中的日军这场战斗最为激烈,使日军受到了重创,在中日战争史上,两国史料都有记载。

百子坳位于里高镇板六村与果郎村交界处,古时候山坳上只有一条崎岖的羊肠小道从石崖上通过,民国时期,修筑公路时,将石壁炸开,劈成一条1000多米呈S形的两侧全是悬崖峭壁的公路,汽车从这里通过,俨然进入隧洞一般,地势非常险要,可说是柳邕路咽喉要道,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气势。1945年6月初,驻扎在宜山、迁江的日本侵略军,陆续向柳州方向败退,当时国民党军队采取跟踪追击和侧面阻击的战术,以逐步消耗敌人的兵力。百子坳是日军必经之地。6月16日是农历端午节(存疑:据万年历,该年的端午节为6月14日,据此,下文斜体标注的“农历五月初七晚”时间可能也有误),我方得到日军第三师团后卫第六联队千余人,集结于忻城大塘一带,准备向柳州撤退的消息后,国军四十六军五二五团奉命前往百子坳埋伏阻击撤退的日军,五二五团团长沙玉衡立即下令全团官兵急行军赶往百子坳布阵。该团二营营长蒙献明率领先锋部队以日急行军60多公里的速度直奔百子坳,于当天傍晚,抵达板六的北弄屯埋锅造饭。两小时后,卢团长也率全团官兵赶到北弄屯,团指挥部也因此设在北弄屯。该屯与百子坳并排贴近,又处两座山后边,地形隐蔽,且有山路直通前沿阵地牛屎坳,便于指挥。晚饭后,卢团长立即分配作战任务:其中一、二营负责阻击通过百子坳的敌人,一营在果柚弄山腰构筑轻重机枪阵地,就近侧击进入坳的之敌,正面还可控制公路北面勒桃弄口和对面九丹屯后边土坡一带地域;二营的火力阵地布置在百子坳东面的弄伞坳口,这里可以封锁公路斜坡地段和沿公路北

面勒桃弄前一带田垌,也可兼顾九丹屯后土坡与一营阵地构成多方交叉火力网;三营由北弄屯村民覃国三、覃安中做向导,从山路绕过长垌屯后面到坡孝屯后小山弄口布防,这里与牛屎坳毗连,可构成一扇形的轻重武器火力网,以封锁阻击溃逃之敌。

当晚全团进入阵地后,官兵也不顾白天急行军的疲劳就连夜赶筑工事,里高、板六附近群众知道国军在百子坳布防伏击日本侵略军,都纷纷赶来慰问支援,有的送水送粮,有的参加修筑工事,板六村民还捐了一大担粽子送上阵地来慰劳官兵。当晚里高、板六和忻城县思练、大塘两支 200 多人的抗日自卫队也在卢团长的统一指挥下,在百子坳两侧山腰布好阵地,配合国军,严阵以待,准备围歼到来之敌。

端午节的夜里,天上乌云密布,到处漆黑一片,四周万籁俱寂,天空突然下了一场中雨,阵地上的官兵们衣衫被淋得湿透,但埋伏在阵地上的官兵纹丝不动,一点细微的响声都没有,只是个个紧握手中的武器,密切注视着公路上的动静,等待着敌人的到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雨停过后,正值午夜时分,半月月牙刚从云缝中露出脸儿,忽然从里高方面传来隆隆的坦克声,由远而近,声音震荡了整个山峪,敌军坦克刚开过我方阵地,只见一队队日军的骑兵、步兵、辎重部队和黑压压的便衣队伍,缓慢地沿着弯曲狭长的百子坳地段公路向前移动着。突然,二营阵地一名士兵咳了一声,敌军发觉有响声,一名指挥官立即翻身下马,大声吆喝了几句,公路上的日军都随声趴倒在地。当这位军官未发现什么动静后,便爬上公路右侧的一块大石头上,探头探脑地撒起尿来。谁知,不偏不倚,正好淋到埋伏在草丛中的排长韦志勇旁边一位战士的头上,这位战士为了不暴露目标,一动不动。韦排长看到这种情景实在忍不住,便顺势“叭叭”两枪,敌指挥官应声滚下了公路。

目标暴露了,卢玉衡团长当机立断,立即发出攻击信号:红绿色各两枚信号弹划破了夜空。顿时,我方阵地上轻重武器一齐开火,追击炮声、轻重机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我军强大的火力网横扫直射,打得日军人仰马翻,乱碰乱撞混成一团,没有被打死打伤的日军,只得拼命挣扎,胡乱开枪开炮,边打边退,天亮之后大部分退进公路两侧的杨家屯和吴家屯倚势继续顽抗,双方战斗遂成僵持状态。

6月17日晨,驻在大塘的日军警备联队和驻里高的宪兵队,还有从宜山、迁江撤退下来的后援日军总共2000余人,与里高九丹屯的前沿日军会合,以大队骑兵作先锋开路,以炮兵部队开炮在后掩护,气势汹汹地从九丹屯向百子坳口公路强行推进,待日军人部分队伍进入狭谷地带时,卢玉衡团长又一次发出攻击命令。霎时,国军的迫击炮、轻重机枪和抗日自卫队的步枪、机枪、手榴弹同时开火,万弹齐发,一排排仇恨的子弹猛射向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日军阵脚大乱。有的避进九丹屯的民房里,有的就地埋伏在九丹屯后面土坡的坟堆边,还有大部分抢占了百子坳左侧公路北面的勒桃弄口山头,用山炮、枪榴弹和轻重武器向我军阵地猛烈还击。顿时,在九丹屯至百子坳十段1000多米的地段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隆隆的炮声,嗒嗒嗒的机枪声、嘭嘭嘭的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地动山摇,整个阵地火光闪闪、硝烟弥漫……战斗持续了三四个小时,当大队日军冲到百子坳中间时,国军三营一排韦志勇一跃跳出战壕端起轻机枪横直猛扫敌人。就在这时,一颗敌人的子弹射中韦排长的心胸,他壮烈牺牲了。战士们看到这情景,都怀着复仇的怒火,个个更加英勇顽强,用猛烈的火力,把日军压退到百子坳下边。入夜后,日军又几次集中火力反扑,企图冲过百子坳,但都在我军民合力奋勇阻击下,又丢下无数尸体,龟缩进公路两侧的九丹屯和杨家屯、吴家屯,伺机而动。

6月18日拂晓,一大股日军炮兵、步兵,偷偷翻过杨家屯背后山,摸上牛屎坳前的两座山头,这两座山与坡孝弄口对峙并高过坡孝弄口,在这里日军居高临下,观察我军阵地即一目了然。上午10时许,国军炊事员和北弄屯两位村民送午饭到坡孝阵地上,正当国军战士集中用餐时,对面山日军猛烈向我方阵地开炮,无数弹片纷纷四溅,国军战士当场牺牲了十余人。这股日军趁国军未及防备之时,乘机抢占了牛屎坳两侧高地,以接应他们的后撤部队。被困在百子坳的北边大部日军,经过两天多的地形侦察,发现百子坳左侧勒桃弄口有个较高的土坳没有悬崖峭壁易通过,从这里过去到百子坳东面的一个小弄便是长垌屯,就把百子坳正面阻击的国军抛在后面,这也正是因为国军兵力都集中防守在百子坳公路南边而使北边空虚所致。农历五月初七晚,趁夜色朦胧,日军突然用猛烈炮火攻击国军阵地,佯攻百子坳,实则掩护他们的大部队偷偷爬过勒桃弄口土坳而摆脱国军的正面阻击而逃出伏击圈,最后日军大部队终于从小路逃脱,于6月18

日上午 10 时左右到达盘龙长洞一带与抢占牛尿坳阵地的日军会合,然后向柳州逃窜。

百子坳激战中,在公路旁,田地间、坟堆边、九丹屯民房里和山脚下,到处是日军遗下横七竖八的数十具死尸、死马 60 余匹,沿公路上血迹斑斑,腥臭之气数月未散。在这场战斗中,国军军官阵亡 9 人、士兵 20 人。抗战胜利后,1945 年 12 月在坳脚公路边建立一座抗日纪念亭,亭高 5 米、宽 20 平方米,中门上书“鬼子坳”字样;大门和侧门门柱分别刻有楹联二副,大门楹联是“百子亿人泪,千军万马魂”系原国军八十四军军长覃连芳题;侧门楹联是:“百子坳前清血债,蓬莱岛上吊孤魂”,门楣上题“精忠报国”四字,均为五二五团团团长卢玉衡题写;亭中立有石碑,上面书刻《鬼子坳序》和《迁柳歼敌战斗经过》以及阵亡官兵名单。从此,百子坳又称鬼子坳。

柳州军民在百子坳伏击日军的战事已过去 50 多年了,但现在年逾古稀的三都里高老人对它却永生难忘。“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为使子孙后代“勿忘国耻”永记历史,以增强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特撰写此文以勉励之。

(韦卓史搜集整理)

徒手搏杀日本兵

日本侵略者占领三都、里高期间人们传颂着这样一个故事：“韦用翻真勇敢，徒手搏杀日本兵。”

每当人们传颂这个故事时，我心里总是乐滋滋的。因为故事中的韦用翻，就是我的父亲。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1944年初冬，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广西，三都乡一夜之间沦为敌占区，各村屯的村民为避免遭到无辜的枪杀，都逃进远离公路的山弄里躲避，随身只带少量的衣物；粮食和牲口都还来不及转移。我家住在板江拉寨屯，当时跟其他村民一样，逃到离我村几里路的盘龙弄白山岩，只用一些茅草搭成简易的茅棚，作为栖身之地。家中仅有的一头大猪，则暂时放在村后的岩洞里，每天还得回去喂食。

日军侵占三都后，经常派兵到村庄进行骚扰，他们见东西就抢，抢猪、抢牛、抢粮食，烧房子、烧门板，甚至拉屎拉尿进老百姓的水缸、锅头。对日军的暴行，我父亲无比愤恨。他跟村里的村民曾经说：“日本兵你莫恶，有机会我就收拾你……”

机会果然来了。那是1944年寒冬，凛冽的北风在山间呼啸着，我父亲突然他想起了家里的一头猪关在岩洞里已有一天没有喂食了。在这山弄里每天早晚到岩洞喂食，很费时间，而且回家的路上，还得横过公路，这条公路常有日本兵活动，很不安全，所以他决定到岩洞把猪抬进山弄里来养。

作出决定之后，父亲随手拿着一根木棒，穿过猪笼扛在肩上出发了。这天又特别冷，父亲把六件单衣全部都穿在身上。为了御寒，他竟小跑起来，很快就到了公路边自家的一块畲地，在地里意外地发现了日本兵丢下的一顶钢帽和一个口盅，他非常高兴，将它们捡起来，嘴里还自言自语说：“今天真是好运气，一大早就捡得东西。”随即把钢帽和口盅挂在猪笼上继续走路，这两件东西还发出叮当响的撞击声。父亲身材比较矮小，但非常结实，在家里除了种田外，农闲时还替人杀猪卖肉，晚上则跟人学打拳。因为他为人很机灵，又很用心学，所以很快就

学会一些拳术。这时因为心里高兴,就索性把猪笼放下,吹起口哨来,在空地上舞弄起拳术来,困了,他稍休息,眼睛往干涸的鱼塘一看,见塘边禾稿堆里一个黑影蠕动着,发出嗦嗦的响声。我父亲想道,不知是难民还是别的什么人在禾稿堆里睡觉。于是,为了看个究竟,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日本兵,眼睛血红血红的。大概是刚才进村里掳掠,喝酒醉了躲进禾稿堆里来睡觉。但他眼还睁着,一见有人走近草堆,立刻举起枪来朝我父亲“嘣”的就开了一枪,幸运的是子弹从耳边飞过。这可激怒了我父亲,说时迟,那时快,他像猛虎下山一样,迅速地抓起木棒扑向日本兵,朝日本兵的身上就是一棒,日本兵嚎叫了一声,接着又朝我父亲开了第二枪,这回枪口偏低了一些,子弹从父亲的下巴边擦皮而过,又躲过劫难。这时父亲显得非常沉着,没有一点害怕,他利用敌人来不及把子弹推上枪膛的短暂间隙,就狠狠地用木棒朝日本兵连续猛打了十几棒,血溅得把草堆都染红了,日本兵满脸是血,但仍凶神恶煞的,死死地盯住我父亲。不过毕竟是被棒棍打了十几下,他不得不瘫软地躺在草堆里呻吟着。当时父亲错误地判断,这个日本兵可能快死了,绝对没有反抗的能力了。于是他一个箭步上去,把枪猛地夺了过来,然后迅速地跑走。日本兵发觉枪已被夺走,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必须把枪夺回来,于是猛地站了起来,朝父亲跑的方向奋力地追赶上来,这时父亲的确很累了,身上、脸上到处被鲜血溅了,简直是个血人似的,跑跑停停,速度明显地减慢了,眼看敌人追上来,离他只有三四尺了,他索性转过身,用枪口对准日本兵,大声叫道:“莫动!”日本兵一时愣住停下来,父亲转头又快跑,而日本兵在后面则穷追不舍。眼看又快追上了,父亲又转身面对日本兵,大声叫喊:“莫过来,过来我就开枪!”大概日本兵略懂得一些中国话,就暂时停下来,不敢前进,但只停一下,他又往前走,父亲举起枪射击。但由于没有使用过这种日本造的“三八式”步枪,枪的机柄总是压不下去,更无法勾动扳机了。日本兵见了,狞笑了一下,他认为这个村民根本不会使用这种枪,因而大胆地猛扑上来,日本兵抓住了枪筒,我父亲抓住枪把,双方用死力气互相争夺。父亲这时机灵地用力将枪筒往下压,然后顺对方的力将枪筒往上一提,恰巧戳对日本兵的下巴,使他双手脱空,父亲重新夺回了枪支。

父亲夺得枪后,生怕又被日本兵抢走,索性把枪扔出远远的,决定与敌人徒手搏斗,砸也要把他砸死。日本兵的个子比父亲高大,人很粗壮。但刚才已被父

亲用木棒打了十几下,已是遍体鳞伤,锐气已大减。父亲一会儿使出猛虎擒羊,一会儿又用翻龙倒海的招儿,把敌人弄得眼花缭乱,到处挨打。父亲知道,今天这一斗,不是我活,就是他死。这是一场殊死的搏斗。父亲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在这场搏斗中,双方都已疲软不堪,所以呈现出打打停停的状态。当父亲稍喘一口气后,又扑向日本兵,他勾敌人的大腿,想转换一个方向厮打时,却意外地碰对日本兵屁股上的刺刀。这时父亲抓住敌人的衣领,同时用头顶住敌人的下巴,右手则抓住刺刀的刀柄,用力拔刀出鞘。那日本兵斜眼看了一下,脸都吓白了,眼前这个村民抓得刺刀,结果意味着什么,他知道得很清楚,于是不顾一切地抓着刺刀,而双手却抓对刺刀的口子。当父亲用力将刺刀往上一拉时,敌人的双手脱空了,满手是血。父亲又趁机将敌人拦腰抱住,将其摔倒在地,骑在敌人身上,敌人又拼命将父亲摔到一边。父亲则趁机跳起来用刺刀往日本兵身上连戳数刀,也许是日本兵穿衣服多很厚实,抑或是刀不受力,硬是刺不进敌人的皮肉。后来父亲又换了个方向,将刺刀从背后往敌人腹部刺,但由于双方太近,刺刀太长,无法用力。后来父亲用脚拼命地踢日本兵的下阴,日本兵大声叫起来。父亲趁此机会,用头顶住敌人的下巴,使敌人的头歪斜到一边。父亲这时抽出刺刀正对着日本兵头部的太阳穴部位猛的一戳,鲜血呼的一声喷射而出,而父亲的全身上下被溅得到处是血,但他的手仍紧握着刺刀,并连续转了几转,直到日本兵头歪手软了,才将刺刀抽出来,就这样,一个罪恶累累的日本兵完蛋了。

父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将刺刀擦在日本兵尸体的衣服上,擦干了血迹,扛着一支崭新的日本“三八式”步枪,迈着矫健的步伐往山弄的家胜利而归。

(作者:韦化如,选自《沧桑岁月——三都·里高拾珍》,2002年)

抗日救亡

柳州女同胞为抗战踊跃募捐

从廖磊率第七军进驻柳州起,柳州的妇女们自发起来,通过自己的行动,慷慨募捐、护幼劳军。特别是柳州妇女抗敌后援会在八年抗战期间,做出了令人称道的惊人事迹,给柳州妇女运动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由驻柳第七军军长廖磊夫人胡慧和柳州人李荫青、梁凤梧、张佩琚等 30 多人发起,于 1937 年 9 月 15 日成立了柳州妇女界第一个抗日救亡组织——柳州妇女抗敌后援会。该会在成立宣言中宣称:“国难已到最后关头!”“我艰苦奋勇将士此刻正在前线牺牲其热血头颅,与敌作殊死战斗,后方女同胞当此民族存亡危急之秋,宁袖手旁观耶?”“国家兴亡,人人有责。”“我等自愧不能驰骋疆场,荷戈杀敌。然爱国之心宁甘落后?(特)发起组织柳州妇女抗敌后援会。”“凡我爱国妇女均应奋起,肩负救亡责任,有钱者出钱,无钱者出力,踊跃捐输,努力工作。”“誓将暴日军阀逐出我神州大地而后止!”此后,在长达八年之艰苦抗战的岁月里,柳州妇女同胞们始终恪守誓言,通过感人至深的种种行动,点点热心,为对日作战做出重大贡献。

第一个响应抗敌后援会“踊跃捐输”号召的,是柳西镇小学高年级女生柯秀英,她在母亲的支持和鼓励下,除了将积储起来的一笔零花钱汇往前方外,还发动同学认捐,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全校即收到在父母支持下捐出的 50 余元(法币),并寄到前方。1937—1938 年柳州每担(100 市斤)米价为东毫 5 元,折合法币 2.5 元,50 元法币可购食米 2000 斤。青云街有位 63 岁的孤寡老人林胡氏,以糊布壳(做布鞋底用)为生,听了抗敌后援会的宣传之后,也为抗战捐出了积攒多年的 96 元养老钱!

这年 11 月,由柳州妇女抗敌后援会组织了一次全县性的“征募前方战士寒衣费”活动,几天时间,通过后援会的宣传劝募,光在妇女界就征集得法币 10000 余元、金器 3 两 6 钱 5 分,两项合计可制作棉衣 1000 余件,占全县征募所得款数的一半以上。

柳州妇女抗敌后援会还组织了五个宣传队,从 11 月起,每逢星期六晚分别到河南、河北街头做抗日宣传;女子小学有一位 60 多岁的工友周妈和几位同校

教工,在福建会馆演出《打东洋》话剧,将门票收入的三分之一汇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其余用作开办妇女扫盲班开支。

1938年1月10日,有9架日本飞机经北海首次侵入柳州。我高射炮和驻柳空军迎击下,打落日机两架。这是驻柳空军首次击落日本入侵的飞机,第二天,柳州妇女界带着慰问信到飞机场对英勇杀敌的空军战士进行慰问,大大鼓舞了驻柳空军官兵的士气。

1938年初,宋庆龄、李德全为了保护日军入侵时无家可归的难童,在武汉建立了中国战时第一个儿童保育院。5月,柳州也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分会并设立保育院,大量武汉战区的难童转移到柳州后,临时安置在柳侯祠内。领导柳州分会的是西大教授黄振璇和胡慧;保育院主要负责人是宋淮、黄宝训等女士。在此之前,后援会曾训练了一班看护,并刊印了几册有关药物学和看护常识的书。这班看护平时到医院为伤病士兵服务,保育院成立后,又在保育院为来柳的难童作保健和护理工作。9月17日,战时儿童保育院柳州分院为救济失去生活依靠的难童,在城区发起募捐活动,第一个慷慨解囊的是一位自称“李帼男”的女子,她捐赠了新衣裤19件、童鞋10双。第二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年妇女,也把她收得的房租400余元法币(相当于4000斤大米价)全部捐出。为了长期开展募捐活动,方便乐善好施的人士随时捐赠,还在保育院大门旁设了个固定赈济箱。当天,就有一名叫邓江乾的人捐赠面包71个;莫锡春捐赠裤子13条,布鞋9双。此后,每天都从箱子里收到现金和衣物用品、文具、食品等实物。由柳州妇女界同胞主持的捐赠活动,保障了在柳难童生活、学习的基本需要。12月30日《柳州日报》以《战时儿童保育院 将扩大收容难童 廖夫人躬亲督促计划一切》为题作了报道。

1940年春,桂南会战结束,柳州各界组织“一角劳军运动”,妇女界率先积极响应,全城90%的成年姐妹都捐了款,共得法币4000余元(此时米价已涨至每担法币近3元)。是年冬,日军退出桂南,柳州(时称柳江县)妇女会又带头发起“一角劳军运



1940年柳州妇女界组织劳军募捐(资料图片)

动”，资助抗战出征军人家属，《新华日报》还为此事作了报道。

这年7月，又开展为抗战义卖鲜花活动（每朵玉兰花以高出市价10倍卖出），柳州妇女们除担负义卖工作外，也认购了不少鲜花。这次义卖所得钱款共3000余元，由妇女们制作四面锦旗和印制16000份宣传品、制作4000个装有毛巾、牙刷、肥皂、慰问信的慰问袋，购买5000多份书报，分别送给当时戍守柳州一带的部队。此外，柳州妇女抗敌后援会还先后组织发动16万人次，给前方将士写信慰问和鼓励；更有大批妇女会员到医院为抗战受伤的士兵服务，为伤病士兵喂食、洗衣、缝补衣裤，为他们写家信、读报、唱歌、演戏；还经常组织会员到近郊，帮助劳动力不足的抗日战士家属犁田、耙田、插秧、施肥、收割、舂米、洗衣、煮饭、喂猪，解决他们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给出征军人家属极大的鼓舞和安慰。

1941年，广西当局号召捐款购买“广西妇女号”飞机，柳江妇女会积极发动女界响应献机运动，妇女界除自身捐献外，还四出劝募，共得法币12000余元。购买“柳江县妇女号”滑翔机一架。捐献成绩为全省第二，获得省政府通令嘉奖。

柳州在抗战期间有不少难民过境，地方设立了难民临时过境食宿站，县妇女后援会曾派出几十人到该站充当义工，日夜为难民提供饮食。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不少东南亚国家的华侨逃难到柳州，这些被迫抛弃产业和家园的难侨，经历颠沛流离、万苦千辛的流亡，身心都遭受到极大的摧残，对人生失去了希望，情绪非常低落。县妇女后援会得知这一情况后，便发动会员对归侨进行慰问安抚，帮助政府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还捐助一批棉衣给他们御寒，并深入到各归侨家中宣传国内外形势，让他们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以增强他们战胜困难的决心。

1944年“七七事变”七周年纪念日，柳州举行了盛大“国旗献金”的游行，上面提到的那位青云街的林胡氏，在这次献金中，又把她这些年积攒下来的348元全捐出去！沿街将钱抛到国旗上或设在街边的献金箱的人，除男士外，还有不少家庭妇女。她们将戴着的耳环、戒指脱下丢到平铺的国旗上或献金箱内。一位路过庆云路献金台的妇女，将袋中仅有的3元法币献出后，感到捐得太少了，又毅然脱下手中的金戒指投入街边献金台上的箱子里。当工作人员问她姓名时，她说：“我叫‘不愿沦为亡国奴’！”

在旧社会，家庭妇女绝大多数不掌管财权，只管相夫教子，也很少关心国家大

事,只为柴米油盐、缝补洗刷等琐事操劳;但她们在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下,能把仅有的十分珍惜的金首饰和少量私房钱捐献出来,其爱国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柳州妇女慷慨的献金举动,感动了两名路过的驻柳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飞虎队)军官,两人也拿出随身携带的200美元投入献金箱里!



抗战中的学生军女兵(资料图片)

柳州各中学的女学生,除了踊跃带头参加各次捐献活动外,还积极参加救亡宣传和查抄日货等爱国行动。更有参军上前线或到敌后从事宣传和组织民众武装等项工作的。

1937年9月广西组织学生军北上抗日,报名参加学生军的柳州女青年就占了报名人数数的1/6,录取时占总人数的1/4。在出征抗战中,有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柳州籍女学生赵素娥,在柳州中学读初二时就加入了妇女抗日后援会,积极参加各项爱国活动。进入高中后,16岁的她就报名参加第一批广西学生军,且在军中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在安徽大别山区活动时曾担任过安徽学生军团指导员,为地方地下党做过宣传工作。1940年春,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赵素娥在组织安排下,转移到皖东北新四军根据地,改名艾侠在敌占区从事组织民兵武装工作。1941年7月的一天,赵素娥与一名通讯员在深入敌后工作时不幸被捕,在敌人的酷刑逼供下,两人英勇不屈。敌人从他们嘴里得不到什么可用的东西,最后残忍地把两人活埋了。赵素娥牺牲时年仅20岁,新中国成立后,赵素娥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可她的家人在柳州沦陷时已不知去向(或已死亡),烈士证明书竟无处送达!

(作者:陈佚生)

参考资料:

- 1.柳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图说柳州抗战》(云南出版社,2005年)
- 2.中共柳州市委宣传部、柳州市文化局编:《抗战烽火中的柳州》(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小飞燕为《柳州日报》义演记

广西桂剧名伶小飞燕,原名方昭媛,广西桂林人,从小就失去了父母,跟随姑母生活。她十多岁时就拜中国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先生学习改良桂剧。方昭媛年纪虽小,但灵巧精干、刻苦锻炼。因而,她在每次登台演出对扮演剧中人物的性格、动作都能表现得惟妙惟肖。手、眼、身、步的各种动作,都有独到之处。如演《黛玉葬花》中,她塑造林黛玉这一形象时,聪明文静、多愁善感,准确地表达了剧中人物的性格神态。还凭着她那优美的嗓音,创造了委婉、舒展、多情、柔中带刚的腔调。1939年底,她在桂林演出《打渔杀家》中塑造桂英这一角色,得到桂柳文化、艺术界以及同行们的赞赏。桂柳之间的戏迷都一致推举小飞燕为桂剧四大名旦之首。

1939年春,中国名戏剧家田汉、马彦祥等来柳,在柳州“纽约旅社”楼下设茶话会招待柳州文化、艺术界人士。到会的有各报记者,各中、小学校的文化老师,桂剧名伶小飞燕、小梅芳、庆丰年、周兰魁等。我是在那个时候认识小飞燕的。她天真活泼,文化程度虽低,但求知心切,有学而不倦、不耻下问的精神。她有时向我问字、借书,我也常送她一些刊物。从此,你来我往,就建立了纯洁的友谊。

抗战不久,柳州便遭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当时柳州报社设在福建会馆,一弹正中字房,房屋倒塌,弹片横飞,一个派报工友被炸死了。我们经过半个多月的清理,才勉强出版了报纸。这次遇炸后,我们便把报社迁到盐冲口,但敌机还是天天光顾,离市区又近。经过全社人员的商量,第二次便把报社迁到鹧鸪江。结果发现又离市区太远,往返送稿送报不方便。便又作了第三次搬迁,搬到了马鞍山的大岩洞里面。但那时正是日军二次进攻桂南,昆仑关正展开激战,报社准备疏散到融安长安镇。船只已经准备妥当,正欲起程之际,恰好传来昆仑关大捷的消息,人心振奋,疏散计划便告终止。

那时我兼任柳州“伤兵之友社”总干事。“伤友社”有一笔存款在银行,此款准备为伤兵过境或桂柳伤兵住院添置衣服、棉被等项之用。当时“伤友社”理事

长是尹承纲。后来桂南战事结束,驻柳伤兵甚少,伤管处撤销。因此,我与尹承纲商量,将“伤友社”所剩存款提出建造“伤友社”社址。落成后,尹承纲便决定:房屋一半留“伤友社”,一半留给柳州报社。迁新社址的时候,社长仍然是林继茂,后来增加了一批新人如罗培元、张琛、邓邦俊、陈平白等。罗培元任编辑主任,张琛、邓邦俊任编辑,我仍主持采访部。除吴越、张唤宁外,还增加了温流、胡清涛、朱宗、李文等为外勤记者。正当我们在按部就班地工作的时候,林继茂突然被捕了。社长一缺由柳区专署派助理秘书黄炎兼任。此人诡计多端,擅长吹拍,毫无办报经验。接任不久,社内经济枯竭。同时纸张低劣,销路日趋下降,随时有停刊的可能。

后来黄炎和柳州戏剧工会理事长朱午迟商量,想在慈善戏院的桂班义演筹款,他知道我和桂班名伶甚熟,尤其是与小飞燕的关系甚好,要我协力办成此事。当时我对他说:“这样做有损报社的声誉,同时也给桂班出了一道难题,柳州大小报五六间,你请求义演,别报也可请求义演,这样一来谁来代表社会舆论?”最后他说,在本市不能出演,到别处去演,只要少数的名角去配合当地的桂班作短期演出,收入定然可观。他再三要我和桂班台柱小飞燕商量。本来这件事很难启齿的,因为,在抗战时期的艺人,生活是够苦的。今天义演赈灾,明天筹款慰劳,每天所获仅可糊口。因此,我秉着试探性质去找方昭媛。谁知她不但不拒绝,还帮我提出一个方案:“须生找庆丰年、花脸找周兰魁、小生找小梅芳,旦角你看找谁?”说完还朝我笑了笑。我说:“方小姐,旦角只有找你了。还烦劳驾你代为敦请他们三位。”她满口答应下来。以前,我总觉得她之所以有这一义举,是因为我与她的好友情促成的。现在看来,远不是那么一回事。如果我们单是从个人的友谊出发来看待她的义举,我觉得意义是不大的,也有损她的形象。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当时正是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伟大的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全国取得节节胜利的时期,是全国亿万人民大众在统一战线的领导下,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时期。我们正是在这样伟大的形势下办报的。由于在这样伟大的形势促进下,当时我们办的报纸或多或少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意愿,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我认为,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待小飞燕为报社义演筹款的壮举。而且,小飞燕在与当时留在桂柳的中国各名戏剧家的交往中,还从戏剧家欧阳予倩先生学戏,接受了进步的思想。这就可以说,小飞燕不只是简单的为某报社义

演筹款,而是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了她的一份力量!

小飞燕同意义演一事,我转告了黄炎。1943年的六七月间,由柳州专署通知宜山县长罗人杰、融县长安区区长韦初开,要他们妥善安排我们到宜山和长安为柳州日报筹款义演。经编辑、采访、经理三部人员决定:演出时间每处定为六个晚上,由我率队前往。先赴宜山后到长安,说来奇怪,也许是名伶声誉在起作用吧。我们还未到达宜山之前,门票已抢购一空了,在长安区演出也是如此。演出结束后,两地人民群众纷纷要求多演几晚,有的甚至还要求白天里继续演唱。因为是义演,我们不好过多地麻烦他们,只在宜山、长安两地按原计划各演六个晚上。多亏了他们的帮助,使我们报社渡过了难关。当时报社没有给任何东西酬谢他们,仅在报纸上登个广告鸣谢而已!

(作者:刘雄,选自《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

抗战时期柳州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41年春天,一位名叫屠柄恒的外地学生经过柳州,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禀告他旅行的经历。信中说:“柳州充满了一片雄壮之气,看起来,都欣欣向荣,我们真有帮助呢。”

“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快快走向战场,把八百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这种激越的呼声,当年曾无数次回荡在柳州的大街小巷。

柳州民众心系前方的子弟,关注着前线的风云变幻。每一次前方的胜利,对于柳州人民来说,就意味着一个欢欣的节日。

1938年4月7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出现在中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指挥这次战役的李宗仁将军名扬中外。消息传到柳州,城区通宵燃放鞭炮,激起了人们走向前线、击杀强敌的豪情。当时到此考察的湖南省政府委员宾敏骸,记述了他亲眼所见的情形:(柳州)近来一般乡镇长及小学教员志愿往前方杀敌者,实繁有徒;当电影院放映八桂子弟兵对日血战的电影时,全院座无虚位,情形甚为热闹。在该片播映出八桂健儿奋勇杀敌的镜头时,全场观众掌声如雷……

1940年1月13日,昆仑关之役缴获的战利品——大炮5门、轻重机枪20挺、步枪500余支、各种枪弹6万多发,分装成21车运抵柳州,在乐群社前展出,柳州城厢前往参观者达3万余人。这是何等令人鼓舞的情景呵!而每当遇到战事吃紧,同样也都无不牵动人们的心神。

1938年10月26日,为了鼓舞民众同仇敌忾、共同武装保卫大华南,柳州中学和龙城中学两校员工在这天傍晚6时30分举行火炬大巡行。在蜿蜒涌动的人流中,民众无不感受到时代灼热的气浪。如今,每日在街道边踽踽而行的陈雄子先生,还记得当年为保卫大华南而写于1938年12月14日警报声中的那首《看守我们的家乡》:

献出我们的血,肉和力量,站上祖国自由斗争的火线,站上保卫华南的堡垒,看守我们的家乡呵!

家乡有:万世的祖业,无限的宝藏,饶富的园林,活命的田庄和静美的山河,家乡是我们的生命线呵!我们在这里一代代生长下来,我们也将一代代这样生长下去。

我们决不让日本鬼子踏进我们一分的地方,我们决不让日本鬼子侵占我们一分的产业。

起来,万众的中华儿女,为民族,也为自己而战斗吧!

为了民族,也同时是为自己的家乡,人们发出了响彻云霄的呐喊。而当汉奸要将祖国出卖给敌人的时候,人们怒不可遏,刀锋直指。1940年2月,柳州日报社和全国22个省、市的122家报纸共同联名发出通电,声讨汪精卫的卖国行径,还在报上开辟了讨汪专版。

青年永远是时代的先锋。还是在1936年的冬天,柳州中学和龙城中学的部分师生就发起组织了“黎明剧社”,演出抗日话剧。1938年10月16日,龙城中学的学生成立“晨钟剧团”,晚上在校内燕园公演鼓动抗日的文艺节目。即使是小学生也成了向民众宣传的“小先生”。

1938年11月9日,柳江县学生抗敌后援会决定在各中心校组织“小先生团”,开展宣传活动。1939年5月,龙城中学全校师生组织抗日巡回宣传工作组,历时一周,行程数百里,到拉堡、成团、洛满、新圩等乡镇圩场演出戏剧及其他文艺节目。同时还组织小分队,以歌咏、山歌、墙报、家访等形式,宣传抗日和捐资慰问抗日战士家属。

柳州民众的抗日热情感动着每一个人。1939年3月,广西学生军第一团第六中队从桂林来柳州开展抗战宣传工作。短短一个月相聚,临别之时,他们发表了感人的《告别柳州各界人士书》:

在柳州,我们相聚虽然只短短四个星期,但在这短短四个星期的期间里,确使我们感到了无限的兴奋和鼓励:首先,你们火热般的救亡热情和对抗战深切的关心,便深深感动了我们,你们热心地把各处刊载的信报一字一句地看完,你们热烈地参加民众大会,热情地去看每次的话剧和漫画;同时,更用着无

比崇高的热情去帮助我们,在热闹的大马路上,在静僻的小巷里,从百十家的贴上了“民族英雄”的门里深深表现了你们对抗战参加的踊跃;同时,你们对我们学生军的深切的同情和关心,使我们感到长此的兴奋,将更高度的鞭策和鼓励我们更英勇的去工作,去战斗。同胞们,柳州的兄弟姐妹们,我们的民族是绝对有希望的!

柳州和学校、文化界抗日救亡宣传协会都组成了歌咏团,长期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在报纸上,外地团体到柳州进行宣传活动的报道也是屡屡不断。

《柳州日报》1938年11月22日报道了全国漫画作家协会华南分会抵柳工作的一则消息:

全国漫画作家协会华南分会为一范围广泛之绘画团体,会员包括华南大部分之美术工作者。自广州沦陷后,该会即组织一纯粹漫画之宣传队,沿西江入广西内地作抗战宣传。日前曾在梧州举行一次抗战漫画街头展览,收效颇大。现该会已在梧工毕,继续西上,已于前(二十)日安抵本市,拟于日间举行一盛大之抗战漫画展览会,闻该会品展第一批到柳者为黄茅、麦非、谢谢、黄超4人。尚有一部分留梧工作云。

这些团体中,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敌演剧一队(剧宣四队)、九队(剧宣五队)先后来到柳州,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成为抗敌文化宣传的主力军,并为柳州培养了一批文艺人才。本地的,外地的,上海“八一三”歌咏队、上海话剧团、广州儿童剧团、厦门儿童剧团、蓝白剧团、铁血剧团、港粤服务社、国防艺术社、新中国剧社、柳州四维平剧社等剧团,四战区政治部教导大队、漫画作家协会华南分会等团体,为时或长或短地在柳州进行抗日宣演活动。

1938年11月,由中共党员谈星率领的广州儿童剧团,从广州辗转梧州到达柳州。孩子们与上海“八一三”歌咏队、蓝白剧团联合演出《扬子江暴风雨》多幕歌剧。还到沙塘广西农学院演出,并与该校学生救亡宣传队为长塘乡的农民演出。次年3月,在第二期抗战宣传周活动进入高潮时,剧团向市民公演了《塞上风云》。

这些团体中的主要人物往往都是文化名人,如田汉、夏衍、马思聪、欧阳予倩、蔡楚生、金山、王莹、红线女、马师曾等人,也都因此在柳州留下了足迹,也就带给柳



1943年成立的龙城中学合唱团(资料图片)

州一份文化的营养。田汉先生曾在《新中国剧社的奋斗与西南剧运》中回忆“新中国剧社”在柳州进行抗战宣演的情况：

1944年7月初，“新中国”全体由桂林转进到柳州。在柳州，又会合了剧宣四、五队、四战区政工大队、边政大队共一

百五十余人在抗建堂演出《怒吼吧，大后方！》。这当然是《怒吼吧，桂林！》的改作。又以集体创作演出《同盟军进行曲》慰劳盟友。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合作之佳至今为剧界所称道。他们又计划演出《四城记》，剧本已成，吕复写长沙，严恭写衡阳，汪巩写桂林，李超写柳州。主题针对当时一种谬论，认为桂柳丧失无关战局，而强调保卫西南，坚持抗战，不得轻易放弃一寸国土。这剧本刚要演出而柳州也继桂林之后进行紧急疏散了。

1939年2月5日的《救亡日报》上，有一篇文章说：“柳州救亡工作空前活跃。”在柳州的这些文化艺术团体上演了大量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歌曲和戏剧，有《黄河大合唱》、《流亡三部曲》、《伟大的民团》、《塞上风云》、《四城记》等，在爱国、救国的教育中，柳州民众也同时欣赏到了许多名家、名角精湛的艺术以及各门各派的风格。在新闻界，有以《柳州日报》为主的各种报刊，将宣传抗日，反映时局动态作为主要的报道内容，大力报道抗日前线及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情况。这样，柳州思想文化的空域里，交响的是抗战救国的主题乐章。

一次次的宣讲、演出，一篇篇的报道，赞颂浴血的战士，讴歌光明，发扬正气，揭露黑暗，针砭时弊，激励民众抗日的决心，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心。柳州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回荡着抗日救亡的呼声。

(作者：刘汉忠)

参考资料：

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图说柳州抗战》（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

柳州热血青年在 1939 年

1939年,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前方将士抛头颅洒热血誓死保家卫国,后方民众努力生产支援前线如火如荼。柳州龙中、柳州中学的青年学生成立农村工作团、出征军人家属服务团、山歌队等,送戏下乡,用山歌、漫画、演讲等多种形式投入抗战宣传,激发民众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热情;许多学生到农村去慰问、帮助抗战军属,为军属解决实际困难,人人抗战胜利献出一份力量。

龙城中学成立“五四”农村工作团,组建山歌队,到县郊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有一天,工作团的山歌队来到柳江县福塘乡,用山歌、漫画的形式向赶圩的农民宣传。山歌队由一帮女同学组成。她们在圩场的土台上拉开嗓子唱起来:“身上有钱要出钱,身上有力要出力;出钱出力打日本,打败日本才太平。”山歌声一下子就引来四五十个农民,把狭窄的福塘街塞得满满的。

唱完山歌,同学们拿来一卷漫画,一张一张地打开,一面展示一面向围观的群众解释画中的内容:“这是日本鬼子烧我们的房屋呀!”“这是日本鬼子强奸我们的妇女呀!”“这是我们的游击队杀日本鬼子呀……”农民兄弟看到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仇恨。

此时,一个头上戴三角竹壳帽、穿着农民服装、打着大赤脚、脚上满是污泥的汉子向山歌队的女同学请求:“我是一个烧饭的,我可以上台讲几句吗?”女同学回话说:“可以!不论哪一个人上来都欢迎。”

戴竹壳帽的汉子上台,很恭敬地向听众行了一个鞠躬礼,然后打开嗓门,用当地土话高声演说:“各位亲爱的同胞:我们中国和日本打仗,已经差不多两年了……”他深入浅出的演讲获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把现场听众的情绪鼓得高高的。当他快演讲完的时候,从远处跑来一个同学,急急地叫他:“烧饭的同志,你快回去烧饭了!”汉子脱下竹壳帽,愉快地向每一位听众鞠躬,微笑。群众这才知道,他也是龙中“五四”工作团的工作人员。

五月的一天晚上,柳州中学的学生与抗日游击队士兵,在柳江县成团乡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军民联欢会。联欢演出的礼堂是用茅草搭盖而成,一盏汽灯高挂在简陋得可怜的舞台上,清白的光线照耀在每个负责民运工作的同志的脸上。尽管农村物质缺乏,但参加搭台筹备工作的同学,每人的脸上都挂着微笑,因为他们都为自己能参加抗日救亡宣传而高兴。

成团军民联欢会的第一个节目,是柳中学生和游击队士兵集体大合唱,那昂扬的抗战歌声震撼了全场观众的心,沸腾的热血要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斗争到底。柳中学生利用旧的表演形式装入新的内容。例如双簧、魔术,过去都只是助兴节目,不能利用它来作为抗战的宣传工具。这一次表演双簧的时候,加入反汉奸、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场面;在表演魔术时,利用观众对表演的祈望,由表演者领头喊口号,观众便跟着喊。这样一来,虽然是极平凡的双簧、魔术,也使会场充满抗战的气氛。

柳中同学表演《放下你的鞭子》和《难民曲》,把全场 1000 多个观众的心揪得紧紧的。

军民联欢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柳中同学和游击队战士联合演出《伟大的民团》。舞台上,一群健美的男女青年在后方参加生产劳动时,利用休息的片刻,男女对唱最受农民欢迎的抗战山歌。男青年调皮地唱:“石榴青,问妹出嫁是招人?若妹招人就招我,会种田地会当兵。”接着女的答过来:“石榴青,妹今还是年纪轻;等哥当兵退伍了,那时同哥来结亲。”歌声一停,便是观众的狂呼声、掌声震撼山岳。最后一刻,是一群勇敢健美的男青年,在一群农村少女热烈的欢送中上前线去了。

青年学生潘渊参加“出征军人家属服务团”第八队,于 1939 年 5 月 21 日来到柳江县广源乡维扬村(今白露街道办事处小村)。他们五人为一个小分队,到抗战军属家里进行慰问。当服务小分队把柳州各界热心人士捐助的钱和慰问品送到军属手中时,军属们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服务团的学生极力安慰军属,劝慰他们安心生产,鼓励在前方打仗的儿子英勇杀敌。

当服务团的学生去到田间,要帮助军属干农活时,军属们很客气地阻拦,怕学生们干不了农村的劳苦工作。潘渊被派到军属何神德、龙有德家去服务,军属们对他讲出心里话:“你们是学生呀,怎做得起农村的劳苦工作?就是你们做了,

也不过是短短的时间。还是请你们和村长商量个根本的办法吧。因为我们的儿子被征出去了,家里的工作有时是自己做不了的,非要别人来帮帮忙不可。”

潘渊向队长反映了军属的真实困难。第二天晚上开村民大会,队长就把这件事情解释给大家听:“当兵是每个国民的义务,迟早都要征去一次的。假若现在别人被征出去,我们不帮他,将来自已征出去时,当然也无人帮自己了……”队长的话说得众人心服口服,大家都愿意为军属帮忙了。当晚,村民大会决定:今后,全村未征调出去的壮丁,每月轮流去帮军属义务劳动一天,并且不在军属家吃饭。这个办法解决了出征军人家属缺少劳动力的困难,很受军属欢迎。

(作者:沈培光)

参考资料:

1939年6月4日《柳州日报》第三版

不做亡国奴的呐喊

——抗战时期柳州文化救亡活动概述

柳州抗战文化活动十分活跃,中共在柳州积极推动抗战宣传,群众救亡文化活动、抗日文艺演出和美术歌咏活动、新闻出版活动以及诗词创作都有精彩之处,对柳州抗日救亡运动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构成了广西抗战文化史的重要一页。

中共统战中推动抗战救亡宣传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柳州的抗日救亡热潮持续高涨。中共柳州地下党组织也在积极地组织推动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这一时期,在柳州活动的有中共柳州中学支部,中共柳州日报支部。1940年以后,又有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抗敌演剧一队(即剧宣四队,配属第四战



1940年7月,演剧五队合影于柳州测量局驻地。

(资料图片)

区)和后来从沦陷区来到柳州的抗敌演剧九队(即剧宣五队),国民政府军委会第四战区中共特别支部。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深入工厂、农村、学校、社会团体,开展群众性救亡宣传动员活动,并在国民政府机关内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国民政府军委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秘书和军事参谋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利用特殊身份和各种机会,在为长官撰写讲稿和文章时,经常巧妙地把共产党提出的政治主张融入文中加以宣传。他们与国民党高中级将领广泛交往,激发其民族正义感和爱国热情,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群众性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高潮不断

各中学爱国师生是抗战文化宣传活动的先锋。柳州中学、龙城中学的抗日救国宣传队和抗日巡回工作团,其他学校组成各种抗日宣传队、歌咏队、演剧队,他们到大街小巷、车站、码头、茶馆、酒楼,控诉日军的滔天罪行,诉说沦陷区人民的悲惨遭遇,宣传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感人事迹。多所学校的学生还组织了“晨呼队”,于每日清晨6时,列队巡游各街道,大声疾呼抗日救国口号,一时间,“奋起抗日,共驱强寇”、“不忘国耻,不恢复国土完整不罢休”等口号响彻柳州大地,受到各阶层的广泛支持,连远在千里以外的《广州民国日报》,也迅速给予了肯定的舆论支持。柳州中学、龙城中学的部分师生还成立了柳州第一个业余剧社——黎明剧社,演出抗日话剧,宣传效果极佳。航空学校和其他中小学也跟随其后演起了话剧,以广泛宣传发动民众。黎明剧社在排演话剧的同时,还组织歌咏队,印刷了歌纸,在街头、学校、机关、剧院等公共场所向广大民众演唱和教唱抗日歌曲。1938年秋,柳州中学迁到柳江成团圩后,深入乡村和圩场,向农民宣传抗日救亡,保卫家乡,鼓动民众的抗日激情。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组织还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向学生推荐进步书刊,把进步青年学生牢牢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广大青年学生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柳州的群众性救亡热潮感染了因采购报纸印刷设备路过柳州的著名作家夏衍,他在其主编的《救亡日报》上报道了柳州当时的抗日宣传情况:“救亡运动在柳州,它简直是以惊人速度在迈进着,现在的街头就像是一幅幅巨大的壁画在刺激着人们。”群众性抗日救亡宣传文化活动深入民众心里,有力地促进了民众的抗战意识和征兵、支前、赈灾、救护伤员等后方抗日工作。

文艺界抗日文艺活动十分活跃

1938年11月,柳州成立了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协会组织了一个救亡话剧团和四个救亡歌咏队,在福建会馆处办起了救亡剧场,在救亡剧场公演《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塞上风云》等抗日剧目和歌曲。相继来到柳州的剧团还

有上海“八一三”歌咏团、上海话剧团、广东儿童剧团、福建儿童剧团等，他们也带来了多出抗战剧目，并时常举办联合演出，扩大演出效果。1940年后，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文艺队伍剧宣第四、第五队常驻柳州，他们在柳州新光大剧院公演了《愁城记》、《宣传》、《包得行》、《蜕变》等。1944年，剧宣第四队到桂林参加了西南剧展，上演了《家》、《蜕变》和早期话剧《父归》，活报剧《伤兵医院》、《七年了》等。

美术界通过举办画展，在《柳州日报》开辟“草原木艺”专刊，举办美术培训班、函授班，深入抗日前线以画笔记录抗战实景等方式，在柳州开展了大量的抗日救亡文艺活动。1938年2月，柳州文艺界组织了一次“筹款救国美术展”，共展出徐悲鸿等人的美术精品341幅，结束后将出售作品的收入271元全部捐给前方将士。1942年10月10日在柳州大南路广东同乡会文化服务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双十木刻展·柳州展区”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在柳州和宜山两地同时揭幕，展期五天，展出作品530幅，参展作者包括广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浙江、山西等地81人，展出木刻书报41种，木刻画刊、期刊52种，参观人数约7000人。1943年元旦，《柳州日报》在龙城中学为去湖南前线战地写生归来的报社记者黄荣灿举办了“黄荣灿战地写生画展”。抗战时期，柳州还举办过“抗战画展”、“木刻研究会展”、“黄荣灿和黄新波木刻联展”和“街头木刻画展”等。

音乐界人士也深入学校、机关和社会团体，教唱抗日歌曲，组织街头歌咏会。在国民政府军委会第四战区工作的孙慎、舒模、吉联抗、黄凛等音乐工作者利用合法身份在柳州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歌咏活动，并与剧宣四队、五队合作在柳州上演解放区的音乐作品，如歌剧《军民进行曲》、《农村曲》，大合唱《黄河大合唱》、《新年大合唱》等。他们还积极创作抗日救亡歌曲，如《纪念“一·二八”歌》（上海“八一三”歌咏队原作，柳州救亡歌咏团改作）、《广西航空学校校歌》（满谦子词曲）、《你这个坏东西》（舒模词曲）、《四大禁令歌》（联抗词曲）等。孙慎和何家槐还合作编选歌曲集《战地新歌》，1940年2月由南方出版社出版。

新闻出版界大力宣传抗日救亡

《柳州日报》是抗战时期柳州重要的抗日宣传阵地。当时，报社经理、采访部

主任和多名编辑、记者都是中共地下党员。1941年8月中共柳州日报党支部建立,有党员30多人,《柳州日报》实际由中共地下党所掌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柳州日报》及时发表战地消息,传播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主张和各类抗战言论的文章。在国际宣传上,着重报道苏联在欧洲战场上的反法西斯的战争形势;在国内抗战形势上,积极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1938年,报社将原来的“前哨”副刊改为“救亡”周刊,突出抗战救亡主题,发表许多抗日救亡文艺作品,如诗歌作品《护路人》、《大家捐》、《老乡们,大家保卫家乡》、《记住这仇恨》、《保卫华南歌》、《战斗讴歌》,歌词《我们还活着》、《纪念“一·二八”歌》等,还发表不少知名人士和作家如黄药眠、艾青、王造时等人的文章。1941年,版画家黄荣灿来柳州后,进入《柳州日报》工作,主编副刊,出版了“草原木艺”专栏,发表一批抗日木刻作品,如《生与死的搏斗》、《救救孩子》、《浏阳战斗》。1942年初,他代表《柳州日报》到湘北作战地采访,用画笔绘下战地实景,归来后举办了战地写生展。

1942年12月5日,柳州新闻界成立了柳州市新闻记者公会,会址在中山西路柳州日报社内。会员以《柳州日报》员工为主,也有其他军、警、民办报纸记者。1943年6月6日,为慰劳湖北前线抗日将士,柳州市新闻记者公会举办报纸义卖活动,共筹款25万元,均捐给抗日前线部队。

抗战时期,柳州还办有《柳州晚报》、《阵中日报》、《立鱼峰报》、《中正日报》、《前锋报》、《真报》、《大刚报》等报纸和《柳江潮》、《救亡周刊》刊物,都刊载了宣传抗战的时评、社论等文稿和文艺作品。

(作者:李建平)

参考资料:

- 1.中共柳州市委宣传部、柳州市文化局编:《抗战烽火中的柳州》(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 2.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柳州市志》第六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 3.广西大百科全书编委会:《广西大百科全书》文化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
- 4.郦虹:《抗战时期的柳州日报》

韩国临时政府流亡在柳州的日子

1919年4月11日,韩国独立党人在上海法租界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反日独立运动,争取实现民族复兴。后辗转杭州、嘉兴、镇江、南京、长沙、广州、柳州、重庆等地,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他们由重庆经上海回国。

1938年10月至1939年4月,韩国临时政府落脚柳州,与龙城人民共同开展各种抗日斗争活动,结下深厚战斗情谊。

2000年9月,著名诗人艾青等一批国内外学者到柳州采风,与当地文艺界人士愉快座谈之际,韩国高丽大学老教授许世旭忽然提起:“据我所知,韩国临时政府曾经来过柳州,不知柳州这里是否还有当时的记录?还有没有他们活动的旧址?”一语既出,四座皆惊。当天在座的柳州人谁都不知道有这么一段历史。柳州文联主席柯天国当即请相关部门的文史研究人员查阅资料,第二天得到反馈:确有其事!而且文化部门还提供了一张乐群社的照片,疑为当时韩国人的住处。

这个发现引起了两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此后,韩国方面先后派出6批学者专家到柳州,专门就此事进行考察,而柳州方面也两次派人前往韩国,寻访当年到柳的幸存者。

通过双方的努力,过往的历史脉络再次清晰地展现:1938年10月,正当龙城抗战烽火熊熊燃烧之际,流亡中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00多人,从广州辗转陆续抵达柳州。他们在这里开展了许多革命活动,包括发表《韩国独立宣言20周年纪念宣言》纲领性文件,成立大韩民国光复阵线青年工作队,并与柳州人民一道,共同开展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抗日活动。

“离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2001年11月28日,阔别柳州60多年后,当年大韩民国光复阵线青年工作队队员李允哲偕夫人闽泳爱应邀来到柳州,站在柳侯公园的音乐亭前(靠近文惠路的一个三角顶凉亭),又唱起了熟悉的老歌。

60多年前,李允哲和闽泳爱的父母都在临时政府工作,他们在柳州生活过

7个月。那时的李允哲,虽然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却已经是光复青年工作队的队员了。故地重游,能够再次见到昔日排练唱歌的凉亭,李激动不已。他告诉记者,当时他们住在柳侯祠旁一个二层小楼里(后据文史工作者考察,该小楼可能是当时的江西会馆,在柳侯公园旁)。“我们经常去劳军、慰问伤兵,在乡下做一些抗日宣传。”白发苍苍的李允哲和闽泳爱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



1939年4月4日,在柳侯公园音乐亭前合影留念的部分大韩民国光复阵线青年工作队队员。(资料图片)

同为韩国光复队员的池复荣女士回忆说:“我们经常上街贴壁报、喊口号、唱革命歌曲。我们的抗日宣传活动很受柳州人民的欢迎。我们贴壁报,就会有很多人围着来看;我们唱革命歌曲,就会有很多人停下来听,给我们鼓掌;我们喊口号,柳州的人民就跟我们一起喊,还不断鼓励我们。”

据了解,成立于1939年2月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光复阵线青年工作队,在当时的柳州非常引人注目。他们身着草绿仿美式军装、船形帽,胸前佩戴圆形队徽,短短几个月内就由柳州地方报纸报道达百次之多,俨然成为当时柳州抗战团体中的明星。在撤离柳州前,青年光复队与中国战友一起,曾特意在柳侯公园的音乐亭前合影留念。

当初韩国临时政府上百号人来到柳州的时候,因条件所限,只能分散居住。现位于中山东路的柳州市工商联所在的办公楼,也就是当年国民党第七军军长廖磊的公馆,曾经是韩临时政府要员相对集中生活和办公的地方。李允哲夫妇在参观廖磊公馆时忆起:“我们韩国临时政府除了金九先生以外的要人,都在这个地方住过,国务委员们都在这个地方住过。”

柳州市博物馆原副书记邝家华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韩国临时政府在柳情况的调查考证,他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人员在柳州分散而居。住河北的主要围绕在柳侯公园、城中区一带,已查明的地址有潭中路(即现在的解放南路)50号、庆云路(现中山中路)109号、廖磊公馆(中山东路)、江西会馆(文惠



柳州鱼峰山下的乐群社,韩国流亡政府人员的暂住地。(资料图片)

路)、覃连芳公馆(弯塘路)、京西路(疑为庆云路)10号、卫戍司令部旁的大院内(中山东路)等地。住河南的主要是围绕在鱼峰山一带,已查明的地址有太平西街18号、乐群社等。如今的乐群社在中韩两国政府的努力下,已经被建成柳州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抗日斗争活动陈列馆,供世人参观凭吊。

那时日军气焰正嚣张,柳州经常被轰炸。来柳逃难的韩国人和当地老百姓一样,吃尽苦头。到过柳州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要员杨宇朝,后来以其儿子杰西的名义写过一本回忆录《杰西日记》,曾详细记录这段悲惨经历:

1938年12月5日,柳州。上午10点多钟响起了空袭警报。刚躲进山洞,日本的飞机似乎投下无数炸弹。山洞严重震荡,好像立刻要塌下来,洞里面就像雷鸣闪电,不断从上面落下石头渣子。我弯腰挡住杰西,等着投弹结束。过了几十分钟,似乎爆炸声停止了,十来分钟后解除了警报。被惊吓的人们犹豫地走出山洞,看到了一片惨状。原来我们住的房子前后左右已成一片火海,山洞前的大片田野上到处是炸出的深坑和惨不忍睹的尸体。

日本人的炮火硝烟,激起的是被压迫民众的奋力反抗。1939年3月1日,韩国临时政府在柳州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在龙城中学举行集会,隆重纪念韩国“三·一”反日独立运动20周年。

1939年3月2日的《柳州日报》披露了这次聚会的详情：韩国光复阵线青年工作队队员们首先上台演唱爱国歌曲，尔后是魔术、舞蹈等节目。当天最有看点的是韩国光复阵线青年工作队集体创作的话剧《国境之夜》。舞台上的铁丝网和碉堡等舞美设计在当时独树一帜。剧情讲述的是在西伯利亚国境线上，东北原野中的中韩抗日联合军与日军英勇作战的情景。当时记者岳沙这样描写他们的表演：“他们费了很大的心血，完全逼真的布置出来。演员方面据说都是初次登台，但演出相当熟练，毕竟他们经历饱尝过斗争的生活，弥补了演技修养的贫乏。”

演出结束时，观众备受感染，他们挥舞旗帜，高呼“中韩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革命热情分外高涨。

纪念大会后，在柳州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韩国光复阵线联合宣传委员会”的名义，立即发表了《韩国独立宣言20周年纪念宣言》，刊登在当时由中共柳州地下党和革命爱国志士控制的《柳州日报》上。

当年韩国人在柳州的时候，除了上街宣传鼓动，还积极组织义演筹募善款慰问负伤将士。时任柳州文化界救亡协会负责人、柳州救亡剧场领导的陈雄子先生，曾经帮他们安排在曲园演出。

“1939年的3月1日，有两个20多岁的韩国年轻人到文化救亡协会来找我，他们是光复阵线青年工作队的。他们会讲中国话，说他们要在柳州搞个募捐义演活动，募捐得的钱拿来慰问中国的负伤将士。”他们希望陈雄子帮助解决三件事：第一，联系一个演出剧场；第二，联系一些演出单位和他们一起共同演出；第三，联系报社，他们希望为演出活动出一个特刊。

陈雄子很快将事情办妥。当时号称广西第一的曲园剧场（在今培新路东面街道一带）答应腾出一个夜晚和一个下午的时间来给他们演出。柳州救亡歌咏团、广州儿童剧团、广州兰白剧团、上海“八一三”歌咏队4个文协成员单位也表示愿意一同演出。当时《柳州日报》的主编得知原委后也非常爽快地解决了《特刊》问题。

当时《柳州日报》为这次义演活动配发了两期《韩国光复阵线青年工作队为慰劳抗敌将士游艺大会特刊》。从泛黄的旧报纸上，我们得知那两天的演出盛况空前，座无虚席。滞柳的中国负伤官兵、柳州的各抗战救亡团体和韩国光复阵线

青年工作队轮番上台献艺,各显其能。负伤将士进行慷慨激昂的抗战演讲,广州儿童剧团演唱《前进》、《热血》和《祖国》等革命歌曲;上海“八一三”歌咏队在音乐家章枚先生的指挥下,表演了四声部合唱《保家乡》、《游击队》、《抗战歌》等革命歌曲,章枚先生还亲自演唱了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因战祸滞柳的北京大学提琴家陈君琬女士上台进行了小提琴独奏;等等。

韩国光复阵线青年工作队的节目更是丰富多彩,31个节目中有8个是他们表演的。儿童部的少年们上台合唱了《慰劳伤兵歌》,进行舞蹈表演和魔术表演,歌咏组的30多名男女青年则上台齐唱了《救亡进行曲》,戏剧组的青年们将经过精心排练、自编自导的独幕话剧《国境之夜》和《伤兵之友》奉献给了柳州的观众,使柳州的群众耳目一新;他们的歌声饱含亡国之痛、思乡之悲,引起观众强烈共鸣。

为期两天的义演活动轰动龙城。3月10日,由柳州各机关团体派出代表陪同韩国光复阵线青年工作队前往柳州军医院进行慰问活动,将所得收益捐给了住院伤兵。

此后,韩国临时政府和韩国光复阵线青年工作队的名声和地位不断提高,他们和柳州人民已经真正亲如一家。在以后柳州进行的各种抗战活动和会议中,他们成了必不可少的参与者。

(作者:巴 方)

抗战人物

阚维雍：断头不做降将军

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抗日名将阚维雍入选,成为唯一名列其中的柳州人。

1944年,日军重兵围困桂林,阚维雍将军坚守至城破之际自戕殉国,践行了自己“与城共存亡”的誓言,死前留下“断头不做降将军”的绝命诗。

2014年9月3日,柳州市在人民广场举行的“抗战烽火中的柳州”陈列展览,就有阚维雍将军的图文资料。尽管阚维雍在柳州的儿子阚培桐已经过世,但儿媳杨秀云、孙子阚滔对阚将军不平凡的一生仍记忆犹新。

1900年,阚维雍出生于柳州的一个书香之家。清末民初,阚家一直是柳州的望族,其祖屋就在如今从“五角星”往东,经过培新路口后,所看到的中山东路南侧原地区供销社一带。阚维雍自幼聪颖勤奋、性情忠厚,深得以“书礼传家,忠义继世”自励的父亲阚宗骜的喜爱。

尽管阚维雍有着20多年的戎马生涯,但他少年时代的理想则是成为一名解人病痛的医生。1917年,他考入广州医科学校,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由于两广战事迭起,父亲不放心他只身在外,令其辍学回家。

五四运动爆发后,大大激发了阚维雍的爱国热情。他认为“当今军阀混战,割据为雄,国是日非,教育受摧残,无枪阶级遭蹂躏……文冠懦弱”,决心“改习武事,欲挥鲁阳之戈”,于是考入南宁广西陆军讲武堂工兵科。

1924年,孙中山委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督办兼第一军军长,阚维雍因是南宁讲武堂高才生而被李宗仁录用、委任为军部机要参谋,参加了消灭旧桂系以及抗击滇军进犯广西的历次战事。1926年春,国民党在南宁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阚维雍调到该校担任教官。

1932年11月,阚维雍被选送到南京陆军工兵专科学校第一期深造。1933年毕业后,他奉命担任第15军工兵营营长。1939年,他考入贵州遵义国民党中央

陆军大学乙级将官班深造。1940年4月,他从陆军大学毕业,即被委任为陆军31军少将副师长、参谋长,率部参加了桂南昆仑关之战,重创日军。

1942年,阚维雍调任第31军131师少将师长,率部担负桂西南防务。1944年秋,日军因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利,遂调集大军沿湘桂线南犯广西,妄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与孤悬东南亚的部队取得联系。

1944年8月,阚维雍奉命率部从驻地钦州、防城港徒步开赴桂林。途经柳州,他顺路回家看望,这时他的双脚已经红肿,并开始溃烂,亲属劝其休息一两日再走,但他求战心切,仅停留不到一小时便挥师继续北上。当年9月中旬,阚维雍抵达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下令131师担负东、北两面,170师担负西、南两面的防务。而据敌情判断,敌人正面兵力多达7个师团约10万人,且以桂林为主攻目标。以两个多师不到两万人的兵力,抗击装备精良的10万之敌,无异于以卵击石,而要完成“死守三个月”的任务,更是天方夜谭。

对于如此部署,阚维雍心里也是一清二楚。然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曾对一些好友说道:“作为一个军人,只有服从命令,与桂林共存亡。”他没有被敌人的凶焰所吓倒,夜以继日地督导部属疏散居民,抢修工事,并深入各部队,勉励士兵奋勇杀敌,誓死保卫桂林。

记者在阚家见到了阚维雍写于1944年10月4日晚的两封家书。一封是写给兄长的,他在信中说:“市内外之工事全部完成,加以地势天险,已成金城汤池,不独不怕敌人来攻,正恐其不来攻也!”体现了他当时对桂林保卫战的强大信心;另一封是写给妻子罗咏裳的,他告诉妻子:“此次保卫桂林大会战不日即可开幕,此战关系重大,我得率部参加,正感幸运,不成功便成仁,总要与日军大厮杀一场也。”他还勉励妻子:“家无积余,用度极力节省,如何寒苦,亦当忍受,抗战胜利在望,生活总有解决办法也。”其忠诚报国之壮志和廉洁奉公之衷情,溢于言表。



阚维雍在黄埔军校南宁分校任教官时的全家福。(资料图片)

日军对桂林形成合围,在外围“机动作战”的 175 师和 188 师当即“机动”撤退,防守桂林城的部队成为孤军。日军经一周准备,于 1944 年 10 月 31 日上午开始发动进攻,攻击的重点是东、北两面,由阚维雍指挥的 131 师防守的阵地遭到沉重打击,阵地逐步被敌蚕食。

东面之敌攻占屏风山后,即对普陀山、七星岩、月牙山阵地实施围攻。阚维雍指挥 391 团官兵节节抵抗,重创敌军。惨无人道的日军竟向该团团部所在地七星岩内施放毒气并喷射火焰,全团 800 多名官兵壮烈殉国。

11 月 9 日,大批日军渡过漓江,向桂林城发动全面进攻,阚维雍指挥退入城内的官兵顽强抵抗。当日下午,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当晚午夜弃城突围。阚维雍认为国人对桂林保卫战寄予厚望,主张调整部署,改变战法,继续抵抗,恪尽军人卫国保土之责。但韦云淞急于逃命,顽固加以拒绝,阚愤然离开会场。

当晚 7 时许,阚维雍返回师部,召集有关人员布置突围,然后将所背行囊交给卫士杨霖超,内有任职令、履历表、面巾等物,还有一条小手帕,上面用钢笔写着“大忠大孝,成功成仁”八个大字。他叮嘱说:“如我发生不幸,你将这些物件带到融县交给我妻子,叫她不要过分悲伤。子女的教育费用国家必有照顾,要他们勤奋自修,切勿疏懒。”

之后,他又把一封信交给卫队营长,让其突围后交给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并报告官兵奋战的经过。这封信里面是一首绝笔诗:

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
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

从容安排好事后,阚维雍整理衣装,以稍事休息为由,进入指挥所的住房内,把灯熄灭,在床上举起手枪对准右边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第二天,桂林沦陷。日军入城后,接受被俘官兵的要求,下令所俘官兵及日军官佐 20 余人,将阚维雍的遗体重新殓殓,立一木牌,上书“支那陆军阚维雍将军之墓”,并对天鸣枪,深深鞠躬,对其忠勇精神表示钦佩。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追晋阚维雍为陆军中将师长,并为他举行国葬,陵墓

设于桂林七星岩霸王坪,建纪念亭于墓侧,还在他殉国之处建烈士纪念碑,以供后人瞻仰。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陈诚、孙科等人都是为他书写了挽联。

1945年10月10日,阚维雍夫人和大儿子阚培松、小儿子阚培桐等亲属前往桂林收殓将军遗体,大家在一段战壕内找到了棺木,打开一看,将军容颜还依稀可辨。

柳州也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还把公园路和景行路改名维雍路,以纪念阚将军。1946年3月29日,国民政府在桂林举行广西各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颁发陆军中将师长阚维雍优恤状。新中国成立后,柳州市军管会按照政务院文件规定,承认阚维雍为抗日阵亡将士,追认为烈士,给其亲属颁发了“烈士家属”光荣匾。

阚维雍有四个子女,除了在台湾的二子外,其余的子女都已先后过世。在柳州市广播电视大学任教多年的小儿子阚培桐,晚年完成了一个“子承父业”的壮举:年过花甲的他耗时三年多收集整理,将200余名曲作家、300余名词作者在抗战时期所创作的共3600多首抗日战争歌曲结集成册。

2005年,《救亡之声——中国抗日战争歌曲汇编》正式出版,共分八卷,收录抗战歌曲3621首。2010年3月,阚培桐因病去世,享年71岁。阚培桐生前将自己复印的这批抗战歌曲书稿及自己的手稿全部捐赠柳州图书馆收藏,使柳州图书馆成为全国藏有抗战歌曲最全的图书馆之一。如今,阚家人仍保存着与阚维雍、阚培桐有关的一大批照片和文字资料,尽管基本都是复印件(原件都已捐赠出去),但都被他们视为最宝贵的遗产。

(作者:刘 山)

廖磊：魂系抗战国兴亡

2011年2月28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为编写《桂军抗战录》，走访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军长廖磊在柳州时的公寓廖磊公馆和其夫人的后人。通过这次走访，我们了解到抗战时期廖磊和他夫人的一些抗战往事。

1890年2月20日，廖磊出生在广西陆川清湖乡一个贫穷的农家，仅读过三年私塾。辍学后考入桂林陆军小学，1911年毕业后升入湖北陆军第三中学，1914年毕业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二期就读，1916年在保定军校毕业后，到湖南唐生智部服役，时年27岁。1927年夏天，宁汉分裂，武汉方面的唐生智被南京方面的李宗仁、白崇禧打败而辞职，唐部向李、白投降，廖也随之归顺李、白，升任第36军军长，1928年4月到广西整编部队后参加北伐。1929年蒋桂战争时，因救白崇禧有功受到李、白重用，被晋升为名噪一时的“钢七军”军长，后在1931年10月25日移防柳州。

柳州人认识廖磊，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从1931年10月到1937年11月参加淞沪抗战，再到1938年10月率部北上建立大别山根据地，“钢七军”在柳州的七年时间里，廖磊除了建好中山东路上至今被柳州市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廖磊公馆、柳侯公园里的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及鱼峰山上的钢军亭外，还在柳州开展大规模的抗战宣传。

第七军入驻柳州时，正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地处边远南疆的柳州，对于日军入侵，好像与自己关联不大，根本不担心日军会打到广西山区。故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还只在学校师生中进行，市民对日本军侵华产生的危机认识不足，大多置身度外消极观望。廖磊感到，有必要采取相关的行动，来提高柳州市民的抗日救亡意识。

1931年10月下旬，廖磊率部队进入柳州，立即召开有各机关、团体、学校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要求所有单位“立即行动起来，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抗日宣传，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时刻听从国家召唤，奔赴疆场杀敌”。会

后第三天他亲自给柳州各单位职员及驻军军官作题为“倭奴亡我之心不死”的报告,号召“不忍坐视亡国,不甘沦为亡国奴”的国人,“誓同心一致,与日寇血战到底”。为了提高抗日宣传质量,他还多次到县通俗教育演讲所,指导演讲员拟定上街下乡演讲的题目和内容。其夫人胡慧,也和大家一起走上街头,开展抗日宣传,并成立了柳江妇女抗日后援会,为全民抗日而努力。同时,第七军还招募学生进行培训,组成了广西学生军,为桂系部队提供了抗战后援。

廖磊在柳驻军期间,在柳州建造飞机场,创办航空学校,并任航校校长,从日本购进教练机及战斗机,请来教官训练空军飞行员,建立桂军系统之空军。抗日战争爆发后,广西空军曾在武汉空战中建立战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廖磊升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率第七、第四十八军北上抗日。

廖磊把湖南籍妻子及家人安顿在柳州,为的是更能安心抗日,而他还带走了妻弟胡祥,留下了妻子与妻弟媳在柳州的廖磊公馆度过了去安徽前的抗战时期。

8月底,廖磊率部到达山东,警戒海州、日照诸地,10月中旬即奉命率部参加淞沪会战,于陈家行、蕴藻滨、大场一线与日军精锐浴血苦战一月之久,廖磊亲临前线,激励三军,裹伤继奋,确保阵地。是时战况虽甚恶劣,但仍抽调一团之众,增援黄港、湖里宅告急之友军。11月12日,奉命后撤之时,又自请所部殿后,掩护友军退却。

淞沪会战,日军投入兵力约30万人,中国参战部队约70万人。中国军队奋勇战斗近三个月,毙伤日军5万余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

然而,国民政府却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一时间,柳州的抗日救亡运动由高潮跌入了低谷。面对如此局面,廖磊在一次军政联席会上,号召大家“牢记国难情势,勿悲观,勿气馁,勿上当,用卧薪尝胆精神雪国耻,将抗日救亡这把火再烧旺起来”。还发动部下开展“联络军民感情,扩大抗日宣传”的大型游艺晚会,演出话剧《民族之生路》、桂剧《侵略者的末路》以及粤剧清唱,重新鼓起了民众的斗志。在驻军的带动下,柳州的抗日救亡活动又蓬勃开展起来。

1938年10月22日,廖磊抵达立煌(今金寨县),以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兼任鄂豫皖边区游击总指挥、安徽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等职,建立敌后

抗日根据地。

廖磊从就职到去世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这却是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转折到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时期;从大别山说,则是从无到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廖磊继续动员广大民众投入抗日战争。李宗仁当时的思路是,只有把广大群众动员来,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抗日战争才有坚实的基础;从新桂系来说,才能保住安徽这块来之不易的地盘。

廖磊接任后,按照李宗仁的意图,至1939年5月,省动委会工作团、省动委会委托工作团、县属工作团共有107个,团员2400余人,经动委会宣传、动员,组织到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抗敌协会工作的有40万人,广泛开展了包括参军、支前、捐献、宣传等工作。有些接敌地区一个县在24小时之内就能集中数千副担架,投入运输战斗,群众动员的规模和作用都大大超过初建时期。在此期间,廖磊还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有着良好的携手合作。

廖磊任用进步人士周新民、朱蕴山等人,任用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为财政厅厅长,以整顿财政,废除苛杂,改进交通,提倡勤俭节约,恢复生产建设。廖磊还派人深入敌伪占领区,惩办贪污,肃清土劣。期间查实桐城县有一大绅士暗中通敌,立即下令拿办,就地枪决。又查得罗田县书记长以物资与敌伪交换,事发后畏罪潜逃,即下令通缉。因而民心振奋,不到一年时间,安徽有抗战模范省之誉。

廖磊在驻军柳州期间,受命出兵东兰,对红军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围剿”,曾与中共为敌。但后来他在安徽主政期间却与中共合作抗日,共赴国难,1938年春,新四军四支队组建以后,所需经费,均由廖磊在省政府拨给,并同意新四军在省府驻地设立办事处,以便加强与新四军的联系,办事处主任由新四军参谋何伟兼任。新四军领导叶挺、张云逸、戴季英等同志,曾多次赴立煌与廖磊会晤,受到廖磊的热情接待。当时廖磊一手创办的《大别山日报》曾发表《发扬精诚团结 欢迎叶挺将军》的社论,还邀请叶挺、张云逸同志,对于校学员发表演讲。

廖磊在主皖期间,任用进步人士及中共党员,如省府秘书陈超琼,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长狄超白,组织部竺部长等,都是中共党员。

廖磊与共产党新四军合作,致使蒋介石对廖磊有所烦言,李宗仁、崇禧白也有埋怨。但廖磊始终以统一救国大业为重与新四军保持合作。

廖磊主皖以后,公务繁忙,积劳成疾。1939年10月12日,廖磊正与民政厅

长陈良佐通电话时,旧病复发,昏倒在地。后经急救,但病情仍很严重,终于23日下午在住所绕室狂奔,面红耳赤,忽大呼“敌来了,杀呀!杀呀!”数声,即倒地口吐鲜血,与世长辞,终年仅50岁。

廖磊病故后,中国共产党及新四军特派何伟为代表,参加了他的葬礼,新四军领导叶挺、项英、张云逸和四支队政委戴季英,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孙仲德等联名致电吊唁,1939年11月14日,安徽省政府和二十一兵团军总部在立煌为他举行葬礼。

廖磊后事办完后,夫人胡慧于1940年元月动身回广西。经过八天的行程,胡慧终于回到了柳州的廖磊公馆家中。一进公馆,看到的是廖磊的大幅遗像,胡慧大哭一场,病情更加重了。此后数年,胡慧一直卧床,话说不出,柳州的医生都说没有治了。最后经路过柳州的广东部队退休医生司徒治疗,终于病情稳定,但胡慧的心脏病却也因此相伴终身。

(作者:刘丽虹)

参考资料:

廖磊:《燕农日记》

陈烈：英年早逝的抗日虎将

曾经有人在网上撰文说：“当年蒋介石的爱将陈烈将军回乡省亲，蒋介石也来探望。”文中还说蒋介石给凤山题了字。蒋介石只在召开桂南战役检讨会时来过柳州羊角山，从未到过柳城凤山，“探望”、“题字”也属于虚乌有。但回望柳城籍抗日将领陈烈短暂的一生，却也是充满了“将军打得乡音好，百战归来唱俚歌”的豪情。

陈烈(1902—1940)，字石经，柳城人。年幼时其父在县城凤山镇西门开了间陈桂记杂货店。后因父母早逝，只读了几年私塾的陈烈便辍学回家，以兄长身份挑起养活弟妹的重担，年纪轻轻就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弟妹稍长，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陈烈把微薄的家业交给弟妹经营，自己到当时驻扎在柳州的桂军将领刘震寰部当兵吃军粮去了。

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第二年刘震寰部在孙中山的召唤下入粤平叛，陈烈亦随军参战。叛军被逐出广州后，陈烈得保送到讲武学堂学习。1924年5月，转入刚成立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同年底从军校毕业后，曾担任连党代表和连长、营长等职，两次参加孙中山发动的东征讨陈(炯明)以及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变的战斗，战中有功升任国民革命军第58团代理团长。1926年随东路军北伐，以一团之众攻入南京城，陈烈得擢升上校团长。

陈烈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接受共产党的宣传教育，表现活跃。1927年宁汉分裂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发动清党，陈烈被列入通缉名单中。陈觉察后偕同本团三名营长悄然离队，返回广州参加12月11日由叶剑英、张太雷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陈避居香港，1929年潜回上海，1930年夏秋间加入邓演达组织的黄埔军校同学会，开展反蒋活动。(邓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队长、教育长。他组织黄埔同学会的目的在于联系黄埔系军人，策动他们反蒋)在这期间陈烈认

识了田汉,并向田汉学习书法和诗词,与田汉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后因蒋介石追捕得紧,陈与夫人马氏(上海人)一度隐居南岳衡山。1931年返回上海时在租界被捕,并引渡到南京关押在监狱里。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举国同声要求抗日,要求释放政治犯,陈烈经黄埔军校同学多人努力奔走游说,获保释出狱,并推荐到陈诚所部,先后担任团长、旅长等职。

1934年底,陈烈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深造,时因战局多变,于1936年10月提前毕业,出任第54军14师少将师长。“七七事变”爆发,陈师奉命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8月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在国军主力退到浙皖赣后,陈又率师转战于青阳港、南北塘口、昆山、洛阳桥、誓节渡、九龙岗等地,曾逼近上海附近的南翔,与日军血战多日。田汉曾到前线采访过陈烈。后来陈部移驻安徽广德,遏阻日军西进,保卫南京侧翼之安全。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陈师因数月转战减员过半,缩编为一个旅,继续对敌作战。1938年4月,陈部恢复14师编制,开赴河南省布防,后转到江西瑞昌驻西马头镇、黄桥一线扼守,与进犯之敌激战40余日,阵地未损一角。日军电台广播称:“中国军队战斗力强者,14师其一也。”在缴获敌人的军用地图上,也标明“14师阵地不可动摇”。1938年6月开始的武汉会战中,陈烈率师退守田家镇要塞,苦战长时。1939年初,陈以抗日军功荣获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勋章,升任54军副军长兼14师师长。

1939年2月,中国共产党派叶剑英等人帮助国民党在湖南衡山开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陈烈奉调到训练班任政治部主任。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陈重返54军以军长身份率军警备战洞庭湖一带。1939年5月21日,日军万余人在广东汕头登陆,企图攻占粤桂两省,广东战事紧急,陈奉命从衡山、衡阳南下援粤。出师前全军将士人人佩戴黄底红字“还我河山”臂章,以示杀敌决心。进军至韶关后立即对敌开展攻势,经激战后翁源县得以克复,随后连克英德、从化、清远、源潭和三水。此役击溃日军土肥原师团,追敌数百里,直逼广州,与敌增援部队对峙西北郊区。敌酋岗村宁次对所部通报时称:“54军是一支不可轻视的顽敌。”

1939年11月中旬,日军从钦州湾西部登陆,攻陷防城、钦县,沿钦邕公路北进,24日敌陷邕宁。日军占据昆仑关后进逼红水河,柳州告急,西南震惊。陈烈接统帅部电令,从广州前线迅速率麾下14师和50师两个师驰防柳州,直抵红水河,扼守迁江咽喉通道,以防不测。随后,两师向南推进,以打援围困和断敌供应

线为主要任务,并先后攻克宾阳、芦圩及上林等地。12月31日,中国军队收复昆仑关。

昆仑关大捷后,田汉率演剧五队赴昆仑关慰问,陈烈陪同田汉登上昆仑关游览,田汉即兴赋《过昆仑关战场》诗一首:

一树桃花惨淡红,雄关阻塞驿亭空。
倭师四处留残垒,汉帜依然卷大风。
仙女山头奇石耸,牡丹岭上战云浓。
莫道南向输形胜,枢相当年立战功。

昆仑关战后,陈烈邀请田汉乘船从柳州出发,回他久别的家乡柳城一游。船到凤山河段,陈兴奋异常,情不自禁地用方言唱起本地山歌。田汉闻歌颇有感触,即兴对景赋诗:

青凤鸟鸢夹大河,碧波千顷走轻舸。
将军打得乡音好,百战归来唱俚歌。

1940年9月22日,日军分三路攻入越南全境,我西南边陲受到直接威胁。陈军奉命移防天保、靖西,拱卫西南国门。不久,日军在中越边境大肆增兵,窥伺我滇南。陈烈率54军驻守滇边,待命杀敌。陈原患有败血病,不幸于10月下旬在富宁拔牙时受到感染,病情危急,龙云(曾任国民党政府陆军副总司令、昆明行营主任、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闻讯立即派飞机送药,可惜药未送到陈已身亡,逝年仅38岁!英年早逝,袍泽为之痛哭,后将灵柩运到湖南,葬于南岳络丝潭边。

1941年3月30日,田汉专程到南岳为陈烈扫墓,写下《谒陈烈将军墓》诗一首刻在石壁上:

粤北曾传虎将名,秋风白马又南征。
岂因烟瘴回锋锐,常为光明作斗争。
清血奈何无药石,埋忠差幸有佳城。
络丝日夜风雷走,犹作翁源杀敌声。

(作者:陈佚生)

越南领袖胡志明在柳州的日子

“日本南进政策已彻底失败,在缅甸战场上已为中国远征军打得溃不成军,日本要撤退其南进的军队,中国通往越南的这条陆上走廊势必拼命打通,所以还有一场恶战,不过这场恶战是最后一次了,中国抗战就要结束了。不管法国殖民者怎样凶恶狡猾,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我们总是要胜利的,越南总是要独立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殖民者滚出越南去的日子不远了。同学们,请你们去迎接胜利吧!”

这段充满激情的话,是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在柳州时候的一次激情演讲。1944年的春天,越南干部训练班在柳举行毕业典礼,胡志明来到学员们上课的地方,也就是今天柳州市工人疗养院大门对面的高亮山下,发表了这次著名的演讲。

如今,越南训练班遗址已经变成了青青果园,但70多年前,胡志明和他的战友来到中国寻求革命理想,与当地人民一起积极抗战的故事,却仍然在这片土地上流传。

说起胡志明的生平,柳州市博物馆的温其洲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潜心研究越南历史,收集有关胡志明的一切资料,参与编写了《越南胡志明在柳州》。

“胡志明来中国,是1942年8月的事。”一段久远历史从温其洲口中娓娓道来。

胡志明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呢?首先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与中国对越态度的变化,其次是由于中国的援越力度进一步加强,他希望能为越南争取到更多有力支持。

“不过,进入中国后,因为他拿的介绍信有些问题,结果走到广西德保时被抓了。”乡警在检查胡志明的证件时,发现他持有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介绍信,其余的证件都是1940年签发的,已经失效。乡警由此认为,胡志明的身份复杂,有间谍嫌疑。于是,1942年8月28日,胡志明被押回广西德保县城。几经辗转后,12月9日被押到了柳州。

当时,胡志明感慨万千,于是写了一首诗:

到柳州

千辛万苦非无限,九日吾人到柳州。
回顾百余天恶梦,醒来面尚带余愁。

胡志明到柳州后,被关押在第四战区政治部军人扣留所的一个山洞里。

大约一个星期后,胡志明被押往桂林。

当时国民党地方当局认为,胡志明是一个越南人,却持有中国有关方面的多种证件,很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嫌疑犯。因而把他送交广西省最高军事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审查。到桂林后,仍未能查明胡志明的身份。

1943年1月,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又将胡志明送回柳州第四战区政治部审查。这时,胡志明怀着无比的忧愤和痛苦的心情,又作了几首诗。其中一首简直就是对自己牢狱生活的白描:

四个月了

一日囚,千秋在外,
古人之话不差讹。
四月非人类生活,
使余憔悴十年多。
因为:
四月吃不饱,
四月睡不好。
四月不换衣,
四月不洗澡。

所以:
落了一只牙,
发白了许多。
黑瘦象饿鬼,
全身是癞痧。
幸而:
持久和忍耐,
不肯退一分。
物质虽痛苦,
不动摇精神。

在胡志明第二次被押到柳州扣押心情最郁闷的时候,当时在柳江东南岸蟠龙山下办公,时任国民党柳州第四战区政治部中尉科员的柳州人彭德(已去世)与他结下了忘年交。

1943年1月下旬的一天早上,彭德去上班时意外地发现,办公室旁边的大树脚下有个老人,旁边还有警卫看守。老人的脸瘦瘦的,留着长须,穿一套深灰色的旧棉军服和一双破胶鞋,坐在自己随身携带的小包袱上面,抬头望天,神情自若。

老人被单独关在一间囚房里,双警卫看守。当时天气正冷,常见他站起来活动手脚驱寒取暖,却从不唉声叹气。过了一段时间,政治部主任侯志明从重庆回来后,老人当天就解除了关押。第二天侯主任将老人带到饭堂与大家一块吃饭,并当众介绍说:“老先生是越南的胡志明,和我们共同抗战,打日本鬼子。”阶下囚就这样成了座上宾。“第二天我们饭堂杀了一只羊加菜,连汤带肉两大盆,平常的红糙米也换成了白米饭。”大伙沾胡志明的光改善了一次伙食后,对这位异国老者友善了许多。彭德发现,胡志明性格乐观,饭量很好,但不怎么爱吃肉类。

因为吃饭时间经常同老人见面,彼此逐渐熟识。那年一个秋日午后,彭德跟同事小吕到饭堂吃饭,正好与胡志明邻桌。胡志明一个人吃得很是无聊,见两个小青年马上招呼:“彭仔、吕仔,飞象过河啊,到我这一块儿吃!”俩小伙于是端着饭碗乐呵呵到胡伯身边去,一来二去,成了忘年交。

胡志明告诉他们,法国侵略越南,并把它作为远东的殖民地,肆意压迫剥削越南民众。越南民众对法国统治者痛恨入骨。他年轻的时候,不堪忍受虐待,跟随长辈在洋船上打工,离开越南漂泊海外,追求真理,到过许多国家。他在国外结识了许多同志,深受思想熏陶,回国带动同胞们团结斗争,要过自由平等的新生活。彭德无法忘记,当胡伯说到日本军国主义者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共同敌人时那种慷慨激昂的神情。

最让彭德佩服的是,老人有很好的语言天赋,广东白话讲得好,普通话也会讲,法语也讲得流畅。“胡伯平时同我俩谈话,说的是流畅的广东话。有一次他对群众演讲,开头他用汉语,后来他为表明自己是越南人,改讲越南话,请翻译员帮助翻译。以后演讲,他全用越南话演说。”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几个月,后来彭德调往战区《阵中日报》工作,很长时间没见到胡志明。

那年初秋的一天,两人在东门沙角附近不期而遇。“彭仔!”胡志明一见彭德就大叫,彭德也高兴得跳了起来,两人情不自禁地拥抱。胡志明乐呵呵地说:“抗日战争胜利了,越南复国了,请您到河内、西贡采访新闻,报道喜讯。”以后彭德再听到关于胡志明的消息的时候,他已经是越南的伟大领袖和最高领导了。

柳江河畔,鱼峰山下,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红楼(今天的鱼峰小学门口),那里就是胡志明在柳开展革命活动期间的主要住所,当年的南洋客栈,如今被命名为“胡志明旧居”。这是一座两层的中国传统风格砖木结构建筑,如今柳州市政府已经按照其历史原貌进行恢复,并在一楼陈列图片展等介绍胡志明生平。二楼已经还原成当年的客房,一间一间暗红的木板房,顶部相通,声气相闻。当年这里楼下为餐饮店,楼上为客房,胡志明被释放后,几经辗转,住到这家客栈南端的套间里,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

温其洲说,监狱生活对胡志明的健康造成了一定影响,他住到南洋客栈后,积极进行登山、跑步、游泳等锻炼,恢复体能。他从越南文史资料中查到,当时曾在柳州四战区政治部训练班学习的越盟成员武长溪回忆说:“他(胡志明)在柳州的时候,每天早晨四点钟就起床,在市区主要街道跑一圈,然后才回来做早操或到菜园里锄地,锄地后就洗澡。天天如此,什么时候不劳动了,就在家看书。可以说,除了睡眠外,他没有虚度过一分钟。”那段时间胡志明在柳州非常活跃。他利用合法地位积极开展抗战宣传,争取中国上层人士对越南革命活动的支持。

那时候,胡志明还经常去给越南干部训练班上课,有几百名越南青年在今天的大桥园艺场那里受训。当时在第四战区政治部任少尉司书的龚启隆(也是柳州人,已去世)有这样的回忆:第四战区长官部、政治部还帮助其培训过人员,叫特别训练班,也叫边政队。胡志明担任越盟领导后常到训练班讲课,而四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也派人去讲课。训练班间或也有人到第四战区来,男女青年都有,有的牙齿黑亮黑亮,据说是吃槟榔多了的结果……

今天,人们来到胡志明旧居的时候,依然能够感受到他的气息。套间现在还是胡志明入住时的模样。在这里,他撰写了大量的革命文章,指导越南的革命斗争,还编辑了自己在狱中写作的100多首狱中诗,将其编成《狱中日记》诗,撰写的《国际反侵略大会越南分会之报告》,曾在柳州召开的“越南革命同盟会代表大会”上宣读。

房间角落里那个木制的脸盆架上,那只浅浅的铜脸盆据说是当年胡志明用过的原物,斑驳陈旧中显露出岁月沧桑的痕迹。靠近卧室的另一个墙角摆放着两张竹沙发,沙发背面的木板墙上挂有一个罗马字母的挂钟。里间是胡志明睡觉的地方,有张老式大木床,一领草席,枕边随意搁着一柄扇子,仿佛斯人刚刚还在这里。门旁暗红色的两开门衣柜,也是当年的旧物,上面的铜钮已不再光亮。

胡志明套间隔壁的房间,是当年普通客房的模样,里面安放着一个沙盘模型。那是前两年彭德老人为纪念胡志明亲手做的,当年胡志明在柳落难期间的所有相关场景,都有迹可寻。当你踩着吱吱作响的木地板来到一楼的时候,一张张图片,一本本书籍,讲述的不再是胡志明革命生涯中的某个片段,而是他完整的一生。他那尊青铜半身塑像,正含笑注视着你。

穿过幽暗岁月,历史仿佛伸手可及。

(作者:巴 方)

柳州融安籍飞行员韦鼎烈、韦鼎峙抗日空战事略

在广西融安县东北部莽莽苍苍的群山中,有一条清清亮亮的浪溪江,浪溪江畔有一个翡翠明珠般的小镇——板榄镇。70多年前从这里走出两位英雄的飞行员——韦鼎烈、韦鼎峙,他们是我八桂健儿的佼佼者,参加过南宁空战、鲁南会战(台儿庄保卫战)、大武汉保卫战、粤汉铁路保卫战、西南保卫战,在我广袤的空域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搏击,并击落击伤日机数架,为捍卫我中国领空做出过杰出贡献。

韦鼎烈,1914年出生于融县永安圩(今融安县板榄镇)。鼎烈聪明好学,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于1932年考入广西大学,后因受航空救国理念的鼓舞,恰逢广西航空管理处筹备成立空军向社会招考飞行学员,鼎烈改读航校。由于广西航校尚未正式成立,首次招收的30名学员附设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内,由航空局聘请中外航空专家负责教习。1934年4月,广西航空学校于柳州成立,毕业后的鼎烈在学校校务处任飞行教官。

韦鼎峙,1916出生于融县板榄圩(今融安县板榄镇),兄弟姐妹七人,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苦读力学,自小学、县高小、县初中而南宁军校童训队。1934年3月,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南宁第一分校甄试转入广西航空学校第二期飞行班。1936年5月毕业,留在校本部教务处充当飞行班第三期飞行助教兼学生队队副之职。

韦鼎烈家在马步,韦鼎峙家在泗意,两家相距七八里,本是同宗兄弟,而今能在同一所航空学校学习供职,自是互相提携帮助。他们心里都渴望能早日飞上蓝天与日军一决雌雄。不久两人得遂心愿,鼎烈任飞机教导队第二队分队长,鼎峙分到飞机教导队第一队,任少尉飞行员。

“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后,广西空军归中央政府统一指挥,广西航空学校并入中央笕桥航校。韦鼎峙所在的飞行教导第一队改编为中国空军第三大队第七、八中队奉命北上,先到兰州接收新式飞机,然后飞到襄樊集训。而韦鼎烈所在的飞行教导第二队改编为空军32、34中队,他留在32中队并由柳州迁往南宁。

空军 32 中队中队长为张柏寿,副队长韦一青,分队长马毓鑫、韦鼎烈,飞行员杨永章、吕明、庞健、蒋盛祜、唐信光、李之干、莫梗,机械长赵廷桂。整个中队有日本造、英国造和广西飞机修理厂自行设计制造单座驱逐机共十余架。这些飞机大都已残旧,性能落后,又缺乏器材零件供修理补充,只有 5 驾飞机勉强能够使用。

为截断我西南国际补给线,日本海军航空队对南宁地区实施轰炸。1938 年 1 月 8 日上午 9 时,敌机两批各 7 架自钦州湾起飞进犯我南宁领空。32 中队全体人员立即各就各位,准备战斗。副队长韦一青率领马毓鑫、韦鼎烈、吕明、蒋盛祜各自驾驶一架“九一”型驱逐机紧急迎敌。各机接敌占位,利用高度优势突然俯冲攻击。韦鼎烈分队长首战告捷击落敌机一架,韦一青、杨永章联合击伤一架(后坠毁)。就在此时,第二批 7 架敌机赶到,并从高位加入战斗,我方机群顿时陷入被动,5 架战机分别被 2 架以上的敌机咬着攻击。蒋盛祜座机不幸中弹着火,跳伞降落时又被敌机野蛮扫射,光荣殉国。韦鼎烈被 2 架敌机缠斗,危急时刻他仍然保持沉着冷静,驾机向青秀山我方陆军阵地低飞。紧紧追来的敌机被我地面炮火攻击,掉头离去。下午 2 时,敌机再度来袭,韦一青率领韦鼎烈、杨永章驾驶三架飞机再次升空迎击,在扰乱敌机队形之后,飞往武鸣降落。

当第七、八中队从兰州接回 12 架苏式新飞机返回襄樊机场时,鼎峙和队友们纷纷接到由南宁发来的捷报,无不为鼎烈及同伴们感到高兴!没想到如此残劣装备能打退日军的空中进攻,也给大家增长了信心。

1938 年 3 月,鼎峙随第七中队进驻孝感护卫武汉领空。3 月 18 日,七中队与驻信阳的八中队在归德机场汇合联手前往鲁南前线执行轰炸任务,返回途中在韩庄上空遇敌两架轰炸机,大家合围将其击落。队友欧阳森独自追踪 1 架侦察机并将其击落。25 日,七、八中队 14 架 E-15 式驱逐机再次从归德机场前往台儿庄、枣庄、峄县、滕县执行轰炸和配合地面陆军作战的任务,返航时遇 30 多架敌机,双方在空中展开激烈厮杀。鼎峙与大队长吴汝鏊、分队长莫休同在一组。缠斗中,鼎峙拉起机头来了个上升急转弯,发现一架“九五”型驱逐机正追蹊一架友机,他果断开火,那架日机应声中弹坠毁。随即,鼎峙被两架日机夹击,无法脱身的鼎峙欲驾机撞向敌机,而敌机有所防备,一直与他保持一定距离。他在回避上方飞机攻击时,却不幸被下方敌机击中,飞机起火,身负重伤的鼎峙跳伞着陆,

获得河南省马牧集群众的救护,将他抬送至归德圣保罗医院。同样击落一架日机而负伤的第八中队长陆光球,迫降时受伤的大队长吴汝鏊和其他几位伤员已先期到达这家医院就医。是役,我方共击落日机7架(黄莺击落2架、陆光球、曾达池、黄名翔、周善、韦鼎峙各击落一架),7名日方飞行员全部死在机舱里。此次来犯之敌为日本陆军航空兵的王牌部队加藤驱逐联队。享有“加藤之宝”之称的川原幸助,在此次空战中被击落。战斗中,我方也损失7架飞机,李膺勳、莫休、何信3名飞行员阵亡。

4月10日,我18架飞机前往枣庄轰炸敌军阵地,归航时再次与加藤驱逐联队的30余架飞机遭遇,我机打掉5架日机,加藤大尉也在这次空战中殒命,加藤驱逐联队,从此威风不再!我方损失飞机3架,阵亡2人。

1938年3月,原留驻南宁的32中队奉令前往湖南衡阳一厂接收修复的英国“格机”,并改由朱嘉勋任队长。在桂林机场做短期训练后,于7月8日调往武汉归并于三大队战斗序列。在武汉保卫战中,韦鼎烈与32中队的队友多次升空作战,在8月3日的空战中,队长朱嘉勋、何觉民各击落日机一架,大队长吴汝鏊与韦鼎烈、杨永章在追逐一批驱逐机的过程中,在黄冈附近击伤一架日机。

日军为阻止我军用物资运送,屡派飞机轰炸粤汉铁路。32中队于8月15日奉命移防衡阳,执行护卫粤汉铁路的任务。

8月29日,3大队大队长吴汝鏊带领32中队中队长朱嘉勋,分队长韦鼎烈、杨永章、马毓鑫,队员韦善谋、唐信光、吕明、梁康荣各驾“格机”一架飞抵南雄机场。30日晨,敌人即派20多架驱逐机分两批次前来挑衅,32中队9健儿升空迎敌,虽然敌众我寡,队员们充分发挥“格机”灵活的性能与敌机展开殊死搏斗,大家以大队长为中心形成一个大战斗圈,苦战两个多小时,共击落敌机7架。韦鼎烈在击落一架敌机后,座机被击中起火,被迫跳伞,降落在一片松树林里时脚踝受伤,被乡民发现,用树林里的竹木做了一副临时担架,将他送回南雄机场。

此役,我32中队损失4架飞机,大队长吴汝鏊,队员马毓鑫为国捐躯。

(作者:吴爱玲)

作者注:2005年,韦鼎峙将个人参战经历及有关见闻所著文章集结为《抗日空战》出版,本文写作时参考了该书。2009年,韦鼎峙在美国去世,享年93岁。

城市后方

急剧膨胀和“繁荣”的城市

抗战岁月的大后方柳州,战争背景下注定发生剧变,出现了始料未及的急剧膨胀和“繁荣”。如此巨大的动荡与变化,为柳州之前的历史所未有,不论从文化、经济、民生等方面,都是如此。战争结束之后,随着复员大潮的出现呈现消退之势。但是,这些斑驳复杂的色调,已经融入这个城市的血液之中。

西南水陆交通要道的柳州,随着湘桂、黔桂铁路相继开通,它的地理位置益显重要,成为战时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还是在1938年的9月,一位名叫邓瀚均的过客感觉到了这个城市急速的变化:“到那里的人,一天多似一天,房租陆续涨价,旅馆总是没有空房,饭店的饭无论煮多少,一点也不会剩而且还不够。过路的人常常找不到房间,有些找不到房间的客人还情愿拿钱来租旅店的铺面作暂时住宿的处所。公路局的售票窗口是永远挤满了人。”《柳州日报》上正好有这个月人口迁出迁入的情况公布:“在一个月内,迁入1496人,迁出共851人”,即净增加645人。人口的急剧增加与这位旅客的感觉是吻合的。

随着战事变化,难民像潮水一般地涌进柳州,又退潮似地流出柳州。消消涨涨,城区居住的几万人口最高时几乎增至20万人。过路客人要在柳州住下来,并非易事。林冰先生在《旅行杂志》介绍了柳州旅馆住宿的情况:

来来往往的人实在太多了,大家都在旅馆里老等,以致每天空房甚少,到得稍迟者即有抱向隅之虞。万一到得太迟,旅馆宣告客满之后,还有一条路,就是利用摆过柳江进城去的那些船,船有摆渡船及游艇之分,摆渡船较小,怕不会有人去利用它,也还用不到。游艇比较大些,在船上过一夜至多不过法币三元,可以供给被褥,住二三人,招待也很周到,是另有一番风味。过路客大可以去一试新鲜。

物价上涨的速度也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徐悲鸿夫人蒋碧薇的父亲蒋梅笙也是在1938年10月经过柳州,下榻于民生旅舍。这里,房价之贵让他吃惊不小:“我和华君住的一间房,要国币二元一天,还只有一床一木榻,一切设备的简陋,都不成现代化,而价格则已等于京沪了。”饭菜的滋味也让他不甚满意:“晚饭我们打算吃得略丰一点,以补几天的枯淡。便渡江到一家高大菜馆新柳江者,去吃了一顿饭。花了国币两元多,但总不及京沪的滋味好。”滋味的好否难免有家乡的情愫在其中使然,只有公园里的景致,才让他感觉到怡然自得:“与华君及他朋友张君渡江,至柳侯公园,大概就是罗池庙古迹。内中花木茂盛,池亭位置,都楚楚可观,比较桂林公园,优胜多多!我们在亭上品茗清谈,亭前芙蓉盛开,亭左芭蕉,结实甚蕃;时有美丽蝴蝶,翩翩飞过,不觉心静意怡,忘了风尘劳顿!”

战争却让远离战场的柳州城显得极为拥挤。随着大量难民涌入,吃与住的供应能力极为紧张。房价飙升,难民叫苦不迭。一位难民因此在报上(《柳州日报》1938年12月1日)呼吁:

途者避止本市,或路经桂省之难民,日见挤拥,孤苦无依,啼饥号寒,吾老吾幼,何以堪此,何以堪此!而柳州位居湖广滇黔公路之交点,为向内地逃难所必经。因之各旅店客栈,均以居奇而垄断。一般奸商乘机加价,改收大洋,比之已在价目,几至特加两三倍,而房间之设置则较前为简陋,侍者肆意傲慢难民,嗟嗟。际此国难当前,而竟有人乘机发国难财,对难胞漠不关心,深愿贤明之当局有以取缔之。则避难同胞受惠何止一身已乎。

城市的变化,无不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在林立的饭店旅馆中,有1938年夏由几位流亡学生开办的七七饭店,在河南路上段(今驾鹤西路)开业。一位记者写道:“初游柳州的印象,深感柳州已经都市化。柳州市上,有‘北平饭馆’、‘天津饭馆’、‘天津流浪饭馆’、‘一二九平津饭馆’等等,都是抗战中产生的。”虽然如“天津流浪饭馆”这样的,“是一群北方人开设的,没有酒菜,只备几样面食,显然只是几个人借以对付流浪生活而已。”其中,“巴黎酒店”这样的就明显流露出西化的色调;还有江边“泉胜酒吧”,中式小船,洋文招幌,成了柳江边一道别致的风景,这些都是时代化的迹象。城内商铺林立,旅馆、饮食等各行业兴盛,市面呈现出畸

形的繁荣。形形色色的广告,表露出这个城市活力的同时,也反映了竞争的激烈。

这时期,沦为战场的地区撤退而来的工厂相继开办,有中华铁工厂、交通部柳江机器厂、捷和钢铁厂柳州分厂等。柳州因此很快就成为战时电力、机械工业区之一。民营工厂在这一时期发展较快,到1943年有52家,主要为机器、印刷、卷烟、建筑、纺织等行业。1943年1月中美油漆厂在柳建立,推出的产品“三轮”牌磁漆在短期即广销全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43年10月29日,中国工程师学会百名会员来柳考察,对广西省建设厅拟在柳州建立西南重工业中心计划的可行性进行评估。

抗战时期,柳州成为西南大后方进出口物资的中转地。1943年2月,因为桂粤通海线路完全阻塞,各地商人争相来柳抢购进口货,这时汇入银行的款项比汇出多一倍有余。最能反映那个时代商品交易特色的经纪行在柳州取得了极为兴盛的发展。金融行业吐纳巨量资金,与经纪业相互作用,大大推动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仅是在1939年,中国银行柳州支行、中央银行柳州支行、交通银行柳州支行、广东省银行柳州办事处先后在庆云路、培新路及柳江路开业。而到了1944年,还有美丰银行、聚兴诚银行、中国工矿银行柳州分行、中国农工银行柳州办事处、建业银行、兴文银行等陆续开业。发展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战争让中国的经济严重恶化,这种情形当然也迅速地对柳州这个经济敏感的城市发生影响,使得柳州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动荡与创击,难免让它染上了恐慌的色彩。1939年4月,日货流入柳州开始增加,到了6月,平均每天达2000担之多。12月,柳州因此而成立了查禁敌货委员会。1942年8月,敌伪指使汉奸扰乱国统区金融市场,大量假钞从东泉、中渡等地流入柳州。1944年2月间,柳州农村的米谷进城数量减少,一时米价发生剧烈波动。米行商囤积居奇,待价而沽。柳江县府下令禁止酒商用米熬酒,同时派出纠察队检查粮商积米,规定不得储备3个月以上的粮食。2月29日的《新华日报》即以《柳州米价发生激烈波动》加以报道。3月,市面又出现谣言,传说银行限制提出存款,一时间各银行发生挤兑现象。到8月,桂柳大动荡之时,柳州市场上游资活跃,有权有势者乘机收购无法疏散的货物,当作行李免费免税运到云贵川等省大牟其利。

随着大量各色人群的注入,城市的都市化自然影响到了社会风习。也是这位叫邓瀚均的旅客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人民生活原是很朴实的,但现在都把各

都市的奢侈气都带进去,人们耳濡目染,已渐渐变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还只是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



江边的泉胜酒吧。中式小船,洋文招幌,成了柳江边一道别致的风景。(资料图片)

战争还让外地一大批文化、教育、军事等公务机构移驻或过往柳州,外乡人群,还有外国人士,也就相应带来了各地的特色。当时,在柳州只待了一周的格兰姆·贝克先生就在一次躲空袭时从小孩子的称呼用语中观察到这样的情况:

过了一会儿,山下一些玩游戏的孩子们在我背后模拟着空袭,挥手叫着“蹦蹦”,彼此打耳光。当然,他们一看见外国人,就立即停下来,用他们所想象的“外国话”,“叽里咕噜”地和我逗。“叽里咕噜”是中国人对外国话的通称。在那些熟知英语的城市里,孩子们通常和外国人逗,都喊些“唉,比,塞,意思、意思”之类的声音,那大概是由“A,B,C, Yes, Yes”演化而来的。可这些柳州孩子却不断发出“郝勒儿,郝勒儿”这样的卷舌音。后来我得知那是由于苏联顾问与地方的国民党军队发生联系缘故,那些孩子可能是在试图说俄语“赫勒儿”即“好”的意思。

这就是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它无声无息地发挥着作用。

在这膨胀而又拥挤的城市里,各种文化和经济的信息就像酒发酵一样迅速传递着,为柳州的城市文化注入了丰富而驳杂的内容。既有声有色,又形形色色。

(作者:刘汉忠)

抗战岁月柳州的战时运输

战争是空间的运动,往往取决于人员及物资供应是否迅捷。不论前方,或者后方,都在运输中体现一个城市的活力。抗战时期,作为西南大通途,军队的运动,难民的流移,机关和学校的迁址,物资的调拨,都在柳州的交通网络中超负荷地运转。

抗战时期,铁路运输对于战争的意义,可想而知。日本之所以长期使用 100 万左右的兵力就可以有效压制超过自己近五倍的中国军队,除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之外,主要是他们在战争初期就控制了铁路、公路、水路等交通线,因此转运兵力快捷方便,也就节省了大量的兵力投入。

湘桂铁路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始建于 1937 年 9 月,1939 年 12 月 16 日修通至柳州,1941 年 9 月 8 日通车至来宾。黔桂铁路桂段开工于 1939 年 9 月,1941 年 2 月 1 日通车至金城江,1944 年 6 月通车至贵州省清泰坡。

1938 年 8 月,湘桂铁路的桂柳段兴工。9 月底,衡阳至桂林一段通车后,桂林至柳州一段工程更为紧急。武汉、广州失陷之后,广西情势危急。1939 年 4 月间桂柳段北端由桂林开始向南铺轨。11 月,日军攻入南宁,西南局势大变,柳州地位更为重要,于是日夜赶工所剩下的 30 公里的铺轨工作。此时杜聿明机械化部队的大炮及弹药已装车沿新铺之路源源而来。12 月 17 日桂柳全段接轨,军列陆续南开。几天之后,第五军昆仑关报捷。

桂柳段铁路在战事极为紧急的情况下抢筑告成,对于桂南战役的影响,成为军事历史上极有意义的一个事例。当年任桂南段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的凌鸿勋(1894—1981)先生回忆说:

在敌人日日派机轰炸柳州和南宁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柳南一段的工程不易进行,于是集中全力于桂柳段,由桂林与柳州双方对向铺轨。由于敌机的逐

日侦察和轰炸,对于这条积极赶修的国际路线自然不肯放过,于是敌人在海南岛登陆之后,继之于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北海企沙登陆,越八日,敌军遂进据南宁。自后,西南局势大变,柳州地位更为重要,万一不守,不但全桂动摇,且黔省亦将受威胁。我于是坐镇柳州,日夜督促所剩下三十公里的铺轨工作。而中央已派了大军由桂林南下,杜聿明将军所部机械化部队的大炮及弹药已装车沿新铺之路源源而来。十二月十七日桂柳全段接轨,自是军车十六列陆续南开。未数日,我第五军在昆仑关大捷,阻敌不得再前进。



逢山开路——修筑湘桂铁路旧影(资料图片)

湘桂、黔桂铁路的修筑,是抗战期间广西最重要的抗战动员之一,广西人民为建设铁路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和牺牲。铁路不少路段依山傍水,地形崎岖,工程极为艰巨,又加之民工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故而民工死亡相继,减员甚多。全省征调民工,以铁路沿线附近各县壮丁多少为比例,按路程远近征调50%—80%。全桂和桂柳两段,征调26个县民工25万人,征购各种枕木40余万根,采集道砟20万立方。柳南段征调29个县民工15万人,南镇段征调30个县民工20万人。湘桂、黔桂铁路,全省先后共征调多个县民工100多万人参加建筑。每个民工需工作45天,完成路基40—50立方土方,而民工劳动所得每立方土方仅折米1公斤。在艰苦的劳动中,成千上万的人受伤或患病,甚至死亡。据不完全统计,柳

南、南镇两段员工(民工占大多数)伤病 44447 人,死亡 1482 人;黔桂路桂段员工伤病 38339 人,死亡 1454 人。

湘桂、黔桂铁路的建成,对西南大后方的军需民用交通和经济发展,支持全国抗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劳工们为抗战付出了血汗以至生命,“大家一齐流血汗,为了抗战哪管日晒筋骨酸。一齐用力,哪怕山高和岭长”。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动力,才得以完成路段的修筑。

战争是空间的运动,往往取决于人员及物资供应是否迅捷。不论前方,或者后方,都在运输中体现一个城市的活力。

新桂系登台之后,柳州成了广西陆路交通的枢纽。因此,人们对这个城市的印象,就是交通道路与车辆比其他城市的优胜。一位游客说:“就因为公路的发达,柳州的汽车业也表现出了广西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现象。长途汽车除了广西公路管理局的‘邮车’之外,有中华、广华、福韶、岭南、常山等许多公司的‘商车’。和广西公路管理局柳南办事处比邻的商车合作社的规模,是颇为可观的。”当他们清晨从旅馆到了柳州车站时,看到“大型长途汽车特别的多”,“这可以说是对每一个旅行者,用事实来证明柳州交通的发达,也就是说明了广西公路的发达”。据记载,1940 年前后,柳江南岸检修或停留的汽车经常有二三百辆之多。而 1943 年 7 月广西省车运特种股份有限公司在柳成立开办柳州至南宁线路的运输业务,拥有公务车达 134 辆。因此,称柳州为西南大后方的交通中心,是当之无愧的。

战争的爆发,使得公路运输量猛然增加。《旅行杂志》14 卷第 5 号刊发了一位名叫金叶的旅客的旅行记《柳桂道上》:“旅行人最感觉痛苦的,是找不到交通工具。尤其是在目前抗战时期军事第一的当儿,更没有办法找交通工具。要想坐到车子,简直是难乎其难,(车子)极稀有的了。”

运力和运量永远是矛盾的统一,这在战争时期往往极度突出。巴金先生在柳州也曾因为不容易弄到车票感到痛苦,他将此事写进文章中。

为了战争的需要,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1938 年 12 月 20 日的《柳州日报》登出了柳州民团指挥部的通告:“昨奉总司令部电知,由本月十六日起,经决定以路车五十辆、商车三十辆维持桂柳间交通。该项车辆由总部另行编号,发给临时车照,该项车辆无论任何机关不得征用。”

1939年秋冬桂南战事吃紧之时,柳州就出现过一次集中抢运,时称“柳州抢运”。

抗战开始之后,柳州公路运输转入战时体制,全力以赴投入对军队、战时军用物资和进出口物资的运输。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相继沦陷之后,政府公务人员、战区难民、机关、学校及工商企业纷纷向西南地区转移疏散,柳州运输任务十分紧张,客货运输甚为拥挤。柳州组织商车成立汽车商业同业公会,投入战时运输。据统计,本地和外地私营汽车最高达300多辆。公路军运任务繁重,又征调了商车投入协运。虽然运价低,但是柳州的商车仍能顾全大局,踊跃应征参加抢运。

1939年11月,日军进犯广西,截断柳州通向越南的国际通道,积存在柳州的大批进口物资和设于柳州的第40、41兵工厂的设备器材,急待向黔、川两省疏运,此时柳州车辆不足以应付抢运任务,西南运输处从外地急调汽车1000辆集中柳州,日夜不停地抢运,调度中心设在柳州运输站。调来的汽车专程载运参加桂南战役的兵员及军械弹药,回程装载兵工厂拆迁的机械设备、器材和员工。当时驾驶人员多为归国参加抗战的华侨,他们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地投入运输。“柳州抢运”历时7个月,运送机关公务人员及眷属6000余人,疏散难民3.6万余人。1940年,交通部运输统制局在柳州设立公商车辆管理站,为抢运军需物品及出入口物资,曾规定凡在管制区行驶的商车,每行驶4次,须先承运军需品2次,第3次始准运商货,第4次准运自用之汽油。柳州至六寨一段,行驶在贵州至柳州的商车顿感不足,民用客货运输受到影响。这是为了战争运输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1939年秋冬的“柳州抢运”只不过是当时战时运输的一次紧急动员。其实,在整个抗战时期,柳州的公路运输,一直是在超负荷地运转。

(作者:刘汉忠)

抗战时期的柳州后方工业

抗战时期,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更受战争局势所迫,国民政府发起了工厂西迁运动,动员东部工厂迁至未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西部省份。

柳州作为当时广西工业基础较好的后方城市,加上湘桂、湘黔铁路通车后成为西南交通枢纽,承接了一些由东部转移而来的工业企业,加上后方生产生活的需要,新建了一批工业企业,形成了工业兴盛一时的局面。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通过工厂内迁的提案,部分民营工厂为了避免日军侵占,也着手迁到后方。从1938年到1942年底全国内迁厂矿共计639家,器材12万多吨,技工1.2万余人,以机器、纺织为主,这些内迁工厂是促进后方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沿海城市的工商业纷纷内迁,一批官办及民营机器工业也先后落户柳州。1938年8月,上海中华铁工厂与广西省政府合股组建广西中华铁工厂,在柳州鸡喇设厂。之后,经济部中国植物油料厂柳州分厂、易和煤气制造厂、经纬纺织机制造厂、养生代乳粉公司、华南雪茄烟厂、广西骨粉厂、广西企业公司制革厂、染织厂等10余家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厂企业,也迁柳重建复工。此外,还有近百家从事冶金、印刷、制糖、面粉、日用化工诸多行业的小厂相继开工。

1937年,原先开办在广州的一家生产防毒面具的私营小工厂由政府接管,并设立研发机构。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厂里的设备经过辗转运输,于1939年初迁入柳州,厂址设在窑埠(原区卫校位置),有员工六七百人,专业研制、生产防毒面具,代号第四十二兵工厂。该厂工场设在蟠龙山的山洞里,因而不为外人所知。1939年10月南宁陷落。柳州情势也变得危急,四十二兵工厂迁往贵州。

抗日战争爆发后,浙赣、粤汉两条铁路相继沦入敌手,1940年,铁道机械工程专家茅以新与老专家程孝刚受命一起着手筹建铁路工厂。工厂的任务是制造火车机车和车辆的零配件,以及各种车床和加工设备。为了选择合适的地址,茅以新在湘桂线的山林、野地来往奔波。因为他要选择一个既靠近公路,便于运输,

又靠近山谷,以防空袭,既要有山洞,又要有水源的地方建厂,最后找到了柳州郊区羊角山附近的一片荒地。

当时柳州不通火车,除场地外一无所有。茅以新和他的助手白手起家,组织铁路撤退下来的技工,利用一部分旧机器,办起一个不要政府补贴、有着几百工人的柳江机器厂,茅任厂长。茅以新为了使工厂能及早投入生产,先把一些机器设备安装在山洞里,一边建厂房,一边开工生产,职工们的住房都因陋就简,住在临时搭起的木棚里。虽然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但广大员工在抗日爱国热情的感召下,大家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制造出车用配件、工作母机,以及超长卡车拖车等,工厂办得生机勃勃。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满足了在抗战条件下内地多个工厂对机械产品极其迫切的需求。工厂名声远扬,一些优秀技术人员不远千里投奔而来,他们对茅以新的工作精神都很敬仰。柳江机器厂制造出来的产品不仅为当时我国最新两条铁路——粤汉、湘桂路局争相订购,连正在施工期的黔桂路局乃至广西、江西、四川等地的单位也来订货。

1944年10月,柳州沦陷前夕,茅以新准备把工厂搬到贵州都匀,重新开张生产。然而,黔桂铁路刚刚建成通车,运输能力很差,加上管理不善,疏散任务又重,根本不可能实现他的计划。后来大部分工厂物资堆积在柳州火车站,少量的物资运出柳州,但也没有运到都匀,而是散布在铁路沿线上,茅以新几年辛苦的结晶全部被战争毁掉了。

工业企业和人口的剧增也带来了需电量的激增,原有电厂360千瓦机组已供不应求。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与广西省政府商定在柳州合资办新厂。1941年8月双方签订合同,成立了柳州电厂理事会。

厂址择于水南村驾鹤山东麓(今柳州供电局内)。1942年1月16日“资源委员会、广西省政府柳州电厂”成立,宋廉生任厂长,将老厂资产作价33万元进行处理,接管了老厂的设备及人员,继续供电营业,并负责筹建新厂。资源委员会从湖南湘江电厂调拨20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1台至柳州电厂,11月14日破土动工。1944年1月16日设备安装完毕进行调试,3月6日正式供电。

1944年日军入侵广西,将逼近柳州时,电厂奉令将雅儒村临江巷老厂两台发电机组及库存重要器材运往贵州独山,新厂2000千瓦机组仍维持发电。11月7日凌晨1时,紧急停机,抢拆重要机件、仪表,当日员工疏散,厂长等10余人用

汽车将 20 余吨器材迁至重庆,在九龙坎设立柳州电厂驻重庆留守处。11 月 10 日日军占领柳州城,2000 千瓦发电机被日军用利斧砍断定子两端线圈多处,部分辅助设备也遭破坏,配电屏被毁,电厂已不能发电。先行运出的两台机组,也因黔桂铁路受阻,运至金城江后无法前进,后遭焚毁。

1941 年日军入侵广西时,原南宁制革厂迁来柳州窑埠,随即在九头山、柳江河畔建立新厂,属广西省营企业公司。1942 年新厂房建成投产,有准备工程、鞣制工程、整理工程、制鞋制箱及动力等车间,设有柴油机、转鼓、辊压机、刨皮机、打光机,并在河边设水泵船抽河水自用。该厂以牛皮为原料,产品有面革(珠皮)、带革(箱皮)、底革等。

抗战期间,皮浆、软皮油、鞣料等来源短缺,制革厂职工就地取材,用牛尾树皮、薯蓣、五倍子鞣制底革、带革。并配制一些皮浆、软皮油等,制成较优的面革、带革和底革。各种皮革除销往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各地外,一部分由制鞋、制箱车间制成皮鞋、皮箱及一些军用皮革制品,直接在市内销售。

1944 年冬,日军进犯柳州,制革厂被迫从水路疏散迁往雒容运江圩,不幸船行至导江时与日军遭遇,工厂全部财物被劫掠,机器设备被倒入江中,船只被强夺运日军渡河,数十名职工亦被拉去做苦工,生死不明。1945 年秋部分职工转回柳州恢复生产,但设备全无,只靠手工少量生产,柳州临解放时停产。

(作者:刘丽虹)

参考资料:

1. 曾桂林:《近代柳州城市空间的演变》
2. 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柳州市志》第二卷、第七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 年)
3. 《柳州文史资料》,第 5 辑,1987 年
4. 茅青:《我们家的人和事儿》(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年)

抗战时期的柳州农业

抗战时期,由于避战乱疏散,华东、华北、华南的大批农学专家、教授荟萃广西柳州沙塘,在沙塘建立了广西农事试验场、中央农业试验所广西工作站、农林部广西省推广繁殖站和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期间还创办了广西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

这些农林科研机构在抗战期间的沙塘开设了 100 多个研究试验课题,取得了大批重要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农都”、“战时后方唯一仅存的农业实验中心”。这不仅使广西的农业科技呈现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而且对我国近代农业科技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新中国造就了一批科研和教学骨干。

1937 年至 1944 年,是我国的抗日战争时期。为避战乱,百业南迁西移,柳州也“因祸得福”,迁到沙塘的农学家、科研机构,就地开展近八年科研和教学,践行了“科学救国”“实业抗战”,让沙塘成了后方的农科基地,享誉中外,成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农都”。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设有广西农事试验场、中央农业实验所广西工作站(亦称中央农业实验所广西各系联合办公室)、农林部广西省推广繁殖站(以上单位当时简称“场、站、室”)和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等科研、教学机关和一批公共设施。

广西农事试验场实脱胎于 1926 年创办的柳江农林试验场及梧州广西实业研究院,1927 年并为广西实业院。以后数易其名,1935 年从柳州羊角山迁至沙塘广西农村建设试办区原址,并定名为广西农事试验场。1938 年,马保之博士接任陈大宁为广西农事试验场第四任场长,直至 1947 年。

广西农事试验场占地面积 2 万多亩,其中建筑房屋用地 168.13 亩,试验用地 3231.4 亩,各种园圃 812.49 亩,水田及水塘 418.30 亩,其他 812.50 亩;历年营造松杉油桐及其他阔叶树共计 20439 亩,有林木 187 万株;建有实验室、办公室、仓库、礼堂、宿舍、测候室、温室、机房、糖厂、畜舍等各类房屋 58 幢;另附属沙塘垦



位于沙塘的广西农村建设试办区石碑坪垦殖区办事处
(资料图片)

区有办公室、宿舍、畜舍等建筑物4幢,水塘3处,水渠9条;设备方面,有关农业研究所应用之图书、机器、仪器等,均甚完备。重要机器如精米机、犁田机、轧花机、玉米脱粒机、蒸汽消毒机、喷雾机、汽车、小型发电机、电话机、各种新式农具等,均有设置;仪器方面如显微镜,折光镜、比色镜、打字机、计算机、磅秤、天平等,设置极多;有图书杂志14824册,加上中央农业实验所广西工作站的一批外文书刊,使国内外一些重要专业期刊大体不缺,能基本掌握国内外农业科研动态和进展情况。其间,还派人到越南等地购置过图书、设备,使科研条件进一步改善。据1943年统计,全场共有员工1226人,其中职员93人(其中技术人员56人,行政及事务人员25人),工人111人,警兵22人。在技术人员中,有技正10人,技士20人,技佐及助理26人。

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广西工作站1938年1月在沙塘正式成立,亦称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广西各系联合办公室,主任马保之。下设5个系,与广西农事试验场合室办公。1942年6月,农林部广西省推广繁殖站亦在沙塘成立,下设3个股,与广西农事试验场合处办公。人员方面,设站主任兼技正1人,技正2人,技士5人,技佐7人,课员1人,技术专员5人,技术员2人,督导员7人,指导员3人,事务员、会计员2人,雇员2人,技工8人,共45人。站主任马保之。其试验研究均与广西农事试验场密切合作,设备互通有无,并协助省方办理示范推广工作。同时,中央农业实验所广西工作站奉令撤销,所有职员,均调推广繁殖站工作,一切实验研究,仍照原计划继续进行,“中央农业实验所广西各系联合办公室”的名称仍继续沿用。

1937年,时任广西农事试验场场长马保之请求,借广西省府整理高等教育之机,将原设于梧州的广西大学农学院迁到了沙塘,使教学实践更为方便。当年9月,广西大学农学院自梧州迁至柳州沙塘。

抗战期间,先后在广西大学农学院任院长的有王益活、周明群、童润之、汪振儒。1943年,全院学生有225人,教职员82人。上述几个单位,均设立于柳州沙塘,并于1940年共同创办了学术刊物《广西农业》(双月刊)及《沙塘农讯》(半月刊)。《广西农业》共出版6卷36期。《沙塘农讯》在抗战期间出版34期。广西农事试验场还出版了中文、英文研究专刊。

除上述机关外,当时沙塘还设有广西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和推广人员技术训练班。前者创办于1940年4月,马保之兼任校长;后者举办于1940年,至1943年已办了3期,在抗战期间培养了一批初级农业技术人员,成为推广农业科技成果必不可少的力量。

广西农事试验场场长马保之本着“农业无科学,即失其改良之凭借;科学无农业,即减其应用之范围”的思想主持工作,加上有这一大批著名专家集中在沙塘,使得这里的研究试验工作水平,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比过去大为提高。抗战农都取得许多重大农业科研成果,共完成科研项目120多项,其中有列入优良水稻品种的马房粳,早禾3号、4号,优良蔗种桂蔗2号、3号,毛鱼杀虫研究和繁殖,稻谷虫防治示范,玉米螟防治等。

原在中央农业实验所进行的大规模水稻杂交育种试验研究,因抗战爆发而于1938年后移至沙塘,继续进行试验。中央农业实验所原来的小麦抗病育种、乌柏良种选育等项目,也移至沙塘继续研究试验,直至取得重要成果,他们研究的范围,除广西外,还涉及福建、浙江、江西、台湾和西南诸省。全国著名水稻品种比较试验,西南森林资源调查研究,福建、江西、台湾、四川的糖业调查,都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他们的研究论著有数百篇之多,除在《广西农业》、《广西农业通讯》等刊物发表外,也在《中华农学会报》、《农业推广通讯》、《农林部研究专刊》等刊物上刊载。

1943年出版的《科学与广西植物生产》记载广西农事试验场的研究试验项目分为“农艺”、“园艺”、“森林”、“病虫害”、“农业化学”五类。

广西农事试验场从1936年起,至1939年止,经过四年试验,从各地搜集的

3285 个水稻品种中,选育出优良稻种广西早禾 1 至 14 号、广西老禾 1 至 6 号,广西晚禾 1 至 6 号、长安粳、大王柚等 30 个优良品种,从外省引进的水稻品种中,筛选出黑督 4 号、东莞白 18 号等 5 个优良稻种,产量较当地土种每亩增产 50 至 60 市斤。

由中央农业实验所广西工作站主持,从 1938 年起进行水稻育种试验,历时四年,从 5000 余品系中选出中桂马房粳,中桂月湖粳二纯系,较当地优良种增产 11%—14%。

小麦育种始于 1934 年冬,1938 年起在沙塘经过数年区域试验,从 144 个品种中选出纯系桂 3566 号,每亩产量较农家种增产 27.29%,中央农业实验所广西工作站从各杂交系中,选出杂交系 166 号及 199 号,其产量较农家种增产 30% 以上。

玉米育种始于 1936 年,先后从全省各地征集地方品种,逐年举行自交。接着又引进美国杂交玉米 64 种,进行引种试验。

广西农事试验场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起,先后从爪哇、夏威夷、檀香山等地引进 51 个国外甘蔗品种,在省内征集 29 个品种,还引进台湾品种,总共 80 余种。经多年对比观察试验,选出桂蔗 2 号、桂蔗 3 号两种良种,产量及含糖量高,宿根力强,无黑穗病。

抗战期间,沙塘的植保专家对广西农作物病虫害进行了一系列综合和专题调查,查清了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的种类、分布及危害情况,并对一部分主要害虫的生活史做了研究,为科学治虫提供了依据。

(作者:刘丽虹)

参考资料:

1. 赖彦于:《广西一览》(广西印刷厂印行版,1935 年)
2. 柳州市沙塘镇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沙塘镇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

抗战时期柳州的金融商贸情况

柳州是在1944年11月沦陷的,是抗战末期才沦陷的城市之一。沦陷前的柳州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变化,逐渐成为沟通我国西南大后方的交通要道和金融商贸中心。

一、抗战前夕(1935—1936年)柳州的商贸

民国初年柳州的金融商贸经济市场,大抵可以说是双边的集市贸易。一是跟附近的邻县、圩、镇,进行民生不可缺少的米粮、油料、布匹、牲畜、药材等集市交换买卖。柳州附近地区镇乡如运江、柳城、长安、庆远、三岔、雒容、榴江、鹿寨等所产的油、豆、米、麦、糖、五倍子等土产,定期在柳州集中进行的圩市交易买卖;二是跟省内外经济较发达的城市,进行输出原材料、粮食、牲口、农产品等,购买工业产品的进出口贸易。

1936年广西桂系集团发动所谓“六一运动”,出师湖南,要求北上“抗日”。形势一变,人心不安,重货轻钞,外汇汇值又复告涨。在这个时期,柳州进出口贸易的经济活动,已经取代集市经济贸易活动,成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柳州的货物价格指数,是由进出口贸易市场的供销、集散的商情变化来决定的。一些主要行业的大商号如绸布业的友成隆生昌,五金业的广益,百货业的宝康和昌,酱料业的和源华、庞怡泰,平码行的德昌、明德、大隆重、桂德(兼代理美商汽油、火水油)等都在市场上活跃经营。

二、抗战初期(1937—1940年)柳州成为西南货物集散中心

1940年桂南战役展开,敌机不时轰炸,物价频涨,粤、沪、杭、赣、浙等地沦陷区同胞纷纷逃难经过或留住柳州,柳州人口突增。这一系列重大局势的出现和

演变,冲击了当时柳州人民的宁静生活,促使柳州的金融、商贸经济市场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柳州成为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进出口物资的港口,为对敌经济战的前哨基地。广州未沦陷时,柳州对外的货物购销运转,是经梧州到广州或到达香港。广州沦陷,梧州对外交通阻塞后,柳州便取代梧州成为我国西南大后方进出口货物的主要口岸。面对日敌的经济封锁,我国军民从香港设法运出进口物资,绕过日敌的封锁线,从下面三条途径到达柳州,并相应地运出出口物资。

一是从香港、沙鱼涌、淡水绕过惠阳北至曲江(韶关),转铁路车运,经衡阳到柳州。

二是由香港航运到广州湾(现在的湛江,当时是法属租借地,对日本保持中立),然后陆运经广东遂溪寸金桥,转入桂省陆川、博白、玉林、贵县等地至柳州。

三是由香港航运到澳门,用机帆船偷运到广东三埠转沙坪至肇庆、梧州转达柳州。

日敌攻陷香港、新加坡、菲律宾等地,海运也在日敌武力控制下,我后方所需的民用物资和必要的工业器材,也无法海运,须经滇缅路运进。柳州当时已经形成我国西南大后方的唯一交通要道、商贸金融经济活动的中心。为打破日敌的封锁,在以上三条货运通道的基础上,迫于形势,又扩大开辟下列货运通道。

一是从香港偷运至大鹏湾、沙鱼涌,起陆绕过淡水、惠阳沿粤北至曲江转衡阳到柳州。

二是从香港运到澳门(当时葡租借地,中立区),再经敌占领区前山、石岐,至南海九江,偷渡到我方前哨阵地鹤山、沙坪,转肇庆入梧州转柳州。

三是从敌占领区广州、佛山、九江,偷渡到我方前哨阵地鹤山、沙坪,转肇庆入梧州转柳州。

四是由越南芒街运至东兴,向东运至广西灵山、乐民等地,转运到贵县,再到柳州。

五是从香港或澳门用机帆船偷运到阳江三丫港,转罗定、德庆至梧州,再到柳州。

六是1942年2月,日敌军事管制广州湾后,我国商民仍有从澳门偷运进口货物如西药奎宁、阿狄平、大健皇、轮胎、卷烟纸、布匹等到西营外海登陆,绕过敌人

监哨,经遂溪进广西的博白、玉林到柳州。

七是上海租界为敌伪占领后,沪杭一带的进口货物,从浙赣交界运至江西鹰潭,转衡阳至柳州。

通过这些货运渠道,更促使柳州当时的金融商贸经济活跃。

三、形势的变化促使柳州经纪行业等商贸市场活跃

广州沦陷后,柳州成为大量资金、物资涌入大后方的集散投资场所,商贾辐辏,游资集中,经纪行的业务经营范围广泛灵活,可以容纳大量的游资,可以通过行商的方式,贩运货物,可以分币计算盈亏,容易抽调资金,容易走私漏税,可以适应当时的市场波动,买空卖空。因此,当时的经纪行商号大量增加。该行商号原来集中在沙街(现柳江路),这时扩充到正南路(现解放南路)、河南大马路、谷埠街等地。还有,当时以代客报关纳税运载货物的新兴行业——运输行,也纷纷成立,并兼营经纪业务。

四、抗战后期(1941—1944年)柳州的金融行业崛起

柳州当时是我国西南大后方的交通要道,商贸经济集中的市场,和敌占领区的香港、广州以及当时仍由法国管辖的广州湾、越南等地毗连较近,内移的资金、物资,都先运达柳州,根据业务经营需要,分别拨运到贵阳、昆明、重庆等地或在柳州就地投资经营,金融市场随之活跃。从1942年起到1944年11月柳州沦陷前,在柳州开设的官营银行有18家,民营银行13家,共31家。

此外还有一些商号,兼营汇兑拆息的业务。

柳州当时以西南一隅的内地城市,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设立有这么多的官营民营金融机构,向抗战大后方发挥吐纳运转巨大资金的作用。当时的银行有:

(1)中央银行柳州分行。中央银行柳行负有调节地方银行货币流通量的任务。即地方银行头寸紧缩,往往通过中央银行调拨疏通。中央银行柳行设有“公库存款户”,对象是由国家在国库账上拨给款项的军政主管机关,例如当时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对一般工商业往来账户,不着重开设。

(2) 中国银行柳州办事处。开设工商业往来存款户,经营信贷、侨汇、外汇业务。

(3) 交通银行柳州支行。开设工商业往来存款户,经营信贷、汇兑;主要任务是对湘桂黔铁路总局的经费和建设铁路经费的支拨。

(4) 中国农民银行柳州支行。主要业务是农贷,开设工商业往来存款户,经营信贷、汇兑。

(5) 广西省银行柳州分行。为原先建立的地方省银行,有较好的存户基础。1940年冬季后,全省可以通汇,柳州各行业的大户商号,与该行都有往来存放款,信贷业务一向旺盛。此外,该行信托业务出口方面,代复兴公司购运桐油、茶油;进口方面,代该行总行在柳州抛售总行以前在香港买进运到柳州的液体燃料、纸料、食盐等大宗商品。该行还在柳州附近各县地区,如宜山、怀远、三岔、金城江、长安、鹿寨、雒容、运江等地,收购囤积米、油、糖、麦及其他农产品,运转资金,调节物价。

(6) 广东省银行柳州办事处。该行当时因广州等地沦陷,对珠江三角洲一带地区以及汕头、惠阳等东江地区均不能通汇,因此汇兑业务省内只限于粤北曲江、仁化、绍兴等地,西江肇庆、封川等地,省外则桂林、昆明、衡阳、贵阳等地。对往来工商业存户经营信贷,并为该行总行(当时设在曲江)的信托部购运桐油、牛皮等出口货物或转运汽油、轮胎、五金器材等进口货物往重庆、昆明。

(7) 其他民营银行经营的项目。主要都是开设工商业往来存款户,兼营汇兑及短期信贷或利用资金,经营进出口生意。

(8) 永隆金号。该号原设于香港。香港沦陷后,1942年夏,该号由香港内迁至柳州,主要经营金条的现货和期货交易。该号在曲江、衡阳、桂林、重庆、昆明以及越南的海防,印度的加尔各答都有联络行号。由于当时交通困难,内迁的人,携带大量的现钞,既不方便,又恐怕遭受抢劫,所以携带黄金,容易隐藏,又可避免钞票的贬值。该号因此经营黄金汇兑,即在柳州承汇。如汇出,则在柳州交现货金条,在上述各联络行号收取原汇成色黄金若干数量;如汇入,则先由上述联络行号收取汇兑黄金,再电告柳州永隆交汇。汇兑的黄金可以用现货,也可由双方协议以当时金市折价兑换现钞交付。汇费亦以黄金计价收取。

(作者:刘振先,写于1987年8月,选自市政协留存资料)

柳州抗战时期的教育

抗战爆发后,东南沿海富泽之地尽失,大量的工商企业以及学校迁往西南大后方,广西的现代工业在原来落后的基础上得到快速发展。由于战时需求的大增,现代工业及其他的发展,使得广西原有的生产方式、技术力量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面对现代工农商各业和战时对技术人员的迫切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广西当局的推动下,以培养职业技术人才为目标的战时职业教育快速发展起来,部分地满足了当时和战后的需要,为抗战的胜利和广西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同时柳州驻军子女的教育、迁柳的沦陷区学校、香港的学校都在柳州有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史。

1937年暑假,原设在梧州的广西大学遭日机5次轰炸后,其农学院迁至柳州沙塘与广西农业试验场合并。农学院设农学、森林学、畜牧兽医学3个系,教职工约40人。全院农林两系只有一、三、四年级,学生120余人。至1939年,农学院有教员44人,学生155人,农场占地29亩,林场占地4000亩,保留在梧州的农林分场占地9335亩。1940年夏,农学院随广西大学本部由柳州疏散至贵州榕江。

1940年4月,在柳州沙塘的农事试验场建中等专业性质的广西省立柳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设有畜牧兽医科,学制三年。首任校长由场长马保之博士兼任。

1943年冬,香港私立华侨工商学院迁来柳州,校址在东大路琴园(今中山东路柳州地区土产公司处)。私立华侨工商学院虽然设在柳州且在柳州招生,但主要是在桂林招的学生。因为,当时桂林事实上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除陪都重庆以外,就数桂林了,成为大后方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被誉为抗战时期的文化城。每当寒、暑假时,特别是秋季始业时,全国著名大学都到桂林招生,如西南联大、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岭南大学、湖南大学、四川大学,以及本省的大专院校,还有由江苏迁来桂林复校的无锡国专等等。桂林的报纸上登满了各校的“招生简

章”。考生云集,有本地的,有外地的。外地来的,有住在亲友家里,有住在旅馆里,显得分外繁荣。因此,私立华侨工商学院也在桂林招生。

据当时考取该学院的柳州籍学生黎远明回忆,1944年,华侨工商学院在广西招生后开学,设土木工程、商业、银行三个系,一个系只有一个班。土木系20人,在戏台底的教室上课,商业系40人,在大厅的教室上课。银行会计系30人,在正厅的教室上课。学生宿舍设在戏台楼上,课桌椅、床等都是新的,但很简单,没有膳堂,同学们除有家在本地外,都在校外饭店包膳。不时还躲日机,学习、生活相当艰苦。1944年11月日军侵占柳州后停办。1946年,日军投降后迁回香港复校。

1945年9月,广西大学从贵州榕江迁至柳州鹧鸪江,借用前十六集团军妇孺工读学校旧址作临时校舍。次年夏,全校(含农学院)迁往桂林复课。

抗战全面开始后,随着第四战区长官部1940年迁往窑埠,1941年避难到柳州的北京香山慈小应邀到第四战区旁的窑埠古庙暂时办学,第四战区1942年也开办了窑埠小学。这两所学校,基本是因为抗战而设立的,随着抗战的结束而结束或者改换门庭。

第四战区司令部的长官们在桂南会战后相对稳定的时间里,陆续将家眷从其他的地方接到窑埠安住。然而,窑埠附近没有一所像样的学校,长官们的孩子也没有上学的地方。虽然1941年春,时任广西绥靖公署参谋张任民及地方士绅联合邀请当时避难到三江县办学的北京香山慈小到柳州发展,在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梁华盛将军协助下,当年秋季香山慈小就在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旁的盘古庙驻扎开始办学。可没过多久,日军轰炸第四战区司令部时,将盘古庙炸毁,香山慈小只好迁到柳侯公园继续办学,长官们的孩子上学仍然是没有着落。

面对这样的现状,张发奎清楚,不能因为战争而毁了孩子们的学业。于是,1942年第四战区政治部打算在窑埠街长官部大门口筹办中正小学。然而,校长赵不忧先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筹备了很久,也没能正式开学。一向注重办学教育的张发奎对此很不满,想把这间小学收归长官部办。第四战区中共特支书记左洪涛当时是张发奎的秘书,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找在柳州大桥志锐中学教书的郑黎亚等几位特支同志商量,想请她们到战区办小学,结果大家都愿意去。

这样,郑黎亚、杨野明、吕璧如、方兮、黄凛、沈丹凤等六位同志即从第四战区赵不忧手上把学校接过来,由郑黎亚全面负责。

当年窑埠小学主要招收四战区长官部、政治部军官的子女。上将司令官张发奎的女儿张丽芳,中将高参张励的儿子张翼翼,中将参谋长吴石的女儿吴学成,中将军法执行监吴仲禧的儿子吴群策,少将高参黄中廛的女儿黄荔芬,政治部少将督察专员伍根华的儿子伍世文等都在窑埠小学学习。长官部的大多数家长认为窑埠小学办得好,放心孩子在这里学习,有的还把自己亲戚的孩子也送来窑埠小学。当时在第四战区不与特支发生联系的地下党员吴仲禧也把自己的三个孩子都送到窑埠街小学来,还说把孩子交给这样的老师进行教育他很放心。其中张发奎的侄女、侄子、外甥都在这里学习。司令部的长官们看到孩子有进步,也就很少干涉学校的事情。

窑埠街小学除招收军官子女之外,也招收了一批难民的子女,以及窑埠街贫苦人家的子女。从广东顺德逃难到柳州的陈淑仪、陈仁锦等,以及窑埠街贫苦人家的子女,政治部还有两个勤务兵的孩子也在窑埠小学就读。当时窑埠街上失学儿童很多,尤其是烧窑工人的孩子,没钱上学。特支全体老师带上一部分高年班的学生去发动失学儿童来上夜校,不收一个铜板,纸张笔墨由特支老师们捐助,直接使用学校的教室开展教学活动。每天晚上上两节课,一节语文课,一节算术课。失学儿童纷纷来报名,非常踊跃,学习成绩也很好。

桂柳大撤退,第四战区撤离窑埠,并在河池南丹六寨遭盟军轰炸后亦不成军,窑埠小学因此结束了战时军人办学的使命。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由地方人士捐资再续民办了后来的窑埠小学。

香山慈小从窑埠迁到了柳侯祠,最后在现104招待所的狮子山脚下建起校舍。1940年开始在新校舍开学,可在防空警报响时进狮子山洞里学习。当时的学校要求学生准备好四样东西,一是油灯,因为空袭警报响学生就进入山洞继续学习,而油灯就起着照明作用;二是写字板,到山洞里学习时没有课桌,写字板放在腿上可以当课桌继续学习;三是小板凳,是为了进山洞学习时有坐的,板凳和写字板都是交钱到学校,由学校统一制作;四是备一把小锄头,学生们课余时间在山下的空地里种菜,既解决部分吃菜问题,也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念。1942年,香山慈小增至七个班,次年又增加幼儿班,全校学生400余人。后因为要求

至此上学的人渐多,在社会的资助下,又建校舍一座,增收了两个班的学生,共有学生 460 多人,可安排 70 多个学生住宿。

当时的市建会,半募集半拨款建设了礼堂一座,免去了学生活动时的日晒雨淋之苦。后第七工程处以建一栋楼房为条件,借礼堂作办公用。不料,此时日军由北南侵,香山慈小也到丹洲避过。后日军被阻于衡阳,局势又似稳定,香山慈小的 21 位教师、546 名学生在柳重新开学。可惜不久后我方军队为抗日需要,借驻学校,慈小再次停课。随后战事愈紧,学校师生向河池方向疏散,1944 年 9 月 17 日,已经病重的校长张子招卒于途中。日军投降后,1946 年 8 月 20 日,香山慈小终于正式复课,当时教师 13 人,学生 320 多人。

(作者:刘丽虹)

参考资料:

- 1.《柳州文史资料》,第五辑,1987 年
- 2.赖彦于:《广西一览》(广西印刷厂印行,1935 年)
- 3.柳州市沙塘镇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沙塘镇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
- 4.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柳州市志》第七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 年)

桐油灯下的西农学子

在柳北区沙塘镇西北面江湾村的绿色原野上,坐落着一群青瓦盖面、饱经沧桑的老屋,这就是建于1939年8月的广西大学农学院教学楼、办公楼、教授宿舍楼旧址,总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这一栋栋老屋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人流前来参观。并不是广西大学农学院的建筑与众不同,而是因为它经受了抗日战争烽烟的洗礼,保存了许许多多的历史痕迹和漫漫记忆。

70多年前,在那艰苦抗战的岁月里,来自五湖四海的莘莘学子在这里学习、交流、磨炼、奋斗、成长,他们从这里走出去后,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栋梁!而今,当那些曾在桐油灯下苦读的学子变成白发苍苍的老者,迈着蹒跚的步子重返沙塘,手扶农学院旧址的门框,回忆在这里度过的日日夜夜时,禁不住老泪纵横,心潮澎湃……



广西大学农学院合唱团(资料图片)

1937年9月,广西大学农学院从梧州迁来沙塘,全院学生152名,教职员工

82名,设农学、森林及畜牧兽医三个学系,还有农场、林场、牧场、兽医院等。之后,国内又有许多青年学生远道跋涉来到沙塘求学,发奋读书,立志救国。尽管不时有敌机飞到柳州来轰炸,但西农学子矢志不渝,坚定学好知识终有报国之日信念。

从上海来的女同学黄仁美、程绪珂等,开始很不适应沙塘的生活,这里晚上没有电灯,复习功课点桐油灯照明。日本的飞机还不时来干扰,常常是一节课还没上完,警报就响,大家只好跑到野外去躲避。仅有的一个图书馆,座位有限,图书也不多。尽管如此,他们尤为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往往为了在图书馆争到一个座位,常常是吃完饭后就守在门口,门一打开,就一窝蜂似的拥进去,抢书、抢座位,埋头看书,认真做笔记。由于学习时间紧,同学们把平时玩的扑克牌用刀砍碎,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学习上。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全国大学农林院系学生学业竞赛考试中,广西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学生代表曾有两年夺得第一名。

如今,在柳州市农科所资料室里,还陈列着当年广西大学农学院和广西农事试验场联合创办的学术刊物《广西农业》、《沙塘农讯》等杂志。双月刊《广西农业》共出版6卷36期,《沙塘农讯》出版34期。同时还有中文、英文研究专刊。这些刊物刊载了数百篇研究报告、论著和文献摘要,成为研究我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向全国发行,并与国内外有关单位交换。农科所至今还保存有一批民国文献资料及图书。

在市农科所展览室,一张广西大学农学院合唱团的黑白照片挂在墙上,照片里那一张张朝气蓬勃的笑脸,让我们看到这些青年学生当年是怎样活跃在抗日救亡的文艺舞台上。当年,物资匮乏,生活艰苦,但沙塘的文艺活动却十分活跃。农学院与农事试验场等经常举行晚会。西农剧社演出《流寇队长》、《长夜行》等剧目,西农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思乡、杀敌、救国、支前的歌声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剧中的政治热情坚定军民的抗战决心,鼓舞农民努力增产粮食、支援前方打胜仗。义演、义赛的收入全部捐献给抗战。1941—1943年春节,广西大学农学院与农事试验场等单位同当地农民联欢,举办先进农具陈列品展览和农产品、家畜家禽比赛。沙塘、柳城、宜山的农民都赶来参加农展会。广西大学农学院学生分别带引农民参观并做讲解,把先进技术传授给农友,推广科技成果。潜伏在西农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康、郑大兴、唐最培等,

积极发动当地群众、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行进行斗争,宣传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张与策略。怀着满腔热血投笔从戎的有陆丽华、陆汝升、梁元伦、吴启增、罗书镇、梁致和、杨思铭、张毅、许炳文等数十名学生。

苦苦求学不放松,立志救国结硕果。当年在桐油灯下苦读的广西大学农学院学生,大多数成为新中国农业科研机构或大专院校的主要骨干。如何康担任国家农业部部长、李崇道任台湾农复会主任、黄成达任香港渔农署署长,刘祖洞是中国人类医学遗传学领域的创始人之一;程绪珂成为我国著名园林专家;贺善文当选中国园艺学会副理事长、国际柑橘学会执行委员;罗达新任广西农科院副院长;蓝乾福是全国兽医寄生虫学界知名教授……

(作者:沈培光 兰生葵)

土法上马的专家学者

走进柳州市农科所的昆虫标本室,参观者可以看到上千只五颜六色的昆虫标本,它们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标本板上,像一支整装待发的昆虫大军,气度非凡,逗人喜爱。观者有所不知,这么多的昆虫标本、植物标本,是70多年前在沙塘的植保专家们,从广袤的山谷原野里采集而来,经过精心制作才保存到今天。

那时候,抗日战争爆发,广西成为抗战的后方,国内许多科研机构迁入沙塘,许多不屑喘息于沦陷区的专家、学者、教授,怀着深厚的爱国热情,抱着毕生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荟萃于沙塘,坚持进行各种科研实验。农艺方面有徐天锡、范福仁、孙仲逸、彭绍光等;土壤农化方面有黄瑞纶、戴弘、张信诚、李酉开等;植保方面有柳支英、陆大京、黄亮、邱式邦等;林业方面有汪振儒、钟济新等;畜牧兽医方面有沈克敦、张一农等;园艺方面有吴耕民、程世抚等。他们坚信科技必能兴国,国家强盛了才不会受人欺凌!他们绞尽脑汁,艰辛地从事设计、试验、调查、观察、记录以及整理、总结,写成报告,试验成功一大批科研成果,为后人留下价值不菲的科研资料。

这一大批中青年技术人员,处在越来越艰苦的生活重压之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学术活动精神,挑起复兴中华民族的重任,实非过誉。正由于他们锲而不舍地追求、磨炼,从而为后来取得突破性的科研成果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最突出的佼佼者当数邱式邦、沈善



昆虫组专家合影(资料图片)

炯、张肇騫等,这些在抗战烽火中坚持科研从不停步的专家,后来分别被选聘为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

邱式邦,随中央农业实验所广西工作站来到沙塘,继续从事害虫研究。在这段伴随战争的岁月里,他前后从事过松毛虫、玉米螟、大豆害虫、甘蔗棉蚜、飞蝗等重要农林害虫的生物学、发生规律、防治方法及天敌等方面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我国现代生物防治的先驱者、中科院院士。

张肇騫于1938年就任广西大学农学院教授兼植物研究所主任,他从事教学一丝不苟,积极收集植物学研究的新成就,充实教材,使学生具有更广阔的知识 and 视野;他收集的每一张标本都有完整的说明,有时为了一个标本和一个完整的说明,不惜四处翻阅资料与外出考察。

昆虫学家柳支英从事害虫防治研究,与他人合作研制成功粘杀蔬菜害虫的粘虫胶籛,在广西46个县推广应用;他发现凉薯种子能杀虫,这在国内外尚属首次。他于1939年发表的《中国之蚕类》成为我国第一部蚕类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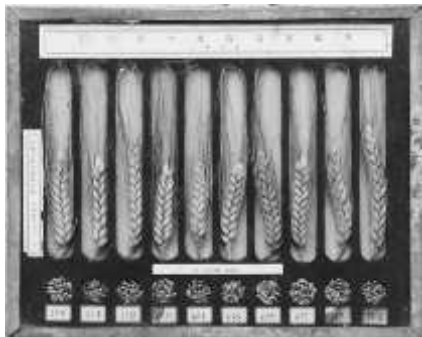
科研条件差,专家们就想出许多土办法来完成任务。如李永禧画昆虫标本,没有正规的图纸,便用普通的砂纸,直接用笔起稿,橡皮一擦便会起毛,影响着色。他就反复试验出一种办法,先用薄纸打稿,再拿硬铅笔稍着力照描,移去薄纸后,画纸上便留下一个虫体的刻痕,依此刻痕用淡色描出,照此轮廓着色,完成的画便非常干净,一点铅笔的残迹也找不到。英国博士李约瑟参观他的小画室,连连点头夸奖。农事试验场病虫害组连一间养虫室都没有,只搭有一间临时茅棚和用木板钉起来的养虫架,饲养工具只有檐灯罩、小瓦缸和养虫盅。

1938年3月7日,广西农学院、广西农事试验场、中央农业实验所的15位昆虫专家在沙塘合影留念。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当年,他们正处在青壮年时期,那一颗颗献身科技开发、报国为民的心滚烫滚烫。

在抗战硝烟中坚持土法科研试验,取得丰硕成果的专家还有:陆大京在柳州上空500—5000米高度捕获真菌孢子十二类,开中国空中孢子调查之先河。彭绍光从国外引进爪哇、菲律宾、印度、美国的优良蔗种,取代广西本地蔗种,提高产量和糖分。孙仲逸从德国留学归来,带回欧美牧草种子1000余份。范福仁白天冒着酷暑在地里观察、记载、套袋、授粉,晚上忍着蚊虫叮咬伏案整理记录,致力于玉米引种和杂交育种,使广西农事试验场成为当时全国玉米育种规模最大、



昆虫标本



小麦标本

成绩最卓著的单位之一。黄瑞纶因陋就简地兴建人力担水的自来水塔及管道、人工研磨样品处理室等,他还自己动手吹制玻璃仪器,建成四个农业化学和土壤微生物实验室。

科研人员选育出 30 个优良水稻品种,推广到 32 个县,三年累计增产稻谷 32.09 万担,其中“中桂马房粳”,被列为全国优良水稻品种。从国外引进的甘蔗良种,每亩出糖量较本地竹蔗高 37.84%。试制成功的稻苞虫梳虫器,推广到全省 81 个县,对消灭稻田里的病虫害发挥了巨大作用。

.....

专家们在民族危难时刻,蹚过硝烟,坚持进行农业科学试验,为全国农业增产增收、支援前方打胜仗立下了汗马功劳。

(作者:沈培光 兰生葵)

抗战遗存

柳州机场旧址

柳州机场始建于1929年,曾经作为广西空军训练基地、广西航校校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机场于1937年、1941年春和1943年夏先后进行了三次扩建,苏联空军志愿队、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分别于1939年10月至1941年6月、1942年初至1945年8月进驻。抗战期间,苏联空军志愿队多批次出动飞机参加桂南会战昆仑关主战场空战和对地面日军战场实施轰炸;美国飞虎队以柳州机场为重要基地,实施对日本占领下的香港、广州、台湾及日本本土的轰炸,与进入领空的日军展开空中血战。如今,柳州机场旧址仍然保存着“飞虎队”时期修建的跑道、碉堡、飞机库、军人俱乐部等重要建筑。2013年,柳州机场及柳州城防工事群旧址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文/李乐年)



机场礼堂旧址



跑道旧址



指挥塔旧址



指挥部山洞旧址



油库哨所旧址



山洞飞机库旧址



美国飞虎队营房旧址



美国飞虎队俱乐部旧址

柳州城防工事群旧址

柳州城防工事碉堡群始建于1933年,为柳州城厢后备队配合桂军第七军24师所建,后为保护柳州机场、火车站、城市周围、柳江两岸及交通要道等重要设施而扩建。防御工事由战车防御壕、散兵壕、掩体坑道、碉堡、炮台、战壕、指挥所等组成,均为片石钢筋混凝土结构,形状不一,多倚仗地形,分别位于张公岭、鸡喇、金鸡岭、磨滩村、大鹅山、小鹅山、新云村、门头村等地,现除张公岭环山工事较为完整外,其他尚存约28处。2013年,柳州机场及柳州城防工事群旧址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文/李乐年)

张公岭环山工事碉堡

位于柳州市柳南区张公岭上的环山工事碉堡群,为1933年至1937年防止地方土匪、恶霸和日本侵略而建,占地700多亩,战壕、碉堡皆用钢筋混凝土构筑并深藏于山岭内,其明碉、暗堡、地道、瞭望台等设施布局合理,上下两层战壕深藏地下绕至岭顶,壕内有储藏所、弹药库、指挥室、炮台等,现存部分约800米,抗战时期有铁路与机场相连。(图文/李乐年)



碉堡入口



战壕

鸡喇碉堡群

位于柳州市鱼峰区东南郊鸡喇村的碉堡群原有 10 多个,均为片石混凝土结构,后因修建防洪堤被拆毁,目前仅存 3 个。最大的碉堡长 5 米,宽 4 米,高 2.4 米;入口宽 0.9 米,入口现高 1.2 米。碉堡墙厚 0.6 米,顶厚 0.8 米,开有南面、东面两个射击口,顶部为五边形,下部为圆柱形。(图文/市文物局)



金鸡岭防御工事

位于柳州市学院路与西江路交汇处的金鸡岭上的防御工事,由战壕、坑道、碉堡群等组成,现仅存两个碉堡。位于山顶的碉堡长约 6 米,宽约 3.5 米,顶厚 0.5 米,设有东、西两个出入口,北面有三个射击口。位于山西侧半山腰的碉堡,长 4.8 米,宽 2.8 米,高 2.9 米,也有三个射击口,两个出入口。两个碉堡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图文/市文物局)



小鹅山防御工事群

分布于柳州市柳南区磨滩村至小鹅山铁路线北侧,呈带状分布的防御工事群共有明碉、暗堡、瞭望哨、指挥所等 18 处,主要作用是为了保卫柳州火车站及柳江铁路大桥。其中磨滩村 5 个碉堡修筑于平地,已被村民自建房填压或作为山墙利用;大、小鹅山 10 处防御工事修筑在山脚、山腰及山顶处,大多圯于荒野之中。(图文/市文物局)



柳江铁桥边碉堡

桂南会战检讨会旧址

1939年12月17日至31日,蒋介石调集15万将士、100余架飞机驰援桂南,会同原先驻守广西的十六集团军打响了以收复南宁为目的、以昆仑关(邕宁县九塘乡、宾阳县思陇乡交界的昆仑山上)为主战场的桂南会战。这次会战,中国军队以一万多将士及支前民众阵亡的惨重代价,歼灭日军4000余人,取得抗战以来中国军队正面战场对日军首次山地攻坚战——昆仑关战役的重大胜利。桂南会战后,日军被迫从南宁撤走。为总结这次会战中国军队尽管取得了决定性的重大胜利却又损失惨重的经验教训,处分一批指挥失当的高级将领,商讨今后的御敌对策,1940年2月22日至25日,蒋介石在柳州召开了有10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参加,史称桂南会战检讨会的军事会议。(图文/李乐年)



会议期间,蒋介石下榻的小别墅。



会议期间,蒋介石躲避日军轰炸的山洞,后称“护蒋洞”。

胡志明旧居

胡志明旧居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南洋客栈、乐群社、蟠龙山扣留所山洞等。

在全国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阶段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时期,1942年12月至1944年9月期间,胡志明在柳州度过了最艰难的狱中岁月,完成了著名的《狱中日记》100多首诗集的整理;与柳州人民一起参加了中国伟大的抗日救亡斗争,为中国和越南的民族解放做了大量工作;改组了越南革命同盟会,使越南共产党人在越南革命同盟会各党派中发挥了抗日、抗法复国斗争的中坚作用;创办越南青年干部训练班,为越南解放运动培训了大批骨干力量。(图文/李乐年)



南洋客栈:胡志明1943年9月至1944年9月居住、工作的地方。



乐群社旧址:越南同盟会领导人居住、开展活动的地方。



蟠龙山扣留所旧址:1942年12月至1943年9月胡志明被第四战区政治部关押的地方。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抗战活动旧址

位于柳州市鱼峰山脚下的乐群社,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胡志明旧居的一部分,也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柳州住宿、办公和开展抗战活动的主要场所。1938年10月至1939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由上海辗转迁徙至柳州。在柳州期间,临时政府公开发表抗战宣言《韩国独立宣言20周年纪念宣言》;组建光复阵线青年工作队;组织筹款义演开展救死扶伤;与柳州群众一起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4月16日,临时政府随地方国民政府离开柳州经贵阳转赴重庆。(图文/李乐年)



乐群社旧址

廖磊公馆

廖磊公馆位于柳州市中山东路36号,现为柳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廖磊公馆是廖磊将军于1930—1937年任第7军军长驻军柳州时自己兴建的住宅。廖磊将军在驻军柳州时做了许多强国强军、利民富民的事,如扩建柳州机场、创办广西航空学校、修筑张公岭军事工事、扩建柳侯公园、协办龙城中学等。1938年9月,廖磊将军率第七军北上抗日参加淞沪会战,1939年10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安徽省主席任上。蒋介石、李宗仁、周恩来、朱德等国共两党领导对廖磊的抗日壮举给予了高度赞扬,褒扬其为“屡歼顽敌的名将”。(图文/李乐年)



廖磊公馆主楼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三层楼房,约1000平方米。

广西农事试验场旧址

位于柳州沙塘镇的广西农事试验场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26年创建于柳州羊角山,初名“柳江农林试验场”,是一个农业科学研究和推广单位。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地处抗战大后方,社会秩序相对安定,农业科研力量较为雄厚,农垦事业发展很快,许多农业专家、教授以及有识之士都前来加入科研并极力向外推广科研成果。良好的农业科研和农垦实践,造就了一批高级农业人才,如我国原农业部长何康,农业博士马保之,农业专家孙仲逸、彭绍光等,也培养了一大批农业科技骨干,如原广西科委领导吴启章,原广东省矿业厅厅长梁先伦等。(图文/李乐年)



广西农事试验场旧址



董必武题词纪念亭



沙塘垦村城堡建筑群

泗角碉楼

柳州石碑坪乡泗角村共有三座碉楼，两座建于清光绪初年，一座建于1919年，楼为方形，边长4.4米，高分别为10米、15米、20米，原为防土匪用。1944年冬，当地村民和国民党188师约一个排在此利用碉楼抗击日军，军民配合保住了村庄，1945年春节又重创了前来围攻的日军，至今碉楼上仍保留着许多弹痕。（文/市文物局，图/李乐年）



钟宅

钟宅位于柳州市罗池路东一巷8号，二层楼房，坐南向北，占地面积74.7平方米，建于民国初年，1944年被日本飞机轰炸部分损毁，后又有一部分被拆除，现存建筑为砖木结构。楼房临街立面保存有浓厚的欧式风格，东侧墙壁残留有日机轰炸扫射的弹孔。（文/市文物局，图/李乐年）



水汶岩民众避难所

水汶岩民众避难所位于柳州市龙潭路市造漆厂后山,为一大型山洞,面积约400平方米,山洞旁岩石上刻有“水汶岩民众避难所”八个大字,是抗战时期附近市民躲避敌机轰炸的场所之一。(文/市文物局,图/李乐年)



柳州铁桥

连接湘桂、黔桂铁路的柳江铁路大桥建于1939年10月,1941年1月建成通车,在抗日战争中运送物资、兵员发挥了重要作用。1944年,侵华日军逼近柳州,为阻碍日军进程,湘桂铁路管理局奉令于11月9日炸毁大桥。后铁桥于1946年恢复修建,1950年8月30日修复通车并使用至今。(图文/李乐年)



文化抗战

文化名人

夏衍、马思聪抗战时期途经柳州轶闻

1941年底,日军占领了香港,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一大批爱国文化人士从香港撤回内地,其中夏衍等人坐小艇经澳门、台山到达柳州。在柳州,夏衍一行到大龙潭看望了住在那里的剧宣五队队员,队员们向夏衍等人汇报了他们准备排演《愁城记》的情况,诗人队员杨伊还热情洋溢地朗诵了他即兴写出的诗作《你们回来了》,战斗的友谊、深情的诗句使宾主为之泪下。

一天晚上,月黑无星,夏衍为追忆旧时的行踪(之前他曾到过柳州),在柳江边独自漫步。当时的柳州,已成了各省难民的汇集地,面对一群群无家可归的难民,望着街上昏黄的灯光,夏衍感到一种莫名的凄苦之情。在浮桥边,突然一句熟悉的浙江乡音随风飘进了他的耳朵:“你想也想不到的,嫂嫂他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夏衍在黑暗中看不清说话人的面目,从声音判断出这是两位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看来是兄妹俩。他们正在为家中的亲人担心着。同行的少年怕冷似的竖起了衣领,垂头不答,两个人都沉浸在凄哀的乡愁中。这对小儿女的对话一下子触动了夏衍的乡思,他不禁想起了故园,想起了无数在故园过着“想也想不到”生活的乡亲。

柳江边那一夜的偶然见闻,引发了夏衍戏剧创作的冲动和灵感,决心写一篇反映抗战时期人民斗争生活的话剧。于是,他于6月在桂林写成了著名的四幕话剧《水乡吟》,并于10月由桂林群益出版社出版。剧中,夏衍借助主人公梅漪的经历写出了那个时代江南沦陷区的“平凡人的悲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现实斗争生活。该剧后来在1944年在桂林举行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上,由广东“中国艺联剧团”用粤语于4月18日至21日公开演出,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夏衍在这年以《忆江南》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回忆了他在柳州的经历,并引用了李白的诗句:“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1944年,日军发动了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32岁的音乐家马思聪

与夫人王慕理及两个小儿女一家成了难民,他们一路颠沛流离,从广东沿江而上,9月份经梧州紧急疏散到了柳州。他们到柳后,受到当时在柳州的剧宣四队、五队队员的热情接待,安排住进了柳州中学。马思聪夫妇决定为当地难民举行一场音乐会,剧宣队同志们全力以赴为音乐会包办了台前台后的工作,海报贴出后,门票即销售一空。

不料演出时发生了啼笑皆非的事,第一支曲子刚奏完,不少听众涌向售票处要求退票。一问原因原来他们是把马思聪误为广东粤剧名角马师曾了(马师曾领衔的太平粤剧团,曾于1943年5月到柳演出过,时间不到一年,柳人记忆犹新),当看到的是位“拉琴的”,大呼“上当”。一些伤兵也乘机起哄,幸亏当时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也在场听演奏,立即大声喝止,才没有闹出大乱子。

为了报答剧宣四、五队队友,马氏夫妇后来专门到剧宣五队驻地大龙潭为他们演奏了舒伯特的《圣母颂》和他本人创作的《绥远组曲》,毕竟同是文化人,二人精湛的琴艺深得队员的理解和赞赏,认为真是“人间能得几回闻”。

不久,柳州吃紧,马思聪挈妇将雏又踏上往西南的旅途。

(作者:陈铁生)

舒模在柳州的艺术活动

从1940年初春起,在柳侯公园里,一位身穿军棉袄、脚踏旧皮鞋、年近三十的青年人,一边徘徊散步,一边浅唱低吟,时而凝视远方,时而挥手舞拍。此人是谁?他在干什么?

他就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舒模。他原名蒋树模,南京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第一队(后改称剧宣四队)副队长,也是该队的中共党支部书记。舒模所在的演剧队随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从广东曲江移防到柳州,自此以柳州为驻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前后长达四年多。

舒模在柳州努力创作、传播抗战歌曲。此前,他创作的抗战歌曲《军民合作》、《齐动枪》等,早已唱遍全中国。来到柳州,他目睹柳州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父母送子上前线的豪壮场面,感动得夜不能眠,挑灯谱出一首富有浓厚江南风味的独唱歌曲《孩子你去吧》:“孩子你去吧,赶快上战场,多你一个多分力量,早去一会儿早打胜仗。去吧,莫挂念我,我还耐得起风霜……”这首歌仿佛让人看见一个母亲在送儿子出征,一面在嘱咐、鼓励,同时也有点依依不舍的意味在里面,听众无不为之动容。这是他到柳州后创作的第一首歌曲,后来在华南一带传唱流行。1940年12月,演剧队被派到南宁做战后恢复的宣传慰问工作,舒模闻知有个叫陈高和的农民,把田产卖掉买枪支,组织乡民御敌保家乡,很受启发。回到柳州后,他以此为素材,创作了歌曲《王老二做顺民》,用对唱的方式揭露日军挑拨中国人斗中国人的毒计,劝勉大家不要上敌人的当,要做杀鬼子保家乡的中华男儿。

舒模遵循“边工作、边深入生活、边创作”的原则,把在前线的耳闻目睹,在群众生活中的感受,写出来,唱出来。他常常对作曲的朋友说,我们写出一个曲子,一定要使得人了解,喜欢听它,也喜欢唱它,这样才不丢掉我们创作的意义。每一次从抗敌前线回到柳州,舒模的耳鼓里都震撼着战场上双方交战的枪炮声,心胸里回荡着抗日将士英勇杀敌的口号声,这一阵阵激情化作心声流出笔端,谱出一首首抗战歌曲,先在剧宣队演唱,不久便在民众中传唱。

1944年,从桂林返柳,舒模又创作了歌曲《往哪里逃》,号召人民要靠自己,

团结起来打敌人。舒模不仅自己致力于音乐创作,还热心帮助指导他人提高写作水平。新队友宋杨常常捧着自己的新作去求教舒模,舒模每次都热心地指导和鼓励宋杨。宋杨从舒模的创作方法和揣摩他的作品中,受到很大的启发和帮助。不久,宋杨创作的《古怪歌》,成为全国人民很喜爱唱的名曲。

舒模的歌曲在抗战前方越唱越响,远在大后方的文艺界的朋友们纷纷写信到柳州,要求他把新作寄给大后方的人们唱。舒模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把自抗战以来他所创作的歌曲一一整理,收录了26首歌曲汇编成一本歌曲集,书名为《民主抗战进行曲》,又名《反法西斯进行曲》,由教育书店出版。这本歌曲集出版发行之后,销往全国。由于他创作的歌曲表达了抗战军民的战斗意志,传播了全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心声,很快唱响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舒模在柳州期间,常常深入机关、学校、部队、农村去教唱抗战歌曲或传授音乐知识。在柳州中学,学生们都很熟悉舒模的身影。他经常给同学们传授乐理知识,谈他的创作经验。虽然他是国内著名的音乐大师,但是他的讲座没有A、B、C等一套深奥的理论,而是一些歌曲创作背景、演唱处理之类的常谈。这样深入浅出的教学,使学生们受益匪浅。第四战区政治部在大桥开办干训团,请舒模担任音乐教官。利用职务的便利,他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游击队歌》、《毕业上前线》等在延安传唱的革命歌曲稍作改动后,便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教唱。就连战区司令张发奎也拿着歌单跟着学员一道唱。这样既点燃了国民党将士的抗日热情,又使他们接受到革命教育。

舒模常与田汉、马思聪、林路等艺术家们一道出席柳州文化界举办的音乐会、年会、晚会等艺术活动,极力推动柳州的抗战文化。1944年1月19日,舒模与队友葛文骅在柳州喜结良缘,柳州各界名流应邀出席他们的婚礼,当晚的婚礼便是在轻松的音乐演出活动中进行的。剧宣队在柳州先后公演《蜕变》、《伤兵医院》、《家》、《国家至上》、《流寇队长》等几十个剧目,舒模不仅为剧中的歌词谱曲,还参加演出。他在《蜕变》中饰况西堂,在《国家至上》中饰县长,在《家》中饰觉新。他在表演艺术中善于体验角色内心的思想感情,把角色体现得真实可信。柳州亨得利钟表店老板在看完舒模的表演之后,十分感动,要求舒模把用作道具的眼镜留给他作纪念。

(作者:沈培光)

参考资料:

《柳州市党史资料》第十三期,《星光指引着我们走向光明》

抗战时期旅柳文化人活动

抗战时期,柳州作为西南抗战的大后方,聚集了不少文化名人,并创作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文化作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版画家黄荣灿、漫画家丰子恺、杂文家何家槐。

版画家黄荣灿,重庆人,1938年秋广州沦陷前离开广州来到柳州,先在柳州龙城中学任教,并在《柳州日报》当编辑,1944年又到广西宜山柳庆师范学校任教,教木刻、雕塑、工艺,还为宜山县政府街头抗日宣传栏出板报。黄荣灿在柳州担任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理事兼柳州支会负责人,主办过“黄荣灿战地写生画展”、“黄荣灿和黄新波木刻联展”抗战画展,主持筹办“第一届全国双十木刻展·柳州展区”,影响广泛。他的木刻代表作有《收获》、《战争与和平》、《修铁道》等,《修铁道》收入《抗战八年木刻选集》,《街头》被大英博物馆收藏。1942年初,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不久,黄荣灿赴湘北前线写生,他深入各军战地,以及长沙城内的战俘营,写生创作了一批战地作品后返回柳州。1942年3月17至21日,剧宣五队为他在柳侯公园体育协会举办了“黄荣灿战地写生画展”,参观者络绎不绝。3月18日《柳州日报》第四版为这次战地写生画展出了特刊,漫画家沈振黄、音乐家孙慎、作家何家槐、剧宣五队队员丁波、诗人艾军以及柳州日报编辑宋绿伊、骆任石等为展览写了寄语,诗人严杰人和李定写了观后感。黄荣灿是抗战时期柳州有代表性的美术家,1944年湘桂大撤退时他离开柳州赴重庆。

漫画家丰子恺,浙江人,1939年4月8日,跟随浙江大学搬迁到柳州市西边的宜山县(今宜州市,当时属柳州),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他仍是孜孜不倦地辛勤教学创作,开展抗战艺术宣传。丰子恺在宜山教学时负责两门功课,一门是教育系“艺术教育”,另一门功课是中文系“艺术欣赏”,这两门课的讲义,后来作为单篇论文,收在1992年出版的《丰子恺文集·艺术卷四》里面。除了讲课之外,他在宜山潜心于著作,在宜山,他写了半部《教师日记》,另有根据在宜山生活的感受,写了《宜山遇炸记》、《防空洞所闻》等散文十多篇,在控诉日军轰炸平民

百姓的同时,描述宜山的民风民情。在宜山期间,编了一本《大树画册》,作为抗日救亡运动宣传的幻灯片,供学校师生开展宣传活动使用。此外,其绘画作品《若时降雨》送给宜山抗日民营金融机构“合作金库”,《山川亦有情》、《偷他一片云》、《宜山小景》分别送给友人梅光迪、王星贤、汪静之等。

杂文家何家槐,浙江省义乌人,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参加钱亦石、杜国庠领导的战地服务队,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后在柳州第四战区长官部任职,做统战工作并写有大量文艺作品宣传抗日救亡。他创作在柳州,但以桂林文坛为发表作品的平台。1939年和1940年,他的作品主要在《救亡日报》发表。1940年8月《野草》创刊后,何家槐更是连连为其写稿,《野草》杂志的主要负责人秦似曾说:“何家槐同志在柳州的时间里,几乎每月都寄文章来。”(《〈野草〉杂忆》)。1941年,他的杂文集《冒烟集》为“野草丛书之七”,1941年9月由桂林文献出版社出版,收录《老成与幼稚》、《年资》、《无所适从》、《关于士兵文艺》、《作品与生活》、《新谈狐说鬼》等杂文38篇,另有《后记》、《校讫再记》各一篇。该集一方面揭露、批判“狗彘不如”的汪精卫汉奸卖国集团以及那些“暗中做着鬼事的人妖”;另一方面对各种阻碍社会进步的旧传统观和世俗偏见进行讽刺和批判。另外,何家槐也写了不少关于文学问题及抗战文艺发展状况的杂感和短论,如《“民族文艺”一解》、《关于士兵文艺》、《战地戏剧谈》、《国民文学乎?帮忙文学乎?》、《作品与生活》、《关于国防文学》等。同时还翻译发表了不少苏联作品,从《文艺生活》1941年9月15日创刊号起,何家槐连续在该刊发表了以《苏联工厂史之X》为副标题的8篇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系列文章。1944年秋日军迫近,桂林大疏散,何家槐也撤离了柳州。

此外,戏剧家田汉,音乐家舒模,诗人郑思、严杰人等都在柳州有过抗日活动事迹,留下过作品,值得我们收集整理和研究。

(作者:李建平)

徐悲鸿画于柳州的《松鹤图》

1935年至1942年,徐悲鸿在广西生活了很长时间,期间他曾多次到桂林,也到过柳州。他在广西期间,创作了大量的中国画作品,其中有一幅画于柳州的《松鹤图》,画中一对丹顶鹤立于一段横出的松树枝干上,引颈回顾,这幅画在徐悲鸿的艺术创作及其一生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985年10月19日,徐悲鸿画展在柳州市隆重开展,75幅珍品参展,观众反响热烈。徐悲鸿先生的遗孀廖静文女士应柳州市政府邀请,19日上午抵柳参加画展开幕式,下午在柳州饭店接受记者采访,笔者当时任柳州日报副刊部编辑,同时负责副刊版面人物稿件采写,和报社摄影记者潘宏忠一起参加了采访。采访中廖静文回忆了很多,并谈到了《松鹤图》——

“悲鸿当年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孤身一人来到广西,1935年至1938年,他在柳州、桂林、阳朔居住过,在悲鸿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广西人民给了他那么多温暖,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和悲鸿是在广西相识,我和悲鸿对广西充满怀念。悲鸿和我及其女儿们心里已把阳朔、把广西当做我们的第二故乡。”

“这次画展中有一张《松鹤图》,就是悲鸿当年在柳州画的,他在画上面还题了字:1938年敌机轰炸时作于柳。当时国破家亡,他希望苦难的中国能像松柏一样常青,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仙鹤也是长寿的意思。”

据笔者后来核证,采访中廖静文说的《松鹤图》,后人也称《双鹤图》或《苍松双鹤图》。如王震编著的《徐悲鸿年谱长编》记述:“徐悲鸿于此年9月中旬小游柳州时,绘一幅《双鹤》,因敌机轰炸未画完,即离柳州,次日返回桂林。”徐悲鸿在题跋中也作了记载:“廿七年九月十八倭机轰炸柳州,悲鸿正写,此画未竟。”松树的枝干俱未写完,未完成的作品恰好见证了那个惨烈的历史瞬间,也永远记录下了日军罪恶的侵略行径。

这幅作品的创作背景也比较特殊。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人民生活战乱和苦难之中,徐悲鸿此时在广西,他一方面举办画展,筹赈救国,一方面为广

西中等艺术教师讲习班授课,培养更多的美术老师,其间也游历山川创作作品。另外,这一年对于徐悲鸿的感情生活来说,是一个伤心之年,蒋碧薇早已与他貌合神离,在桂林他和学生孙多慈相恋了。为和孙多慈结合,他在《广西日报》上刊登了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的启事,但孙父仍以徐悲鸿已有家室为由而拒绝,并在8月上旬携女儿离开了桂林。徐悲鸿情绪沮丧到了极点,国难与情苦使他悲痛,便在九月上旬去柳州等地游历散心,这便是此画的创作心境。

《松鹤图》现在在哪里呢?笔者经查阅资料得知,徐悲鸿去世以后,其妻廖静文女士根据他的遗愿,将其创作和收藏的书画作品,悉数捐献给国家。20世纪80年代初,徐悲鸿的四个子女提出,希望能继承一部分父亲的书画作品。政府方面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从当年廖静文女士捐献的作品中选出40幅中国画和若干素描,给徐悲鸿的子女继承。时任北京文物出境鉴定所组长章津才后来回忆说,当时政府委托他来选择这40件给徐氏子女的中国画作品,选择的的原则是:既不能破坏之前捐赠的徐悲鸿国画作品整体的艺术性,又要考虑国家对徐氏子女的照顾和关怀,选出的作品也要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章津才和助手反复斟酌多次筛选才最终确定。在归还的作品里,《松鹤图》是令章津才内心比较纠结的一幅作品。这张画捐献前就曾多次展览,并且是徐悲鸿送给廖静文秘藏的作品。这张画尺寸为129cm×77cm,尺幅比较大,内容也非常好,它代表了徐先生花鸟画的最高水平。松鹤题材的作品在徐先生的作品中有,但是双鹤却很少;此画的寓意也非常深远:松鹤同春,松鹤延年,具有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意义,正是藏家追求的热点。在2008年北京保利秋季拍卖会上,《松鹤图》以504万的价格被收藏家李笠拍得。



(作者:林 冬)

抗战美术活动中的柳州籍画家邓俊群、潘文经

在柳州,有两位画梅的已故国画家,一位是鹿寨人潘文经,一位是融水人邓俊群,这两位画家都堪称大家,同出生于1906年,同是长寿画家。这两位同龄画家在抗战时期满怀爱国热情,以美术形式参加了当时的抗日文化救亡活动。

邓俊群原名家骏,号梅谷、六然,原籍广西融水,后迁居柳州,素有“画梅圣手”之称。1934年他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其间得到著名画家刘海粟的教导。抗战时期,参与创办桂林榕门美术专科学校,开广西创办美术专科学校之先河。

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名人云集,成为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抗日文化中心。成立于1942年1月的私立桂林榕门美术专科学校是当时桂林较有影响的美术院校,邓俊群与著名画家马万里、宋吟可、张家瑶等人共同参与了该校的创办。马万里出任校长,除聘请邓俊群为国画教授外,还聘请了不少美术界知名人士,如黄新波(木刻)、陈烟桥(木刻、漫画)、阳太阳(油画)等。当时物价飞涨、金融混乱,邓俊群一面利用自己的声望参与落实教师、经费、校址等事宜,一面作画筹集资金,终于使学校能正常办学。学校从开办至1944年停办,前后仅三个年头,虽然时间短暂,又是国难时期,但仍能坚持正常教学,共有6个班共200余人,还举办了三届美术作品展、两次写生画展,为国家培养了一批艺术人才,是抗战时期美术活动一个重要阵地。

这间学校一直办到1944年夏,日军入侵,桂林紧急疏散,邓俊群才离开广西桂林美专,回到家乡融水县以作画为生,1946年到柳州开办画室,新中国成立后在柳州多个中小学任教,1983年成为中国民主同盟会会员,是



邓俊群作品

中国美术家协会广西分会和中国书法家协会广西分会会员,柳州市政协第五、第六届委员,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馆馆员,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柳州分校、柳州画院顾问等职务,在桂林、柳州多次举行个人画展。1980年,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专门为邓俊群拍摄了一部名为《水墨丹青》的彩色纪录片。1990年,84岁的邓俊群高龄辞世。

潘文经,别名雪笙,字绿邨,壮族,其画梅技艺精湛,被誉为“岭南第一梅”。1906年12月12日出生于鹿寨县中渡镇一个小商家庭,排行第四。幼时初入私塾,新式小学兴起后接受现代教育,1921年毕业于中渡县立两等小学。

潘文经小学毕业后于1926年春前往桂林求学,考入广西省立第二师范小学教员师范讲习科(两年),后又继续在该校的后期师范(三年,相当于大专)学习。1931年夏毕业,先后在昭平、信都、三江、南丹、柳城、榴江、柳江、融县、阳朔等县的教师讲习所、中学和桂林女中、桂林职工训练所、桂岭师范任教。

在桂林二师读书时潘文经得以大开眼界,先后师从桂林著名画家帅础坚、容大块先生研习岭南花鸟画,1932年8月辞职跟随桂林著名画家唐翰学习花鸟画,打下坚实的美术功底。1938年,国画大师徐悲鸿与时任广西教育厅音乐督学的满谦子先生,在桂林创办了“广西省会国民基础学校艺术师资训练班”(简称“艺



潘文经作品

师班”)。艺师班时期,丰子恺、吴伯超等艺术名家在此任教,培养出一批艺术教育骨干和艺术名家。当年潘文经有幸进入桂林艺师班学习,并得徐悲鸿赏识。一次,潘文经画了一幅《腊梅八哥》,自我感觉良好,便在画上题“愚画此幅多矣,唯此张是精品”。潘文经题完字后又觉得有点不妥,便拿去给徐悲鸿看。徐悲鸿看后一乐,在画上又题“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邨弟此幅确系精品,无怪乎自鸣得意,宜也”。可见当时年轻的潘文经画功已十分了得。1936年,在徐悲鸿主持的广西首届书画展上,潘文经的《雄鹰》荣获金奖。1938年其作品《花鸟》参加徐悲鸿先生组织的中国画联展义卖活动,款项捐献前方抗日。

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曾邀潘文经到中央美术学院执教,可惜,还未成行,徐悲鸿就去世了。之后潘文经一直在鹿寨县从事教学和美术创作,1983年当选为鹿寨县政协第一届委员,曾任广西美术家协会会员、广西书画院院士、柳州地区书画院顾问、鹿寨县文联顾问和鹿寨县美术家协会主席、鹿州画院院长,2008年8月辞世,享年102岁。

(作者:林 冬)

参考资料:

- 1.《柳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
- 2.《百岁画家潘文经》(华夏收藏网)

陆田与抗战木刻

抗战时期的木刻运动,是中国抗日救亡阵线上战斗性最强、政治取向最鲜明、社会影响最大的美术活动,广受大后方社会各界的首肯和民众的欢迎。其中有一位抗战时期在柳州中学任教的版画家,参与了许多有影响的抗战美术活动特别是抗战木刻活动,是中国抗战美术史上的重要版画家,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先驱者之一,他就是中国著名版画家陆田。

陆田,江苏无锡人,1916年10月出生,2000年3月逝世。抗战时期曾在柳州中学、新华中学、柳庆师范当美术教师,新中国成立后又继续在柳州工作了一段时间,曾任柳州教育工会秘书长、柳州文联副主席、《柳州日报》编辑、宾阳文化馆创作员、广西艺术学院教授,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理事。出版有《陆田木刻选》,代表作有《秋实》、《拾柴过活的孩子》、《宜山妇女》、《赈灾大员下乡》等,1988年获“中国新兴版画贡献奖”。

抗战期间,陆田在许多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报刊上发表了許多优秀抗战木刻作品:他的第一幅木刻作品《故乡》1936年发表于上海《申报·副刊》,当时仅20岁;重庆《时事新报》在抗战期间较有影响,陆田当时也有抗战木刻作品发表在这张报纸上;《文艺阵地》杂志是重庆抗战时期影响最大的四大期刊之一,陆田曾在其上发表木刻作品《仇恨》,把中国人的爱恨情仇表达得痛快淋漓,激发起民众的斗志和抗战的热情。

1940年10月,陆田与李桦(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在湖南衡阳《开明日报》合编《抗战木刻》与《诗与木刻》不定期副刊。这一年,24岁的陆田出版了第一本个人木刻画集《战地》。

1942年初,陆田从湖南到桂林从事抗日美术活动。当时有许多艺术名家聚集于桂林,除了陆田,还有徐悲鸿、丰子恺、关山月、廖冰兄、陈海鹰、阳太阳等。这批荟萃于桂林的艺术名家多达250人,大部分人都在25岁左右,最大的不超过40岁,陆田那时也只有26岁。他们从事抗日美术宣传、美术教育活动,成为抗战

时期桂林美术活动的主体。1937年7月至1944年8月间的桂林,成为整个中国举办画展最为活跃的城市。各种形式内容画展的举办不仅推动了全国抗战美术运动的发展,还为中国美术史留下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其中就有陆田的木刻《宜山妇女》,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当时甚至今天都被认为具有典型性的代表作品。

抗战时期的木刻展览很有影响,1942年8月24日,全国木刻研究总会决定全国分十个地区同时举行“全国双十木刻展览会”。贵阳筹备组向各地木刻家发函征集作品,得到木刻家们的踊跃响应,如李桦、梁永泰、刘仑等及木研总会都寄去许多作品,陆田也寄送了作品。展览非常成功,原定10月11至12日在贵阳展出两天,应市民要求13日又续展了一天,除展出木刻画216幅外,为普及木刻艺术,使初学者能有观摩实物的机会,还在会场内陈设了木刻工具及其使用制作说明和有关木刻书刊64种。同时受中国版画研究会之托,当年10月陆田和黄荣灿一起在柳州也举办了全国木刻展览。

20世纪50年代,陆田在《柳州日报》任文艺版主编,据原《柳州日报》美术编辑翁乾礼生前回忆,他1956年5月调到柳州日报社任美术编辑时,陆田还在《柳州日报》工作,翁乾礼喜欢创作木刻,工作中得到陆田的无私帮助和教诲,视为恩师。另外一位报社老报人在一篇文章也回忆了陆田带他到鱼峰山,教他使用135型的莱卡照相机,指导如何构图和调光圈,完成了《从鱼峰山顶俯瞰柳州市区》的创作经过。

陆田抗战木刻影响深远,其部分木刻被中国美术馆收藏,1965年中国美术馆在收藏了他的木刻作品后,寄给他一张简历表,由本人填好后再寄给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馆至今还珍藏有他的这份手稿,表上有美术馆印章及收录章。

(作者:林冬)

参考资料:

- 1.《20世纪中国版画大事年表》
- 2.《版画百年1900—2000典藏作品集》

抗战作品

《柳州日报》的“战时木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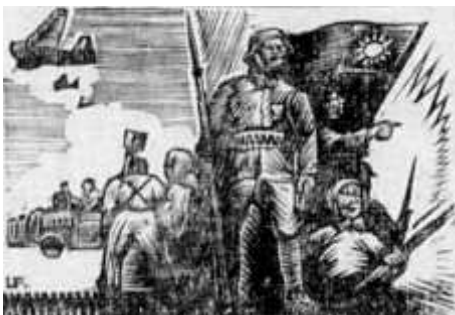
抗战时期,由中共“特支”控制的第四战区特别党支部中山室美术股,在《柳州日报》副刊开辟“战时木刻”专版,半月刊。我们从中选出部分作品重新刊发,让读者品味当年美术工作者的艰辛创作,分享当年抗战如火如荼的氛围。



保卫我们的家乡(力 夫)



要为被害同胞报仇(力 夫)



我们是中国的新青年(力 夫)



大家参加保卫家乡的工作(力 夫)



准备杀敌(力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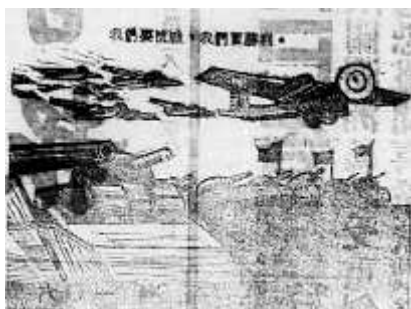
妇女队员(力夫)



节约·储蓄·救国(野明)



血债(野明)



我们要抗战，我们要胜利(野明)



快买储蓄券(欧剑星)

(沈培光搜集整理,资料来源:柳州市图书馆)

话说柳州抗战时期的诗词

以诗为剑,驱寇救国。抗战时期,柳州虽不是烽火连天的主战场,却是抗日大后方的文化重镇之一,以抗日救亡为主题,出现了大量柳州籍人创作的,外地人写柳州的,或在柳州报刊发表的诗词作品。当时发行量较大的《柳州日报》,就曾刊发过很多的抗战诗词。2011年,中共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还专门收集整理出版了一本《柳州抗战诗词选》。

创作抗战诗词的作者不仅有中共柳州临时工委负责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报社特派记者,教育家、诗人,表演艺术家、剧作家,也有国民党的将领、民主党派成员、县参议会议长等,还有普通的民众。据悉,很多诗词作者平时虽然不大写诗词,但却在灾难突降的时刻,同仇敌忾地拿起笔,或控诉敌人的罪行,或描绘战斗的情景,或抒发抗战的豪情壮志,抒时代之情,言人民心声。这些抗战诗词极富强烈的时代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饱满的激情与昂扬的活力。读这些诗词如置身抗日战争中,热血沸腾,心似潮涌。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柳州的抗战诗词都是人的情感、心灵世界在抗日战争这个大环境下的反映,与国家民族的生存息息相关。如为柳城人的国民党少将旅长黄聘三所写的《壮志殷殷贯九州》:

扫恶除奸志未酬,烟横沧海气横秋。
万里挥戈驱虎豹,三杯拔剑斩妖猴。
忠心耿耿垂千古,壮志殷殷贯九州。
报国不成遗后世,聘三青史永芳留。

诗小情怀大,让我们看到了当年壮士一腔热血倾吐出的铮铮誓言,听到了那个时代脉搏的跳动声。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浩劫,中国南方的柳

州也深受其害。一位叫彭志连的就作诗《闻日机轰炸柳州》，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卢沟旧恨未曾忘，又见烽烟弥故乡。
破碎山河悲冻骨，艰难国势断愁肠。

当时的《柳州日报》曾刊载过作者辛人题为《在铁蹄下的家乡》的诗：“谁使我们苦难？谁使我们饥寒？在铁蹄下的家乡，兄弟被残杀，母亲在黑暗里悲伤。谁，谁使我们受辱？谁迫害我们的爹娘？”有力地控诉了日军的罪行。《柳州日报》还刊发过名为林宁的诗《不是没有家的人们》：“没有家的人们，在沦陷的家乡里，蒙受了耻辱，奴役和毒骂！还有那最凶狠的敌人，用刺刀和鞭子一样打杀！”使人体会到当时的父老乡亲简直就是生活在人间地狱里。

但是，欺凌一个民族，势必会唤醒一个民族的奋起反抗。在抗日战争中，柳州所涌现的诗词创作更多的是表现了苦难中的人民蕴藏着强大的凝聚力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如王志明写的《我需要斗争》就有这样的表达：“我将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笔，向‘保卫家乡’的大旗奔去。”还有身为国民革命军军人的克尔的《踏着殷红的血迹前进》：“踏着殷红的血迹前进！我们早下了杀敌的决心，肉搏冲锋呀，我们，誓不畏缩！我们宁愿听着最后的枪声，做个英勇的战死者的忠魂；不愿在无情的铁蹄下，过着忍辱苟存的一生！”让我们听到了“雄心驱寇诗为剑，不灭强盗恨难平”的吼声。大多数柳州人熟知，并引以为骄傲的抗日名将阚维雍，他一边握枪作战，一边挥笔作诗，所写的《绝笔诗》更是掷地有声地道出了中国军人的心声：

千头万颅共一心，岂忍苟全惜此身。
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作降将军。

这首诗自然地流露出一种爱国爱民族的情怀，激发了无数人强烈共鸣。阚维雍后在奉命坚守桂林时，因城破而自戕殉国，他的壮烈举动受到人民的敬仰，曾有人作诗《吊阚师长维雍殉职榕城》：

力战吞枪漓水江,血花怒溅不成行。
永留正气千秋壮,愿与倭奴一日亡。
城陷英魂应有恨,土焦忠胆亦可惶。
从容赴义如君少,忠烈尤增闾氏光。

至今胜利的欢呼声虽然已远离我们 70 年了,但是,那个悲壮的年代留存下来的大量以抗战为题材,表现我国军民英勇斗争精神的诗词,仍使我们不忘国仇家恨,鼓舞我们发扬先辈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精神,坚决地维护民族尊严,努力地建设日渐强大的祖国。

(作者:林 玉)

田汉诗十一首

贺演剧九队三周年队庆

(一)

鹅峰如剑割新愁,特带愁肠到柳州。
风雨忽停云物媚,剧坛今日贺千秋。

(二)

罗池柳色浑如昨,风雨危亭写史诗。
三十健儿皆虎虎,粤南千里凯旋时。

(三)

当时救亡青年群,三载卓然钢铁军。
却怜创业艰难志,秋水连天忆曙云。^①

^① “曙云”指九队队员、音乐家张曙父女,二人于 1939 年 12 月 21 日在日本飞机空袭桂林时遇难。

(四)

青年精力柳江波,含血为君慷慨歌。
莫让乾坤犹涕泪,诛龙齐试剑新磨。

1941年9月1日 于柳州

——选自《田汉诗选》

同为人间觅自由

(一)

同为人间觅自由,盈盈明月隔银流。
月圆露重龙潭路,一片歌声贺女牛。

(二)

莲脸犹含淡淡羞,说来经过俯明眸。
何须戒子连双手,当把花冠戴上头。

(三)

边城此去不须愁,眠食依当注意周。
郎若不嫌千里远,滇池同泛木兰舟。

(四)

八阵森森列景休,人前真个再追求。
新郎捉得新娘子,笑把香糖笑嘴投。

1943年春 于柳州

——选自《图说柳州抗战》

撤退前致柳州文化界人士

再为中原着一鞭

胜利完成疏散年,高歌雄辩柳江边。
明朝莫作鸟兽散,再为中原着一鞭。

1944年秋 于柳州

——选自《柳州古今》第12期

观冯法祀画作有感

(一)

开辟崎岖作坦途,大军从此纵驰驱。
江山人物寻常见,谁遣工程入画图?

(二)

画笔常随足迹遥,今年情史写红瓢。
南荒一例成前敌,喜见精诚结汉瑶!

1943年

——选自《柳州市党史资料》第十二期

田汉(1898—1968),湖南长沙人,戏剧家,时任军委会政治部第六处处长。

曾敏之诗二首

街头小景

红十字的大衣点缀了罕有的肮脏
抖索地——像一堆剩余的东西
当路人的皮靴踏过了他生命的边沿
饥饿的本能叫他挣扎着眨眨白眼
那失了光泽而灰黯的眼光哟
似含着多种用意
说是忿怒又是乞怜
他挣扎着——在白眼所及的天地内
有一天我看见了白衣护士
用消毒的药水去揭开他的大衣
检查遗体没有别的——
瘦伶伶底的胸前
两处弹痕记下了这位无名英雄之死！

——选自《柳州日报》1940年11月6日 第三版

复(信片诗)

你说：
“红杏枝头春意好。”
我明白你触到了春！
你说：“种子已在抽了芽，”
我知道你已体会到大地的新生。
可是朋友，

你又说：“天空满是荫翳的浓云，毁灭了希望。”

这都是雨季，

浓云密雨的象征。

没有雨，

渴坏了耕耘底人。

没有雨，

抽芽的种子长不成！

而你啊，

不理解。

患了歇斯底里病。

求爱滋养，

为爱消沉。

恕我狂妄吧！

过多的感情用于哭笑。

不敢激发愤火，

投向民族解放战争。

掷向残暴敌人。

可怜的朋友！

因此我说你没有憎恨。

于是：

永远把握不住你真正的生命之春！

——选自《柳州日报》1941年4月15日 第四版

曾敏之，罗城县人，抗战时期任《柳州日报》驻桂林特派记者、作家，新中国成立后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

从烽火中来的声音

——为《四五队歌选十一曲》所作序

田 汉

政治部武汉时代文化部队的力量还保存不错,甚至有进一步发展的是抗敌演剧队,尤其是西南战场的演剧四、五、六诸队;许多人对这几个团体的存在也并非完全祝福的。有热心人士甚至替这些青年们惋惜,说抗战是长期的,一眨眼我们已经同敌人打了五六年。我们在战争中工作少则二三年,多则四五年,也有抗战一开始就投身进来的。以前十八九岁的人现在是二十四五了;二十四五岁的人就要到三十了。可是我们毕竟有什么成绩呢?是不是我们把光阴白白糟蹋了呢?或是我们通过教歌、演剧、演说与个人谈话、分别访问等等的工作形式对于巩固部队,动员民众未尝不有足一定的功劳;而把自己的学业都整个抛荒了,或者耽误了呢?假使说演剧队对于学习的态度客观上都是陶行知主义者。那就是讲我们以社会作学校,以生活作教育,也就是说工作即学习,从不断的工作中去学习,那么我们这四五年来究竟学习了什么呢?

从新的教育观点说这几年我们虽无法自己满足,但所学习的也是够多的。不管是对抗战的认识也好,工作技术的磨炼也好,只要拿来同武昌昙华林受训和竞赛演出的时候一比,就可知我们的进步是多么大了。整个的团体生活尤其进步得不可以道里计。拿当时最年青的九队即今日的五队说,他们原是由张曙、冼星海们训练的歌咏队改编的,对于戏剧艺术大部分同志没有入过门,有的甚至对戏剧还不大感兴趣。直至柳州时代,他们还在争论是一般工作要紧呢,还是戏剧工作要紧呢?然而到了这几年,他们的问题更深化了。他们不仅在大火前后的长沙,在大后方的桂林,在兵荒马乱的柳州,在战火未息的宾阳以及整个桂南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他们就在戏剧艺术的专门方面也积有相当深厚的修养,从前根本没有演过戏甚至不喜欢戏剧的青年同志,现在居然从不断的艰苦工作中练成优秀而实际的戏剧工作者,在前方工作中为着找不到够用和适用的剧

本,为着得针对临时随地的需要,从他们中间孕育着,甚至已经产生了优秀而质朴的剧本作家。此次四队将在桂林公演的《边城之家》以及最近两队同志出版的独幕剧本集,可以说是从他们工作和学习的紧密联系中最良的产物。

在音乐方面,他们的干部是辛勤的,他们曾在最为艰苦的工作中继续着理论与作品的研讨,他们随时在部队中,在农村,在学校从事新音乐的传播工作,他们每到一地也适应着环境而作词作曲,使音乐艺术发生异常直接的政治影响。他们每到一地便不断的收集当地民歌俗调,不仅借以观风俗纯驳,而是拿来丰富自己的研究。运用当地民歌俗谣写成的抗战歌曲,常常使当地听众更亲切有味,盖不必论。他们自己的话是对的:

“我们流转在战地,在乡村——这些丰富的土地抚育了我们,熏陶了我们。我们是在它怀里生长起来的。”

他们写的歌曲听起来可以说是土的声音,真正的声音。听吧!

“邕江的水儿慢慢的流,邕江的人儿要报仇(重)你要问我的仇人是哪一个啊?那就是他来时送我八尺布去时牵走我两头牛的日本鬼啊。我要报仇,我要报仇!(重)”(五队力丁词、余雷曲,《邕江水二重唱》)。

“走私的人啊,你可知道吗?日本想要把我们中国亡,为什么你把桐油偷运出国境,为什么还把铜仙偷运到安南,更把辣椒卖给敌人哪!(合)卖给敌人哪!”

“走私的人啊!你可明白吗?桐油拿去可以造飞机,还有那铜仙拿去可以造枪炮,更有那辣椒拿去可以造毒气,敌人就拿来杀我们!(合)拿来杀我们哪!”

“走私的人啊你太没良心,你的祖宗也都是中国人,你走私国家民族就此遭灾殃,你细想走私发财就是帮日本,走私的人啊,你是汉奸哪!(合)汉奸哪!”

(四队碧夫词、舒模曲,《走私的人》)。

这是多么质朴而有力的曲调啊。其他如《保边疆》、《从军别》、《五月礼赞》等曲与词雄浑热烈,另具风格,都是抗战音乐中难得的产物,不是像他们那样用自己的脚一步步踏破西南战地千山万水的人真不能道出只字,凭着这几支歌曲也就是对于把工作和学习分开,主张演剧队贻误青年学业的人最好的回答,同时在这样紧迫的局面,把动员民众提高部队士气的工作摆在一边,而高尚其志地强调与实践分开的学习的人,也决不能有什么艺术上的辉煌成就。

(选自1944年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宣传队四、五队出版的《四五队歌选十一曲》)

《四五队歌选十一曲》编者言

四年来,我们流转在战地,在乡村——这些丰裕的土地,它抚育了我们,熏陶了我们,我们是在这儿生长起来的。

1940年的春天,正是桂南烽火连天的时日,我们一、九两队(今四、五队)在昆仑关下见面了,从此,织就了我们不可分离的友情与热爱!

“一、九队”这一个为人所熟知的称号,到今天,是深深的刻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

这是我们光荣的史迹呀!

如今,五队要走了,走到遥远的滇越边疆去。这,又是一个多么值得纪念的日子。

为了纪念我们三年的合作,为了纪念我们匆匆的别离,我们冒昧出版这一个册子,我们想这虽然是合作中的点滴,或许也能够给社会人士一点注意吧!

但是,我们是非常年青的,这年青,也正说明了我们的幼稚。在此,盼望一些关心我们演剧队的朋友们,热忱给我们以不客气的指正,这是我们诚恳的期待着的。

朋友们,

请不要叫我们失望吧!

《民主抗战进行曲》代序

□□(原稿文字无法辨认):

首先要感谢你!因为你的鼓励和催促使我完成了这册歌集。

这里我得向你有点解释的,就是你问我为什么不把自己创作的歌曲送给大后方的人们唱?这并不是我吝啬或是对后方有成见,实在是因为我一直工作在前方,所产生的歌曲也都是对着前方许多情形而写的,所以写成之后就在前方唱开了,我觉得既然是为前方写的,只要在前方唱起来就成了,因此没想到往后方送。

最近许多大后方的朋友常写信来问我要歌曲,他们异口同声的说,现在没有歌唱,大后方在闹歌曲荒,因为歌曲缺乏,目前不仅是翻旧歌唱,而且把那些风花雪月、春思秋愁的玩意儿也唱起来了,就差毛毛雨之流的东西还没拿出来。虽然是大后方,可是到底还是要抗战,火药味总比脂粉香来得有些,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我觉得把前方的东西送些给后方,还是有他深切的意义的,同时对抗战中的后方也不无小补,这也是促成我完成这册歌集的原因。再则,这册歌集中,有部分曾经发表过的,可是由于过去某些刊物校对不够仔细,可以说我发表的曲子,没有一个不有错的地方,如《军民合作》吧,早已唱遍了全国,甚至目前美国也在很流行的唱着,可是我见过很多歌集里没有一个完全不错的谱,所以趁这个机会也可以把以前发表错误的,来一个改正,更希望你这次在校对上帮我多下些功夫。

我很高兴,这小册子编好了,三天之后我又要出发工作去了!你知道么?工作就是我创作的源泉,我待在家里什么都写不出,只有实际的工作中,那些活生生的现实材料,才能给我创作灵感上一些启示,也就是说,在工作中我才能写出东西来。

这里我就想起过去,如果没有徐州突围那段艰苦的生活,我不会产生出《军民合作》来。要是没有那次桂越边境之行,《保边疆》、《走私的人》也无从写出。

我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工作中产生出来的。关在房子里写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不够踏实。所以现在我更相信,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才能产生出现实的作品来,也只有有实际生活体验的人,才能创作出真实的作品来。

我常常在想,要想一个歌曲为大众所了解,所接受,首先你得生活到大众当中去。如果你的生活是跟他们隔离的,那你写出来的东西也只有你自己能了解。我常常和许多作曲的朋友说,我们用许多心血写成一个曲子,不要给它浪费了。这就是说,我们写出一个曲子,一定要使得人了解,喜欢听它,也喜欢唱它,这样才不丢掉我们创作的意义咧! 否则一个曲子写出来,人家不了解,听不懂,唱不会,不喜欢它,那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也许人家会说我功利主义了,可是在今天音乐到底还不是给少爷小姐们当做茶余饭后消遣取乐的玩意的,如果我们写出一个曲子不能使大众了解,接受,喜爱,不能起些作用,在今天的现实情况来说,那就失掉写作的意义和艺术价值。我希望在这次工作中又能写几个曲子出来,那时我一定要给你。

祝你健康!

模哥(舒模) 1943年11月于柳州

75 年前《柳州日报》刊载的抗战联语

抗战期间,柳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全城军民口诛笔伐日军侵华的滔天罪行。在大街小巷,居民家门口,机关单位院内院外,戏院、商铺的门前屋后,贴满抗战必胜、驱逐倭寇的楹联和标语口号,这些鼓舞士气、坚定信心的豪言壮语,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长中华民族志气,灭日伪汉奸威风。《柳州日报》编辑把遍布城内外的抗战联语收集整理,于1940年1月31日、2月2日、2月7日,在该报第三版刊登出来。75年后的今天,我们选用部分抗战联语重新发表,以此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店铺、机关、居家街门——

抗战必定胜利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妥协就是灭亡

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发挥全民力量

上下同心抗战到底

参加抗日战争

军民一致团结向前

增强必胜信念

敌我分明坚持抗战

坚持抗战主张

存亡呼吸拒绝私争

不计个人利害

冒险向前养成朝气

争取民族生存

淬厉奋发蔚为时风

整饬日常生活

雪耻复仇无落人后

养成奋发精神

冒险犯难率先躬行

革除声色贷利生活
提起奋发蓬勃精神

革除自私自利习性
养成不移不屈精神

革除苟且偷生习性
倡行率先犯难精神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闻败勿馁闻胜勿骄

必须自重自强自治自立
利用广人广物广地广时

地不论东西同心救国
人无分老幼合力驱倭

争取国家生存民族独立
维护人类正义世界和平

摈拒私利为民族奋斗
牺牲自我求国家生存

贯彻抗战主张反对中途妥协
争取全民福利勿图一己安全

砥砺廉隅澄清吏治
严明赏罚洞察民情

肉店——

敌寇嚣张忍使人为刀俎
沦区待复莫教地失膏腴

眼见牵羊方晓自由可贵
耳闻缚豕当知奴隶莫为

拼血肉换自由忍教刀俎加身听人宰割
大扫除痛洗涤宁许犬羊留迹遍地膻腥

油烛店——

驱逐倭奴高擎火炬
复兴中国大放光明

照解放明灯同心赴汉
擎自由火炬一举歼倭

钟表店——

月月年年誓雪中华奇耻
时时刻刻勿忘民族深仇

全国动员踏上空前大时代
长期抗战坚持最后五分钟

药材店——

调养精神保存国家元气
 坚强体魄讲求大众健康

振作精神革除国民痼疾
 坚强体质起来东亚病夫

瓷器店——

建立新区革除旧染
 宁成焦土莫作瓦全

百炼窑功冶出全民坚志
 纯青炉火锻成一代新型

水果店——

未复沦区莫想吃南海香蕉山东梨子
 且收失地再来买中州红柿关外枣儿

打铁店——

百炼中华全民成铁汉
 长期抗战大地是洪炉

敌寇似煤灰渐烧渐烬
 我军如钢铁越打越强

裱装店——

面目一新全仗改修手段
 河山再造且看恢复版图

小食店——

抗战时结心有似出锅热气
 留名争报国共闻扑鼻奇香

国难当头味如尝胆日
 敌寇未灭念切操刀时

酒楼——

银盏金觥祝抗战胜利
 眉飞色舞颂民族中兴

失地未收莫谈街巷
 民仇待报且罢私争

(沈培光搜集整理)

文艺活动

抗敌剧宣队在柳州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属的两个演剧队来到柳州。在柳州几年时间里,他们融入了柳州,柳州也容纳了他们。

扎根柳州,宣传救亡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了救亡图存,国共两党再次携手,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加强全国抗敌宣传工作,中共派周恩来来到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出任副部长。1938年8月1日,在周恩来指导下,政治部第三厅集中全国文化艺术界精英,在武汉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其他宣传团队。经集训后派遣到各战区前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9年12月下旬,演剧九队奉命到柳州听候。1940年初到达广东的演剧一队,在2月初随四战区长官司令部迁移,也来到柳州。

1940年元旦,为了支援昆仑关抗敌战士,刚到柳州的演剧九队,和柳州各界团体共同发起“一角钱劳军捐献运动”。他们用布幕改成一面大国旗,由队员用手执着旗边高高举起,一路高呼“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把敌人赶出去!”沿街排列等待献金的民众,纷纷把钞票和硬币甚至首饰抛掷到张开的国旗里。九队还派出人员通过各种形式向商铺和作坊进行募捐宣传。通过这次捐献运动,演剧九队很快就得到柳州民众的认可。

这年春节期间,为了配合声讨汪精卫投敌的叛国行径,宣传抗战到底,刚到柳州的演剧一队公演四幕剧《黑暗的笑声》。这出戏的题材在当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演出后观众反应强烈,认为这戏“在低压沉闷的政治空气中送来一帖清凉剂,使人清醒,促人深思”。一队也就在柳州民众中扎下了根。

历尽艰辛辗转来到柳州的一、九两个演剧队,人员都有流失,因一时来不及

补充,工作起来很感到困难。7月,经两队队务会议联合协商,决定两队暂时合作一个时期。从此,两队在柳州并肩作战,流缺的人员也在柳州逐渐得到补充。

1941年5月,四战区长官部在柳州大桥响水河边办了个干部训练团,要求演剧一、九两队人员也参加训练。在训练期间,两队在周末晚会上都为受训军官们演出节目,四队中的音乐教员还教受训人员唱救亡歌曲。后来这些歌曲由参加训练团的军官们带回各自部队教士兵们唱,极大地鼓舞了军队的抗日情绪。

同月,军委会政治部下令对所属演剧队改变番号,原抗敌演剧队与抗敌宣传队合并改称为“抗敌演剧宣传队”。番号按配属的战区序号排列,一队配属第四战区,改称“剧宣四队”。九队则调到第五战区(长官部在湖北襄樊),改称“剧宣五队”(为了行文方便,下面不分时段,全用新番号四队、五队称呼)。五队人员不愿到那国共摩擦炽热的五战区,要求留在柳州。后经张发奎同意,五队留在柳州。

两个剧宣队在柳州四五年时间,除了通过戏剧的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外,还利用举办音乐会、教唱歌曲、办画展、出版墙报等形式宣传抗日。两个队还分别受派到桂南各地或省外做巡回宣传演出。

1943年6月,五队接到军委会命令,把他们配属远征军司令部,开赴云南前线做宣传。离柳前夕,五队演出《愁城记》向柳州民众告别;《柳州日报》也发表《送五队》、《五队,那儿更需要你们》的文章送别。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元旦,剧宣五队曾一度回到离别两年多的柳州,柳州像对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欢迎他们。四队在柳州沦陷前夕,和众多疏散的难民一同离开柳州,之后一直没有回过柳州。

用文艺鼓舞斗志

五队刚到柳州时生活非常艰苦,但是他们仍然以炽热的抗日救国之情,投入到柳州民众的抗日宣传活动中。四队一到柳州,就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他们在演出之余,还到驻柳部队和各学校、企业、团体辅导戏剧活动,并与学校、银行、书店、医院、新闻界中的知识分子和各有方面人士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广交朋友。还吸收近百名柳州青年成立抗敌歌咏团,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两个队很快融入了



1942年剧宣五队在柳州大龙潭队部宿舍留影(资料图片)

柳州,成为柳州最得力的抗日救亡宣传队伍。他们时而联合作战,时而分散活动。

1941年八九月间,柳州各界发起救济难侨的募捐,两个剧宣队响应号召,在柳州举办募款演出,获得地方人士的好评。10月7日,剧宣四、五两队联袂在柳州公演《蜕变》和《国家至上》两出戏,得到观众的高度赞誉。《柳州日报》在报道中称之为“演剧二重奏”,柳州戏剧界把两队誉之为“演剧双璧”,“姊妹花”。

8月14日柳州开展献金购买飞机活动,剧宣五队演出《愁城记》将所得票款捐出购买“剧人号”滑翔机。四队由于音乐人才比较多,经常举办音乐会,他们在柳州传播的抗战歌曲,给柳州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大刀进行曲》、《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松花江上》,和诙谐辛辣的《茶馆小调》、《你这个坏东西》、《五块钱的钞票没人要》等歌曲。

1943年5月,剧宣四队针对国内外形势拟排演《法西斯细菌》以鼓舞士气,正巧柳州中学(以下简称“柳中”)也在排练这出戏,四队领导认为业余剧团,尤其是学生剧团选定剧目不容易,为了推动校园演剧运动,他们便把这剧目让给柳中演,自己改排由巴金小说改编成话剧的《家》。在自己排练余暇,还派人去帮助柳中同学排戏和制作布景。四队与地方学生剧团的关系如此水乳交融,实在难得。

1944年7月,柳州已经开始大疏散,为纪念卢沟桥事变七周年,四队通过四战区政治部发起“七七国旗献金大游行”。由各界合作做了一面大大的国旗,由

演剧队的队员举起沿街缓缓而行,还没有逃离柳州的民众,大多纷纷把钱投入国旗里。队员们还分成若干组到各商店募捐,当时很多商家还没有疏散,他们都有一股爱国热情,在此情况下,其中不少商人仍乐意为抗战捐款。在那动乱不安的时局,三天的献金活动,还募得近40万元法币慰问桂林守城部队。当晚,四队和龙中、柳中联合举行“千人大合唱音乐会”,在此时间,两个剧团为了招待柳州各界和驻军,还联合演出反映当时欧洲和中国各战场形势的大型活报剧《同盟军进行曲》,这出戏有200多人登台演出,场面十分壮观。

剧宣队到柳州后,很快融入了柳州,柳州人(包括在柳州的外来人)也热情容纳剧宣队,在生活、工作等各方面都给他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剧宣队初来柳州时,《柳州日报》为他们发布演出新闻,出特刊作剧评宣传。剧宣队负责人和报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彼此成为亲密的朋友。

剧宣五队初来柳州时,在没有找到住宿地方前,河北浮桥头江面上珠江水上餐厅老板陆俭,同意他们晚上到餐厅过夜。1942年12月五队到桂林演出返回柳州时,再次在水上餐厅寄宿,但两次寄宿的时间都不长,因为餐厅早市在清晨就要营业,睡眠不足会影响剧宣队的排练和演出。

剧宣队在柳州的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像春天播下的种子一样,发了芽开了花。当四队深入桂南战地巡回宣传演出回到柳州后,各界进步人士纷纷到四队驻地慰问。且有许多爱好戏剧、具备一定文艺修养的进步青年要求加入剧宣队,让他们有选择新生力量、壮大队伍的条件。

四队在柳州演出的剧目中,曹禺创作的《蜕变》演出场次最多,影响也最大。这出戏讲述的是国民党的一所伤兵医院,通过医生、护士的爱国热情,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为伤员做手术的事例,转变了以往懒散腐败的风气。四队在排练这一剧目时,演员需要体验生活,省立柳州医院同意导演和演员们进入手术室参观现场操作,使导演和演员对医疗手术的全过程有真实的感受和体验,演出时更为逼真。

当年剧宣队没有专拨的演出经费,布幕和布景都是筹款制作的,服装和道具等演出用品,基本靠借。《蜕变》演出时,省立医院很乐意把医生、护士的服装和手术器械等100多件道具借给演剧队。演出时医院的杨医生还到现场指点各种用具应该如何摆放,怎样操作使用。此外,剧中人所需的其他服装近百件和其他

笨重的用具将近 400 件,都是演员们在排练之余四处奔走寻觅,向群众借来的。外地迁来柳州的中央银行有位朱其昌先生,被剧宣队的敬业精神和求实作风感动了,亲自四处奔波替四队求借服装道具。还热情表示:“你们借不来又是必须用的东西,可以告诉我,由我买,借给你们用!”一家亨得利钟表店老板更是热心,毫不吝啬地从柜台里取出 6 副眼镜、6 件钟表、7 支手杖借给演剧队。还说明这种眼镜是医学博士用的,配上高档手表更适合剧中人的身份和性格。

《蜕变》的演出,轰动了柳州,后来长官部举办专场招待本战区医务人员,又演出一场,广东体育宣访团来柳,张发奎为了欢迎宣访团,并扩大《蜕变》在公务人员中和各阶层中的宣传作用,特邀请剧团继续公演三天。为了慰劳演剧队人员,开酒楼的陆俭老板和来柳的交通银行何东浦先生,用上好美酒和鲜肥山羊肉等佳肴联合宴请他们。何先生说:“这戏不仅坚定了每个同胞对最后胜利的信心,而且指出了中国前途的光明。几年来,我没被戏剧这样感动过,我落泪了,但是这泪水是欢快的、兴奋的!”

(作者:陈佚生)

参考资料:

1. 抗敌演剧一队史料征集小组整理:《演剧四队(原一队)队史资料专辑》
2. 杨震等撰:《千山万水忆八年(演剧五队回忆录)》

抗战时期粤剧在柳州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大举侵华,广州、香港、澳门等地相继沦陷。大批广东人举家逃难沿江西上,云集柳州,众多的广东粤剧戏班,亦纷纷来柳演出。1942—1943年间,可说是柳州粤剧的鼎盛时期,每晚演出的剧团有时竟达四五个之多,参加演出的不仅有当时红遍广西的朱笑珊、玉英英、程剑峰、何慧贞、朱剑秋、花弄影等名伶,还有省、港、澳的大佬倌薛觉先、唐雪卿、马师曾、罗丽娟、梁醒波、银剑影、关德兴(即新靓就)、高飞凤等,令观众大饱眼福。

1942年末,号称“四大天王”之一的梁醒波,偕同花旦罗丽娟、邝健廉(即红线女)等在大光明戏院,演出《刁蛮公主憨驸马》、《烽火戏诸侯》、《野花香》等名剧,盛况空前,场场爆满。

1942年12月,爱国艺人关德兴、高飞凤以第四战区粤剧宣传队的名义,先后在中正中学礼堂、映山戏院演出《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岳武穆大战金兀术》、《梁红玉击鼓退金兵》等爱国名剧,并为柳州六个慈善团体募捐义演,受到舆论界的一致好评。关德兴神鞭绝技百步之外打灭烟头而不伤人,挥鞭碎纸而不伤身,鞭梢灭烛而不倒的表演,数十斤铁弓拉满弦的惊人气力,倾倒了柳州观众,数十年仍不忘怀。

1943年2月,眷满艺坛、素有“南薛北梅”美称的薛觉先,率领阵容强大的“觉先声”剧团,在天星戏院演出。主要演员有唐雪卿、陈燕依、薛觉明、白龙珠、梁少声、区少基、张汉升等,演出首本名剧《姑缘嫂劫》、《西施》、《关公月下释貂蝉》、《王昭君》、《毒玫瑰》及神话剧《神女会襄王》等,薛觉先一人饰几个角色,生、旦、文、武包揽,他精湛的技艺、清雅的唱腔、潇洒的身段,不知使多少观众为之折服。

接着梁醒波偕同名花旦银剑影等,再次在东方戏院演出。银剑影在《癫婆寻仔》、《璇宫剑影》中的杰出演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满台的光剑影,四座惊叹。

1943年3月,粤剧艺坛的大哥——粤剧泰斗马师曾率领剧团,偕同电影明星兰茵(即陆小仙)、紫罗莲等,在国泰戏院演出成名杰作——《贼王子》、《佳偶兵戎》、《刁蛮公主》、《宝鼎明珠》、《苦凤莺伶》等戏,很快就在柳州流传开来。

1943年7月7日是抗战全面爆发周年纪念日,在柳州的粤剧界人士在蟠龙山山下东面的第四区长官部的礼堂,进行慰劳战区官兵活动。当时的窑埠村民平时根本没钱购票进戏院观剧,风闻薛觉先等艺人来长官部献技,认为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人人兴高采烈,晚饭后即聚集在窑埠码头等候。当天晚上,薛觉先反串女角,主演《王昭君和番》一出古戏,他马上琵琶,袭服披肩,悲怨凄凉,踟躅塞外。这时正当中日交战白热阶段,敌我势不两立,这时演出“和番”,与时局现实极不协调。观众不敢喝倒彩,但啧啧微言,气氛并不肃静。

当时,除剧团上演之外,还有其他曲艺家经常举行清唱会。红伶张琼仙女士唱腔高亢,响遏行云,她摒弃话筒扩音器,凭借本人一副金嗓,原音传播。加上她的丈夫小提琴家梁以忠的精彩伴奏,如锦上添花,相得益彰。

日军侵入柳州后,马、薛、关等艺人亦随众疏散去昆明。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柳州毁于兵燹,一片废墟,满目疮痍。剧团演员全无用武之地,相继拉箱返回广州。于是,柳州的粤剧爱好者只能仍用留声机播放唱片,或者听一些艺人卖唱过点戏瘾罢了。

(李理想搜集整理)

抗战时期柳州的影戏院

抗日战争前,柳州城镇有三四万人(包括近城地),“娱乐场所所有柳州舞台、柳州影戏院和京剧场等,据说营业不很兴旺”(见梁文威《广西考察记》,1935年)。抗战爆发后,外地剧团来柳演出逐渐增多,演出场所也随之有所发展。据1939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沈永椿编写的《广西指南》介绍:柳州培新路有设备尚佳的戏院,设有包厢和普通座,可容纳1200余观众,上演粤剧平(京)剧或电影。庆云路(今中山中路)有设备一般的国华电影院,楼底二层有700多座位,放电影或演平(京)剧。东大路(今中山东路红十字会医院处)有设备平常的慈善戏院,楼底二层有600多座位,主要演桂剧。桃花庄(位于映山街)有设备平常的中山戏院,主要演桂剧。

1938年,武汉广州失守后,大批难民借道和暂栖柳州,柳州人口剧增,达六七万人。众多外地的剧团随之涌入,刺激了柳州影戏院的发展。柳州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1938年11月成立后,利用“文协”内现有的戏台取名为“救亡剧场”,专演抗日救亡戏剧,为在柳滞留的上海“八一三”歌咏团、上海话剧团、广东儿童剧团、广东蓝白剧团等艺术团提供食宿、演出之地,救亡剧场主要是售票演话剧。著名戏剧家马彦祥曾评价:它是目前我国话剧有自己剧场售票演出的还不多见的剧场。

1939年初,位于桃花庄原演桂戏的中山戏院改为专放电影的大观戏院,不久位于柳新街小公园斜对面的河北戏院开业。戏院为砖木柱子板皮房,主要演桂戏、粤剧或放一些无声电影。至此柳州一共有六所影戏院。但好景难长,1939年7月15、22日,日本飞机两次狂炸了柳州河北繁华市区,先后将救亡剧场、大观戏院炸毁,曲园戏院被震坏,柳州市面一下少了三家戏院。

1939年秋,原在曲园戏院演京剧的四维国剧社,因戏院震坏需修理,不得不搬到东大路继续营业的慈善戏院演出,改慈善戏院为东方戏院,自此四维国剧社在东方戏院演京剧一直到1944年初,曲园戏院不久修复,由在柳的桂剧名角组

班在该院演出。因门口观音喷水池炸坏以后没有修好,建筑不如从前堂皇,戏院的名气显然也不如从前了。

1940年初,随着桂南会战我线相对稳定,日本飞机空袭也减少。位于正南路(今解放南路)、被炸毁的救亡剧场修复后,由原大观戏院的股东租用该剧场重新开放电影,仍沿用大观戏院的招牌。与此同时,新世界戏院的股东们在桃花庄原大观戏院那块空地上,造起一座砖木结构的电影院,1941年初完工开业。新世界戏院改名为金声戏院,继续以放电影为主。这期间,在河南大码头西面也修了一座砖木席棚搭起的华星戏院,专放无声电影与演粤剧等戏剧。此时位于映山街东八巷的宝记太平戏院开业,专演粤剧。到1941年8月20日止,柳州当时共有八家影剧院同时营业。其中金声、大观、新光、华星戏院以放电影为主,东方、曲园、太平、河北戏院以演戏为主。

同时还有一些人将正南路善昌当铺改建为戏院,这时柳州的专业影剧院发展到了最高峰。不幸的是1941年8月24日,军飞机大规模轰炸柳州南北繁华市区,曲园、河北戏院被毁坏,大观戏院被炸塌戏台西角及紧挨着的墙壁,柳州一时间消失了三家戏院。接着金声戏院也停业易主装修,柳州此时只剩下四家影戏院了。

1941年9月上旬飞燕大舞台装饰一新,鸣锣开业。它的设施中档,楼底二层设有包厢,舞台灯光配备较全,可容纳600观众,使原在曲园戏院演出的桂剧名角小蓬莱、凤凰鸣、蒋金凯、满盘珠、清风明、黄仪仙等得以继续登台表演。10月4日,河南的唯一戏院——华星戏院,被隔壁豆腐店失火殃及,戏院被毁。好在10月23日,天星影戏院在原金声戏院处隆重开幕,使市民多了一处看电影的娱乐场所。

1941年12月,大观戏院修复,桂柳桂剧界名角桂枝香、月中桂等联合组成强大阵容,租下该戏院以乐群桂剧场招牌,上演新编宋朝历史剧《莲花帕》和连台大戏《薛仁贵跨海东征》等,吸引了众多桂剧爱好者。1942年春节(2月15日)后,该戏院易主换牌为蟾官戏院。特聘粤剧界名角谢江、何鲁瑞、吕北筠、董少侠等,根据古装电影新编粤剧《热血忠魂》、《三笑姻缘》、《十三美人头》、《秦良玉》等,在该院演出。同年11月,该戏院又易主换剧团,招牌改为粤华戏院继续演粤剧,同时一些颇有影响的著名话剧也在此上演。

1942年12月10日柳州中学演出的话剧《风雨归舟》和1934年元旦期间剧宣五队的四幕话剧《长夜行》，曾先后在该院演出。1943年元月10日，薛觉先、唐雪卿领衔主演的觉先粤剧团，租用该戏院改名为正南戏院。薛、唐两名角主演了《三误佳期》、《重婚节妇》和薛觉先反串的《貂蝉》等拿手好戏。自此柳州的戏院形成了东方戏院演京剧、飞燕大舞台主演桂剧、正南戏院主演粤剧的三剧鼎立之势。

放映电影的新光影院，同太平戏院一样毁于1942年5月27日的映山街大火。柳州城区只剩下天星影院继续放电影。1942年10月21日，位于太平西街一巷，自称借以补益教育、改良风化，从而提高民智的社教电影院开幕。放映了托尔斯泰著的《黑暗之势力》，由阮玲玉、袁牧之、陈波儿等主演的《人生》、《桃李劫》，以及滑稽片《街头博士》等影片。1943年初，又一间国泰影戏院开业，专以放电影为主。

从这之后，柳州城区有天星、国泰、社教三家电影院放电影，有东方、正南、飞燕等三家戏院演戏。这六家影戏院基本维持到了1944年上半年。1944年夏季，柳州大疏散后，原有影戏院全都人去楼空。1945年6月日军撤离柳州前大破坏时，将以上这些影戏院大多毁掉了。这是日军侵华期间，在柳州犯下的又一罪行。

（作者：方敏，选自《柳北文史》第九辑）

火热的抗日话剧演出

话剧在柳州,最早只是在学校或是一些场合上作为一种余兴的演出节目。到抗日战争期间,已作为一种有力的宣传工具,成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剧种之一,起着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宣传抗日的的作用。

1938年年底,柳州市“文协”(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开始计划利用福建会馆中停演多年的剧场和其留下的部分破旧设备办一个话剧场,作为扩大抗日救亡宣传的基地。此举得到福建会馆的无偿支持,又得到“文协”集体会员京剧团、桂剧团、粤剧团的支持,各义演一个晚上,收入1000余元为修建费。1939年2月,剧场建起来了,命名为“救亡剧场”。

救亡剧场刚成立,正好上海话剧团部分成员和上海“八一三”歌咏团、广州儿童剧团等先后来柳,“文协”吸收他们为团体会员并无偿供应他们吃宿,并肩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同年春夏之交时,由上海话剧团与龙城中学话剧团联合首场演出以汉蒙民族团结抗日为主题的大型话剧《塞上风云》。该剧前后演出十来场,几乎场场满座。有时还得加演白天下午场,以满足观众要求。此外还演了一些小型话剧,有《魔窟》、《光荣人家》、《风波亭》等等。“八一三”歌咏团亦曾在剧场演唱了几场《黄河大合唱》,有时在曲园京剧场演唱,十分激动人心。在这期间,我国著名戏剧家马彦祥由沪赴渝途经柳州时,曾到访“救亡剧场”,认为一个群众团体能建起一个剧场,实在不可多得。

遗憾的是剧场收入微薄,经济负担又重,到同年夏已无法维持下去,外来剧团先后离柳他去,剧场演出很不正常。至同年7月15日日机肆虐龙城时,剧场遭炸毁,无法恢复。

1941年,剧宣四、五队随四战区长官部来柳后,直至1944年柳州大疏散前夕,几年间,柳州话剧演出在四、五队推动下出现有史以来的高潮。这期间有广西国际艺术社演出《日出》、《雷雨》,广州话剧团演出《夜光杯》、《茶花女》。上场次数最多、规模最大、在群众中影响最大、教育最深的要数四、五队的演出。正如



剧宣五队演出的话剧《愁城记》(资料图片)

何启君所说的,剧宣四、五队的演出活动给柳州人民大众传播了革命道理,向柳州人民大众发出了抗战的呐喊,使柳州的抗日救亡运动气势磅礴地开展起来。

现在能回忆起来他们的演出有:作为后世之师的大型古装历史剧《李闯王》、《大明英烈传》、《陈圆圆》、《天国春秋》、《忠王李秀成》等。深刻反映当代现实的多幕剧《蜕变》、《杏花春雨江南》、《金玉满堂》、《国家至上》、《升官图》、《重庆二十四小时》、《草木皆兵》、《人兽之间》等等。演出地点大都是租用培新路设备较完善、环境较清静的京剧院——曲园,每场上座率很高,尤其是历史古装剧。

此外,剧宣四、五队的演出影响下,柳高、龙中等学校的抗日话剧演出尤为火热,几乎每学期都举行一次话剧比赛,有时亦走入社会公演。这一时期,柳州话剧的演出,在柳州“可以说是闪闪发光的时期”。

(作者:陈雄子,选自《鱼峰文史》第十三辑)

1944 年的柳州抗战文艺活动

1944 年 2 月 15 日至 5 月 17 日,八省三十二个戏剧团队、上千名戏剧工作者集中桂林,举行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柳州方面参加的团队有:四战区柳州军委会政治部剧宣四队、柳州四战区政治部政治大队、柳州四维平剧社等。

5 月 27 日,剧宣四队乘火车离开桂林回柳州,住进柳州中学。当天日军进攻湖南,6 月 17 日总攻长沙,19 日长沙陷落。原驻长沙的剧宣九队有家不能归,而原驻桂林的新中国剧社因桂林开始疏散也待不下去了,6 月下旬,两个文艺团队先后到了柳州,与剧宣四队会合。这时大批文艺界著名人士也陆续到柳,作为队友住在四队的,就有著名电影导演蔡楚生、女作家安娥、音乐家马思聪夫妇等。

7 月 2 日,为了宣传抗日,柳州文化界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工作委员会在柳候公园举行了一个“一切为了前方”诗歌朗诵夜会,节目共分三部分:

一、《吹起进军的号角》。计有《吹号者》、《队长骑马去了》、《军民联欢》、《你这个坏东西》、《王老二当顺民》、《我们是游击队》、《进军》、口琴独奏等。

二、《怒吼吧,柳江》。计有《怒吼吧,柳江》、《把敌人赶出鸭绿江》、《一起搬上山》、《打到东北去》、《丈夫去当兵》、舞剧等。

三、《再来一次总动员》。计有《朋友,检查一下你的心》、《醒一醒吧大后方》、《献金运动歌》、《为保卫衡阳而歌》、《向湘江》、《我们歌唱》、《一切为了前方》、《再来一次总动员》等。

当时,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已到了转折关头,为了显现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剧宣四、九队和新中国剧社又集体创作了由四队的张客、九队的赵明、新中国剧社的瞿白音联合导演的大型多幕活报剧《同盟军进行曲》,并向柳州人民公演。这个剧主要内容就是从全世界的角度肯定人民战争的正义性和加强人民反侵略战争胜利的信心。舞台上出现了英勇的苏联红军对德国法西斯的反击,莫斯科红场上胜利的欢舞,英美联军开辟第二战场,太平洋中岛屿的战斗,中国北部战场的抗日,日本军阀的日暮途穷……整个剧空间阔大、场面雄壮,充满了战斗的激情。台上的宣传引起了台下观众的共鸣,使大家产生了一种胜利的预

感,不时发出一阵阵掌声、欢呼声。三个团队演出时,不仅投入了全部力量,还动员了不少义务演员,上台者达两百多人,实为柳州剧坛的空前壮举。

8月上旬,日军铁蹄开始沿湘桂铁路直犯广西,更多的文化人,如田汉、胡危舟、金仲华、艾芜、司马文森、穆木天等都先后到了柳州。大批从湖南、桂北、粤北来的难民也流落到这里,使得柳州的房租、物价骤然飞涨,本来演剧人员的生活已极清苦,到柳州后更是窘迫,但他们仍然坚持演出。这时,三个团队又推出了一个新节目《怒吼吧,大后方》。紧接着,8月中旬,他们再一次联合演出一个由汪巩、严恭编剧,赵明、许秉铎、张客导演的四幕《四城记》,该剧以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四个地方的战时动态为背景,反映了民众抗敌保土思想和行动。

由于8月8日衡阳的陷落,白崇禧要张发奎的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撤离柳州,这时九队因第九战区湖南已被敌占,只好随四战区行动,新中国剧社因是民间剧团,一时生计无着,由四队通过关系暂时改编为第四战区司令部直属怀远剧团,也随军撤离。四队则除少数妇幼后撤,部分队员除由副队长舒模率领留守柳州,住在一家搬空了的“和成银行”宿舍外,其余精壮者20余人在队长魏曼青率领下,前往桂林,在进行宣传、演剧的同时,并为桂林难民服务。10月中旬,桂林紧急疏散令下后,他们才撤出桂林,历时十多天,步行回柳与在柳的队员汇合。这时柳州已是半座空城,四队队员针对性地创作了一批歌曲以鼓舞民心。舒模作了一首《往哪里逃》,指明逃跑没有出路,只有坚决抵抗才是出路。宋杨作了一首《广西人》,表示广西人好讲不好欺,史莽、草田二人合作了一首《难民对唱》,控诉日军侵略的罪行。但很快,10月17日日军进攻桂林,27日突破防线,国民党军队纷纷后撤,柳州民众在作最后的疏散。11月4日,四队队员也乘火车离开了柳州。11日柳州陷落,从此,柳州的抗战文艺活动被迫宣告停止,这情况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文艺活动才得以恢复并很快出现另一个高潮。

(作者:陈铁生,选自《城中文史》第二辑)

参考资料:

- 1.《重庆师院学报》1981年第二期连载的《抗战时期国统区文艺大事记》
- 2.《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二期《回忆抗敌演剧四队》
- 3.《抗战文艺研究》,1983年第三期、1984年第二期
- 4.《柳州市党史资料》第八期《抗战演剧一队在柳州》
- 5.1944年全年《新华日报》

新闻报刊

抗战期间柳州新闻检查述略

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推行文化专制政策,1938年10月成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全国图书杂志原稿审查,翌年4月成立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对全国新闻检查,并都在全国各地设有分支机构,以此达到控制全国舆论的目的。战时柳州新闻亦不例外。

(一)柳州新闻检查室的主要职责

1940年底,由于蒋桂之间矛盾的激化,蒋介石撤销了以白崇禧为首的桂林行营,将广西的军政大权划归了驻在柳州的以张发奎为首的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柳州成为当时广西军事政治中心,其新闻事业,也出现了一时的“繁荣”。如以往仅有《柳州日报》一家报纸,后来出现了七八家之多的报纸。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于1941年6月10日在柳州正式设立直属新闻检查室(下简称“新检室”)。该室负责柳州地区新闻检查事宜,并由赖振家为检查长,主要工作如下。

1.参与组织地方宣传活动并协助其工作。如1941年7月参加柳州各界集会纪念“七七”抗战四周年大会及公祭抗日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参加柳州兵役宣传工作,参加1944年柳州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及该年“三二九”青年节大会等。

2.与柳州新闻界广泛接触。新检室除每月举行一次柳州新闻记者联谊会,1941年9月1日还隆重举行了柳州第八届新闻记者节。1942年3月在新闻记者联谊会上,帮助成立了柳州新闻记者公会筹备委员会,推举《柳州日报》的林继茂、《阵中日报》的赵问微、《大公报》驻柳记者钱庆燕为筹备委员,是年12月1日柳州新闻记者公会正式成立。

3.依据新闻报纸,编辑柳州地方言论集。新检室每月依据柳州各家报纸对政

风、粮政、参议、战局、国际等新闻及评论,编辑柳州地方言论集。有时还编制某一专题的言论特辑,如1943年11月就编有《湘鄂战事特辑》,12月编有《中东三大会议后同盟国今后战略的新动向特辑》。

此外,新检室一开始还参加图书审查工作,随同广西图书杂志审查处一起经常前往柳州各书店进行检查。

(二)被新检室“枪毙”的文章

柳州新检室的首要任务是执行国民党当局推行的文化专制政策,对柳州地方新闻进行强制监督与检查,被新检室“枪毙”、不准刊登的稿件主要有以下几类。

1.对现实不满的文章。如1942年11月22日《立鱼峰》三日刊送检的何可泰写的《官场感》,因文中写道“争雄群丑论功高,裙带官阶是自豪,那管兴亡天下事,生财有道刮民膏”,被认为“不满政治现状,破口谩骂”。1944年2月23日《柳州晚报》送检的《公务人员保险》,被认为“对政府法令有攻击之嫌”;同月26日《中正日报》送检的“梧肇轮渡水手罢工”,因报道水手要求加薪不遂全体罢工,被认为若刊登会“影响航运事业”。

2.暴露人民生活悲惨的文章。如1941年7月28日《柳州日报》送检的《黄老师》,认为“过分暴露小学教师生活艰苦情形,将引起整个小学教育界之不安”;9月15日《柳州日报》送检的《莫干山已非胜地》内述“粮食之不足,并描写难民凄凉情况”,被认为“动摇人心,影响抗战”;1944年3月2日《柳州日报》送检的《船家掘取草根充饥》,报道了物价高涨,人民生活维艰竟至掘草根以食者,被认为“此种稿件若予刊登,适足以供敌伪宣传之资料”。

3.揭露军政腐败现象的文章。如1943年4月20日《中正日报》与《阵中日报》联合送检的《挟带鸦片触犯禁例,两军人昨被审讯办》,被认为“有损军誉”;3月18日《前锋报》送检的《市参议会亦有黑市》,报道韶关选举市参议员,有人向有关方面送大礼,以图当选,被指责“暴露政治弱点”;该报同时送检的《沙坪何老二》,报道沙坪烟赌仍未禁绝,被认为“暴露禁政弱点”。

4.有关破坏社会治安的“匪盗”新闻。如1941年11月15日《柳州日报》送检的《军警合围,群匪就逮》,被认为“暴露后方治安不良”;1944年1月10日《真

报》送检的《金城江附近股匪为患》，被指责“报道匪情，触犯新闻禁载标准”；1月30日《中正日报》送检的《歹徒拦劫警察》，3月10日《阵中日报》送检的《宜山劫杀巨案》，均被认为“暴露后方治安弱点”。

5.一些“涉嫌”泄露军事情报及国际敏感问题的文章。如1941年9月8日《柳州日报》送检的《星徽统下的曲江》，被认为“暴露邻近战区要地”；10月3日该报送检的《东战场全线出击》，被认为“暴露前线战局的演进与战果，于军事不利”；1944年1月17日《阵中日报》送检的《常德会战活铁军》，被认为“报道我军在常德会战中所取战术之优点，触犯禁载标准”。一些国际敏感问题的文章也被禁止刊登，如1944年1月20日《柳州日报》送检的《传英、德言和》，《柳州晚报》送检的《空穴来风》，23日《鱼峰报》三日刊送检的《英德言和之谣传》等，均被认为“评论英德媾和问题，及揭示盟国政治上的齟齬，有碍团结”。

(三) 新闻检查的“大事件”

由于执行新闻检查政策，战时柳州新闻界出现了几件影响较大的“事件”。下面进行简略的介绍。

1.《中正日报》的“违检”

《中正日报》为第四战区政治部机关报，但在1942年10月19日鲁迅忌辰日，该报“违检”出了特刊以示纪念。专刊一出，柳州新检室检查长赖振家即去交涉，但该报采编主任凌柳、副刊编辑钱贯宇“不顾党的立场，籍词争辩”，使得赖振家在向新闻检查局报告中，称凌、钱二人“思想均欠正确……一若不满现状，别有世界”，同时要求第四战区政治部对二人特别注意。

1943年8月9日，柳州柳长路板凳坳车上发生抢劫案。同条新闻，《柳州日报》送检的被扣，而《中正日报》“违检”刊登了。《柳州日报》立即抗议柳州新检室，指责该室有所偏袒。其检查长赖振家有口难辩，迫于压力，宣布给该报“严重警告处分”。

2.《柳州日报》的“逆”字风波

1944年1月28日《柳州日报》第三版一条“魏道明大使述国内印象”新闻中，第一句“魏大使道明返重庆后，二十六日晋谒蒋主席、孔副院长、暨宋部长述

职”中在“晋谒蒋主席”一句“蒋”字之上原留空格(民国时期一种行文方式,以示尊敬)的地方赫然嵌进了个“逆”字、变为“晋谒逆蒋主席”。而此事在发行后才发觉。该报立即将尚未寄往外埠的报纸把“逆”字涂去,并迅将当日经手排印的工人开除。柳州新检室也马上赴该报调查,查明后确认“属报手民误植字粒,校对失察”。并连忙将此事连同该室检查该报的第一、二次校对稿附上呈报新闻检查局,又被该局转报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及中央宣传部。最后,对该报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将该报校对长开除,其社长、副社长记大过处分。这起被县党部称之为由该报“奸伪分子”做的“侮辱领袖之报”的风波就这样结束。

3.柳州《前锋报》的被禁

柳州《前锋报》三日刊1943年11月28日首版刊登了一条新闻,其标题醒目:“献美葬生记”。写的是当年广东鹤山县县长高升荣为调离本县不择手段,利用该县一烟土贩子的50万元和自己的五姨太太,献给当地“某将军”而办成了调离。不曾想,他在上任顺德县长坐汽艇的途中竟跳海溺毙。该文章立即遭到了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指责,认为该文涉及了西江游击指挥官朱朝日及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要求柳州新检室查办该报。该室迫于无奈,向新闻检查局报告。该局“为顾全四战区威信,拟(该报)停刊一月之处分”。但张发奎得知后,立即致电新闻检查局局长商震,要求“科予(该报)永久停刊处分,藉正舆论,以利抗战”。慑于张发奎之权力与压力,新检局遂下令该报于1944年6月1日“永久停刊”。而柳州新检室检查长赖振家没有因《柳州日报》“逆”字风波而受处理,却因该报而受记过处分,并于同年6月3日辞去检查长一职。7月该检查长由莫国粹接任。

在文化出版界的长期斗争和全国舆论界的广泛谴责声中,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于1945年10月废除了出版检查制度,并撤销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及战时新闻检查局,柳州新闻检查室随之结束。

(作者:喻春生,选自《柳南文史资料》第七辑)

参考资料:

-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党新闻检查局档案
- 2.《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1949)(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 3.鄢启新:《解放前的柳州日报概况》(《柳州古今》,1993年第三期)

抗战时期的《柳州日报》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进步的文化人荟萃广西桂林,而被国内外誉为“文化城”。距桂林百公里的柳州,当时也有不少文化人和文化团体经常从桂林等地来柳州工作,配合桂林的文化活动,表现得活跃和繁荣,人们曾称柳州为桂林的文化卫星城。

在这座文化卫星城起中坚作用的是《柳州日报》。从抗战初期的四十年代开始,《柳州日报》就在中共地下党的进步人士的领导之下,通过新闻报道、社论、专论、文艺副刊等,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教育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并掩护、团结了近百个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开展工作。1942年左右,《柳州日报》的发行量达6000至10000多份。在1944年秋至1945年夏柳州地区沦陷期间,以《柳州日报》特委、桂林文化支部、柳北地下党为核心,在罗城、融县和柳城县开辟了抗日游击区,建立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

社论鼓舞人心

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柳州日报》即发表了题为《新形势与新任务》的社论,并即发号外。柳江两岸的大批人群抢购号外,以先睹为快,大家都感到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力量增强了,日本更加孤立了,抗战胜利更有把握了。

1942年8月8日《柳州日报》发表一篇论述国内时局的文章《从大处远处看时局》,认为目前抗日战争出现了犬牙交错、互有进退和游击战争大发展的形势,而要使战局从相持阶段转为胜利的反攻阶段,就要进一步发动人民群众,团结各方力量,进行政治改革。社论发表后,报社收到不少从湘鄂前线寄来的读者信件,认为文章分析战局颇有见地,希望以后多发表这类文章。

1942年冬,正是德国希特勒法西斯军队从斯摩棱斯克正面扑向莫斯科的时

候。当时重庆、桂林都有一些悲观的论调,反动分子则乘机诋毁苏联红军,如右派文人陈源在《大公报》发表文章,公然宣称:苏联红军不堪德军之一击,莫斯科的陷落是不可避免的。《柳州日报》当即发表社论《论莫斯科的保卫战》予以反击,断定莫斯科不会失陷。这篇社论发表后得到群众广泛的称赞和好评,桂林的一些进步报刊还作了摘要转载。

沦陷后坚持办报

1944年秋,日军大举进犯湘桂,桂林、柳州相继在11月沦陷。《柳州日报》撤退到罗城县龙岸一带坚持斗争。龙岸是一个方圆二三十公里的村庄,约3000人口,农副产品比较富足,广东来的移民在这里务农的很多。龙岸还是著名文化人士周钢鸣和曾敏之同志的故乡,一大批共产党人和文化人聚集到这里,便着手酝酿、筹备建立抗日武装的组织及活动。

在罗培元同志为领导的地下党《柳州日报》特委的领导下,《柳州日报》的百多名职工分派在龙岸、和睦、黄金等圩镇,出版油印的《柳州日报》。报纸主要接收延安新华社的电讯,改头换面登出来;建立了一支武装警卫队,名为保护报社,实际是开到前线,在半沦陷区开辟工作;还从附近的战时儿童教养院挑选队员,组织了一个儿童宣传队,集中培训后曾去黄金等地做宣传演出。

《柳州日报》油印报一般八开纸一张,两面四版,隔天出一期。有时也出八开纸两张,除第一张是电讯、社论及当地的重要消息,第二张的副刊,则登些小品文、特写、杂感、随笔等。在当时与大后方消息隔绝的情况下,《柳州日报》的油印报非常受人们的欢迎,有时在热闹腾腾的圩期被抢购一空。

1945年5月,苏联红军攻下柏林,《柳州日报》头版头条上标出极为醒目的头号文字标题“苏联国旗飘扬在德国国会之上”,而把“苏联国旗”四个字标成三号字体的眉题,象征着一面旗帜在建筑物上飘扬的形象。这天的报纸在罗城、融县、柳江、宜山等地抢购一空,复印增发了两次。

见证日本投降

1945年6月,日军撤离柳州。《柳州日报》迁回柳州后,社址设在东门城楼上,下层为编辑部,上层当宿舍,住人;起先打统铺,睡在楼板上,后来才用竹篾隔成一个个小房间。电台则设在门楼东侧一间小平房里,报纸起先还是出八开一张油印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报社收到这消息是在晚上9点左右。报社编辑朱杰收到国民党中央社连续三次播出这条电讯,证实消息确实无误,他也把铅笔一掷,叫道:“日本投降了!”于是整个东门城楼沸腾起来,赶刻油印报。但因过于仔细刻标题的图案字,耽误了些时间,发出报纸时已将近10时。报社编辑于逢与几个卖报员拿了报纸沿街叫卖:“《柳州日报》号外,请看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日本投降!”沿路漆黑静寂,家家户户大都熄灯入睡了。有的还有灯光,他们把“日本投降!”听成了“日本过河!”(广州话“投降”与“过河”音相近)连忙熄灯关门。驻河南方面的“盟军”竟乒乒乓乓地打了一轮贺喜枪。卖报员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躲进一间门还开着的国民党某小机关,高兴地告诉他们:“日本投降了!”他们只是冷冷地说:“早知道了。”表情麻木淡然。

(李理想搜集整理)

附录：

抗战时期在柳州活动的部分文化团体一览表

团体名称	主要成员	主要文化活动
抗敌演剧宣传第四队(简称“剧宣四队”)	队长魏曼青,副队长舒模、李超,队员有张客、蒋超等35人。	1940年3月从曲江到广西,驻柳州,参加音乐、话剧演出,创作话剧剧本《一颗手榴弹》、《开小差》等30多个,创作《齐动枪》、《你是个坏东西》等歌曲51首,与剧宣五队合作演出《蜕变》、《国家至上》等,并以《蜕变》参加1944年2月在桂林举行的西南剧展。
抗敌演剧宣传第五队(简称“剧宣五队”)	队长徐桑楚,队员有周云、易行等30多人。	1939年12月来到柳州,期间又多次受命到桂南、粤北、湘中等地演出话剧、歌曲。常驻大龙潭,演出《黑地狱》、《保卫卢沟桥》、《三江好》、《武则天》等剧。
抗敌演剧宣传第七队(简称“剧宣七队”)	队长吴荻舟,队副徐洗尘,支队长蒋湘军、徐方略,队员20多人。	1938年由武汉到广西,曾深入南宁、龙州、柳州、梧州一带农村巡回演出。表演歌剧《军民进行曲》、《农村曲》等节目。
四战区政治部教导大队	队长郑衡,全队50余人。	该队驻柳州,最初仅偏重于一般政训工作,1941年后始开展戏剧演出活动,足迹遍及前线各地。演出的话剧《鞭》参加西南剧展。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漫画宣传队	队员陆志庠、黄茅等。	1939年1月起,先后在桂林阳朔、平乐、荔浦、柳州、桂平、藤县、梧州、南宁、宾阳等地举行抗战漫画巡回展览,培训各地漫画作者。
中国木刻研究会桂林分会	刘建庵为理事。	1942、1943年在桂林举办第一届、第二届“全国双十木刻展览会”,画展结束后,继续到柳州、宜山、百色等地巡回展出。
广西美术会	理事陈宏、沈钺、张家瑶等,会员20多人。	抗战期间举办“七七”美展、联合美展。1941冬,接办桂林美专,先后在桂林、柳州、衡阳等地举办筹募桂林美专基金画展。
柳州四维平剧社		为1940年成立的桂林四维平剧社的分社,1944年到桂林参加西南剧展,演出《聂政之死》、《梁红玉》(欧阳予倩编导)。

(林冬、李理想搜集整理)

参考资料：

- 1.《桂林抗战文化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 2.《柳州市志》第六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抗战时期在柳州活动的部分文化人士一览表

姓名	生卒时间	籍贯	职业	抗战期间文化活动简述	新中国成立后情况
巴金	1904—2005	四川成都	作家	1938年到柳州停留三天,会见主编《宇宙风》的林憾庐父子,后写有关于柳州见闻的回忆录。	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茅盾	1896—1981	浙江嘉兴	作家 评论家	1942年经柳州前往重庆,看望剧宣五队队员,后写有关于柳州见闻的回忆录。	任文化部部长。
田汉	1898—1968	湖南长沙	戏剧家	多次到柳州,看望剧宣四、五队队员,参加四、五队成立周年活动。	任中国剧协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
夏衍	1900—1995	浙江杭州	戏剧家	1939、1941年两次到柳州,看望剧宣五队队员,根据在柳州的见闻写成四幕话剧《水乡吟》。	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魏曼青			戏剧家	剧宣四队队长,经常带队到广西各地宣传演出。带队到桂林参加西南戏剧展览大会,任大会筹备委员。	
李超	1914—1995	河北迁安	戏剧家	剧宣四队副队长,带队在广西各地开展宣传演出,创作剧目《湘桂线上》、《边城之家》等。	任文化部艺术教育局副局长。
张客	1915—1989	天津宝坻	导演、 教授	剧宣四队编剧、导演,随队常驻柳州,创作剧目有《逃》、《最后一颗手榴弹》等。	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
徐桑楚	1916—2011	浙江鄞县	戏剧家	剧宣五队队长,率队常驻柳州,在湖南、广西沿线、前线演出,参与演出《黑地狱》、《民族之光》等。	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

续表

姓名	生卒时间	籍贯	职业	抗战期间文化活动简述	新中国成立后情况
许之乔	1914—1986	广西 桂林	作家、 剧作家	1943年加入剧宣五队,在桂林、柳州等地演出,代表作有独幕剧《三江好》。	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吴荻舟	1907—1992	福建 龙岩	戏剧家	剧宣七队队长,1941年6月率队到柳州,在湘桂沿线各地演出。创作《打鬼子去》、《月亮下去了》等。	任全国少年儿童艺术委员会委员。
徐洗尘			戏剧家	剧宣七队副队长,多次带队到柳州、桂林等地演出。	任广东省群众艺术馆馆长。
何家槐	1911—1969	浙江 义乌	作家、 文学 评论家	在四战区做统战工作,往返于桂林、柳州等地,撰写散文、评论、小说,出版散文集《冒烟集》。	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
曾敏之	1917—2015	广西 罗城	作家、 记者	抗战时期任《柳州日报》驻桂林特派记者,撰写报告、特写、通讯、散文、诗歌等。	任《大公报》记者、暨南大学教授,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
陆田	1916—2000	江苏 无锡	版画家	1942年初从湖南到广西从事抗日美术活动,在柳州主办全国木刻展览。作品选入《中国版画集》、《抗战八年木刻选集》等。	任柳州市教育工会秘书长、市文联副主席。后在广西艺术学院执教。
丰子恺	1898—1975	浙江 桐乡	漫画家、 作家	1938年到宜山县,开展教学创作、抗战艺术宣传,撰写《宜山遇炸记》等散文,创作绘画作品《若时降雨》等。	任中国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等。
陆志庠	1910—1992	上海 川沙	漫画家	1939年代表抗日漫画宣传队第一队先后到阳朔、柳州、梧州、南宁等地举办漫画流动展览。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续表

姓名	生卒时间	籍贯	职业	抗战期间文化活动简述	新中国成立后情况
舒 模	1912—1992	江苏南京	作曲家、 演员	剧宣四队副队长,1940年起以柳州为驻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4年多,创作歌曲有《你这个坏东西》、《军民合作》等。	任中国音协浙江分会主席、中国戏曲研究院艺术研究室主任等。
马思聪	1912—1987	广东海丰	音乐家	1944年在柳州举办个人音乐会,看望剧宣五队队员。	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后到美国定居。
孙 慎	1916—	浙江镇海	音乐家	1940年赴柳州,参加四战区宣传慰问团,开展抗日歌咏活动,组织歌咏团体。	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顾问。
严 恭	1914—2010	江苏南京	导演、 演员	参加《戏剧春秋》编辑部工作,创作发表独幕剧《军用列车》,主演《大雷雨》、《戏剧春秋》等话剧。	在中央文化部电影局、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
黄荣灿	1920—1952	重庆	版画家	抗战期间任《柳州日报》副刊文艺版主编,加入剧宣五队,在柳州市柳侯公园举办《前线写生》画展。	抗战胜利后去台湾,1952年被台湾当局杀害。
邵一萍 (女)	1910—1963	浙江东阳	国画家	抗战期间,曾经到桂林、柳州等地开展抗战美术活动。	任湖南省湘绣研究所画师。
邓俊群	1906—1990	广西融水	国画家	抗战时期在桂林美术专科学校、桂林榕门美术专科学校教国画课。1944年秋湘桂大撤退,回到家乡融水县。	在柳州一中、柳州六中任教,业余作画,曾在北京开画展。
潘文经	1906—2008	广西鹿寨	国画家	参加徐悲鸿创办的广西省会国民基础学校艺术师资训练班,及其组织的中国画联展义卖活动。	任鹿寨县美协主席、鹿州画院院长。

续表

姓名	生卒时间	籍贯	职业	抗战期间文化活动简述	新中国成立后情况
黎冰鸿	1913—1986	广东东莞	油画家	1943年到桂林,创作不少反映抗战题材的水彩画、油画。1945年7月赴桂柳前线搜集素材,创作大反攻作品。	任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副院长。
曾恕一	1909—1988	广西兴安	指画家	抗战期间曾在桂林、柳州举办过个人指画展,代表作有:《麻雀竹子》、《群雀霜枝》等。	在兴安县秦堤风景管委会工作。
余武章	1917—1988	广西融水	工艺美术家	在广西省立艺术师资训练班、桂林榕门美专任教。1944年举办图案画展,桂林沦陷前夕撤往融水老家,组织自卫游击队,任中队长。	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广西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
郑可	1906—1987	广东新会	工艺美术家	在第四战区从事文艺宣传工作,经常来往于桂林、柳州等地,创作了不少战地素描、速写。	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

(林冬、李理想搜集整理)

参考资料:

《桂林抗战文化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抗战期间在柳州创作或演出的部分文艺作品一览表

作品名称	类别	创作时间	主创人员	主要内容
蜕变	话剧	1940年	编剧曹禺, 导演张客, 剧宣四队演出	讲述国民党的一所伤兵医院, 通过医生、护士的爱国热情, 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为伤员做手术的事例, 转变了以往懒散腐败的风气。
桂南前线 无战事	话剧	1940年	剧宣四队	在昆仑关战事结束之后, 根据亲临前线清扫战场、沿途劳军、招抚流亡工作的所见所闻而写成, 表现军民同仇敌忾和胜利后的喜悦心情。
花烛之夜	话剧	不详	李超编剧, 剧宣四队演出	写一日本军官迎娶华女之夜, 我游击队杀来, 将日本军官送上了西天, 花烛之夜变成了送葬之夜。
七年了	活报剧	1944年	剧宣四队	讲述一个演剧队克服自身的弱点, 奔赴遭受劫难的村庄, 去救护那里的父老兄弟的故事。
伤兵医院	活报剧	1944年	剧宣四队	讲述国民党当局如何残酷地剥削和虐待为抗日而负伤的战士, 剧中勾画了一个国民党官僚的丑恶形象。
同盟军进行曲	活报剧	1944年	新中国剧社、剧宣四、九队集体创作	讲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 以苏联红军为首的正义力量已经开始在欧洲进行全面反攻, 扭转军事形势, 解放东欧各国人民。
战地新歌	歌曲集	1940年	孙慎编选、何家槐主编	该歌曲集收有张发奎、孙慎、联抗、麦新、黄凛有关新音乐活动的文章, 收录一般歌曲、纪念歌曲、儿童歌曲、创作民歌、民歌配词的歌曲52首。
新游击队之歌	歌曲	1940年	何家槐词、孙慎曲	歌曲旋律轻松、活泼, 表现了在抗日战争艰苦的环境中, 革命战士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必胜的信心。

(林冬、李理想搜集整理)

参考资料:

《桂林抗战文化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

抗战时期在柳州举办的部分美术展览一览表

展览名称	展出地点(刊物)	时间	作者
木刻作品展览 (作品 300 件)	柳州中学内	1941-06	四战区特别 党部供稿
战地画册	柳侯祠内	1942-03-03	剧宣五队
游韵珊(女)画册	柳江三青团部内	1942-03-11	游韵珊
战地写生画展	柳侯公园内	1942-03	沈干逸
马万里画展	柳侯商会内	1942-04-18	马万里
建军画展(柳州展出, 广东省军管区特支主办)	刊于《柳州日报》	1942-08-02	建 军
中国木刻展览会柳州区 展览(柳州作品 65 件)	大南路广东同乡会 文化服务部内	1942-10	林汉慕、野明、 铎文、陈庆等人
段远宏画展	映山街湖广小学内	1942-11-13	段远宏

抗战时期在《柳州日报》发表的部分绘画作品一览表

作品名称	展出、发表时间	作者
劳工(木刻)	1941-11-29	力 军
青年团结(木刻)	1941-11-29	丹 凤
我要反攻(木刻)	1941-11-29	野 明
拾粪孩(木刻)	1942-06-04	洁 明
寿生(木刻)	1942-02-04	王(名不详)
黄荣灿战地写生画展特刊	1942-03-18	黄荣灿
看看这满目嗟伤的世界(木刻)	1942-03-22	宋 平
我们歌唱五月	1942-05-09	力 军
纪念五四	1942-06-09	林汉慕
五卅惨案	1942-06-09	江 虹

续表

作品名称	展出、发表时间	作者
家乡的新生活(版画)	1942-06-12	江虹
一个忠于工作的人	1942-08-02	宋平
下乡去	1942-08-02	佚名
前方即景	1942-08-02	刘仑
我等着你说的日子	1942-09-21	力军
湘东小煤矿	1942-09-21	李桦
下种子、渡江女	1942-09-21	陆田
选茶女	1942-09-21	新波
后方资源	1942-11-11	江虹
纪念塔	1942-11-11	陆田
我的苛求	1942-08-02	沈振黄
救救孩子	1942-11-11	黄荣灿
刘阳门战	1942-11-11	力军
开夜车	1942-12-26	黄荣灿
背柴女	1942-12-26	林青
爸爸归来	1942-12-26	姚新
北海絮语	1942-12-26	马丁

(选自《柳州市志》第六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柳州抗战文物保护与利用研究

抗日战争是近代史上中华民族抵御外侵、第一次取得全面胜利的伟大战争,是载入人类史册的重大事件。抗战时期,柳州作为西南大后方和广西的军事重镇,也是国际抗击法西斯的重要基地,见证了许多抗战历史事件,也留下了一大批抗战文物。这些文物提醒着人们永远不能忘记中华民族那段无比惨痛的历史,并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同时,这些文物由于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建筑特色,具有较大的开发利用价值。

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为了响应国家的重大决定,弘扬抗战文化,传承抗战精神,牢记历史,发挥抗战文物的独特作用,2014年,市政协组成了由市政协副主席覃泽芬牵头的课题组,先后到张公岭环山碉堡群遗址、飞虎队营房旧址、桂南会战检讨会旧址等抗战文物实地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部门和委员专家的意见,形成了推动柳州抗战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具体对策建议,现报告如下。

一、柳州抗战历史简介

抗日战争期间,柳州作为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既是西南抗战的大后方,也是抗击日军的最前线。抗战开始不久,柳州就成为日军轰炸的重点目标,百姓遭受了深重的战争灾难。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驻军柳州的桂系第七军奉命北上抗日,在淞沪会战中打出了“钢军”的威名。1938年10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至柳州。1939年12月15日,苏联援华空军进驻柳州,揭开柳州中苏联合抗日的序幕。1940年1月10日,蒋介石飞抵柳州,策勉官兵加紧作战,收复失地,并于2月22日再次临柳,主持召开桂南会战检讨会。同年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迁驻柳州。1941年,美国空军志愿队来柳州协助抗日。1942年10月1日,越南革命同盟会在柳州正式成立。1943年,美第十四航空队下属中美混合联队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七十六中队进驻柳州,受命对日本占领下的香港、广州、台湾及日本本土进行轰炸。1944年11月,柳州沦陷,被日军占领期间,柳州人民饱受侵略者烧

杀掳掠之苦,伤亡损失惨重,柳州(含柳江、柳城)被杀害的群众就达6595人,伤34754人,失踪4350人,被烧毁房屋38431间。1945年6月29日柳州光复。

二、柳州抗战文物概况

柳州市抗战文物保护单位共有8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文物点2处。

(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柳州旧机场及城防工事群旧址。由柳州机场旧址、张公岭环山工事碉堡群旧址、柳州防御工事碉堡群三个部分组成。柳州机场旧址始建于1929年,现存遗迹包括飞机跑道、机场指挥塔、山洞飞机库、油库及哨所、山洞弹药库、飞虎队营房旧址等,在抗日战争期间,曾驻扎我国空军部队、苏联志愿航空队、美国飞虎队。张公岭环山工事碉堡群旧址占地700多亩,满山明碉暗堡,战壕深藏地下可绕至岭顶,用当时极其稀有的钢筋混凝土建造,极其坚固,有战壕、碉堡、瞭望台、地道等设施,主体结构保存较为完整。柳州防御工事碉堡群为保护柳州机场、火车站等重要设施而建,为片石钢筋混凝土结构,形状不一,现存28处,保存基本完好。

2.桂南会战检讨会旧址及护蒋洞。桂南会战检讨会旧址位于柳州市羊角山路龙潭医院家属区内,二层砖木结构建筑。1939年,日本为了切断中国西南交通线,迫使中国投降,发动桂南会战。桂南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在柳州亲自主持召开桂南会战检讨会,今桂南会战检讨会旧址是蒋介石会议期间下榻处。1940年2月21日,桂南会战检讨会开幕当天下午2时左右,日本飞机二十余架集中对会议举行地——羊角山一带进行轰炸,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等躲进距会场150米左右的山洞内躲避,逃过了敌机的轰炸,该山洞后称“护蒋洞”。

3.胡志明旧居。胡志明旧居文物保护单位由胡志明旧居、乐群社旧址、蟠龙山扣留所旧址、红楼旧址四部分组成。胡志明旧居位于柳州市柳南区柳石路2-1号,1930年建成,时为南洋客栈。1943年9月至1944年9月胡志明在客栈内居住,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乐群社旧址位于柳州市鱼峰区柳石路1-1号,1927年建成,原为柳州汽车总站,1935年改名为乐群社,1938年10月至1939年4月一些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及家属在此居住,并开展革命活动,公开发表了抗战誓言——《韩国独立宣言二十周年纪念宣言》,组建了革命团体——韩国光复阵线青年工作队。1943年9月至1944年9月,胡志明在此办公,从事革命活动,现

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抗日斗争活动纪念馆。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1.廖磊公馆。廖磊公馆位于柳州中山东路,是一座20世纪30年代初期兴建的仿西式的中西合璧的私家独立庭院,是抗日将军廖磊将军于1930年到1937年驻军柳州市时兴建的住宅。廖磊,广西陆川人,1931年任国民党第七军军长,1937年10月率军赴上海抗日,1938年10月兼任民国安徽省主席,1939年病故。廖磊驻军柳州时做了许多强国强军、利民富民的事,如扩建柳州机场、创办广西航空学校、修筑张公岭军事工事、建设柳侯公园、协办龙城中学等。

2.广西农事试验场旧址。广西农事试验场旧址现存于柳州农科所内,是一座创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西合璧建筑。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疏散,华东、华北、华南的大批农学专家、教授荟萃广西柳州市郊沙塘,建立了广西农事试验场、中央农业试验所广西工作站、农林部广西省推广繁殖站和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开设了一百多个研究试验课题,取得了大批重要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沙塘也因此被誉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农都”。

(三)柳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泗角碉楼。位于柳北区石碑坪镇泗角村,建于清光绪初年,楼为方形,边长4.4米,共有三座,高分别为10米、15米、20米,原来为防土匪用。1944年冬当地村民和国民党188师约一个排在此利用碉楼抗击日军,军民配合保住了村庄。1945年春节又重创了前来围攻的日军,碉楼上仍保留了许多弹痕。

(四)登记文物点

1.钟宅。位于罗池路东一巷8号,砖木结构,二层楼房。建于民国初年,1944年因被日本飞机轰炸,部分损毁。东侧的墙壁上残留有日本飞机轰炸扫射的机枪弹痕。

2.水文岩民众避难所。抗日战争时期,柳州谷埠街、柳石路一带的居民为躲避日机轰炸,与当局共同修整了这个岩洞,并在岩洞东边的小山路岩壁上凿了“水文岩民众避难所”石刻。

三、柳州抗战文物的保护与利用现状

(一)抗战文物保护利用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

柳州市重视抗战文物保护工作,抗战文物保护和利用取得长足进展,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开展抗战文物普查,公布文物保护单位。以国家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为契机,柳州市全面普查境内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发现大量抗战文物。同时柳州市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发展需要,系统进行了美国“飞虎队”遗址和飞机坠毁地普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柳州活动旧址普查、胡志明柳州活动旧址等专题普查,系统发现抗战文物,收集整理抗战资料,将抗战遗迹申报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2.编制保护规划,修缮抗战文物。柳州市三处抗战文物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和国家文物局要求,需要编制保护规划。目前,《胡志明旧居保护规划》已编制完成并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复,《昆仑关战役旧址保护规划》(桂南会战检讨会旧址、护蒋洞)已编制完成,正逐级上报审核,《柳州旧机场及城防工事群旧址保护规划》已请设计单位编制大纲上报国家申请立项。2000年以来,柳州市维修了桂南会战检讨会旧址、胡志明旧居、乐群社旧址、旧机场礼堂、廖磊公馆等抗战文物,加强了文物安全保护,促进有效利用。2014年,国家文物局下拨资金维修桂南会战检讨会旧址,计划2015年实施。

3.开辟为博物馆,加强利用。利用胡志明旧居开辟为胡志明旧居陈列馆,布置胡志明与中国主题陈列,主要内容为胡志明与中国、胡志明在柳州的活动,展现中国对越南抗日、抗法、抗美的无私援助,以及中越两国、两党的友谊。展览开放以来,大量中越两国政要、游客参观,促进中越文化交流;利用乐群社旧址开辟为柳州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抗日斗争活动陈列馆,布置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柳抗日斗争活动陈列展览,展示在抗日艰苦环境下,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无私帮助和共同抗日的友谊,促进中韩文化交流。

4.开展抗战纪念活动,出版抗战丛书。柳州市已完成建立抗战文物标志牌工作,对宣传保护抗战文物起到积极作用。抗战胜利六十年期间,柳州市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并组织编撰了《抗战中的柳州》丛书,包括《烽火中的柳州》、《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柳州》、《越南胡志明在柳州》、《美国“飞虎队”在柳州》,并与电视、报纸等媒体合作,系统宣传抗战历史。

(二)抗战文物保护和利用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1.资金不足,抗战文物保护工作滞后。由于缺乏保护资金,柳州旧机场及城防工事群旧址无法启动保护规划编制工作,而保护规划是申报国家保护资金的

前提,没有保护规划,国家文物局不会投入保护资金。一些抗战文物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有效的保护,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柳州机场及城防工事群旧址,其包含的张公岭环山工事碉堡群遗址内部钢筋被盗、战壕部分开裂严重、排水设施遭到破坏,周边垃圾成堆;它的另一个文物点“飞虎队”营房内垃圾遍地、多处漏雨、木质结构腐朽不堪,建筑墙体存在不同程度的开裂。

2.一些重点抗战文物管理权属分散,保护、利用存在困难。因历史原因,一些抗战文物长期被非文物机构占用,不能得到科学的保护、修缮、利用。如旧机场的一些建筑被所有权单位作为仓库出租,桂南会战检讨会旧址文物地属两处,分属两个不同的区属单位,桂南会战检讨会建筑目前仅作为社科院考古所堆放考古材料,护蒋洞因为广西血液中心租给广西北生药业存放酒精,违章建筑一直难以拆除。广西农事试验场由柳州农科所管理,一些珍贵的历史文件资料和动植物标本缺乏科学的保存措施。管理权、产权不清晰,妨碍抗战文物有效利用。作为国际反法西斯重要见证的柳州旧机场旧址,也仅仅在飞虎队营房处设立了“柳州·美国飞虎队抗战文化陈列馆”标志,而且长期没有正常对外开放;作为全国少有、广西仅存的规模宏大、保存完整的军事建筑张公岭环山工事碉堡群遗址,一度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状态。

3.对抗战文物的学术研究不够深入,宣传的力度不大。对柳州抗战历史、抗战人物、抗战文物系统和分类进行专题研究较少,出版的历史书籍也不多。柳州虽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由于抗战文物缺乏有效保护利用,没有深入持久有效地宣传,柳州抗战历史在全国的知名度远不如桂林等城市,普通市民、青少年也对柳州抗战历史了解不深。

四、保护利用柳州抗战文物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对于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柳州抗战文物既反映抗战期间军民同仇敌忾,共同抵御日军侵略的决心,也反映了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为世界和平献身的勇气,还是日军侵华的铁证,这些文物提醒着人们永远不能忘记中华民族那段无比惨痛的历史,提醒着人们落后就要挨打。保护利用好抗战文物,对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开展历史教育,有利于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激励人民铭记国耻,奋发图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二)对于柳州提升历史文化名城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柳州市区6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抗战文物就占了3个,可见抗战文化是柳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柳州抗战文化内涵丰富,既有作为军事建筑设施代表的旧机场旧址,又有国际反法西斯力量见证的飞虎队遗址、韩国临时政府旧址,还有重要军事会战会议见证的桂南检讨会旧址。保护利用好柳州抗战文物,对于彰显柳州抗战文化特色、提升历史文化名城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三)对于发展柳州文化旅游和文化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旅游在当今旅游界已成为主要的旅游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令世界各国人民关注。柳州的抗战遗址有多处是涉及美国、苏联、越南、韩国等多个国家的二战遗址,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国际友谊的见证,随着柳州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也将在对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张公岭环山碉堡群遗址、飞虎队旧址等军事建筑主体保存完好,军事特点突出,具备较强的开发利用价值。将这些抗战文物打造成为文化旅游景点,结合文化产业开发,将为柳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打造文化强市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五、加强柳州抗战文物保护与利用对策

(一)加强领导,建立多部门共同参与抗战文物保护利用的协调机制

要抓住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契机,争取国家、自治区政策资金支持,全面加强抗战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成立柳州市抗战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市领导任组长,文化、财政、国土、规划、发改委等多部门作为成员单位共同参与,出台保护利用抗战文物的文件。各部门各司其职,文化部门提供文物保护方面的保护规划方案,国土部门理顺国土关系,规划部门结合市政规划提出规划建议,由发改委审定抗战文物总的保护和开发方案,多部门共同协作推进抗战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二)全面普查,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建立柳州抗战文物信息档案

对柳州抗战文物进行保护和开发利用,要在充分掌握柳州抗战文物信息的基础上编制保护规划,摸清“家底”必不可少。由市财政拨出柳州抗战文物普查专项资金,普查任务由文物局负责实施,并及时上报普查方案,汇报普查成果,建立柳州抗战文物信息档案。根据文物保存状况及重要性,将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纳入政府保护范畴。加大新技术设备的投

人,对我市所有的抗战文物信息进行数字化采集,在电脑上进行3D立体还原,辅以历史图片展示、文字介绍、视频解说等技术手段,实现网上模拟参观抗战文物。

(三) 加大投入,全面加强对抗战文物的修缮和保护

要按照文物保护单位等级,优先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抗战文物进行保护修缮,市财政拨出专项资金,编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加强对张公岭环山工事碉堡群遗址、“飞虎队”营房、桂南会战检讨会旧址等存在的突出安全隐患及时进行修缮,防止损害扩大。编制好国保单位保护规划,争取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及早到位。其他抗战文物也要落实好保护制度,安排维护资金,切实解决文物看护人员经费,提高看护人员待遇和文物保护志愿者补贴标准,强化看护职责,确保抗战文物得到有效保护管理。

(四) 拓宽思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抗战文物的保护利用

由市政府统一协调,将重点文物的管理权限逐步移交给市文物部门,由市文物部门统一管理。对于目前条件尚不成熟,不能尽快移交给文物部门的,由文物部门与权属单位签订文物保护责任合同,制订文物保护规划,明确保护措施,落实文物保护责任,由文物部门定期督促检查权属单位落实情况,并向市政府报告检查情况。建立政府主导、民间资本参与的抗战文物保护利用体系,在保护抗战文物的完整和原貌的前提下,对重点抗战文物的红线范围外及一般文物点,允许权属单位、社会力量、个人参与合理开发,享受文化产业优惠政策,解决文物保护资金不足的问题。

(五) 加强研究,推进抗战文物有关资料的综合利用

设立社科课题专项资金,组织高校、科研单位、机关事业单位对柳州抗战历史和抗战文物保护与利用分专题进行深入研究,形成学术成果,在全国主要抗战学术期刊上发布交流。组织寻访抗战老兵,记录抗战口述史,征集民间抗战文物。整合文化、档案、党史、地志、图书馆、柳州电视台、柳州日报社等单位的抗战史料和相关资源信息,整理出版以抗战遗址、抗战英烈、抗战老兵口述史等为主要内容的柳州抗战历史书籍,拍摄相关的电视专题片,并建设以柳州抗战历史为主题的专题网站,包括有关书籍、图片、研究文章、专题展览、视频等丰富内容,实现柳州抗战类文史资料的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

(六)突出特色,实施重点抗战文物开发利用项目

根据抗战文物各自特点,结合历史教育、文化产业开发、休闲旅游建设,实施一批重点抗战文物开发利用项目,打造成为知名文化旅游景点。

1.依托张公岭环山工事碉堡群旧址,建设广西军事主题文化公园。

张公岭环山工事碉堡群遗址体量巨大,其城防工事建筑特色鲜明,资源稀缺且颇具规模,具有较强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开发利用价值。建议在充分保护张公岭军事遗址的基础上,规划建设以张公岭军事遗址为核心资源,以军事文化为主题,集历史展览、国防教育、军事体验、拓展培训、休闲娱乐、外景拍摄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军事主题文化园区,配套建设体育健身、文化休闲设施,并通过该园区的建设带动柳邕路一带的经济社会发展。

(1)调查摸清文物现状,制定专项保护规划。由市财政拨出专项资金,启动前期工作。对张公岭军事遗址及周边 2000 米范围内的地形图进行测绘,对张公岭军事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摸清张公岭地下文物情况,摸底并理顺张公岭土地产权关系,聘请具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规划编制资质的单位编制《柳州旧机场及城防工事群旧址保护规划》和《张公岭环山工事碉堡群维修方案》。

(2)全面维修军事遗址,再现当年战场实景。拆除保护范围内违章建筑物,通过申请上级资金支持、本级财政资金投入,全面维修张公岭环山工事碉堡群,完善基础设施,恢复其历史规模,增加铁丝网、机枪、指挥和战斗的场景塑像等展陈,再现当年战场实景。组织文史专家对张公岭军事遗址有关历史进行挖掘研究,征集当年历史文物和亲历者的口述史,丰富文物的历史文化内涵,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3)聚集军事主题元素,开设军事体验项目。在军事主题文化公园内设置军事主题展览区,可考虑将柳州军事博物馆搬到张公岭军事主题文化园区,或将飞机、坦克、大炮等军械装备搬到此处,使军事遗址与军事设施相得益彰,充分发挥国防教育功能。开设如乘坐战斗机、驾驶坦克、操控大炮、实弹射击、仿真手榴弹投掷、真人 CS、乘坐热气球等军事主题体验项目,吸引“军迷”体验参与。

(4)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建设休闲娱乐设施。积极招商引资,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园区文物保护范围之外的配套休闲娱乐设施的建设,实现园区建设经营的市场化运作。可建设具有一定档次的餐饮、宾馆、文化体

育、休闲娱乐等设施,突出军事主题特色,为团体拓展、学生军训等提供配套服务,使园区成为集吃、玩、游、住、娱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休闲娱乐消费综合体。

(5) 配套建设文体设施,提升片区整体发展水平。根据柳邕路一带的建设规划,通过政府投入和招商引资吸引社会资金等多元模式,在广西军事主题文化公园周边建设体育文化休闲设施,全面提升该片区的文化品位和文化体育基础设施条件,全面推动该片区的第三产业发展、土地价值提升、城市建设,同时也将为未来柳江县撤县并区、同城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 依托柳州旧机场旧址,建成柳州抗战文化园。

鉴于旧机场各资源点在分布上具有“大聚合,小分散”的特点,打破一般规划在功能分区时“集中连片”的传统布局方式,采取“点线面相结合”的手法,将整个纪念园分为六个大区:柳州·美国“飞虎队”抗战陈列馆、柳州各方抗战活动陈列馆、纪念广场、和平广场、抗战文化研究中心和休闲游乐园林区。

(1) 和平广场。在园区入口处新开辟庄重的和平广场,新塑高大的和平纪念碑一座。同时陈列其他展区已经展出的一些实物外的比较大件的实物或实物的复制品,如飞虎队曾使用的 P-40 战机、B-24 轰炸机、B-25 轰炸机模型等。复制品可以适当安装一些能动装置,增加真实性和趣味性。

(2) 柳州·美国“飞虎队”抗战陈列馆。在已建成的馆内,增加飞虎队有关的文物(或仿制服装、生活用品、武器等),播放飞虎队队员回忆影像资料,设置模拟驾驶体验飞虎队执行战斗任务,使参观者感觉身临其境,重现美国“飞虎队”参与抗战活动的场景。

(3) 柳州各方抗战活动陈列馆。分别陈列国民党桂系、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美军飞虎队、中国人民空军的历史图片、遗物(小型)、文献资料等;陈列桂系军使用柳州机场时的规划、建设、设施、使用情况和重要活动的图片、文字、实物等;陈列飞虎队进驻柳州前柳州的街景、社会现状的文字、图片、实物等;苏联航空志愿队、飞虎队在柳州作战,飞虎队与国民政府交往、联系、合作的图片、文字、实物等;陈列柳州军民支援飞虎队抗战、修建遭受日军破坏的机场、抢运抗战物资的图片、文字、实物等。

(4) 纪念广场。在帽合公园内的营区室外建立纪念广场,恢复李宗仁、白崇禧题词的飞虎队纪念碑(碑座为李宗仁、白崇禧题词,碑身为柱体,碑身上端为一

个小平台,塑翼虎形状的飞虎队战机一架),纪念碑后面和两侧设立碑廊,上刻在柳阵亡将士名单,周边可设置一些关于飞虎队的题词碑刻群、相关雕塑群等,使该区域整体格调庄严、神圣。

(5)抗战文化研究中心。纪念园建成后,利用原有建筑改造使用,成立柳州市抗战文化研究中心,主要负责近现代历史文化研究和对外文化关系史研究。内设较大规模的会议中心,可供学术会议使用。

(6)休闲游乐园林区。可建造、设置一批滑滑梯、秋千、射击、健身等游乐设施及餐饮中心、运动健身中心、儿童游乐中心、综合服务中心、停车场、园林景观等生活设施,以满足游客的休闲需要。

努力将柳州抗战纪念园建成“飞虎队”研究展示中心、二战时期中美合作史的研究展示中心、西南乃至全国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广西重要的军事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成后,将与云南昆明的驼峰纪念馆、南京的空军纪念馆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成为我市主题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环境幽雅,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国家级历史文化AAAA级旅游景区。

3. 依托桂南会战检讨会旧址,建设桂南会战检讨会旧址博物馆。

桂南会战检讨会总结了桂南会战第一阶段和1939年冬季反攻日军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并对桂南会战第一阶段的作战做出了奖罚决定,是抗日战争中有名的军事会议,在抗日史上有显著的记载。军事委员会档案和国民政府档案称此次军事会议为“柳州会议”,与“南岳会议”相提并论。应利用桂南会战检讨会旧址,收集会议内容,参会将领资料、史料,制作展览再现桂南会战检讨会历史风貌,利用电子设备再现当时参加会议的著名将领风采事迹,并播放当时的影像资料辅以说明当时桂南会战之惨烈;陈列展览会议的内容、会议所用的物品和战役时主要人物间来往的密函;布展蒋介石起居室、会议室、守卫室和通讯室。

4. 提升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抗日斗争活动陈列馆,打造中韩文化交流的重点旅游景点。

加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抗日斗争活动陈列展览的扩展工作,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柳活动的旧址如曲园旧址(培新路)、县党部(景行路)、民团指挥部(城中公安分局处)等设立标志牌,配以解说词和旅游路线图,充分展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柳抗日活动的历史轨迹。利用与国内大韩民国陈列馆及韩国独立纪念

馆交流之际,交流信息互通有无,掌握更多有关韩国临时政府在柳州的材料信息,并到各地征集文物充实陈列展览内容,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源,优化规划,提升展览规格和水平,使之成为旅游景点,促进中韩文化交流。

5. 提升胡志明旧居展陈档次,打造中越、东盟文化特色的重要旅游景点。

目前的胡志明旧居由于其使用面积非常窄小,内容少。建议提高陈列档次,扩展陈列内容,通过视频资料、图片、文字、场景再现等全面反映胡志明在柳州的革命活动,并完整展示胡志明在广西及胡志明在中国从事反法复国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历史原貌。同时也可以在旧居内创办越南和东盟人员各种培训基地或开展各种文化、经贸方面的交流活动,使之成为柳州与越南、东盟各国联系的桥梁。使之成为我国唯一一个胡志明在中国、胡志明在广西、胡志明在柳州从事革命活动的瞻仰地和陈列馆,打造成为以中越历史风貌展示和胡志明革命活动陈列为主体的极富中越、东盟文化魅力和思想内涵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6. 依托广西农事试验场旧址,推进广西农事博览园建设。

修缮广西农事试验场旧址的主体建筑,建设抗战“农都”博物馆,通过当时的学术论文、动植物标本、科研器材、历史照片、何康等人的回忆视频等,充分展示沙塘作为抗战“农都”、农业科研兴盛一时的历史。整合利用沙塘乃至柳北郊区一带现有的垦村城堡、郭村水塘、伍廷飏墓、沙塘农事站、董必武题词纪念碑等历史遗迹和柳州农科所的科研资源,以及周边君武森林公园、花果山农业观光旅游胜地等生态资源和丰富的土地资源,打造一个以体验抗战农业历史、农业文明历史、现代农业科技、生态农业为特点,突出体验性和互动性,开展农业科普教育,发展农业休闲旅游经济的开放性园区。

(七) 结合旅游开发,规划好抗战文化旅游线路。

在将抗战文物打造成文化旅游景点的基础上,根据其自身特点,结合周边环境和旅游景点,规划设计不同的抗战文化旅游线路,寓教于游,使游客感受柳州浓厚的抗战文化氛围。如市中心的廖磊公馆—钟宅—水汶岩民众避难所—胡志明旧居—韩国临时政府旧址相距较近,可形成步行体验环路;北线的广西农事试验场旧址、泗角碉楼,南线的桂南会战检讨会旧址、旧机场旧址、张公岭环山碉堡群均可结合休闲旅游进行深度开发,经常组织举办骑行、露营、亲子、体育拓展等活动,提高抗战文物的人气,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八)扩大宣传,提高公众对柳州抗战文物的认知度和保护工作的参与度。

在抗战胜利 70 周年之际,举办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历史研究学术研讨活动,邀请国内知名学者、抗战历史专家、各大抗战纪念馆负责人来柳研讨交流,提高柳州抗战历史知名度。征集抗战文物,举办柳州抗战专题展览,并在网上同步设展。举办系列纪念活动,开展骑行、徒步参观柳州抗战文物等活动,在新闻媒体开设专栏介绍柳州抗战历史、抗战人物、抗战文物,在中小学、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举办柳州抗战专题讲座。通过政府网站、微博、微信平台开设柳州抗战文物专题宣传活动,吸引更多人了解柳州抗战文物,支持参与抗战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

(本文为 2014 年柳州市领导重点课题报告)

课题组人员名单

- 组长:覃泽芬 市政协副主席
组员:刘 频 市政协副秘书长
林 冬 市政协学习文史委主任
韦桂芳 市政协学习文史委调研员
杨 洋 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副主任
潘晓军 市文物局局长
李理想 市政协学习文史委秘书科科长

后 记

抗战时期,柳州作为西南大后方和广西的军事重镇,也是国际抗击法西斯的重要基地,见证了许多抗战历史事件。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激发爱国热情,挖掘弘扬柳州抗战文化,丰富柳州历史文化名城内涵,市政协文史委决定征编出版《柳州抗战史录》,年初启动工作,历时大半年,终于结集出版。

柳州抗战类书籍,这些年陆续出版了不少,因此,在征编《柳州抗战史录》时,避免雷同,挖掘新意,就成为编委会的共识。我们考虑,政协文史资料的最大特点是“亲历、亲闻、亲见”,所以在内容形式上,必须坚持“三亲”特色,通过历史真实的精彩片段,来体现此书的独特史料价值;其次,柳州抗战遗存众多,既有抗战时期的建筑、史迹等重要遗存,也有对抗战事件、人物等重要史实具有直接见证意义的实物、文献,是柳州抗战史最为真实和直观的物证,应作为重要内容专辟章节;其三,毗邻桂林抗战文化城的柳州,曾经有大量文化名人途经或滞留柳州,他们及柳州本土文化人士,在柳州积极开展抗战文化活动,留下了丰富的抗战文化史料。因此,从文化抗战和抗战遗存的角度,梳理柳州抗战历史,成为本书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以实录的文字和图片,以历史的片段和独特的视角,来展现柳州在抗战历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书中收录了大量的柳州抗战珍贵史料和回忆文章,特别是部分关于柳州沦陷前后的资料和文章,来自市政协文史委原始档案资料,由亲历者20多年前亲自执笔撰写,属首次公开发表,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此外,有关柳州文化抗战活动,以系列的条目表格表述,信息量十

分丰富。书中披露的作家特别是本土作家对柳州抗战文化贡献的史料,在柳州抗战史方面,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待开垦的研究领域。本书在征集资料过程中,得到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柳州市图书馆、桂林市图书馆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尽管已倾十分之力,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可能仍存在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编者

2015年6月30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州抗战史录 / 政协柳州市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8

(柳州文史资料; 17)

ISBN 978-7-5495-7114-7

I. ①柳… II. ①政… III. ①抗日战争史—柳州市
IV. ①K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126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5.5 字数: 250 千字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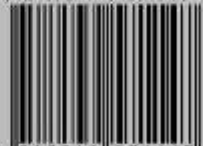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柳州

吴其

ISBN 978-7-5495-7114-7



9 787549 571147 >

定价：45.00元